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第三辑(3) 弗洛伊德主义
与文学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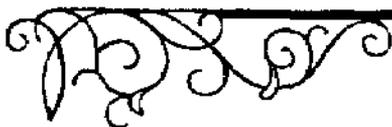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第三辑(3)

王春元 钱中文 主编

弗洛伊德主义 与文学思想

霍夫曼著

王宁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靳建国
封面设计：马少展

Frederick J. Hoffman
FREUDIANISM AND THE LITERARY MIND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第三辑(3)

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
FULOYDEZHUYI YU WENXUE SIXIANG

(美)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著

王宁 谭大立 赵建红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306,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书号 10002·126 定价 2.75元

ISBN 7—108—00018—0/I·6

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

说 明

本译丛主要编译介绍现、当代世界各国文学理论和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选收一些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谨供有关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文艺理论教学参考之用。

近年来，我们围绕着撰写文学原理的准备工作，查阅并组织编译了一定数量的世界文学研究材料。在材料积累过程中，深感我们对最近数十年来国外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知。这种状况，对于建设、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迫切要求，是很不适应的。我们编译这套译丛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期望在和文艺理论界共同改进上述状况的努力中，尽到一点微薄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理论领域的建设。所以，本译丛的选材，以有代表性、有较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重要流派的研究成果。只要我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就一定能够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分析方法去研读这些译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本译丛分辑刊行，每辑包括四部译本，每部译本均由译者或

编审人员撰写前言，对其内容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评价。译本出版的先后和分辑的次序，只是根据编译或出版工作的具体情况而加以排定，并不标示其内在联系，但通观整套丛书，则当能见出其系统性来。

本译丛的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是和文学所内外许多同志的集体努力分不开的。感谢各位翻译家们的辛勤劳动，感谢朱虹、陈棨、吴元迈、兴万生、张英伦、赵毅衡等同志的支持，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关心和鼓励。限于水平，这套译丛的编译工作一定会存在许多缺点和问题，希望学术界、翻译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给以批评指正。

本译丛编译小组成员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王春元、刘保端、邢培明、何文轩、汤学智、杨汉池、钱中文。

王春元、钱中文为编译小组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译小组

目 录

译者前言	王 宁(1)
序	(17)
第一章 弗洛伊德的理论	(21)
第二章 弗洛伊德理论的传播	(66)
第三章 弗洛伊德主义在英美两国	(83)
第四章 影响问题	(115)
第五章 对乔伊斯的影响	(147)
第六章 劳伦斯与弗洛伊德的争论	(186)
第七章 卡夫卡和曼	(215)
第八章 精神分析学的三种美国变体	(273)
第九章 进一步的解释	(323)
第十章 弗洛伊德的先驱	(352)
附录 I 心理学与文学	(370)
附录 II 主要参考书目	(385)

译者前言

西方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流派众多，追求时尚。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的精神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思，导致了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从十九世纪末起，文化界各个领域里就不断出现一些风靡一时的思潮，这些思潮中的代表人物打起“反理性主义”的旗号，公然向传统的观念挑战，同时又在不断地侵袭人们的思想。心理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从一八〇〇年起经过了七十年）”^①而步入文化界以来，不断发展壮大，日臻成熟。断的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心理学本身的领域，进而波及到人类学，语言学，生理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精神分析学派犹如异军突起，从一开始的一支“叛军”逐渐“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逐渐变成了一种心理学的体系和无所不包的人生哲学”。^②作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名字也随着“弗洛伊德主义”(Freudianism)这一术语的产生而蜚声文化界。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主义在心理学界并不十分受到推崇景仰，倒是在文学界影响日增不衰。不管今天的“精神分析

① 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杨立能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二），第3页。

② 见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二），第368页。

批评家”的理论与其创始人的学说相差多远，他们总不愿轻易抛掉“弗洛伊德主义”这个旗号，这就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一番文学思考，以便探讨弗洛伊德对文学的接受和反馈，以及他的文学观点对当代文学的重大影响。

一

弗洛伊德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文化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开始衰落。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曾经鼎盛一时的德国古典哲学也进入了终结阶段。西方古典哲学的衰落导致了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新流派的产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宣扬人的意志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得到满足，因而人生总是充满痛苦悲哀的，尼采则公开宣称“上帝已死”，把叔本华唯意志论发展到“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公然否定基督教精神，开了反理性主义的先声；而柏格森则坚持生物进化学说，鼓吹直觉主义，以神秘来代替生命的科学；斯宾塞走得更远，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社会，打起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所有这些思潮和学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但却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文化进行反思。这些探索者们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无疑都为弗洛伊德主义的产生创造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而弗洛伊德则正是受了这些思潮和流派的启迪和影响，广纳百川汇集成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弗洛伊德生前曾自诩为一位“科学家”，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去探索人类精神生活的“黑暗大陆”——无意识，但是他的理论一经问世，就经历了各种褒贬不一的评论。贬抑者们不分青红皂白，指责他为疯子和“庸医”，对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持根本否定的态度；

而褒誉者们则高度评价了他在二十世纪文化思想史中的地位，称他“和卡尔·马克思一样，提出了一种人类行为的学说，这一学说一开始是极不流行的，只有他自己才相信。同样也和马克思一样，他实质上采取的是哲学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的方法……不管未来的弗洛伊德主义研究者们修改什么原理，或者摈弃什么原理，它的中心论述将继续成为所有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①应当承认，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确有不少谬误，有些甚至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他本人对性问题的探讨是十分严肃的，而且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也有着一定的临床实践基础，因而在治疗精神病过程中也确实取得过一些成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弗洛伊德也和历史上另一些哲学家一样，他们的一些哲学断想虽然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失为真理，但一旦被广泛推广到社会历史学科，就暴露出了其唯心主义实质。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他对西方古典文学名著的鉴赏和分析，因此假想的哲学推断成分大大多于冷静的科学分析成分，这样失之偏颇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弗洛伊德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在这方而已有不少精辟的专论，笔者也曾作过一些尝试。^②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西方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莱昂耐尔·特里林的评论：“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一直是十分巨大的，这一点当然是确信无疑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相当普遍深入的，因此其限度是难以确定的，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常常是歪曲滥用或者荒谬地简化，它已经渗入到我们

① 见雷顿等著，《美国文学思想的背景》（第三版，新泽西），第356页。

② 参阅拙作：《论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及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当代文艺思潮》，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后收入《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

的生活之中，并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这一点，此时还难以明确地意识到。”但是，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弗洛伊德影响文学，文学也同样影响着弗洛伊德。”^①弗洛伊德与文学之关系的渊源，还得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他从小就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十九世纪初风行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极感兴趣。他最喜爱的作家有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歌德、陀斯妥耶夫斯基、吉卜林、马克·吐温、托马斯·曼、茨威格、罗曼·罗兰等。他在《自传》中毫不掩饰地写道，他在文学上最崇拜的偶像是歌德。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反复阅读了《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后来由于其散文文体清新优美而获得一九三〇年的“歌德文学奖”。这一切均为他潜心研究世界文学名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严格说来，弗洛伊德并未出版过一部论文学的专著，专论文学艺术的文章也只有这样一些：《米开朗基罗的摩西》、《诗人与白日梦的关系》、《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列奥纳多·达·芬奇：孩提时回忆的性特征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与狱父》、《妄想与梦》等。在这些专论和另一些著作中，弗洛伊德针对审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根据我个人的粗浅研究，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作的动因——力比多。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文学创作的动因是力比多，即性欲，作家艺术家从事创作是因为要满足他们“本能的欲望”，这些欲望中最强烈的就是性欲。艺术家也和一般人一样，由于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致使他们

^① 见莱昂耐尔·特里林的论文，《弗洛伊德与文学》，收入《自由想象》一书（双重时代公司，一九五三）。

郁郁寡欢，试图在文艺创作中得到感情的渲泄，寻找欢乐，因此他们的创作动因就是这种“性欲的冲动”。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美”这个概念植根于性冲动之中，而人类的审美活动则围绕着性冲动来进行，从性欲中获得“美的享受”。这种看法当然是偏激的，与文艺创作的规律不符合的，因此一些批评家总喜欢将充斥西方文坛的现代派的一些描写色情和凶杀的作品与弗洛伊德的文艺观联系起来。

(二) 创作活动——无意识或自由联想。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部分，这一点也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文学观点中。早在他治疗精神病患者时，就开始实践这一学说了。他把人的精神领域分为三个层次：前意识，意识和无意识，而无意识则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它具有自己的愿望冲动，自己的表现方法以及它特有的精神机制。”艺术家的任务不仅是要表现人的意识活动，而且还要深入到那深不可测的无意识中去，探索心灵的奥秘，以揭示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达到心理上的真实，而非浮于表面的真实。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说确实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表现领域，把文学作品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所谓“自由联想”，就是让病人躺在沙发上，“自由联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胡言乱语、疯子般的语无伦次的呓语及梦中的语言一古脑儿从口中涌出。弗洛伊德在阐述作家的创作活动时，便把这种自由联想与艺术想象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与想象没什么区别”。他的这种自由联想说，从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威廉·詹姆斯开创的意识流理论。第一，正常人在睡梦中的意识流——自由联想；第二，精神病人神经错乱时的不合逻辑的语言。前一种通常叫做睡梦中的意识流，后一种则可称作醒来时的意识流。我认为，这一理论对沟通现实与幻想之间的交流，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纵观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坛，采用意识流手法写作的

艺术大师层出不穷，其手法也日益趋于圆熟老练，变化多端。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对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创作有着卓越的贡献。

(三) 人物的塑造——“升华说”。“升华”一词原为物理学和化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固体物质未经转化为液体就径直“上升”为气体的变化。弗洛伊德借用了这一术语，专指“自我”的活动冲破压抑而得到充分的表现。按照这一观点，艺术家从事文学创作，纯属性本能冲动进而升华的结果。“升华说”用于文学创作中，其作用体现在“把内心的冲突塑造造成外部的形象，”^①主人公的形象通过其自我活动和升华而得到真实的刻画。受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曼、罗曼·罗兰等人就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这一观点，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发掘探测，通过冗长细腻的心理分析使人物的内心外向化，进而升华到一个优雅完满的境地。这对于扩大塑造人物的角度，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层次，使之丰满可信，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 创作主题和批评方法——“俄狄浦斯情结”。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的主人公俄狄浦斯不知不觉地应验了神灵的预言，走上杀父娶母的道路，最后导致了命运的悲剧。弗洛伊德深谙古典文学名著，“根据自己对古希腊悲剧的知识，提取了这个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故事的相似之处，从而为乱伦的欲望发明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术语。”^②他从卷帙浩繁的世界文学名著中，举出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指出这三部作品竟有着同一个主题：“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王之所以“杀死父亲莱厄斯，娶母亲乔卡斯塔为妻，纯属一种愿望的满足

① 见弗洛伊德：《释梦》（伦敦，一九〇〇），第35页。

② 见《美国文学思想的背景》，第350页。

——我们的孩提时代愿望的满足”，《哈姆雷特》“也植根于与《俄狄浦斯王》相同的土壤中。”^①他的这些论断对后来的精神分析派批评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悲剧作品的主题，有着某种启迪作用，但是如用它来解释任何一部作品，其中就必然会蕴含谬误和荒唐之说了。

（五）文艺创作与白日梦。弗洛伊德除了提出无意识和自由联想理论外，还将文艺创作与白日梦作了比较。他认为，创造性作家无异于一个白日梦者，“我们十分明白，许多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与天真幼稚的白日梦的模特儿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把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与白日梦者、将诗歌创作与白日梦相比较并显示出有何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让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明，自己是卓有成效的。”^②弗洛伊德认为，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现成的材料，例如古代史诗的作者，另一种则是创造性作家，即在“光天化日下”做白日梦、创造出艺术材料的作者。而他本人则更喜欢后者，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白日梦诉诸艺术形式，然后转达给读者，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在号召作家突破现实生活的界限，充分发挥创造性和主体作用，创作出富于想象力的艺术作品。我以为这对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来说，有着一定的可取之处。

（六）艺术家与精神病。作为一位行医的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还探讨了艺术家与精神病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病”，而“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

^① 引自伊迪斯·库兹威尔等编，《文学和精神分析学》（纽约，一九八三），第29，31页。

^② 见《文学和精神分析学》，第26，27页。

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① 这就不言而喻地表明，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时，虽然进入了高度的专注状态，如醉如痴，恰象一位精神病人，但他始终有一种理智在控制着自己的神经系统，不致于使之堕入精神病的深渊。这其实和柏拉图所鼓吹的“迷狂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用了一个医学上的术语对之作了概括罢了。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提出自己的假设时，总试图将其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分析学的“科学实验”基础上，使之科学化，概念化。而他对文艺作品的分析，却又是从直觉印象或鉴赏入手，因此提出的看法难免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并不是一个有着系统理论修养的批评家，他虽然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毕竟缺少严格系统的训练，所读作品也只限于个人爱好。此外，他的文学观点缺少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和美学基础，因此常常容易受到攻击或歪曲或甚至误解。例如，他本人素来对性的问题十分严肃，但他在对性问题进行探讨时，却又无限制地夸大了性的作用，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屡遭攻击甚至谩骂；他本人虽反对非理性主义，主张科学和理性，但由于在强调无意识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时，忽视了意识的作用，因而被人误解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本人最喜爱的作家大都是现实主义作家，对他们的精湛写作技艺深感钦佩，但他的文学观点却更受现代派作家推崇，他本人也因而被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在比较艺术家与精神病人时，原想指出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以说明艺术家在创作时是有理智的，但却被人误解为将这二者蓄意混为一谈。弗洛伊德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人，他的理论也包罗万象，庞杂无章，因而也是矛盾的，他对文学艺术的见解虽有启迪人的作用，但也时常陷入

^① 转引自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南粤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269页。

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之中。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弗洛伊德敢于另辟蹊径，走前人未敢涉足的地方，探索几千年来被人视为禁区的地方，并大胆提出自己的假想和推论，这种大无畏的进取精神本身就是令人赞叹的。况且，他的理论中还蕴含着不少合理论的因素，其中有些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考验，已成为作家艺术家创作中不可缺少的指导思想，因此，简单的否定或不加批判的接受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那么，弗洛伊德究竟对文学有多大贡献呢？他究竟应当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什么样的地位呢？眼下作出定论还为时过早。苏联学者维戈茨基在对精神分析学作了一番考察后指出，“弗洛伊德本人的唯一过错，是他试图把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的假梦当作真梦来解释。这反映了他对待艺术作品的幼稚态度……总的说来，这些东西可以归结为：提出了无意识，即扩大了研究范围，指出了艺术中的无意识如何成为社会性的东西。”^①这种看法是比较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但还不足以概括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的贡献。美国学术界则又前进了一步，认为通过“三位德国的思想家尼采、弗洛伊德和荣格，奠定了心理学批评的基础。尼采阐述了悲剧的心理特征；弗洛伊德在对人的心理分析研究中，发现了艺术家的特殊地位；而荣格则用一系列种族无意识原型的陈述来看待艺术。”^②弗洛伊德不仅是因为他的理论丰富了美学理论的宝库，而且还因为他的文学观点对具体的创作和批评实践有着指导作用（不管这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的泛性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影响了好几代作家的创作思想；他的无意识、梦幻和自由联想说则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丰富了创作的技巧；他的精神分

① 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周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第106页。

② 引自《美国百科全书》，一九八〇年版，第八卷，第223页。

析法、人格说和俄狄浦斯情结则成了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的批评武器，并且这一学派至今仍有着发展的趋势。因此我们切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

如果我们并不否认弗洛伊德文艺观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的话，我们还应当意识到，这种影响表现在多方面，涉及到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各个领域。单从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来看，我们就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当然是重要作家）来。其中小说家有杰克·伦敦、德莱塞、劳伦斯、乔伊斯、伍尔芙、普鲁斯特、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路易森、弗兰克、托马斯、安德森、托马斯·曼、罗曼·罗兰、茨威格、索尔·贝娄等；诗人中则有里尔克、庞德、艾略特、杰弗斯、佛洛斯特等；剧作家有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奥尼尔、荒诞派戏剧，以及萨特这样的作家兼思想家。从上述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不仅是那些致力于试验探索新手法之“先锋派”作家受其影响，即使是杰克·伦敦、德莱塞、罗兰、萨特这类曾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也难以幸免其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不感到，弗洛伊德主义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在文学史上确实是罕见的。^①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并得以延续下来的呢？这就需要从思想史和文学的艺术形式以及作家本人的经历和人生观等几方面来探讨。如果说，叔本华对文学的影响仅停留在从哲学上起指导作用，那么尼采的影响就已经渗入到文学创作内部来了，尼采式的“金发碧眼”超人主人公不时地出现在

^① 有关对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影响西方文学的具体例子，请参阅拙作《论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及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

三十年代前的主要作家笔下。但尼采的影响仍然主要是思想上的，因此当另一种新思想、新潮流崛起时，作家们便转而去追求那种时尚了。萨特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不过不同的是，他本人也是个白色的小说家兼剧作家，因此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逝。而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首先，从思想史上来看，他和叔本华、尼采等人有着不少一脉相承的地方，同属于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一线索，只不过弗洛伊德的思想观点更具体、更“科学”、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接受罢了。弗洛伊德主义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之时，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叶，正值传统的理性观念发生变化、非理性主义开始崛起之际；而弗洛伊德主义处于鼎盛之状时，则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这段时期，当时刚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的西方文明，正处于危机和崩溃的边缘，人性遭到践踏，人的价值观念也被破坏了，人成了非人，降低到和动物相差无几的地步，精神病发病率的增长，更是为弗洛伊德主义的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西方知识分子，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在弗洛伊德主义中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从文学史上来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面对着重大的挑战。新崛起的先锋派文学，十分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思潮作为他们的理论支柱，而这时产生的弗洛伊德主义，不仅在思想上给他们以帮助，而且还在文学创作的主题和艺术技巧上，也为他们的探索和试验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刚刚兴起的意识流文学和超现实主义文学，便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有所发挥和创新。最后，从作家本人的经历和人生观来看，受到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作家有下列五大类：第一类主要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功名成就达到了全盛地步，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他们来说，~~概有新灵感~~。例如杰克·伦敦、德莱塞等人就属这类作家之列。第二类作家，如



安德森、乔伊斯等人，赞成并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并将其糅合在自己的创作中。第三类如劳伦斯、卡夫卡等作家，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分歧，并试图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但他们在研究、批判的过程中，却又不自觉地受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最后连他们本人也成了精神分析批评家们分析的对象。第四类作家阵容庞大，他们只接受弗洛伊德的某个观点，或道听途说，或只略有所知，仅用于丰富自己的创作手法。这些作家中有海明威、福克纳、斯特林堡、奥尼尔、伍尔夫、菲茨杰拉德等。第五类则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和弗洛伊德有着个人交往，对他的为人和探索精神深感钦佩，通过和他的交往或书信联系而受其影响。例如罗曼·罗兰、茨威格、里尔克、托马斯·曼等。特别是曼对弗洛伊德颇有研究，并写出长篇论文：《弗洛伊德与未来》、《弗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等，高度评价了他在现代文化各个领域中的突出地位和广泛影响。此外，哲学家兼作家萨特也潜心研究过弗洛伊德主义，写出了专著《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主张用弗洛伊德主义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必要的补充。

弗洛伊德主义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作家的艺术风格和作品的艺术形式上：“……作者的选词，他对象征的运用和对描写意象的运用，他的背景和人物的描写，以及甚至于他的情节安排都不可避免地作者本人心灵中的无意识性呈现给了训练有素的观察者。”^① 翻开二十世纪西方主要作家的作品，这种影响比比皆是。例如，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对男女主人公厄运的安排、对高山之背景和平原之前景的对比式描写就颇有象征意味。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卡夫卡的《城堡》中对恶梦和象征的暗指、在安德森的《多重婚姻》中对性欲和理念的描写、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和

① 见《美国文学思想的背景》，第360—361页。

他的兄弟们》中对约瑟夫故事的处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疯子的呓语以及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对精神病医生娶精神病人为妻的安排中，见到弗洛伊德主义影响文学的痕迹。这些作家大都从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中获得了某种启示，力求在艺术形式上有所突破，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因此，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对指导作家的创作，还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连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也照搬，为了探索无意识而连意识也抛弃，为了标新立异而走向极端，进而违反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只能是走进“反文学”的死胡同，写出的作品也终将被历史淘汰。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文学批评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笔者已另文专论，此处毋容赘言。我想引用几段著名的精神分析批评家诺曼·霍兰的概括，来先行说明精神分析学对文学批评的有效作用：“用精神分析方法来分析一首诗，往往能使我们发现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新的统一。”“……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文学批评，给我们提出了根本的人的问题：不同的个性对同一个事物反映如何？”“最后，精神分析方法除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家及其作品之外，还既以一般方法又以极特殊的专门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读者……”“这种方法引伸开来可以将文学作品中的一般人物理解为一个全面的精神分析过程中的进攻和防御机制，而这种全过程就是文学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尽管不是真实的，有时甚至刻划得不那么真实，但看起来却象真人一样。”^①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也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自觉地、批判地吸取弗洛伊德的某个观点，运用于自己的文学批评中，使得批评的视

^① 见布拉德伯里等编，《当代批评》（阿诺德公司，一九七〇），第139—152页。

野开阔，角度新颖，方法独特，颇为值得我们借鉴。当然，我们决不能为了追求心理学的方法而丢掉社会学和美学的方法，为了弗洛伊德主义而连马克思主义也丢掉了，那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我们的批评走向另一个单一化的窘境之中。

三

以上根据个人的粗浅考察，极为简略地谈了弗洛伊德主义对文学的接受和反馈，因为篇幅所限，未能展开。下面将本书作者及其这本书的特点作一个简单的评介。

弗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一九〇九——一九六七)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兼文学批评家。他生于威斯康星州华盛顿港，一九三四年获斯坦福大学文学士学位，一九三六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一九四二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并赴法国和意大利讲学。他的主要著作有：《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一九四五，一九五七)；与别人合著的有：《小杂志：历史和文献学》(一九四六)，《二十位作家：战后十年的美国文学》(一九五五，一九六二)，《塞缪尔·贝克特：自我的语言》(一九六二)，《人类的荒地：死亡与现代想象》(一九六四)，《想象的新开端：神学和现代文学》(一九六七)，《南方小说的艺术》(一九六八)；并与别人合作编选了许多作家的研究资料。

本书原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后扩充修改为一部专著，一九五七年修改后再版。本书一经问世，便受到评论界的赞扬，被誉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学术研究”^①专著，现已成为研究弗洛

^① 转引自威克曼编，《世界作家，一九五〇——一九七〇》(纽约，一九七五)，第657页。

伊德与文学之关系的一部经典作。本书的特点大概可以归纳如下：

一、资料翔实可靠，涉猎广博。本书作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仔细考察了弗洛伊德与文学可能存在的关系，尽可能地搜集了所论作家的原始资料，包括信件、日记和言论记录，并做到言必有据，因而为后人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并为后人开出了一份较为详细(六十年代前)的基本书目。

二、介绍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从一开始诞生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贬抑者和褒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作者则站在客观的角度，同时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介绍给读者。作者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主要理论，然后又介绍了这些理论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及对文学的影响。同时，作者还通过仔细调查和考证，纠正了一些不合实际的说法。例如，在第六章中，就指出了弗洛伊德与劳伦斯观点的分歧以及二者的争执。

三、评述较为公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同时又不乏具体的实例分析。作者有着扎实的哲学和心理学功底，丰富的文学知识，并熟谙二十世纪的一些主要西方作家的作品，努力通过对具体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找出弗洛伊德影响的踪迹。此外，作者并不停留在简单的分析上，而是探究出弗洛伊德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传统的一脉相承之处，并试图站在美学和思想史的高度，对弗洛伊德的地位和影响作一个评价。尽管这种评价并不能避免偏激之处，但总的说来，过分的贬抑褒誉之词还不多见。

但是，作为一部西方评论家的早期专著，本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有些观点的论述并不能使我们满意，有如下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资料的缺乏，有些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连提都没提到，对弗洛伊德与一些作家的交往、对一些作品的

鉴赏和评论涉及还不多，其实这正是弗洛伊德受到文学影响的极好课题。其次，本书名为《弗洛伊德与文学思想》，却没有深入论述弗洛伊德本人的文学思想；早在一九一〇年，琼斯博士就运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哈姆雷特迟迟延宕报杀父之仇的奥秘了，之后，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的队伍日益壮大，逐步发展成为当代西方批评界的一支主要力量。而本书作者却未能较多地涉及弗洛伊德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这实在是一大缺陷。再者，作者论述的作家仅限于小说家，而且多限于英美作家，对剧作家、诗人及批评家几乎未提及。对于这一点，作者本人已在序言中作了说明。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杨周翰教授和方平先生的关注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的序、第九、第十章及附录一、二由王宁翻译；第一、三章由赵建红翻译；第二、四章由王宁和赵建红合译；第五、六、八章由谭大立翻译；第七章由王宁和谭大立合译；最后由王宁统一校阅全稿。限于时间和水平，书中难免错误，恳请不吝匡正！

王 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

序

本书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介绍和评价，因为它与现代文学颇为有关。我试图清楚地揭示出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弗洛伊德理论的起源，这些理论在西方文化界产生影响的历程，以及它们对一大批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的特殊影响，当然主要是指小说家了。

弗洛伊德的发现和学说已经产生出令人因惑不解的各种各样的反响。社论、训诫、讲演、给编辑的信，以及贯穿着美国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一些个人回忆录，使我们能够估价精神分析的一些最初的影响。文学批评和创造性作品迅速地受到影响。在美国的大都市那些自我意识豪放不羁的艺术家那里，弗洛伊德被攻击为庸医，同时也被人当作圣者受到推崇景仰；他在被人推举为现代心理治疗大师的同时，又因为认可并加强心理混乱失调状态而受到指责。他曾惨淡经营使用了多年的临床疗法也成了某种高谈阔论的儿戏。

把弗洛伊德的著作与他的同代习俗和趋向联系起来，是极为复杂的任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复杂性确实是联想的直接和熟悉的伴随物，也就是一个将要解体的临时性人物，其谬误也将为时光的流逝而得到纠正。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希望对弗洛伊德的重要性仅作一个暂时的估价，尽管他的理论现在已得到充分检验，足以使我们确信其基本的完备性。但是，我还是经常意识到，在我对弗洛伊德主义作的评价中，需要某种严肃认真的判断，因

为它对本世纪的审美活动颇有影响。

在《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这个新版本里，我决定保留原来版本中的实质性内容，因为我相信，那些内容依然构成了对其主题的适当完备和精确的描述。只要有必要，我均对所讨论的题目作了发挥；有些地方我加以删减，特别是在证据似乎不需要增加的地方。自始至终，我重新翻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尽量用最新的资料，在许多地方，我还润色了语言，总之，我试图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使本书增色。

第一章主要概述了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实践。这是一个经过选择的概述，因此在写作时，我带着这样的希望：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对当代文学实验最有意义的那些方面。在这个概述中，似乎省略了的东西恰恰正是那些，而且我正是有意这样做的。然而，我却对弗洛伊德著作的某些部分作了发挥和详尽阐述——诸如对梦的习惯和怪僻的重要研究——因为在我看来，作家们更容易为之所吸引。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试图有选择地在对弗洛伊德的著作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应中，提供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实例——并且也附带描述一下那些偏见和隐秘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表明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接受之特征的那种敌视或讨厌的沉默，这确实已完全成了一样新东西。在诸如我的这些章节中所指出的那些程度上，一个心理发现的哲学理论体系已有了变化和修改——有时竟受到了歪曲，因而它在进入了一个时代的意义之中时，已经是经过相当大的变化了。这种理论的同化几乎不是直接的。科学的简单隐喻和哲学的谨慎使用的术语已适应了审美想象。

第四章则较为具体地讨论了影响问题。在这里，影响得到了考察和估价，同时时代的社会学和思想意识也在其与创作本身的实际和直接的问题的关系之中，得到了讨论。本章结论的那几页，

则总结了我认为弗洛伊德主义为文学上的开拓所提供的主要见解。

接下来就是一些具体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希望弗洛伊德的影响将得到实事求是的表述——一种十分复杂、十分有争议的影响，其结果产生了大量实验和多种观念的形成。（这里我要引起人们去注意新增加的对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的详细考察，而这恰恰在初版中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如果所考虑到的大多数重要作家似乎都反对全然专注于精神分析的影响，那正是因为，我已经努力表明了这样一点：作家对任何一种主要影响的反应，都有着自由的界限。那些既没有表现出那种自由也没有坚持那种抵制态度的作家往往只是具有文献的重要性。我相信，仔细地阅读本书将会显示出，它主要关心的是证明弗洛伊德对现代文学创作的重大意义，但同时也要表明，艺术家确实在坚持一种基本的独立态度，即独立于任何有着某种论述方法的学科约束，尽管这种方法与艺术家本人的方法相似，然而却不尽相同。

在最后一章里，我试图改变或修正一种似乎是这种研究的必然结果的反应。简言之，我并不想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弗洛伊德是对我们当代思想的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影响。鉴于这一原因，我也十分简略地考虑到了十九世纪为数不多的几位思想家，因为他们的影响也是一个决定因素——他们的思想使得对弗洛伊德的反应成为一个十分复杂、而又肯定含混的现象。

作为附录，我把自己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在英文学院宣读的一篇论文收进来；这篇论文随后分发给了现代语言协会的会员（多亏得到了奥纳德·曼海姆的帮助），并发表在《坎尼思评论》上。这篇论文将给读者这样一个概念，考虑到弗洛伊德的贡献，文学理论的扩充和发展是可能的。

我特别要感激恩斯特·克利斯博士，他的专著《艺术的心理分析探索》（国际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精神分析艺术之复杂关系的最有见识的研究。对我这篇论文的论点关系重大的好几处陈述都得益于该书。克利斯博士还提醒我，我可以颇为有利地阐明我构想作为本书涉及范围和目的的那些观点。在他为本书初版撰写的那篇颇有教益的书评（后又载入《艺术的心理分析探索》）中，他颇为中肯地指出，本书略去了一大批完全可以包括进来的欧洲大陆作家。我只好声明，我是有意将对弗洛伊德影响的述评集中于美国和英国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在于使我能够充分、更为满意地论述几位作家。鉴于这一原因，我相信，把曼和卡夫卡包括进来是颇为正当的，但我却不得不忍痛割爱，舍去了赫尔曼·海塞和罗伯特·慕西尔。

在此，我想再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埃利诺·霍夫曼以及所有在我几年前着手这一计划时，给我鼓励、并向我提出宝贵建议的人：密执安大学校长哈兰·H·哈彻；凡得比尔特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列奥纳德·B·比奇；俄亥俄州立大学英文系的哈罗德·R·瓦莱和弗朗西斯·L·乌特莱；华盛顿大学英文系教授罗伯特·B·海尔曼；同时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威廉·萨顿，他在一开始就向我提供了有关舍伍德·安德森的重要资料；以及卡罗琳·F·乌尔里奇小姐，她现已退休在家，但当年曾任纽约公共图书馆期刊部主任，是她为我开放了她那个馆的大量原始资料，因此我才得以研究本世纪的那些小杂志。

弗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

一九五七年八月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第一章 弗洛伊德的理论

—

自从弗洛伊德一九三九年九月去世以来，我们就逐步获得了大量有关他的理论、围绕他的心理学中有争议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以及有关精神分析学派在相关领域内所起到的作用的资料。关于这一影响问题，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但问题本身既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得以澄清。任何决定影响的实质和程度的艰苦努力都会揭示出一种复杂而令人迷惑不解的形式，而对于这种形式人们是难以定义抑或贴标签的。这种令人迷惑不解是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各个学科的转化、解释上的困难和主题本身的性质。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而受到妨碍。从心理学向文学的转变使术语和概念的用法发生了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说来，一旦那些术语和概念运用在文学中，它们就获得了新的意思，或是它们本身的意思有了细微的变化。文学上信奉精神分析学的人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并不是精神分析学家，某些无法克服的障碍使得心理学家无法同艺术家进行密切和明智的合作。同样，艺术家如果查阅弗洛伊德的译著，那他就得不到原著向他提供的准确性这一优势。在很多场合，艺术家给精神分析学带来了自己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有人可能会说，虽然经常存在着兴趣上的很大的一致性，但是艺术家总是允许精神分析学来加以补充，然而却几乎从不允许精神分析学来代替他那独立的判断。

不一致的主要来源在于主题本身，至少从本世纪初起，作家们就设法从多方面表现“非理性”。至于说，在十九世纪引导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的那些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并不总是引导着他们同时代人或后继者的研究兴趣，这一点我们是应当记住的），那要数到这四位：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

在十九世纪，对理性能够充分解释所有伦理和审美的事实这一点渐渐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可称作本世纪“浪漫式抗议”的一部分，但其根源要比那深得多。十九世纪的“非理性主义者”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诸如康德和费希特，他们提出，理性非但没有因一种刺激精神的伦理规则而受到妨碍，反而因此而得到了发展；另一派则站在叔本华和尼采一边，他们认为意志与理性背道而驰，不管盲目与否，它总是损害理性的结构，而且公然无视理性主义的限制。一旦康德确定了理性的界限，对是什么力量使人们的行为非理性——或者直接反对理性的支配，或者无限扩大理性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无限思考就有了余地。

有关弗洛伊德理论（将在第三章讨论）的大量争论——以及其理论受到广泛热情的欢迎，都因为他被看作是一位非理性主义者。但“非理性主义者”这个词适宜于几乎和“浪漫主义者”这个词所适宜的同样多的不同意义。它可能仅仅指一种偏激的态度，例如，反对理性思想的纯粹简化形式。它也许只能替代反唯理智论，主要反对分析，宁要直觉的综合而不要一个非常枯燥乏味和毫无效果的理性过程。最终，非理性主义者也许专心于界定和解释某些知识领域和某些认识方法，而这些知识领域和认识方法为一般人所不知。在所有这些场合，公认的理性的认识方法受到了威胁，即使不被抛弃，至少也得作根本上的修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弗洛伊德本人，精神分析才在我们当代文学界起了模棱两可的作用。他同时是一位生理学家、心理

学家和学者。他对人之科学的兴趣使他不能成为一名纯物质的科学家，使他的注意力离开了无生命的自然界而转向人类的行为。在他的自传中，弗洛伊德否认自己曾向往过一个外科医生的生涯。“我受一种好奇心的驱使，然而这种好奇心是倾向于人类关心的事，而不是自然的物体……”在他生活的最早阶段，弗洛伊德从《圣经》、歌德论自然的文章以及达尔文的理论中接受了三方面的最初指导。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五年，他的兴趣主要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他早期发表的论文都与“鱼的最尾部的一部分脊髓”这类论题有关。他本人也承认，冒险闯入神经病理学是出于金钱上的原因：“着眼于物质利益上的考虑，我便开始研究神经上的疾病……查考特的伟大名字在远方时隐时现地召唤着我。于是，我制定了一个计划：先到维也纳获取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去巴黎继续我的研究”。^①

起初的这些步骤是重要的；它们显示出，鉴于种种原因，弗洛伊德正从研究次等物种转向研究人类的行为；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他作为一位外科医生的兴趣很早就放在了精神疾病上，而没有放在生理疾病上。

一八八五年，弗洛伊德到了巴黎，在那里迈出了既给他带来声誉又使他声名狼藉的第一步。弗洛伊德不满足于对神经病患者作纯粹解剖学上的诊断，他急切地寻求另一种解释。在琼·马丁·查考特的指导下，他开始意识到了解决神经病问题的一种新方法的可能性。在他同时代人没有充分考虑过的事实中，他注意到了“……真正的歇斯底里现象和这些现象与规律的一致性，歇斯底里在人们身上不断发生，^②歇斯底里麻痹症的产生以及由催眠暗

^① 詹姆斯·斯特拉契译：《自传研究》（伦敦一九三六），第13，14，17和18—19页。

^② 直到那时，歇斯底里都被认为是一种尤其对妇女来说的苦惱。

示术所造成的挛缩”。^①

尽管他只是心怀这些设想回到了维也纳，但这些设想清楚地向他说明，为什么医生认为神经病患者得了不治之症而常常不予治疗。的确，当他向维也纳医学界描述他的发现时，这些发现虽然被接受了，但却同时遭到了怀疑和厌恶。因此，他退出了学术界，决定把这些设想进一步向前推进。

一八八六年，弗洛伊德就开始着手进行精神分析的研究了；到那时为止，不仅一种精神生活的新理论的线索不清，而且用来了解事实的方法也是模糊不清的。加之，他还怀疑“解剖学的事实”对这项研究来说是不充分的，因此就注定要在同事中引起不快。他的问题是：既然神经病经过一般医学研究的方法而只是得到蹩脚的治疗，那么对病因的寻求就不充分。肯定还有其他病因，而对那些病因，当时的医学研究还无法下结论。还有另一些方法很可能更接近于发现这些病因，但不管怎么说，冒这个风险还是值得的。但在那时已知的方法中，还有什么可采用的呢？怎样才能不局限于观察神经病患者的表面现象呢？数脉或验血是不能发现这一病因的。

弗洛伊德想到了两种方法：电疗法和催眠术。第一种方法，他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就放弃了；第二种方法，他是在实验室里看到的，显然是成功的。他的问题是如何“从病人身上找出医生不知道的东西。”^②一旦一个人能进入回忆之中，这回忆也许会揭示出某种东西。很显然，进入病人回忆之中的最佳方法是催眠术，因此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鲁尔一起努力工作，旨在发现病

① 《自传研究》，第21页。

② 西格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收入《精神分析学大纲》（小S·凡·台斯勒编，纽约，一九二四），第35页。

人过去的更多情况并把那些情况与现在的病症联系起来。他们的第一个重要实验是在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身上施行的。那姑娘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应该予以认真对待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障碍。”^①通过催眠术，布鲁尔能找到姑娘精神麻痹的原因，并通过向她叙述这些病因治愈了她的病，一旦她清楚并意识到这些病因，她的症状就消失了。

一八九五年，弗洛伊德和布鲁尔公布了他们在《歇斯底里的研究》上合作的成果。在理论上，该书描述了相对于先前神经病研究的一大进展。它着重区别无意识行为与有意识（或较可能是有意识的）行为的重要性；通过假设一种症状是由于情感的压抑而产生的，来介绍一种机能上的因素；同时，把同样的症状看作是大量也可以用在其他方面的能量的产物，该书还介绍了一种经济上的因素。^②

从后来几年的观察来看，这些结论具有研究刚刚开始的特点。有些事实公布了；精神病的本质超出了仅仅是受到怀疑的研究范围；可从其中发现，病源的区域至少得到了观察；一些观察仪器也试着被制作了出来。从这时起，弗洛伊德就不和布鲁尔合作而自己独立工作了。布鲁尔不愿意和他继续在一起，同时对于接受弗洛伊德认为是必然性的许多结论，布鲁尔也犹豫不决。首先，对于受到引诱的催眠状态足以把“不相同的异体”推入“正在觉醒的意识”之中，因而消除了症状的起源这一点，弗洛伊德很满意。这就是所谓的导与法，一种直接而又专断的查明症状的方法。这种方法常常有效，但它忽视了与患者受压抑的早期发展有关的

① 出处同前，第22页。

② 《自传研究》，第38页。

大量重要事实。①弗洛伊德认为，许多这些状态都具有性的起源和发展。他的这种看法也使布鲁尔厌恶，因为查考特就站在他面前。②但并不仅仅是意见分歧导致弗洛伊德与布鲁尔在这时分道扬镳。弗洛伊德不满意催眠的技巧；它的成功既没有规律又无法预测，甚至在催眠术似乎很成功的那些场合，它的成功也是不持久的。在催眠状态下，患者与医生的关系是难处和不肯定的。③弗洛伊德想到，在催眠状态下揭示出来的“回忆”也一定会在非催眠状态下出现；他还想到或许还有进入回忆的其他途径。病人所受到的压抑的特点似乎更有理由对压抑的起因作一更加彻底的研究。(1)病人好象已经把他所受压抑的原因全都忘了，这种“遗忘”好象是“机能上”的——也就是说，遗忘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对被遗忘的东西的绝对厌恶。(2)可以假定，产生遗忘的原因是痛苦的，因而“竭力反对”任何试图回忆这一原因的努力。(3)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设想，病人根本就没有遗忘什么，那被认为是遗忘了的东西实际上是受到了压抑，而不得不以伪装的形式出现。(4)问题是让“被遗忘”的东西以原来的形式在意识中再现。(5)常常有这样一种暗示：“被遗忘”的东西可以从病人早期的生活中找到。

弗洛伊德相信这些事实是重要的。他要求找到一种方法或者技巧。这种方法或技巧可以最佳地向医生描述被遗忘或受压抑的东西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弗洛伊德找到了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病人不用通过诱惑的催眠状态的帮助，就可以在

① 西格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载《弗洛伊德主要著作》布里斯尔编译（纽约，一九三六），第935—936页。

② 出处同前，第937页。

③ 《自传研究》，第47页。参见弗里德·魏特尔斯，《西格蒙·弗洛伊德》，伊魏和西达·保尔合译（纽约，一九二四），第40页。

头脑中重新想起他的过去。乍一看，这个问题几乎是不能解决的：试图发现医生和病人显然都不知道的情况。^①在南锡，弗洛伊德曾观看过伯海姆医生动手术。弗洛伊德接受了伯海姆的建议，然后努力帮助病人“回忆”，从而加强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他要求病人躺在沙发上彻底放松自己，而他则坐在病人的头旁，这样一来病人就无法看到他了。在开始治疗时，弗洛伊德建议对病人说下面这些话：

在我能对你讲任何事情前，我必须知道大量有关你的情况。请告诉我，你都知道你自己一些什么事情……在你开始谈之前，还有一点要交待一下。你和我的谈话必须在某个方面与一次普通的交谈有所不同。你通常把你要叙述的事情的几个头绪放在一起，而把所有干扰的联想和一些枝节问题排除在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止离题太远。在这里，你必须和前面有所不同。你将会注意到，当你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头脑中会出现多种想法。你倾向于把这些想法放在一边，对它们加以评论和反对。你将受到引诱而自言自语道：“在这里，这个或那个是没有联系的，……它是荒谬的，没有必要提到它。”不要听从这些反对意见；即使你对它感到厌恶，或者的确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还是得提一下。今后你会领悟到，并且还能学会理解这一命令的原因，因为这是你必须听从的唯一命令。于是，你把脑中所想的一切全都讲出来，你现在就好象正坐在一列火车的车窗旁，向坐在你身后的人描述你所看到的窗外不断变化的景色。最后，不要忘了你得保证做到绝对诚实，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绝不要因为讲出一些事会令人不

^① 《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第35页。

快而干脆隐瞒不说。①

这里如此简单地说明的，就是“自由联想法”。由于这种方法对病人施加一定的责任，可病人又常常不能承担那责任，因而就有必要用不同的解释和假设来补充这种方法。因为，如果病人将绝对并且毫无保留地听从劝告的话，那他首先就不会是一个病人了。他生病恰恰是因为一些困难妨碍了他去自由联想。当然，这点是精神分析学家预料到的。他决不希望听到一段连贯的叙述，甚至一段合乎理性的叙述。但是他能形成一种解释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掌握病人的正常行为或反常行为所能提供的线索是有效的。②正是通过医生和病人都碰到的那些在催眠状态中不存在的困难，弗洛伊德证实了自己对压抑的机制的怀疑是正确的。因此，从一个将要接受精神分析法治疗的病人着手，我们能够在较容易理解的范围内描述这些困难的性质。

精神分析学家被迫改变自由联想的过程，改变自由联想的方向，并且注意病人叙述中显然无法理解的中断程度，这似乎使病人增强了对直接和诚实的说明的抵触情绪，似乎也指出了在其中可能会碰到这一抵触的方式。遗忘是这一抵触的一个重要特征。阻止被遗忘的东西出现的力量肯定也会首先引起遗忘。这些力量是什么呢？

① 西格蒙·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技巧的进一步建议，论开始治疗……》，收入《西格蒙·弗洛伊德论文集》（伦敦，一九二四），第二卷，第355—356页。

② 精神分析学家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这一问题，在弗洛伊德的许多著作中占有相当的篇幅。参看弗洛伊德：《就精神分析法给医生的建议》一文，收入《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二卷，第323—333页。当然，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具有这样的性格和思想，必须洞晓他自己的心理特征以致不因自己的“情结”或对病人疾病的先入之见而混淆了调查。此外，他必须抑制任何“分析冲动”，因为这些分析冲动使得病人沿着一条显然很容易行得通的道路早些康复。与所有这一切有联系的有关临床安排的大量问题将在以后讨论。

在所有〔致病的〕感受中，一种愿望被唤起了。它与个人的其他欲望是尖锐对立的，不可能与病人伦理的、审美的、个性的私下要求相妥协……正在讨论的思想（譬如，愿望）与“自我”的不一致是压抑的起因，而个人伦理的和其他的的要求则是压抑的力量。

导致疾病的心理障碍远不是身体上受到损伤或精神官能不足的结果，想必是导源于精神上相反力量的某种冲突。再者，弗洛伊德坚决认为没有任何受压抑的愿望可以完全被排除在外，“那种愿望还存在于无意识中，”它最终会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代替受压抑的思想——一种伪装起来而又无法辨认的代替物，痛苦的感觉就与这种代替物发生联系，以致病人以为他已经通过压抑摆脱了那些痛苦的感觉。”^①那么，精神分析学家的任务就是使受压抑的思想暴露出来——也就是说，把它从无意识中转移到意识中。这就是弗洛伊德希望精神分析学家所做的一切。^②

要么病人也许会相信拒绝承认致病的愿望是错误的，他可能被迫全部或部分地承认，致病的愿望是错误的，或者这愿望本身可能会通过被称为“升华”的过程被引向一个不致遭到反抗的更高目标；或者拒绝承认致病的愿望这一做法可能被认为有正确的动机，压抑的无意识因而也是不充分的机制则受到了更高的、更有特点的人的精神官能的加强，凭借有意

^① 《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第36—37，40页。

^② 起初，弗洛伊德拒绝接受医生关于应该起一个顾问作用的想法，宣称对精神神经病压抑的起因的自觉认识就足够了。后来他承认，精神分析学家不得不，但要十分小心地利用自己的身分，以便在某些场合下充当顾问。参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疗法的转向》，收入《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二卷，第397—399页。“……病人应该接受训练，以便解放和满足自己的本性，而不与我们自己相类似。”出处同前，第399页。

识的思想，一个人便能成功地控制自己的愿望。^①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心理生活是复杂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精力的转移和扩散，由于有机体无力追求与“快乐原则”相一致的单一性满足，人类的心理生活便受到了妨碍。由于同现实的冲突和调整群体生活的固定方式的建立，精力的转向便偏离了原先的道路，并在大多数场合下导致正常的生活；但严重的压抑引起精神极端痛苦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精力绝没有安定下来，相反却活跃于无意识中，引导受压抑的愿望沿着秘密而伪装的道路前进，直至怪癖行为产生。因此，即使正常的生活也以同样的方式形成。正常与反常的界限主要在于受压抑的强烈程度以及面对自我反抗，受压抑的愿望试图再现自己时所使用的暴力。^②因而，在日常生活几乎所有的、即使是最普遍和最明显的表现中，诊查受压抑的愿望这一现象是可能的。

弗洛伊德在多方面补充了他的临床疗程。自由联想揭示了奇怪的习惯和表现，而这些奇怪的习惯和表现与正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精神失常并无多大差别。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中，他对正常生活中可观察到的精神失常表现出极大的关注^③。

① 《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第41页。弗洛伊德必须不断地回击那些批评家，因为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学家建议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作为一种控制压抑的方法。从上述引言中可以看出，情况明显不是如此。精神分析学在其简短的历史中，一直与堕落的行为相联系，这一情况既不能归咎于弗洛伊德自己的思想道德不强，也不应归咎于他可能已经提出的不适当建议。这是解释错了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精神分析学同宗教和学校反对推广精神分析学的做法所作的斗争相联系时，更是如此。

② 《自传研究》第86页。

③ 一九〇一年，初版于柏林。再参阅《精神分析学引论》（豪译，纽约，一九二〇），第1—58页。虽然《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一书对于研究正常的行为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其影响相对来说是小的，因而在这里没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总结。

他在对梦的荒谬性的分析以及对有关梦中言语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的发现中，找到了巧妙医治理智和情绪不正常的方法，他把这种方法编入《理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①

但对临床过程最重要的帮助是对梦的解释。心灵表现这一有趣的世界是弗洛伊德最早关心的一个方面；《释梦》^②依然是弗洛伊德的一部拥有最广泛读者的著作，它也是不止一种诗歌和想象理论的基础。相对于诊所中精神分析学家积极却又有意识的概念性联想来说，梦的优势是明显的。弗洛伊德早就声称，释梦是“通向解释无意识的途径，是精神分析最可靠的场所，也是每个工作人员都能在其中获得信念和受到训练的领域。”^③为何会这样说呢？因为梦幻状态对梦的表现没有妨碍，它清楚地说明了，“出现在思想的较深并且又属于无意识的层次中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熟悉的正常的思想过程是大为不同的。”^④梦的作用是导致和延长睡眠。梦是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心理的自我抛弃了外部世界，也抛弃了支配外部世界的现实原则。紧接着，梦将以某种形式表现那些在正常生活中遭到意识世界反对的愿望。潜意识压抑力得到很大放松，只是在保证睡眠这一方面起作用，这也是事实。

梦所显示的所有怪癖行为都归因于梦幻状态中潜意识压抑力

① 一九〇五年初版于莱比锡和维也纳。理智“使某种渴望(淫荡或敌意的)的满足成为可能，尽管存在着障碍……理智向我们提供了超越约束、开辟本来难以接近的快乐源泉的方法。”《理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布里尔译，纽约，一九一六)，第696，698页。

② 写于一八九六——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初版于莱比锡和维也纳。参阅弗洛伊德里克·克拉克·普雷斯科特，《富有诗意的思想》(纽约，一九二二)；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即克里斯托弗·S·J·斯尔里格)，《幻觉与现实：诗歌起源的研究》(伦敦，一九三七)；肯尼斯·伯克，《文学形式的哲学》(巴登卢赫，一九四一)。

③ 《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与发展》，第46页。

④ 《自传研究》，第83页。

的这种作用。如果潜意识压抑力消失，或得到彻底放松，所有无意识愿望的东西就会以毫不掩饰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面貌奔涌而出。但这是一种不可能、或至少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状况。潜意识压抑力只允许这些愿望以伪装的形式表现自己。这样，这些愿望可以享受暂时的和快乐的表现，而不使得做梦的人受到压抑。结果，正如做梦的人记得的那样，梦是混乱和模糊不清的，经常是无法理解和荒谬绝伦的。这种显梦与“潜意识压抑力的愿望”所造成的那样同样混乱和无条理。“一方面，潜意识压抑力的愿望越坏，曲解就显得越大；另一方面，在任何特殊的时候，潜意识压抑力本身越严格，曲解同样会显得越大。”^①

潜梦构成梦的结构的最基本材料，并以愿望的形式出现于显梦（即我们清晨时记得不太清楚的梦）中。

显梦的内容是无意识梦想的伪装起来的代替物，而这种伪装是自我的防卫力量的产物，也是一些阻止力量的产物。在清醒时，这些防卫力量和阻止力量使得受压抑的愿望无法进入意识，甚至在睡眠这一放松过程中，它们依然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受压抑的愿望通过一种伪装而把自己隐藏起来。^②

因而，梦是无意识愿望的伪装的满足。^③ 潜意识压抑力得到放松的事实为临床过程提供了意义。潜意识压抑力依然起作用这一事实则形成了解释上的困难，并引起了对“梦意识”的反复无常状况的多种研究。梦建立在伪装梦想这一必要性之上，有自己的

① 弗洛伊德承认那只是对一种情况较方便的说法，而不是指事情本身。《精神分析学引论》第114，116页。

② 《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与发展》，第48页。

③ 弗洛伊德：《释梦》（布里尔译，纽约，一九一三），第136页。

语言和语法。正是这一给诗人和小说家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们如此感兴趣的表演领域，为在小说中表现无意识状态开辟了新的前景，而且总的来说，可作为某些诗歌和美学理论的基础。不仅精神分析学家，而且现代小说家也能从梦是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之间的一种妥协这一点中有所获益。就目前我们已在讨论的精神分析医生来说，无意识愿望在梦中遇到的阻力是解决患者在其诊所里向他提供的解决困难的线索。^①

对梦的解释证明了弗洛伊德技巧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能作为一种最有用的方法，来代替弗洛伊德已经放弃的催眠法。它强有力地补充了实际临床过程，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无意识的文献”，这一文献提出了一种接近受压抑愿望的方法。最后，既然所有人都做梦，一些非常“善良的”人做极其“邪恶的”梦，这就使弗洛伊德相信，不仅是对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就是对一般的人类行为的解释也存在着共同的基础。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深受弗洛伊德欢迎；他相信自己已经获得了一种比迄今为止的心理学所提出的研究人类特性的任何方法都更为透彻的方法。

因而，他准备提供心理生活发展的一般理论，并用从临床经验中获得的大量证据来证实这一理论。弗洛伊德注意到，病人对

^① 《有关精神分析学的新的介绍性演讲》(斯勃罗特译，纽约，一九三三)设法重申释梦以及将其用于临床目的的困难。“我们在解释梦的过程中所碰到的阻力肯定也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起一些作用。”出处同前，第25页。他还指出，梦是“病理学的产物，是包括歇斯底里在内的一系列症状的第一个因素，摆脱不了的情感和错觉也是其中的因素；由于这些症状的短暂性，而且由于这些症状出现在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条件下，它们与其他的症状是不同的。”出处同前，第27页。弗洛伊德，《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应用》，收入《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二卷，第306—309页。告诫精神分析学家们，不要把梦的解释本身作为目的。“……它的用途应自始至终服从于支配精神分析行为的技术规则。”出处同前，第309页。

在阿瑟·柯斯特勒的《到达与分离》(纽约，一九四三年，第52，62—65，95,102页)中，可以找到把专门梦的分析运用于文学的最有技巧而又最准确的一个例子。

治疗的一种奇怪的反应，是他返回（在症状的表现上或在 对医生本人的反应上）早期的固定——退化的现象。弗洛伊德在努力解释精神病的过程中如此强调幼儿的性本能，这是很自然的事。

分析工作对于一种疾病的全面解释和彻底治疗是必要的，它不会由于疾病开始时的经验而在任何情况下停止，但在一切场合，分析工作必须回到病人的青春期和孩提时代。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决定后期疾病的影响和环境。^①

正确的解释和有效的治疗取决于对病人整个心灵发展过程的检查。在临床经验中所碰到的受压抑的欲望几乎总是与性欲有关的，^②这一事实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洛伊德声称，他早期的老师和合作者中每个人都曾怀疑过精神病的性基础，但每个人都对那种想法感到十分厌恶，避而不去考虑它了。尽管这个兆头不好，他还是继续坚持性本能的问题。综合的事实——精神病转变中的退化现象，精神病患者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性的基础——使他从一开始就对性生活进行了研究。他的《性论三讲》^③的出版招来了更强烈的反对。而弗洛伊德对这些反对置之不理，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传统的阻力”，^④该书在诸如梅莱尼·克

① 《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与发展》第55页，再参看第50页。

②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梦都是与性有关的梦，童年时代的梦几乎总是简单的愿望满足，并从前一天被剥夺的事物中获得内容。参看《释梦》，第107—112页。《精神分析学引论》第八讲，第101—109页。

③ 一九〇五年初版于莱比锡和维也纳，一九一〇年由布里尔医生初次译成英文。

④ “阻力”(resistance)这一术语常被精神分析学家用来作为较容易地(并且在心理上)对付反对精神分析学意见的方法。参看玛丽·安卡编《陪伴病人》(纽约，一九四二)中对使用这一术语的识荆，梅波·桑吉·鲁汉在《移动者与摇荡者》中对使用这一术语的反应。参见《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与发展》，第54—55页。

莱恩以及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这些人的领导下，对修正儿童教育有很大关系。

弗洛伊德首先注意到，“性”这个词本身使用起来就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它的意思几乎没有一致性。有时它可以用来决定性别不同，也可以指性行为；或者也可以用来指下流和猥亵的行为。^①总之，人类行为的重要现象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些肯定都被看作堕落的例证，尽管简单地把它们称为“堕落”对于解释它们的出现或者查出它们的原因并没有什么帮助。^②

同性恋者和堕落者需要更为细致的分类和解释。他们应该被当作“性的对象已发生变化的人”或“性的目标已发生变化的人”，^③传统的反应则是厌恶和愤怒。弗洛伊德认为，理解性心理失常是必要的，假使我们希望知道有关正常性心理的事实的话。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早在一九〇五年前就曾怀疑过的结论）：所有正常性心理和反常性心理从最初的、幼儿时的性生活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论点对于去掉我们最牢固的一个观点——幼儿时代的“天使”理论是一大威胁。当然，所有的人（幼儿除外）都相信，青春期之前，幼儿是没有性欲的，直到社会认为他对性感兴趣是有利的这样一个时候，他才开始对性行为产生兴趣。这种看法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来，是由于“使大多数人（不是所有的人）忘却他们经历的幼儿时期的最初几年，通常为最初的六或八年的奇怪的健忘症。”^④这种“健忘症”在治疗精神病患者的过程中很容易观察到，它也可以用一种非常有效的压抑方式来解释，在这种压抑中，个人和社会携手进行了合作。

① 《精神分析学引论》，第262—263页。

② 弗洛伊德，《性论三讲》，收入《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第554—555页。

③ 《精神分析学引论》，第263—264页。

④ 《性论三讲》，第581页。

弗洛伊德把人的性生活看作有三个阶段，从婴儿阶段开始，直至通过青春期。由于性生活的有限范围，对于性交的无知以及快乐原则对于幼儿初期生活的支配，幼儿的性本能产生了。幼儿寻求本能欲望的迅速满足，而成长常常导致对性的好奇和对满足形式不加选择的追求。^①对性行为的首次接触通常是偶然的，启蒙涉及到一些最温柔的母子关系。性欲的先倾性是从好奇和要求满足的欲望的混合中产生的。当幼儿在器官上最少倾向于把性行为看作重要的时候，在性生活方面的教育早就开始了，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六、八岁至十二、十四岁这一阶段构成所谓的“潜伏期”；在这一阶段中，“厌恶、羞耻、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的要求”这些心理力量最有效地发挥作用（《性论三讲》，第583页）。幼儿在这时对性失去兴趣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既然生殖功能被推迟了，因而幼年的性感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潜伏期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性感是那样的邪恶，因为它们发源于刺激因素，而这些刺激因素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只能引起不愉快之感。”（《性论三讲》，第584页）

对青春期的性的新兴趣把合乎社会需要的、也是必要的方法——检验作为它的目的。在其他两个时期内，性教育的方式，幼儿为了与“正常状态”一致而调整其兴趣的程度，造成了青春期的性特征，性反常行为与同性恋都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性生活，追溯到未能使对性的兴趣转向异性和平常支配性兴趣的、为社会所赞许的目的这种状况。升华与压抑之间的平衡只是十分微妙地保持着，与早期正常的性生活教育的目的任何细微的偏离都可能在生命的

^① 弗洛伊德把幼儿身上的这种倾向称为“多形的违反常情的”的气质，幼儿不加区别的兴趣特征是由于对选择性欲目标和性欲对象缺乏“谨慎”而产生的。如果这一特征在“潜伏期”里得不到控制，就可能导致心理失常。出处同前，第592页。

全过程中继续起作用，结果使得一个人毫无希望获得正常的性生活。

应该提一下有关弗洛伊德对性的动力的解释。弗洛伊德扩大了性欲的概念，从而不仅把婴儿性欲而且把性心理失常也包括在这一概念之内，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在精神分析的术语汇编中，没有任何一个术语能比“利比多”(libido)这个术语得到更不精确的理解了。简单说来，“利比多”就是“性本能”，它是“欲望的本能”之形式。它的满足常常是通过投向一个性欲对象而获得的。但这种性本能可能会从它的对象上退回来，从而“返回自我”——也就是说，这种本能可能投向自我本身而成为自我陶醉的利比多。弗洛伊德很苦恼，甚至气愤地发现这个术语受到了那样严重的误解。这一混乱主要是由于荣格对这一术语的重新解释，认为它的意思是“一般的精神本能”而造成的。依弗洛伊德之见，给利比多下的这一定义使之不适合于科学的用法，而且永远模糊了这一术语在性发展问题中的运用。(《性论三讲》，第611页，第612页)

二

弗洛伊德对人类行为的更重大的问题的兴趣有待于用临床疗程的完善，大量的疾病发病率和实验来进行充分的归纳和思考。奠定这一基础之后，他便准备考虑“心理玄学”，这是一个被他描绘成“精神分析学研究的最终结果”的术语——心理玄学超越了治疗的范围而进入了描述心理学的领域。“我建议，当我们从动力的、解剖的和机能的各方面成功地描述一个心理变化过程的时候，我们将称之为一种心理玄学的表象。”^①这是临床疗程的一个

① 弗洛伊德：《无意识》，收入《弗洛伊德论文集》第四卷，第114页。

合乎逻辑的结果。

另一个理想的推论来自于弗洛伊德必须医治的疾病的数量和种类。解释多种梦幻符号的来源这个问题似乎与前一天思想上或身体上的不适无关，或者根本毫无关系。这个问题使他怀疑一个“古老的层次”。这个层次作为民族思想和梦的表现基础而持续了若干个世纪。（在其他许多观点中），就这一点导致了弗洛伊德与荣格最终分手的激烈论战。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见解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弗洛伊德承认，梦的象征中存在着“种系发生的参照符号”。“梦的工作把我们带回到古代是具有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是个人的古代，即幼儿时代；第二个（就每个个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以或多或少缩短了的方式重新生活过人类完整的发展过程而言）也就是这个古代，即种系发生的时代。”^①

但荣格和他的追随者们则坚持认为，“精神病患者和神经病患者非常详细地重新创造出了神话、宇宙起源说以及人类初期的原始概念。”^②弗洛伊德对这个结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首先，这个结论专断而又绝对；其次，它是排除性关系这一重要根据以及利比多在人类生活中作用的一种方法^③。然而，弗洛伊德相信，他在诊所中进行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某些有关人类行为的结论，而这些行为在民间和原始的心理学区得到了最清楚的说明。在这些结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俄狄浦斯情结”。他首先在《释梦》^④中系统

① 《精神分析学引论》，第167页。

② 魏特尔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第182页。

③ 当然，荣格同样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学家应以宗教领袖和领路人，“哲人和病人的拯救者”自居。出处同前，191页。

④ 使用这个概念来作为分析文学的方法已成了精神分析学家的习惯。例如奥托·兰克，《诗和传说中的乱伦动机》（莱比锡，一九二六）；歌纳斯特·琼斯《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纽约，一九四九）。

地提出了这一结论，然后又在《性论三讲》中对此作了解释，最后在《图腾与禁忌》中把这一结论用作阐明人类许多怪癖行为的方法。这些怪癖行为中主要的一种是原始人对于乱伦以及为了保护自己以防乱伦而提出的严格的社会规则的恐惧；人类学家认为这些约束起源于异族通婚。^①

禁忌是一个有意模棱两可的词，指的是既神圣又危险的对象。禁忌象征着一群人与统治这群人的权威人物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因而原始社会中的人“对其禁律持矛盾的态度；在无意识中，他们只是想违背禁律，但正因为想违背禁律，他们也就产生了恐惧，而且恐惧感比快乐感更强。正如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表现出的那样，在种族中的每个人身上，违背禁律的愿望是无意识的。”

因此，禁忌的基础是“一种受到禁止的行动，对这一行动的强烈爱好则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图腾与禁忌》第55，56页）恰恰因为禁忌受这种无意识愿望的支配，所以它不断地处于受到触犯的危险之中。如果禁忌受到触犯，这样的行为就必须通过“被抛弃”^②的方式受到惩罚。通过与强迫性的精神病比较，弗洛伊德希望解释清楚禁忌的概念。禁忌仪式是“精神神经病强迫性的行动的确当的对应物，在其中受压抑的冲动和压抑它的冲动在共同的和同时的满足中相会了。”这种矛盾的情况在对死者的态度中看得最清楚，在其中，敌意和温和的动机明显地再现。对死者的内疚感和责任感的问题与（目前在正常人身上以某种程度出现的）要所爱的人死去的无意识愿望直接有关。这一矛盾的心理在殡葬仪式中再

① 《图腾与禁忌》（右里尔译，纽约，一九二七），一九一三年初版于维也纳。在他的资料来源中，弗洛伊德使用了乔治·弗雷泽，《金枝》一书（曼丁堡，一八九〇）。

② 当弗洛伊德发展了他的超我概念时，他解释了愿望和悔恨的矛盾心理。参看《新介绍性讲演》，82—92页。

次产生，在仪式中对惩罚的恐惧通过仪式上躲避“恶魔”的方式而得以表现。

原始社会的这种特征似乎已经持续了若干个世纪，并且已经受到文化的限定。因为这种特征总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所以它就一直是人类传统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永恒不变的。为了与现实原则所采取的不断变化形式相一致，对这一特征的处理已经变化和改变了，但无意识的愿望继续存在，并且在精神病患者中尤其明显。（《图腾与禁忌》，第90，126页^①）在原始思想与现代精神病之间存在着相似性这一基础上，弗洛伊德对文化史进行了心理描述，把这一历史划分成人类心灵发展的三大明显阶段。

……万物有灵的阶段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与自我陶醉相符合，宗教阶段与发现对象的阶段相符合，而发现对象的阶段的特征是依赖父母，科学阶段则与个人的成熟状态完全对应。在这个状态中，个人抛弃了快乐原则，使自己适应现实，他在外部世界寻找自己的对象。（《图腾与禁忌》，第158页）

在这一描述中，不容忽视，良知已发展成了一种可替代的控制无意识的力量。如果良知能被解释成一种对某些愿望冲动的令人不快的内在认识，那么它也可能被认为是提出了检查无意识愿望或对个人受其支配而加以惩罚的方法。

从对图腾和禁忌的全面描述中，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些结论。

^① 由于这仅仅是对弗洛伊德的观点的客观总结，因此这里并不打算批评他的观点。然而，对于弗洛伊德在人类学方面工作的极好评价可见于克罗波夫的《对图腾与禁忌的回顾》一文，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5期（一九三九），第446—451页。克罗波夫主要是批评弗洛伊德把“无限期的心理学解释”与“一个历史的解释”相混淆，以及“弗洛伊德对于其结论是否与科学完整性相结合所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出处同前，第448—449页。

首先，人类从原始起源开始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与幼儿的心灵发展是相似的。其次，弗洛伊德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恨—爱感情在原始的图腾—禁忌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也起了作用。弟兄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既热爱又嫉妒的父亲。这一联合起来反对父亲权威的行动之后果是干掉这一行动的对象。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自我克制和悔恨便接踵而至，“种族意识”建立起防止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法则。^①弗洛伊德并非不愿意假设，许多（原始的和现代的）社会和道德行为的基础是俄狄浦斯情结或恋父情结。用这样的方法，他已经解释了在保存原始的“风俗习惯、仪式和法则”的残迹（也就是，那些与不朽的精神实质相一致的残迹）时，无意识所起的作用。（《图腾与禁忌》第276页）

在《摩西与一神教》^②中，弗洛伊德对他早期有关原始社会的观点作了特别的说明。从他对欧纳斯特·塞林的研究中，他第一次承认，谋杀摩西是一个应该用已经在《图腾与禁忌》中讨论过的矛盾心理这一措词来解释的行动。摩西以弥赛西的面目再次出现，又一次导致了“谋杀父亲”的行动。犯罪感再次导致了谋杀父亲，这次是谋杀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子的行动。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第二次谋杀形成了原罪学说的基础；基督教圣餐是图腾崇拜的献祭节日的遗物。然而基督教徒们接受了谋杀父亲这一

^① 托马斯·曼在以《圣经》为题材的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和《年轻的约瑟夫》中使用了这种解释，几位现代杰出的作家用了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个方面。而托马斯·曼可以被算作其中之一。尽管这儿有许多东西有助于一种新的悲剧理论和一种新的历史小说概念的形成，然而鉴于弗洛伊德论述梦以及性本能的早期著作的影响，迄今还没有对另一个这样的方面进行过成熟的思考。

^② 卡瑟琳娜·琼斯译（纽约，一九三九）。一部分章节发表在精神分析学杂志，《意象》上，一九三七年。

事实，而犹太教徒则拒不接受，因此遭到了迫害。^①

一九一三年，弗洛伊德全力以赴把精神分析学运用于不同的领域，并且把它与伦理学和哲学问题相联系，他暗示了个人发展与种族发展之间的相似性；对良知作了尝试性的评论，并认为它是个人和种族之间的某种联络官；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非常重要，把它作为家庭关系及其所具有的较大的种族含义的固定特征。^②因此，他准备讨论社会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当思考精神分析学更广大的含义时，他在一系列较短的专题文章，即他的暴露思想离题的文章中，讨论了社会和社会关系问题。一九二一年，他着手研究群体心理学及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评论群体的行为这一现象时，他注意到“当许多单个的个人来到一起形成一个群体时，他们所有的个人抑制都消失了，作为原始时代遗物的、潜伏在单个人身上的所有残忍的、野蛮的以及破坏性的本能都被激起，去寻求自由的满足。”群体需要幻觉，他们“经常认为不真实比真实更为重要……”^③在一个群体中，单个的自我让步了，而群体的所有自我都集中于一个单一的中心对象上。

他把这种分析继续向前推进，在另一篇较短的文章《幻觉的未来》中较详细地讨论了人类最美好的一个幻觉。人们并非对克制本能有天然的爱好的。他们必须同时具有机构和领导人。对这些本能动力在有关婴儿阶段的性本能中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中，已经使这些本能动力解释得很清楚了。尽管就很大程

① 参见巴伦：《评论》，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四十五期，第471—477页，这可作为一种批评意见。

② 例如，乔伊斯《芬内根的苏醒》中的乱伦动机就与神话的伪装联系在一起，而这种伪装把个人和种族都带到了梦想的同个平面上。

③ 《群体心理学和自我之分析》，詹姆斯·斯金契译（纽约，出版日期不详），一九二一年初版于纽约，第17，20页。

度上来说，从社会的表面看来，人们习惯于服从这些机构的约束，有许多人只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才遵守这些约束的。众多的人恐惧无法无天的本性以及本性的组成部分，因而文化必须“保护我们防止本性的侵扰”。在这种保护中，宗教起了重要的作用。众神面临一项任务：“他们必须驱除对本性的恐惧，他们必须使人们接受残酷的命运……同时，他们必须补偿公共的文化生活所强加于人类的痛苦和贫困。”

众神代替了父亲的形象，是恐惧和无可奈何相混合的态度之结果。因此宗教是在人类的无意识欲望之上产生的组织严密而自我永存的幻觉。幻觉是对愿望所抱态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它与现实几乎或根本没有关系。确实，因为宗教的虚幻特征（如同幻想和梦一般）能够满足一个欲望，而不使之受制于现实原则的合理影响，所以弗洛伊德不赞成这一特征。他说，如果我们既坚定又诚实的话，我们就会承认，“所有文化法则和制度真正是起源于人类的。”^① 幻觉的继续存在阻挠了心灵的发展；“真正的信徒”只有分享一种普遍的精神病才能使自己不患个别的精神病。

作为这些思考推测中的第三个，《文明及其不满》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不幸的来源。我们可以用可替代的满足来消除生活的痛苦。这些满足可以使我们从不幸中解脱出来，否则这种不幸就会成为我们的命运。生活的本来目的是幸福——即快乐。这也是无意识愿望的本能目的。弗洛伊德称之为快乐原则的这种追求快乐的动力常常与整个外部世界发生冲突，因而人们“倾向于减少对幸福的要求，正如快乐原则本身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也会变成更

^① 《幻觉的未来》（罗伯逊·司各特译，纽约，一九二八），一九二七年初版于维也纳，第19，30，73页。参看下面第七章有关这个问题对弗洛伊德和卡夫卡的进一步讨论。

随和的现实原则一样……”^①“现实考验”的发展导致了诸如宗教和艺术等许多“反幻觉”现象的产生。艺术尽管不能使我们避免痛苦，但却能对痛苦提供补偿。^②超自然的力量和寻求快乐的本能迫使人建立起反对本能的严格的安全防护。这样一个反对快乐原则的严格的组织保障产生了反应——例如“返回自然”的理论就忘记了社会禁律的起源，认为这些禁律阻碍了自然的幸福。一个团体本身就是一种对个人放肆行为的安全防护。因而社会就是在克制本能的满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社会毕竟是家庭关系的发展。因此屈从、抛弃和升华这些遭到快乐原则否认的方面都是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不仅性反常行为被认为同性的社会作用相反；而且尽管异性爱就选择对象来说可能是正常的，但这种现象还是反社会的，因为它包含复杂的重新调整和法律问题，并且威胁着社会承认的一夫一妻制。

象爱自己一样去爱邻居的圣训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条禁令，因为它心照不宣地承认“人们不是出于礼貌和友好而希望得到爱的动物，但渴求触犯的强大要求必须被看作是本能的天赋的一部分。”^③在大多数场合，自我与利比多之间的斗争都是以自我的胜利而告终的，因为自我能够依靠社会的帮助；这一胜利的取得经

① 西格蒙·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乔恩·里维尔译，纽约，一九三〇），第28—29页。

② “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学（美学也是如此）对于美比起许多其他事物来说，更没有什么可论述的。它起源于性欲的范围，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爱美是那种带有抑制目的的感情的一个完美例证……”出处同前，第39页。弗洛伊德对美学的评论通常是这样的。尽管他研究了列奥纳多的职业动力，并不厌其烦地去研究一部不出名的德国小说（维尔海姆·杰生的《孕妇》）中的精神病部分，但是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他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对美学的评论方面。

③ 《文明及其不满》第75，85页。因此，弗洛伊德解释说，触犯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一共产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一个建不住的幻觉之上的”。出处同前，第88页。

常需要付出“巨大的痛苦和自我克制”的灾难性代价。当触犯的本能被自我控制，它就返回（被投入）自我，因而自我批评和鞭挞的意向就出现了，这就是良知。无论对参与或是犯下的“本能的罪行”来说，触犯都成为一种内心痛苦，与犯罪和悔恨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因而自我不仅害怕权威本身，而且还害怕良知，或超我。“权威迫使我们抛弃本能的满足；既然坚持受禁止的欲望无法躲避超我，那么良知就压在权威之上对此进行惩罚了。”^①

因而，文明就面临了一个双重难题：它必须帮助自我控制追求本能满足的动力；它必须在触犯的本能投入并破坏自我的道德意义之后，恢复自我的名誉。也许放松那毫无必要的压抑方式会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也许精神分析为理解本能动力和快乐原则的局限而提供的机会有助于消除按照社会需要进行调整的痛苦。^②

三

弗洛伊德从自己理论的开始阶段起就取得了很大进展；他把精神分析学广泛运用于宗教、社会学和美学领域，使得原先的临床术语已经不够用了。他注意扩展他对“性格解剖”的描述，从面把解释性格成分相互影响的因素包括在内。心理玄学要求扩大精神分析学的词汇。原先把心理生活分成意识和无意识是出于这一迫切的心情，即弗洛伊德想证明，“实验心理学”忽视了心理生活的广阔领域。面对心理生活这一广阔领域的研究对充分理解人

① 出处同前，第111页。

② 这种对社会的精神分析同时遭到了乐观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反对。在后者的中，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和弗朗西斯·巴勒特的反对声叫得很响。参看《科学与社会》第三卷（一九三九），第64—105页。一位共产主义者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可以被比补充。查本·奥斯本，《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纽约，出版日期不详）全面考查了弗洛伊德对自我和社会的分析，参看赫尔伯特·马卡斯，《性爱与文明》（波士顿，一九五五）。

类行为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不久,他发现,“无意识”这个词不能描述心理结构的单一成分,但无意识是几个成分中具有特色的东西,它在心理布局中的位置是无法界定和解释的。在《自我和伊底》中,他试图重新给心理结构下定义,并试图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建立一种关系。首先,他注意到,存在着“无意识的不同程度”,或进一步说,存在着两种无意识:“一种在某些经常出现的条件〔前意识〕下容易转变成意识的材料,对另一种来说,转变是困难的,它只能产生于大量的能力消耗之后,或者也许根本不会出现〔无意识〕。”^①

自我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在这一事实中,有着一一种对本能的快乐与现实之间在现实范围内产生的冲突的解释。伊底是所有动力的贮藏所,是自我的敌人,是“我们性格中模糊而且难以接近的部分”。它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难以理解也难以控制它。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一切,都是从我们对梦和精神病症状的解释中获取的。我们有意识的头脑和自我非常熟悉的逻辑和条理的概念是与伊底完全不相关的,有条理的思考的其他行为,例如句法和时空关系与伊底也毫不相关。伊底只具有一种“获得对于本能需要的满足的冲动,而这一满足是与快乐原则相一致的。”^②

这种对无意识的重新解释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心理生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上:前意识系统,它面对外部世界,并从中获得感性认识。自我从前意识中获得了这些感性刺激,它准备保护有机体不受这些感性刺激的干扰。这时自我的不稳定状态很明

^① 《新介绍性讲演》,第101页。

^② 出处同前,第103,104页。当然,伊底对自我并不主动持有敌意,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两者之间的冲突,更确切地说,自我处在伊底和现实之间,被迫使两者达成妥协。

显。它必须为现实原则服务，同时也得注意伊底的冲动要求。自我能够安排和组织个人的精神生活，并且谋取那些与伊底毫不相关的逻辑过程的帮助。自我还要为它第三个主人服务——那就是超我，即良知，它起源于父母的权威和自我的触犯性冲动，而这些冲动已经返回到了自身。假设社会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家庭和道德结构具有复杂的性质，但面对这些多方面的责任，自我竟然常常耽于多种忧虑之中的情况就不会令人吃惊了：“面对外部世界的现实忧虑，面对超我的正常忧虑以及面对伊底中激情力量的精神病性的忧虑。”^①

对另外两个术语需要重新界定。与弗洛伊德的哲学主张相关的许多观点都要依赖于得到澄清后的这两个术语。弗洛伊德把这两个术语中的第一个，即本能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趋势”称为快乐原则。^②这是一个表现所有无意识的愿望并使之与外部世界的复杂结构发生冲突的原则。既然本能的动力很少得到完全满足，既然幻想和幻觉的世界经常不能提供满意的代替物，那么“精神器官就不得不形成外部世界中真实环境的概念，并自己尽力去改变这种环境……所设想的已不再是快乐，而是真实了，尽管它可能会令人不快。”^③不必受“现实考验”支配的唯一活动是在写诗或作画时的想象活动。现实原则不是快乐原则的对立面；它只是用来保护快乐原则的。只有在使得有机体与外部世界发生过于粗鲁的接触的环境中，它才导致不愉快。

^① 《新介绍性讲演》第109—110页。如要获得有关忧虑问题的更多资料，参看下面第七章。

^② 《弗洛伊德论文集》第四卷，第11页。注意到弗洛伊德早在1911年就开始阐明，对快乐原则的讨论是很重要的。

^③ 出处同前。注意：与现实的冲突可能导致不合人意的结果的三种特殊变体：“克制欲望”，痛苦和忧虑。实际上如果预感到危险，这最后一种变体便常常被用来作为保护手段。

一九二〇年，当弗洛伊德发表引起争议的文章《超越快乐原则》时，原先对精神作用两个原则的这种陈述（一九一一）经历了一些变化。首先，个人想方设法复述原先不愉快的事件。这样一来他就能支配那些事件。弗洛伊德注意到，人类的这种“重复强制”是普遍的，只是在精神病患者中才更强烈。“重复强制”的多种表达方式似乎证明一种本能特征；这是力求“恢复一种较早情况”的本能特征，而“那种较早的情况在外部干扰力量的影响下必须为重复强制所抛弃……”弗洛伊德到生物学中去寻求对这种新“强制”的解释：有机物的趋势是返回无机物。生命的所有目标是死亡，“无生命的东西存在于有生命的东西之前。”

如果这完全是正确的，那么死亡早就消灭了所有有生命的物质。但并非所有有机物都以这种方式起作用。再生细胞努力保证它们自己的种类永久存在。因而性本能是“生命的本能”。快乐原则受到重新解释和现实原则的限制，力求使精神器官作为一个整体“不受任何刺激，或者使一定量的刺激不间断，或者将刺激限制在尽可能低的程度。”^①因此，快乐原则有利于返回无机状态的“有机必然性”。

这是弗洛伊德对有关永生不朽的问题的答案。他不允许对本能动力有助于毁灭有机体的感情提供补偿。但他说，通过选择和结合的过程，性本能则符合使有机体生存这一目的。性爱（eros）是生命的战士，它与死神进行着不懈的斗争。^②

^① 《超越快乐原则》胡巴克翻译（伦敦，一九二二），44—45，47，81页。一九二〇年初版于维也纳。

^② 爱情与死亡的这种关系是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纽约，一九二七，第164—167页）中许多有关克罗考斯基医生的谈话的主题。

四

在对弗洛伊德理论发展的这个简单概括中，有三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除了对心理学外，还对临床、“心理玄学”和“实践”这些领域内的思想和表现产生着影响。既然临床这个领域有必要首先发展，它的表达首先得到了公布和解释，那么对文学批评领域来说，它的重要性则是居于首位的。由于弗洛伊德在他称之为“心理玄学”中采取的冒险行动，因而有必要澄清一些术语并使之更为精确。因为这些术语在外行的读者圈中引起了一些兴趣和许多混乱，但受过一般教育的人的古怪保守性——即这些人总喜欢把某个人初次表达的理论代替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使得弗洛伊德这个阶段的著作不如早期著作那样有作用和影响。精神分析学的“实际”应用——它涉及到民族学、哲学、神学和美学——导致了大量作品的发表，其中许多作品在批评方面的重要性令人怀疑。弗洛伊德生前对文学真正显示出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早期发表的著作深受人们的欢迎。^①他的影响问题首先体现在，人们试图断定弗洛伊德给最终为人们普遍使用的某些术语所下的精确定义究竟是什么；从那时起，才有可能去研究这些词的被接受和被使用。不仅一个词的本意，而且这个本意后来受到的曲解，都对一种影响研究至关重要。

在正统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研究意识和有意识的认识范围的那段时间里，弗洛伊德想到了无意识的概念。无意识的问题固然已经研究过了，^②但任何时候都没有对无意识本身作过努力

^① 当然，不包括有关解剖学的专题文章，也不包括对歇斯底里的早期研究。如要查阅这些文章的目录，参阅魏特尔斯，《西格蒙·弗洛伊德》，第273—276页。

^② 爱德瓦德·蒙·哈特曼，《无意识的哲学》（卡普兰译，纽约，一九三一），一八六八年初版于柏林。

的探索，从而把它从神学和认识论的先入之见中分离出来。很显然，无意识是对有意识理解的否定；因此一个人可以说，“理解”无意识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精神或心灵活动的领域，那它一定会被证明为一个积极的心理实在，而不仅仅是“思想消失时所去的领域”。实际上，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真正的心理”：“其内部性质和外部世界的现实同样为我们所不知；无意识通过意识的材料被转述给我们，就和外部世界通过我们感觉器官的指示被转述给我们一样，是不完善的。”

可以说，由于对意识提供的思想情感生活的不充分描述，因此，探索无意识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精神生活最复杂的方式产生时，似乎“没有唤起人的意识”。由于我们只有通过意识才“了解”，因此精神活动的这些类型必须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传达给我们。然而，却并没有把无意识直接解释成意识；为了理解无意识提供的大量情况，我们必须大大地改变自觉认识的规则。精神分析学家无论如何必须认识到，“对意识的影响只是无意识过程较远的精神产品，无意识过程也没有变得如此有意识，它一直存在着，并在起作用，而一点都没有把自己暴露给意识。”^①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怎能希望分析无意识呢？就其自然特征而言，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它，但我们能从它与有意识的精神系统的“接触点”中推论出好多东西。弗洛伊德在他早期最著名的三本书中非常详细地探究和分析了这些接触点。^②通过这些接触点来研究其“怪癖行为”——即它们与自觉表现规则的不同之处——并注意这些怪癖行为在其中出现和再现的方式，我们逐步开始理解无意识了。

因此无意识是我们意识不到的那些东西的蓄积。其表现方

① 《释梦》第485、486页。

② 《释梦》，《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学》以及《理智及其实与无意识的关系》。

式——即与意识世界的接触点——随着个人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注意到，无意识有其自身的生活，或至少有一种感情状态，某些显然很强烈的本能动力以及能力的控制似乎压倒了可供人们随时随地支配的自觉控制方法，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更是如此。当我们检查理解这种精神领域的困难时，我们注意到有两种无意识——容易理解的简单而潜伏的精神状态，以及由于某些阻碍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显得长久受到阻碍而无法变得有意识的状态。前意识和无意识这两种东西与我们容易遗忘的程度相符合。一般的遗忘对无意识不施加过度的压力，但它只是与兴趣相关的问题，而能动的遗忘则包括对受到这样处理的无意识中的那一部分态度，以及与其所作的斗争：

……一种精神行为通常经历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插入了一种检验的过程（潜意识压抑）。在第一阶段，精神行为是无意识的，属于无意识系统；如果受到潜意识压抑力的仔细检查，这种行为就会被抛弃而不能获准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说，它被“压抑”，必须停留在无意识中。然而，如果它通过这一仔细的检查，就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从那时起，它就属于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第二系统了，……它虽还不是有意识的，但肯定能进入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特殊的阻碍和某些固定的条件，它就能成为意识的对象〔前意识〕。^①

弗洛伊德十分专注于进一步澄清无意识的实质，以及为这个领域划分界线的需要。但他从前所持有、并且在这儿描述的主张

^① 《无意识》，部分引证，第四卷，第104—106页。

却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新的名称，伊底(发明于一九二三年)只是指出精神分析活动的几个领域，或是全部无意识的或是部分无意识的，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弗洛伊德早期有关无意识的怪癖行为的观点，也没有改变他有关无意识得以接近意识所凭借的那种方法的观点。

由于几方面的原因，学习心理学的学生欢迎这种对无意识的讨论。某些作家也认为这是对理性主义的强烈攻击；他们相信，这最终消除了严格的逻辑和句法上的体系强加给思考的障碍的限制。因为这些只是他们熟悉的体系，他们就把寓言和比喻作为允许无意识进入思想和讨论的途径。这些比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黑暗世界”提供比较的对象。无意识是“幽深的”，“黑暗的”，“地窖般”的某种东西；所有粗鲁地反对“健全的生活”的方面都来自无意识这个领域。

二十年代广泛流行的另一个术语是压抑。不满足的美国人把自己对周围道德世界的愤怒都发泄在压抑这个主题上。作为一个没有得到承认的术语，它放松了惩戒，铺平了通向诱惑的道路。这是使家庭中的不孝和私通纵欲行为合理化的最容易的形式。它使性爱“自由”并认为，忠诚是自满和庸俗的，从而有助于对之进行谴责。弗洛伊德究竟认为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对无意识的简单分析指出，压抑是使得无意识冲动和动力受到禁止而无法接近有意识生活的机制。如果我们不赞同或害怕外部世界中的某个物体，我们就可以求助于逃避。但我们不能(在生理上)逃脱我们身体内部的某种东西，“自我不能躲开它本身。”换言之，“压抑是谴责的初步阶段，是逃避和谴责之间的某种东西；它是精神分析时代之前不能形成的概念。”只有其满足显然可能被除掉的那些冲动才受到压抑。譬如，永不终止地除掉一个欲望的动力而又不引起有机体的死亡，这是不可能的。直接通向本

能的表现和接踵而来的满足的道路，在压抑的许多场合下，都受到阻塞。受到压抑的本能非但没有直接回到无意识中去，反而扩散开来。“打个譬喻说，它象真菌那样在黑暗中分枝，具有极端的表现形式，当这些形式被解释和揭示给精神病患者时，它们必定不仅表现得与他不相容，而且它们用来反映特殊和危险的本能力量的方法，也使得他非常恐惧。”^①

因此，当受压抑的本能受到抵制而无法进入意识时，它并没有“放弃努力”。它不切题，躲躲闪闪地在“派生物”中表现自己。对意识阻力的这种反应导致了許多怪癖行为的产生，有些是健康的，而另一些则是不健康的。有很多与外部世界保持一致的迂回方法，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受压抑本能的每一块“碎片”都变得虚假了——也就是说，它承认压抑机制的权威性，而同时又想出了躲避它的方法。

压抑就象社会法令一样，需要不断而有力的更新和重新加强：“……如果它被中断的话，压抑的成功就会受到威胁，这样一来，另外一个压抑的行为就是必不可少的了。”^②与压抑力量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睡眠时，受压抑的本能找到了利用正式的纵情狂欢或放松约束的方法。然而压抑仍在继续发生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受压抑的本能的缘故，如果它被允许接近经验，那便会证明是痛苦的——说得更确切些，受被压抑的本能支配的能量会被用来伤害自我，假使它得以充分表现的话。精神分析学家检查病人对治疗的抵抗时，可以意识到病人压抑的性质。因而压抑起初只是精神上的东西；它代表与现实原则相一致的控制本能动力的力量。不向现实原则屈服则意味着灾难，因为精力本身并不见有自我控制

① 出处同前，第84，87页。

② 出处同前，第89页。

的能力；这些精力只是“旺盛”而已。既然自我是压抑的力量，我们就不得不检查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确立的制度，伦理的偏见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它们只是现实原则的从属形式，而现实原则却增加了我们感情生活中“不应该做的事”的力量。也许这一见解使我们离开讨论实际上的压抑机制很远了。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压抑仍为众人所知。解除社会对本能生活的限制这一行动，本身并不有利于一个较为健康的个人。例如，离婚使一个人获得解放，于是他（在法律上）便能重新选择性欲的对象。然而，它并不能使自我推卸原先的责任——这个责任将控制由过分而痛苦的满足而产生的本能动力。因此压抑完全不受法律的制约而起作用。这是一个纯粹心理能量的问题；是一副既使受压抑的东西为病人意识到，而又不允许病人自由使用的“药”；这仅仅向病人指出了一种方法，使他在自己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中，明智地对付受压抑的东西。

性本能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受到压抑的支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适应性本能是正常的，因为性的适应问题主要是与选择合适的对象有关。但在利比多意义上的含混又唤起了那些一度被人们认为已经被永远驱除了的所有幽灵。在二十年代，弗洛伊德的很多读者并没有对他进行仔细研究。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是自由性爱的提倡者，但他争辩说，性自由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从知识界讨论的水平上来看，利比多与无意识相混淆了，就好象这两个术语可以交换使用似的。弗洛伊德解释说，他之所以强调性本能，是因为他们临床经验使他相信性本能的重要性。在绝大多数场合，受压抑的材料是与性有关的，但这并不排除其他本能动力的可能。然而，弗洛伊德希望指出，根据其他本能来解释常常达不到目的，因为这种解释常常假设或者与性欲无关，或者性欲仅服务于另一个更基本的动力。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在大多数场合下，情况恰恰

相反。

这样谈论“利比多”也许是不合适的，就好像它是一个独立的心理实在，只是表面上有变化，并且独立于精神生活的其他因素而存在着。以为利比多可以被消除或暂时取消也是一个错误。事实上，用普通估量的方法简直不能接近利比多。它是一种心理能量，由于其明显的化学特征而区别于其他种类的心理能量；它是“一种具有可变数量的力量，根据这一可变数量，就能估算出性刺激领域中的进程和转变。”只有与利比多投入一个对象相联系，才能估算出利比多来。“当利比多把自身集中和固定在对象上，或当利比多离开那些对象而转向其他对象，从那个方位来指导个人的性活动时，我们就能领会它了；……”^①因此利比多是可变通和机动的，常常被投入对象之中，或从与受到社会赞成的性活动的最终产物很少联系或没有联系的对象中接受刺激。用这个术语来指一般的本能生活，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或根本没有意义。对自恋或“自己的性欲”^②这一现象的仔细分析需要把自我和利比多看作不相连的——以致于自我可以成为利比多投入的对象，可以成为爱的对象。在婴儿性欲的最早阶段，正是如此。^③

我们选来进行特殊分析的三个术语——无意识、压抑和利比多——最常被用来讨论弗洛伊德，只有当人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有机的时候，这三个术语的互相依赖才被注意到。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它们与根源理论切断了联系，并被独立地当作极大的威胁和牺牲品来使用。只从不连贯的片言只语中接受和理

① 《性论三讲》，第611页。

② 来自于哈弗洛克·艾利斯的一个术语，尽管他用这个词时意义稍有不同。参看《性论三讲》，第586页第一行。

③ 《精神分析学概论》，第359页。

解某个学说的习惯，这并非是反常的。除非理论家处于某个位置，来控制某个理论的应用，否则，说这个理论有机地影响了某个群体就是不正确的，把理论转化成实践常常是危险的。

如果精神分析学一直是一种排他性的治疗过程，只为一些正确使用精神分析法的人所知，并且在“主人”的不断监督下，一种理想的控制就成为可能了。但人类行为的科学不同于物理学。前者论述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而人类总的来说对这些方面一直具有很大的兴趣。只有当物理学或天文学上的某个发现，例如哥白尼的发现，被再次转化并通过其言外之意，而不是通过其原先的或已经确立的事实，即在神学和伦理学上引起争论的某件事，而转化时，这一发现才能影响人类行为的进程。转化的动力，即一个概念从远离人类兴趣的领域向接近人类兴趣的领域的转移，对于影响研究来说，应该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不会说，“我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因而我将过一种无节制的生活。”演绎推理必须完整，其中每一部分必须受到检验，通过这些检验，许多概念最终才为平常人所接受或抛弃。这些检验常常只是逻辑上的；一般说来，它们以先前接受和拒绝的情况为基础，而那些情况也是不合逻辑的，并带有片面性。

但精神分析几乎用不着或根本用不着被转化成人类兴趣的流畅语言。它谈论人类的物质，不仅如此，它还起源于社会统治的监禁普及之前的一个设想。精神分析学家因遭到严厉的批评而逃入纯理论之中的情况几乎是前景渺茫的。这一理论本身也是以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常见的偏见为基础的。精神分析学不可能一直局限于抽象的推理，而它也不希望这样。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的奇特性不久就被揭示出来，并且受到了谴责。据说，精神分析学家以拯救生命，但实际上却借口毁灭了一些生命。病人往往会爱上精神分析学家。在有利于获得这一反应方面，精神分析学家常常

是审慎的。这样就产生了大众对被弗洛伊德描述成移情的这一状态的普遍看法。弗洛伊德承认，移情把严肃的道德责任寄托在精神分析学家身上。而这一道德责任唤起了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在想到从业之前所应具备的所有坚定正直的品质。

当病人来请求精神分析学家治疗时，只有他的一部分“爱的能力”得到了发展——也就是朝着对象方向发展。因此，“没有被使用的”利比多也会转向医生本人，这是很可能的。当精神分析学家处理那些与病人密切相关的事件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移情的特殊性不在于其产生而在于其强度。只有“当我们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移情不仅受病人有意识的思想和希望的影响，而且受那些受压抑或无意识的思想和期望影响时，”这种特殊性才变得明显^①。

为了理解事情的这种状态，我们有必要讨论另一个临床术语，批评家也将这一术语同精神分析本身割裂了开来，并用于种种反常行为之中，这个术语就是抵抗。病人虽然被要求“揭示一切”，但他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的或者后来了解到的有关他本人的某些情况在压抑的边缘，或是受压抑材料的一种乔装形式。因而他抵抗精神分析学家想获得他精神生活的忠实再现的愿望。抵抗是压抑的力量，它意在维持现状，并阻止任何违背这一现状的企图^②。

病人依恋医生的情况有利于抵抗。移情是使医生的兴趣从病人不想泄漏的材料转向受压抑材料所采取的另一种伪装的手法。

① 西格蒙·弗洛伊德，《移情的动力》，收入《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二卷，第313，314页。

② 参看《精神分析学概论》，第十九讲，第248页，及以下各页。“病人所表现的抵抗是花样繁多并且非常微妙的。常常难以识别，在其形式的种种变化中，犹如海神普罗丘斯那样变化多端。这就是说，医生必须怀疑并且不断地提防病人。”出处同前，第248—249页。

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移情这一领域中得到解决，而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病人曾求助于精神分析学家。移情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实际上，在消极的移情中抵抗可以看得很清楚。敏锐的精神分析学家“消除”消极的移情，细致地处理积极的移情，结果积极的移情便从与精神分析主要目的的偏离上转向了与医生的积极配合方面。○通过这种方法，精神分析学家能够使移情为他的目的服务。消极的移情或对精神分析学家的憎恨可能达到这样一种阶段，以致使得治疗无效。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病人和精神分析学家在其中为争取主导权而进行斗争的战场；病人仅仅“释放自己的情感”，这样，精神分析学家就能劝诱病人“在治疗过程和生命的历程中使这些情感与适当的情境相适应，对它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并根据它们的真正精神价值来对它们进行评价。”②

因为在所有情况下，积极的移情就其特征上说来，都是引起性欲的，所以弗洛伊德深切关注着明智地处理它的问题。首先，移情的爱并非真正的爱，而是精神分析情境的产物。如果情况就是如此，那么精神分析学家难道应该采取一种道德观念向病人布道吗？“当病人一承认她的移情之爱时”，医生就应该劝她“抛弃她的本能刺激并使之升华吗”？这一过程使精神分析学家无法用移情来作为治愈病人的某种手段。对分析来说，更糟的情况是“屈服

① 《移情的动力》，部分引证，第318页。

② 出处同前，既然在这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家似乎成了群体中的“牧师”，移情竟成了激烈争论的主题，并且为小说中的几种讽刺处理提供了基础：罗斯·麦考莱，《危险的年代》（纽约，一九二一）；瓦尔多·弗兰克，《新郎交了》（纽约，一九三九）；麦卡锡，《她陪伴的人》。对于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中的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来说，爱情的转移也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大量的“坝精神分析”带着这样的观点，即精神分析学家能改变病人未来的生活道路，因而坚持认为，他在改变病人的生活方向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于”移情所提供的诱惑，病人会获得自己的对象，但医生却不会获得他要达到的目的。治愈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精神分析学家在所遭受到的羞辱的压力下丧失了自己的权威。唯一合理和安全的过程就是沿着中间的航道行驶。

〔医生〕必须防止对移情之爱的忽视，将它吓跑或使病人厌恶它；他必须同样坚定地抑制对它的任何反应。他必须大胆地面对移情之爱，但要把它看作是某种不真实的东西，治疗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某种情况，并且追溯到它的无意识的渊源。这样，它就有助于发现隐藏在病人性生活发展深处的所有东西，从而帮助她学会控制它^①。

五

除了对诸如上述细节的不适当处理外，把弗洛伊德当作批评或文学的影响而加以接受和运用，还包括对他的主要作品的使用，这些主要作品被当作一个整体，比其他作品更能决定影响的方向^②。在这些影响中，两个主要的单一影响来自《释梦》中“梦的

^① 西格蒙·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技巧的进一步建议：对移情之爱的观察》，收入《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二卷，第382，375页。

^② 受到误用的术语远远不止这些，其误用支配了精神分析学被接受的方式。

例如，情结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被应用于几乎任何观念的术语，在一般人看来，它则意味着同行为方式一样的东西，尤其是使用这一术语的人感到厌恶的东西。因此它的用途便从纯粹临床方面转向了某种轻蔑的概念。

升华被当作与大众的喜爱相一致的唯一术语，通过这一术语，精神分析屈从于传统的道德和宗教。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它的意思只是性能量为适应存在于性活动范围之外的目标而进行的重新调整。

投射，虽是一个不怎么常用的术语，但仍然可能受到错误的解释，用临床的术语来表示，投射指的是某种感情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或换言之，通过参照一种可替代的原因而使某种感情状态理智化。

工作”和《性论三讲》。在这一点上，每一个影响都值得特别注意。

“梦的工作”对二十年代的思想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对此我们无论作出多高的评价都不会高过其实。这不仅是有关梦的工作的主要部分^①，而且对认识无意识的奇特性质也提供了主要的线索。既然无意识只是在为意识所承认的条件下才被人“知道”，既然在许多方面它仍然为人所知，或至少被感觉到，那么无意识的特殊性则是由于这一原因导致的：有意识的交流系统不能把无意识准确地报道出来。换言之，有意识的表现方式——语言、句法、逻辑——预先假想了一个可以为这些约束所修正的世界。约束的作用之一就是混乱中创造出秩序。所有的意识过程呈现出一致性。词典是语言学一致性的目录；算术和代数的体系在处理数字和符号时，表明了某种一致性；语法（毕竟要算作语言的逻辑）和逻辑要求一致性以维持秩序。即使考虑到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与思想形式演变的过程中出现许多例外，外部世界也还是有秩序的，因为理智的大脑已经认为，限制一致的形式中的不一致性是可取的。这也许既必要又恰当，但这也限制了我们欣赏或掌握任何不容易取得一致的生活形式的能力。无意识完全是没有语言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交流系统而对无意识有所了解，初一看，那是非常难懂的。如果我们希望知道，被歪曲和明显无法辨别的无意识的表现形式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至少暂时不得不放弃我们习惯的研究方法；我们得根据为大家所承认的交流系统而去了解最不容易理解的偶然事件。

如果我们检查一个梦，我们对梦的报道似乎是毫无意义或令人厌恶的，或两者皆是。也就是说，显（manifest）梦，即我们记

^① 参见《新介绍性讲演》，第16—17页。弗洛伊德本人也意识到了涉及传播性的思想方面的困难，“一些原理大家都知道，而其中有几条，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诸如所有的梦都具有性的实质这一说法……”出处同前，第17页。

住和报道出来的梦与我们习惯的思维方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无论怎么说，没有什么任何重大或公认的关系。这是因为显梦只是潜(latent)梦的内容或思想的转变，而我们在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变中，一般使用的价值在这里就不适用了。就好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确定，显梦的任何一种因素究竟是何意义似的。但梦有特点：虽不根据规则，但对梦的因素最终的含义是什么具有某些警觉和某种预感，解释就可以进行了。解释梦的几种主要观点是：(一)存在于无意识中的“潜伏的梦想”；^①(二)压抑或潜意识压抑的力量，由于其激烈和松弛在不断变化，使梦的思想能够以伪装的形式而“显露出来”；(三)当我们记住和报道梦时，显梦的内容就代表了那个梦。如果我们认识到潜意识压抑力的重要性，那我们就能解释显梦的因素与潜伏的梦想的这种或那种关系。例如，显梦是高度浓缩的——“当与范围之广、数量之多的梦想相比时，显梦是含蓄、微不足道和简洁的。”^②正如报道的那样。没有绝对的浓缩比率，但我们可以肯定，显梦的所有因素都“在梦想中享受多种表象”。显梦的浓缩活动有某些奇特的结果：例如，人的复合形象和混合词语。既然潜在的思想总是付诸视觉的，词一般被梦“当作事物”，“于是与事物的概念一样，经历合并，转移和替代”（《释梦》第277页）。结果做文字游戏就与儿意的语言习惯相似。

我们并不因为显梦中的一种因素具有高度的精神强度就肯定这种因素是重要的。说话者通过声音的变化或一个手势来强调一

^① 只有当潜在的思想被压抑的力量从意识中赶出来时，它们才成其为思想。即它们才具有想象的性质，并从受压抑的经验中衍生出来。反之，它们根本就不成其为思想。

^② 《释梦》，第261页。从这以后，该书的参考资料都出现在简略标题《解释》之下的正文中。

个词，他希望这样来造成一种印象；但强调在梦的因素中并不一定说明重要性。这是正确的，因为“精神力量”剥夺了许多具有高度紧张的精神价值的要素，而可能把重要的印象给予一个微不足道的要素。这是替代的机制，它损害和扭曲了显梦，以致无意识的欲望无法辨认。正因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压抑力得知这一无意识的欲望，所以这一欲望一定要变得无法辨认。

我们已经注意到，潜梦并不具有简洁的逻辑特征之优势。它也不用相关的概念来作为指出它的一致或不一致的方法^①。释梦提供了决定方式的许多方法，在这一方式中，可以找到这些相关概念的代替物，如果确有这些代替物的话：

以及 (and)：梦指出了同时存在的方式中的连接关系。

因为 (because)，或既然 (since)：“前提”的梦与“结果”的梦并列并指出了原因的关系；(《释梦》，第292页)或者，梦把一种意象转变成另一种意象，这样来简单地处理这种关系，从而粗略地指出了这一变化的根源。

不是 (either)——就是 (or)：转折连词或选择连词。“把这一选择连词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放进上下文中，好象它们具有相同的特权。”(《释梦》，第294页)这样它在梦中得到了处理。因而“不是一就是”就变成了“既—又”。

没有 (no)，一点也不 (none)，不 (not)：没有 (no) 在梦中似乎不存在，对立被化为统一。

如果 (if)：条件关系被同时性表现出来；也就是，不是“要是他干这事的话”，而是“当他干这事时”。

^① 似乎是“理智组成部分”的东西是梦的材料的一部分，而“不是梦中理智活动的表象”。出处同前，第270页。

相似、一致和相近这些特征“通过集合成一个统一体”而在梦中表现了出来。因而，如果A在一个或许多细节（外表或观念）上类似B，梦将在复合的形式中代表A和B。举弗洛伊德的一个例子来说：“‘A对我有恶感，B也是这样’。在梦中我成为A和B的复合人，或我设想A在做着一个不习惯的动作，而这个动作正是B的特征。”因而，共同的特征，即A和B的敌意就被插入。（《释梦》第298页）

倒置(inversion)是梦的表现最普遍的一种方式，的确也是很方便的方式，其目的是逃避潜意识压抑力。时间的先后常常被颠倒——例如，一个争论的结论也许在一场梦的开端^①。或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可能被颠倒。例如，“他父亲因为他到得很迟而责备他”，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他生父亲的气，因为他父亲总是到得过早。”

梦在所有时候都与用每一种允许的方法描述潜梦有关。既然梦不能接纳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就被特化成在视觉上能表现出来的具体术语。梦欢迎有意识的思想所厌恶的一切（构词上的多种解释）；因为可作多种解释的动词结构适合于“多种梦想的表这”，从而对压缩的机制有利。“一个词成了许多概念的连接点。可以这么说，这个词具有预先决定的多种解释，精神病就象梦一样容易趁机利用一些词为压缩的目的所提供的方便。”为了同样的目的，梦可能采用那些词“本来或词源”的意思，而不采取它们目前抽象的形式。如果专有名词抵制视觉表现，这个专有名词的意思就会受到很大的歪曲，成甚至被“非常牵强的参照特”所替代。（《释梦》，第315页，325页）

另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梦的象征(dream symbol)。象征

^① 《薛内根的苏里》的第一“句”。

性的问题与民间比喻及其在无意识中的持久性有关。弗洛伊德在好几处都注意到，在原始的思想中，有着进行广泛比较的趋势，但对相似之处的准确性却注意得很少^①。因而在结构上，梦的象征比文学艺术中的暗喻和明喻松散。它们之间的比较欣赏的不是暗喻相似性的准确和复杂的细节，而是更普遍和非常明显的关系形式。然而它们之间的比较在事件和行为不能立刻受到同样欣赏这层意义上也是很模糊的；所以，当相似之处被指出来时，这个相似之处就似乎变得那样明显了，以致绝没有被搞错的可能。有关梦的象征的奇怪事实是，它们存在于无意识中，因而可能与“梦日”(dream day)的任何理智或肉体的刺激几乎或根本没有相似之处^②。尽管对于象征在释梦中的地位有过大量的争论^③，精神分析学家仍似乎同意，已发现某些象征“在无意识中产生出来了”，它们与文化史形成了一种联系。

形成梦的最后一个特征，弗洛伊德称之为辅助性阐释(secondary elaboration)，它对于梦本身来说不那么重要，但对解释明显内容的特异性是有帮助的。“从来没有沉睡”的潜意识压抑力“感到它被已得到承认的梦弄得措手不及，辅助性阐释便出现了。《《释梦》，第390页)因此，我们有“噢，那毕竟只是个梦”这样的表达方式，或者我们注意到满足和惊愕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

① 参看《释梦》第322页，《精神分析学概论》第十讲，第122—140页；欧纳斯特·琼斯，《精神分析学论文》(巴尔的摩，一九三八)，第129—186页。

② 琼斯讨论梦的象征的心理动力要比弗洛伊德清楚：象征“总是构成向一种较简单理解方式的退化。如果这种退化仅仅进行一段距离……，结果就是暗喻的……如果由于无意识情绪的力量，这种退化的距离更长——达到无意识的水平——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结果就是象征性。”琼斯，《精神分析学》第186页。

③ 斯特凯尔如此强调象征，因而为释梦提供了目录学的捷径。荣格以包括古代一切遗俗在内的无意识理论为基础来解释象征；因此象征就是针对无意识从“种族心理”中继承的大量宗教和伦理观念的。

式似乎与梦的实际内容不一致。

梦的这些特征所提供的暗示的多种变体与某些二十世纪作家碰到的语言和风格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意识和无意识作为一个行为的连续统一体，那么这一事实，即无意识对安排和控制有意识生活的方法不会有任何反应，就依然存在。完整地描绘任何人的精神生活便把一种责任同时赋予作者和读者；作者和读者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注意中心。这可能比需要用来理解文学幻想的理智技巧更加困难。恰如其分的问题以及在临床和文学之间划分界线的问题，由于考虑到这一文学形式的某些例子，因而最好能推迟到后再考虑。

《性论三讲》被接受时，人们也是怀疑和惊奇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影响了行为的概念，并且为改变公认的家庭行为方式的准则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如果家庭的准则接受科学的严格调查的话，它们就会经不起这种分析。然而，象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这术语对于那些一直把家庭关系作为自己提写领域的作家们来说，就成了流行的行话。要是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提出他的“三大贡献”的话，这些问题仍然会继续作为合理的主题在小说中得到阐述。但不管怎样，弗洛伊德的三大贡献使作家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提问题，并至少给他们这样的幻觉：他们正合理地把科学术语和科学的描写转到艺术领域。二十年代的小说强调了这些主题；小提家得力于对传统标准的怀疑，他们赋予家庭的描写以无可否认的弗洛伊德主义之特征。

第二章 弗洛伊德理论的传播

一

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们的关系照亮了弗洛伊德主义从维也纳到欧洲和美洲一些城市的旅程，关于这一点，论述得也许已经足够了。精神分析学的信徒们的家族关系具有表明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年里闻名于世的程度之价值。

到了一九〇七年，弗洛伊德写成了四本直接关系他名声的著作。由于这几本书还没有一本译成英文，^①因此对这些书的兴趣就局限在医学界和精神分析学界。促使精神分析发展成一个“学派”的因素则来自于卡尔·G·荣格和费希特为首的苏黎世小组。尽管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友谊是短暂的，但这种友谊却提供了分散精神分析运动的最初机会。^②

一九〇七年，弗洛伊德了解到，瑞士精神病学者对他提出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九〇八年春，第一次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召开了。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九一三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关

^① 这四本书中第一本译成英文的是《性论三讲》(一九一〇)。对弗洛伊德缓慢的成名过程的叙述，参看欧纳斯特·琼斯，《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生平和著作》(纽约，一九五三，一九五五)，第一卷和第二卷。

^② 对于承认这一点，弗洛伊德从来就没有犹豫过。参见《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第947—948页。“我曾多次带着感激之情承认，苏黎世精神病理学派在传播精神分析学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布鲁尔和荣格作出的努力，即使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我今天(一九一六)仍毫不犹豫地会这样做。”出处同前，第947页。

素亲密，兴趣相投。在一九一三年的第四次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上，荣格的同事米德宣读了一篇关于梦的论文后，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弗洛伊德看清了他长时间怀疑的问题——荣格对精神现象的解释与弗洛伊德长期的经验可以使他接受的东西迥然不同。在荣格看来，梦表明无意识不仅聚藏着人身上的“动物性”，而且还聚藏着人身上的“神性”；同时，梦也表明，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基本的术语仅仅是象征，而这个象征则可追溯到一个更基本的来源。^①荣格对“分析心理学”作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的《变形记和利比多的象征》，^②该书出版于一九一——一九一二年，该书的特征充分证明了荣格思想的独立性。正如弗里兹·魏特尔斯指出的那样，对这部著作的研究格向任何人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分手的原因：“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荣格仍然追随弗洛伊德。而在第二部分，则创造了遗传性的利比多，并去掉了其中的性欲……”^③

^① 参见魏特尔斯，《西格蒙·弗洛伊德》，第178页。事实上，荣格后来发展了“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实际上，这种集体无意识通过在梦中参照神话的原型（即留存在无意识中的先前概念）来压制个性，“这种完全内在的无意识的秩序在生活的意外事件和骚动中，为我们提供了庇护和帮助。”参看约兰·雅克比，《荣格的心理学》（纽黑文，一九四九），第42—43页。

^② 《无意识心理学》，亨克尔译（纽约，一九一六）。

^③ 魏特尔斯，《西格蒙·弗洛伊德》，第181页。也就是说，荣格认为，利比多既有“人性”，又有“神性”的所有精神能量的对等物；因此，为纯临床和纯治疗过程增加宗教和说教方面的内容提供了机会。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主要的；这不仅是在哲学方法方面也是气质上的分歧。在出版于一九五至一九三〇年这段时间里的评述精神分析学的大量著作中，这种分歧被提及，并形成了表明精神分析的历史的特性的无数次争论的一个基础。在我们本世纪的作家和艺术家中，荣格也不乏拥护者。

在主办巴黎—美国杂志《转折》（一九二七——一九三八）并为该杂志撰稿的人当中，荣格是最讨人喜欢的一个。由于“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特殊’联盟是与无意识的一次‘直接接触’”，（雅克比，《荣格的心理学》，第27页）因此他对这一“联盟”的阐释吸引了《转折》杂志的先驱者们。尤金·约拉斯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告诉我，荣格是《转折》的副编辑办者。另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者们几乎全都（通常不受欢迎）是弗洛伊德的支持者。

弗洛伊德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关系的破裂同样是由对一个主要概念的观点上的分歧造成的。对阿德勒来说，权欲及其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复杂情绪是人类一贯的行为方式。对于“软弱的人”，这种权力意志的愿望在阿德勒所谓的“男性的抗议”中显露出来。他建议，人们应当具有“尽可能大的行动自由”，这样他们就可能满足权欲，而且出现在受压抑的人们中的卑下感也可能被排除。^①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一书中，弗洛伊德试图提出与阿德勒关系破裂的多种原因：

从一开始起，阿德勒的理论就是精神分析尽量不想变成的一种“体系”……精神分析学对证明所有自我奋斗都与利比多的组成部分相混合这一点有着更大的兴趣。阿德勒的理论强调了这一点的对立而，即所有性感都含有自我中心的混合物。这将是一个容易感觉到的收获，如果阿德勒没有利用这一主张，每次都来否定性感，而是赞同具有推动作用的自我组成部分的话。因此，他的理论便达到了所有病人做的一切，以及我们自觉的思考所做的一切，正如琼斯所说的那样，他的理论理性化了，其目的在于掩盖无意识的动机。^②

因而，让阿德勒脱离这个运动是必要的；一九一一年，弗洛伊德这样做了。^③从那时起，阿德勒就有了自己众多的追随者，尤其

① 魏特尔斯，《西格蒙·弗洛伊德》，第147页。

②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第966—967页。对照费利斯·波特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传》（纽约，一九三九），第55—67页。

③ 对于这样做的方式的描述，参见魏特尔斯，《西格蒙·弗洛伊德》，第150—151页。“应该注意时是，在这些联合起来的辞句中，政治影响起了某种作用。阿德勒和他的几位朋友全是社会主义者。”出处同前，第151页。一九三九年，魏特尔斯发表文章，“宣布放弃”他在传记中论述的许多部分，但弗洛伊德在给魏特尔斯的信（作为那本书的序言而发表）中称赞魏特尔斯把阿德勒背叛一事解决得如此之好。

在美国，他把自己的精神分析的牌子称为“个人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

弗洛伊德与另一些追随者的关系，也许完全可以这样说，不少人在后来都离开了祖先的庄园，而且弗洛伊德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他们的离去。^①弗洛伊德性格的这一面是很重要的，不仅作为那件事的结果，精神分析的溪水在最初的源头就被弄浑浊了，而且，把原先属于“弗洛伊德的”那些术语与后来被持有异议的作家在不同的场合中使用的那些术语加以区别，的确也需要仔细的研究。

与这个新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布里尔医生那精力旺盛和忠心耿耿的工作，他在瑞士苏黎世荣格精神病学诊所里初次研究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心理学。一九〇八年，他和弗洛伊德一起安排了翻译弗洛伊德主要著作的工作。^②在那时和一九三八年之间，当布里尔收齐了“主要著作”并在现代图书馆的帮助下使之广泛传播时，他在美国对介绍弗洛伊德主义所起的作用，就和欧纳斯特·琼斯在英国对发展这一运动所起的作用一样。他经常会见艺术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并和他们大家讨论这一“新兴的心理学”的重要性。通过他的忠实翻译，弗洛伊德的作品已经为成千上万的人所阅读了。

① 另一些重要的持异议者包括魏尔海姆·斯特凯尔和奥托·兰克。他的“忠实追随者”包括西奥多·雷克，弗里兹·魏特尔斯(“回头的浪子”)，欧纳斯特·琼斯，圣多·弗伦兹(也许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个)，以及布里尔这样一些人。

② 布里尔，《弗洛伊德著作在美国的介绍和发展》，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四十五期(一九三九)，第323页。再参看布里尔《对西格蒙·弗洛伊德的思考与回忆》，载《医学文选》第三卷(一九四〇)，第19页：“[从一九〇八]至一九一八年，我把大多数空闲时间花在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上。除了翻译工作外，我还讲授、阅读并讨论他的理论，直到今日为止。”

一九〇九年，当弗洛伊德横渡大西洋进行他最初、也是唯一一次对美国的访问时，布里尔就作好准备并在等候了。弗洛伊德应邀来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参加了克拉克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①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弗伦兹和荣格，在那里接待他的是欧纳斯特·琼斯（当时在多伦多）和布里尔。在美期间，他碰到了威廉·詹姆斯，并同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还促使哈佛大学的詹姆斯·J·普特南从精神分析学的反对者变成了热情的拥护者。普特南的倡议大为弗洛伊德欣赏，但弗洛伊德是带着混杂的情感接受他的倡议的。由于过多地屈从于他性格中伟大的伦理学和哲学倾向，普特南后来对精神分析学提出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可能办到的要求。他希望精神分析学必须为普遍的道德和哲学概念服务；……”^②

这次对美国的访问也不能说是为精神分析学后来在美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因为欧纳斯特·琼斯后来在英国成了这一运动的领袖，并且在弗洛伊德的一次较为广泛的冒险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就是在一九三九年，他坐飞机从维也纳飞往伦敦——因此，在伍斯特的聚会就更为重要了。这次聚会并没有立即对美国公众产生出令人吃惊的影响。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局限在医学和心理学杂志上。还找不到一本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弗洛伊德主义仍然处于系统的阐述时期，即使在维也纳和苏黎世也是如此。虽然在推广弗洛伊德主义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在二十年代，仍没有出现席卷美国的广泛兴趣和争论浪

^① 这五次讲演首先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第二十一期（一九一〇）上，第181—218页。这五次讲演被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起源和发展》，构成了对这一运动较早的一个最好总结。因为讲演是在一九〇九年进行的，所以还摆脱了令人气愤的论辩；一旦荣格和阿德勒离他而去，他便认为这种论辩是必要的。

^②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第951页。

潮。^①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早就看到了这门新心理学的多种前景。布里尔谈到他在一九一〇年的某个时期发表了一篇论述梦的论文，并在《纽约星期日时报》上得到了长达两页的评述之后，作家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找我，想了解那篇论文。”^②

二

在美国，最早涉及精神分析学的资料于一九〇六年出现在《变态心理学杂志》上包里斯·西狄斯的文章中。一九一〇年四月的那期《美国心理学杂志》除了用英文刊印了弗洛伊德的讲演外，还发表了荣格、斯泰恩、琼斯和弗伦兹的文章——这是当时可得到的对精神分析学最全面、最完美的英文陈述。^③这些文章以及后来的“报刊”来稿所辩论的并不是那种令外行感兴趣的问题；这样的杂志也不可能具有较大或盈利较多的发行量。至少有几年，弗洛伊德的理论没有得到迅速的同化，到了二十年代它才得到同化。诚然，通俗杂志早些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短评——其中阿丁顿·布鲁斯的一篇文章刊登在《美国杂志》上，这家杂志还刊登了克拉克大学最主要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照片。布鲁斯把这一运动（以及心理学领域里的其他活动）看作是有趣的新奇事物，这场运动的持

① 对哈里·哈特威克所作的那种总结的陈述简直无法进行辩护，《美国小说的突出地位》（纽约，一九三四），第128页：“一九一〇年后，报纸上到处提及这门新学说，大街上的人们开始引用一些晦涩难懂的奇怪的专业术语……”因为他密切注意马克·沙利文在《我们的时代：美国，一九〇〇——一九二五》（纽约，一九三二，约四百页，第166—167页）所提供的情况，所以查阅这部著作的第170页，也可能会有所启发。对于他的陈述，沙利文更是保守和小心。

② 布里尔致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③ 第二十一卷；卡尔·G·荣格，《联想的方法》，第219—269页；威廉·斯泰恩，《……个性的证明和……研究》，第270—282页；欧纳斯特·琼斯，《弗洛伊德的梦幻理论》，第283—308页；圣多·弗伦兹，《梦的心理学分析》，第309—328页。

久贡献还未得到检验和承认：“必须说，迄今还没有其他精神病理学家接受这一总括而大胆的理论。但这一理论正在为弗洛伊德及其日益增多的一帮信徒们大力推广……”^①

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能普遍接受处于专门性解释初期的任何概念：（一）这一概念必须翻译成能够用来进行讨论的语言。

（二）这些译文必须得到定期为受过教育的读者阅读的杂志的适当评论。（三）在本质上，它们必须具有某种为一般读者欣赏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些概念要么必须使人吃惊，颇为新奇，要么对于理智地思考人类行为来说，必须是基本的。

对翻译的重要性作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分。因此，布里尔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一九一三年，他翻译了《释梦》的第三版；^②这部著作和《性论三讲》（一九一八年，他翻译了该书第三版）包含了外行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布里尔奉献给讲英语的公众的其他著作是《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一九一四年译）和《笑话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九一六年译）。这最后两部著作被外行公众认为是对弗洛伊德主要理论的补充和应用，^③但早先的注意力却完全局限在论述梦的著作上。

^① 《思想的主人，在没有药物或外科医生的工具的帮助下，四位伟大的专家所实施的非凡治疗方法》，载《美国杂志》，第71页（一九一〇），第71—81页。

^② 第三版与前二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补充了梦的解释，以及他在一九〇〇年后的数年内查到的有关科目的其他书日而增加的篇幅。翻译完全是字面上的，这样一来几乎达到了笨拙的程度，但布里尔在弗洛伊德的例子“无法翻译”时，便毫不犹豫地替换上了自己的研究实例。参看《释梦》第277、324页。在主要论述使用梦的语言的那些梦幻语合作了一些变化。

^③ 对照，布鲁斯·巴顿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受到欢迎，他在文章中报告了他与布里尔的会谈，《你不能欺骗你的另一个自我》，载《美国杂志》第112期（一九二一），第11—13页。再参看阿尔弗雷德·卡特纳，《关于遗忘的评论》，载《新共和》第一卷（一九一四），第15—17页。

对那本著作，诸如《论坛》、《麦克路尔》、《世纪》、《日晷》以及《民族》这样的杂志都显示出了适当的兴趣。它们的目的是，为心理生活的这个“未知的领地”提供足够的启迪，以使得外行人也可以自己去检验弗洛伊德的结论的有效性。爱德华·M·韦叶尔向他的读者们提议，如果他们当中有谁对弗洛伊德结论的性质还持怀疑态度，

……他就应当使自己做的一些梦接受检验。如果他每天记下自己做过的梦，养成清晨一醒就写下梗概这种习惯，那么他就可以亲自检验弗洛伊德的许多论断了。起初，他本人那丰富的梦幻生活大概会令他吃惊；可到后来，他将逐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热闹的剧院的老板——所有者，观众和批评家融于一身。^①

在向公众描述梦的工作的先驱者们中，有一位就是塞缪尔·麦康伯牧师；然而，与韦叶尔不同的是，麦康伯坚持认为，梦显示了“有秩序的思想过程”，并拒绝过多地考虑“所有的梦先前都显然具有性的起因”这一主张。就他对弗洛伊德的评论来看，他增加了许多涉及梦的参考资料，而在那些梦中，超自然的东西起着首要的作用。总的来说，那篇文章不同意弗洛伊德认为对于理解梦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但麦康伯提出了自己对这门“新心理学”有影响的先入之见：“梦是个寓言，就象《天路历程》一样，它的确具有无意识的洞察力，而这一洞察力实际上是其作者在梦的掩盖下提出的。”^②

^① 爱德华·M·韦叶尔，《释梦的新艺术》，载《论坛》第四十五期，第593页。一些文章在翻译《释梦》之前就出现了。

^② 塞缪尔·麦康伯，《对梦的新解释》，载《世纪》第八十四期（一九一二），第665页。麦康伯尤其反对把欲望的满足看作是梦的概念。他似乎认为，如果梦纯粹是欲望的满足，那就不会为人的心理构造中较高尚的动机提供存在的范围。

早先的评论者在使弗洛伊德心理学为外行们理解所作的努力中，往往求助于类推和比喻。我们有爱德温·泰尼·布鲁斯特所作的这样一种解释。他把精神生活描绘成这样一种情形，“有意识的心灵居住在狭小而整洁的房间里……〔在这房间底下，则是〕充满了奇怪东西的地下室、地下通道和大洞穴……”^①

布里尔译著的出版是批评性反应的起点。《民族》杂志在欢迎《释梦》时有点疑虑。它指出，这门新心理学的总趋势是“过分强调了所有经验中性欲影响的力量，在这里考虑的领域里，这一偏见的结果是很明显的，它导致了不恰当和令人生厌的解释。”^② 贺拉斯·卡伦并不那么容易生气，但对弗洛伊德著作的临床价值却颇感兴趣。他坚持认为，“对弗洛伊德主义最终的检验并不在于争论，而在于其临床的适当性，在于它那样容易而简单地运用于其他问题，并照亮了心理学丛林中的其他的阴暗之处。”^③

一九一五年六月和七月，《人人杂志》发表了麦克斯·伊恩特曼的两篇文章，对这门新心理学作了第一次全面而通俗的介绍。所有使这门较难的学科变得容易和有趣的方法都采用了。伊恩特曼首先说，这些新理论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美国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简单的病例研究被用来说明精神分析学的“魔力”。作者对弗洛伊德的生涯以及释梦的早期阶段作了一个简短的小结。伊恩特曼对普通读者说，精神分析学“是查明无意识心理中的东西的一种技巧。无意识心理是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欲望和梦想去的地方。”在“潜在欲望的威胁”这一标题下，伊恩特曼把心理描绘成

① 爱德温·泰尼·布鲁斯特，《梦幻与遗忘：梦幻心理学中的新发现》，载《交互路尔杂志》第三十九期（一九一三），第715页。

② 对弗洛伊德的《释梦》的评论，载《民族》第一百一十六期（一九一三），第504页。

③ 贺拉斯·卡伦，《梦幻的奥妙》，载《日暮》第五十五期（一九一三），第80页。

“象一口神秘的水井一样，其意识的表面并不大，但它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并渗入到很深的地方。”然而，作者告诫读者说，精神分析并不是各种放纵和放荡行为的随便借口。^①

在第二篇文章中，乔治·布雷姆用当时公认的方式阐明了经过简单化的几种解释。一整页的插图显出了一个年轻人，他向他的同伴提出要对方做他妻子这样一个热情又正式的请求。她正坐在沙发上，脸上带有明显的痛苦的犹豫神情。这幅插图表明了对老处女的精神分析式的解释：“她是一个典型的‘老处女’，”画面下的解说词说道。“她真的爱他，但她又不能下决心嫁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在她的‘无意识’中，有一个‘理想的男人’的幻觉，这个幻觉真的就是她婴儿时父亲或兄弟的形象。”这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主要集中论述了弗洛伊德《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的普遍应用，正如文章标题所肯定地暗示的那样。^②

这两篇文章对公众所起到的作用就和为《民族》和《新共和》撰稿的评论者和专业作家对受过教育的外行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时也和洛林威治村和梅波·多吉·斯泰恩的“圈子”里的男人和女人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所起的作用一样。尽管弗洛伊德主义过分简单化了，并且在解释中使用了不准确的比喻，但这些文章仍然引起了一种对这门新心理学的非常积极的好奇感，这是一种在未来的数年内大大得到满足的好奇之感。

三

一九一五年，精神分析学在创办一些杂志上也得到了很好的

^① 麦克斯·伊恩特曼，《深索灵魂和治愈身体》，载《人人杂志》第三十二期，第741—750页。

^② 麦克斯·伊恩特曼，《先生，噢——哎——哎——嘿！他叫什么名字？》，载《人人杂志》第三十三期（一九一五），第95—103页。

发展，当时的知识界从这些杂志上获取了信息。对梦的研究是通向理解弗洛伊德基本假想的桥梁。这一运动仍然是新兴的；它引起了精神病医生的兴趣，从较低的程度上也引起了牧师们的兴趣，同时它也开始为外行们所欣赏了。在伦理学领域里，爱德温·B·霍尔特从普特南的建议中得到了暗示，他的建议是，精神分析学应该着重论述哲学概念的重新解释，随后，霍尔特便发表了关于《弗洛伊德的愿望及其在伦理学中的地位》（纽约，一九一五）的著作。这本书对欲望的原动力作出了完全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的解释。欲望是“感觉”感情上的继承者，正如先前的心理学家对精神生活的特征所作的描绘一样。这种愿望可以得到理智的察觉或感觉，它是行动过程的指导：它得到了“实用主义的认可”。事实上，“整个一部人生的戏剧都是以动力装置，即融合在体内的目的和欲望的发展和相应的调节为转移的。”（第61页）这种欲望正如弗洛伊德所审视的那样，似乎常常并不导致“有目的的行动”，而是导致防御性的行动，因此便导致了精神病的产生。这一点似乎并不使霍尔特感到烦恼，他认为这种欲望能动地适合良好的、方便的以及社会所允许的一切。^①

早期的先驱者们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二十年代的所有这些问题。他们急于想指出，“虚假的分析”和其他骗术都不应当归咎于弗洛伊德的责任^②。正是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沃尔特·利浦曼预料到了这一点：一旦精神分析学成为推广者的猎物以及饭后茶余的讨论话题，那么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进程将是很困难的。邀请

^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尔特意识到了精神分析的欲望的多种临床性起源。他看到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欲望和现实只需要“区别”的原则在有效的和谐中结为一体了，参看第134—135页。

^② 参见阿尔弗雷德·B·卡特纳，《弗洛伊德的理论》，载《新共和》第二卷（一九一五），第183页。他对霍尔特的这本书的评论载《新共和》第二卷（一九一五），第9—10页。

布里尔在梅波·多吉·斯泰恩的一次“晚会”上发言的正是利浦曼，也还是他告诫人们，要防止那必然会由沙龙讨论和“精神分析”造成的误解。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以饭桌上的交谈为基础或读了有关弗洛伊德的《释梦》的书后，对他进行批评的那些人……”弗洛伊德心理学之所以对外行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于他谈到了人类关心的实质问题。然而，就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不满，才拒绝他的心理学中使他们索然无趣的东西，因而去歪曲他的心理学。如果我们不加干扰让他说下去，他倒可能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当我把他的著作与我在大学里学习的心理学或与用来批驳他的大部分资料进行比较时，我不禁感到，正是由于他的解释，由于这种稳定和光辉的思想，他才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维作出了贡献的最伟大的人物之列。”^①

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一封信中，利浦曼解释了他最初接触弗洛伊德理论的情形。〔一九一二年的春季和夏季〕

在哈佛大学时，我从师于威廉·詹姆斯和格雷厄姆·华莱士，当时我正准备写一本有关政治学的书。该书将以《政治学导言》为标题出版。我有一位亲密的朋友，在我写那本书时，我们俩住在缅因森林中的同一间小屋里。他曾经是布里尔医生的病人，正忙着把《释梦》译成英文。他名叫阿尔弗雷德·布西·卡特纳。在他翻译时，我读了他的译文，并同他一起讨论了译文。这时，我开始明白，弗洛伊德对我在大学里所学的心理学作出了何等巨大的贡献。如果你愿意细读一下《政治学导言》，你就会看到这些影响。如果你知道该书是由弗洛伊德在他的《意象》杂志上写的书评，那也许会使你感

^① 沃尔特·利浦曼，《弗洛伊德与外行》，载《新共和》第二卷（一九一五），第9—10页。

兴趣的。

《政治学导言》于一九一四年问世。书中到处提及了当时知识界最主要的兴趣——其中有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利浦曼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对最近的将来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上争论的一个初步概括。它提倡一个新的、更加恰当的“思维程序”。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社会仅仅通过禁令或戒律来回击罪恶。利浦曼要求我们应该贯彻威廉·詹姆斯提出的找出所有罪恶的“道德上的对应物”的建议。他还提出，这样去引导本来的多种欲望的能量可以使那些欲望十分愉快地为社会所使用，他的这种思想是对精神分析学讨论升华的结果。利浦曼的劝告的要点是，我们应该停止对自己的多种欲望实行人为的限制，而首先要理解自己的内在本质。在理智反省的基础上，我们也许能够发展一种更加与人类的实际本质相一致，并至少是有利无害的、不压抑人的政治道德，就象目前我们的一些法律制度和实际做法那样。

通过梅波·多吉·斯泰恩小组提供的刺激以及二十年代前格林威治村的说明，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人们感兴趣的题材而成了战争的一个对手。一方面，它被指责为为了扬名而接受“空虚的本质”的“心理学骗术。”^①另一方面，它却又被欢呼为忏悔错误的一种补救物和女权运动的集中的呼喊声。佛洛伦斯·基普·弗兰克指出，“弗洛伊德学说对动机的探究是小说家相信的材料，而对梦的象征的使用则是诗人的真正材料。”^②在这点上联系上，请注意围绕着沃纳·费特刊于《民族》杂志上的那篇对荣格的《无意识心理

① 维克多·胡伯曼，正如《当代观点》第六十期（一九一六）第35页上报道的那样。

② 佛洛伦斯·基普·弗兰克，《精神分析及其随想》，载《小评论》第三期（一九一六），第15—17页。然而，她却相信，弗洛伊德最终将证明对医生是更为重要的，而荣格则对外行是更重要的。她相当准确地预言，“对精神分析的讨论还需要五年时间才能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中。”出处同前，第17页。

学》的书评进行的争论。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把精神分析学家的所有言论描述成“具有相同的条理；不仅是性欲的，而且是反常和令人厌恶的。”对可敬的、正常和自觉的自我被精神分析学家说成是傻瓜这一事实，他表示不满。“弗洛伊德学说的贡献在于，把遭到拒绝或受到压抑的联想与有意识的自我的残骸转变成组织完善的第二个性，即魔鬼般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它巧妙而神秘，贪欲而恶毒。”他承认，弗洛伊德提供了“到处都有着美好情感的证据”，但他坚持认为，那些证据“分散在令人厌恶却又具有创造性的想象之中。”^①

在对这一评论的回答中，其中一个塞缪尔·唐纳鲍姆的回答。他是一位开业的精神病医生。他反对费特把弗洛伊德的学派与荣格的学派相混淆，并且坚持认为，一个真理可能并不合趣味，但它仍然是正确的。^②塞缪尔·艾略特抗议道，这一“对性的讨厌的强调”只不过是妨碍发展对精神病作有价值的治疗罢了。^③另一方面，莱德·弗兰克林则称赞费特公开论述“弗洛伊德学说的荒谬之处……”的勇气。“整个思潮不过是对逻辑的滥用——是对科学的敏锐和方法的滥用——而不具有体面的道德。”弗兰克林使用流行的战争歇斯底里来获取优势，把这门新心理学谴责为“德国人头脑”的产物，而这种思想在“与非德国的文明国家的合乎逻辑和道德健全相比时，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熟的……”^④

这些文献中有许多东西是有助于启发人们对弗洛伊德的影响

① 沃纳·费特，《精神分析与性心理学》，载《民族》第一百〇三期（一九一六），第127—129页。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荣格的书的评论，倒不如说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指控。

② 塞缪尔·唐纳鲍姆，《书信》，载《民族》第一百〇三期，第218页。

③ 塞缪尔·艾略特，《书信》，载《民族》第一百〇三期，第219页。

④ 莱德·弗兰克林，《书信》，载《民族》第一百〇三期，第373页。

进行研究的。由于种种原因，作家们（无论是带着同情还是带着敌意）都在有关人的生活、心理学应当研究些什么这一问题上对他们的主题产生了种种偏见。在许多方面，谈到一件说过的事似乎等于说过去不该谈到的那件事。判断就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这是坏的，因为它是一个来自与我们的朋友交战的国家的人表达的”；或者，“这是坏的，因为它超越了文明的道德界限”；或者，“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一种合理的批评也许是针对那些把精神分析钦佩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用它来为个人的过度行为辩解的人进行的。如同在另一个方向一样，误解的压力在一个方向完全起了作用；理智、清醒的讨论仅仅局限于当代一些杂志的为数不多的几页上。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大门或者是表示先入之见，或者是根本无知——并希望前者得到服从或者后者得到宽恕。有一件事肯定会发生，那就是受到如此热情称赞而又受到那样强烈谴责的这一学说一定会使当时善于思考的人们感兴趣。

梅波·多吉·斯泰恩聚集起这么多“善于思考的人”象约翰·里德，沃尔特·利浦曼，玛格丽特·桑格，莫里斯·斯泰恩，哈津泰斯·哈普格德这样一些具有不同观点的男女，这倒是一个谜，这个谜只有斯泰恩夫人自己的心理与整个美国知识界的心理相结合才能解开。她简直是建立了二十世纪的“自由争论的知识界”的型式。因为她的精神分析医生伯纳德·沙契曾经劝她与丈夫分居，所以她感到厌倦或需要证实自己的偏见时，她就再一次去求助于精神分析。因此她便很好地说明了瓦尔多·弗兰克后来作为精神分析的弱点而指出的情况，以及弗洛伊德本人承认和哀叹的结果——巨大的治疗费用。^① 她从一个精神分析医生那里转到另一个

^① 瓦尔多·弗兰克，《西格蒙·弗洛伊德》，载《弗吉尼亚评论季刊》第十期（一九三四）第536页。“分析需要的时间和费用使能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在我们目前的制度下），主要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和寄生的男人。这些人不值得用长时间的努力来挽救

精神分析医生那里，同时又对其他的多种“治愈”方法颇感兴趣。在史密斯·艾利·吉利弗医生的治疗下，她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精神分析显然是一种泄露秘密的方法。我不仅能讲出有关自己的一切，而且还能讲出有关莫里斯〔斯泰恩〕的一切。”一段时间之后，她从吉利弗医生的“荣格派”分析转向布里尔医生的“弗洛伊德派”分析。^②她与布里尔医生一起就她与劳伦斯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通信来往。^③

我们已经注意到，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早就被激起了。布里尔提到了西奥多·德莱塞，他说德莱塞由于“生活观”受到他的影响而感谢他。格林威治村精神分析的伟大提倡者，弗洛德·戴尔谈到了一九一四年他在格林威治村介绍这门新心理学的情况。

那时，自由俱乐部中有六位或更多的成员非常了解精神分析学，二十位或者更多的成员对那些术语十分熟悉，完全可以使用它们来开玩笑。我开始阅读有关精神分析方面的书，起初对梦可以解释表示怀疑，直到我试着把联想〔荣格发展的一种方法〕与自己的一个梦想联系起来，产生了令人信服的结果……我想我是在一九一六年年底开始接受精神分析的，并非由于任何特殊的精神病，而是因为我认为，那对我的爱情生活和文学作品或许有所帮助，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

教，而精神分析医生却专门用这种努力去对他们重新调整，使他们进入病理世界。”在《精神分析疗法方面的转折》一文中，在上述引文中第326—402页，弗洛伊德建议为穷人设立精神分析诊所，他承认分析的过程也许不得不改变从而适应这一发展。

^② 卢汉，《转动者和摇动者》，第439页，498页。到一九二三年时，斯泰恩夫人已经再一次结婚了，这一次她嫁给了托尼·卢汉。因此，她的所有书后来都用了卢汉的姓；谈到斯泰恩夫人和卢汉夫人当然都指的是同一个人。

^③ 梅波·多吉·卢汉，《道家眼中的劳伦佐》（纽约，一九三五年），第270页。“在最后的惊惶中，我急忙赶到纽约去谒教布里尔医生。善良的老布里尔象位仁慈的盗尸鬼那样坐在诊所里，嘲笑秘密的宗教仪式，很快地为任何难以捉摸的窘境命名”。

那个时候对精神分析学有所了解的人都是这一学科某种意义上的传教士，格林威治村周围没有一个人听不到有关精神分析学的大量情况。^①

由于有戴尔帮助麦克斯·伊思特曼编辑的旧《群众》，因而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便幸运地与迅速到来的理性之日的黎明相联系了。讨论集中在妇女的选举权、离婚法的自由化以及其他问题上，而对弗洛伊德的热切兴趣则可以使那些问题与他的理论相联系。因此格林威治村的知识分子这样争论道：弗洛伊德的作品指出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对社会道德约束的一种理智的重新估价。因而我们必须把他看作我们中的一员。这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影响被感觉到之前的情况，但人们个人的性关系仍然同社会关系一样重要；事实上，两者都是相互依赖的。

上面所谈到的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战后二十年代的开端，那些年代作为弗洛伊德主义真正渗透到英美两国人们的思想中的见证。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讨论在战前和战时都没有中断过。把兴趣从科学杂志转向大众的意识这个一般比较慢的进程由于专注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甚至变得更加缓慢了。弗洛伊德自己把写作局限于有关临床疗程的论文；在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八年之间，他的主要著作没有公开发表。他写于一九一五年初的《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想》^②反映了他当时的情绪。同时，荣格安居于瑞士苏黎世的避难所里，照常坚持下去并找到一个机会把精神分析学传播给战争期间被迫流亡到那儿的知识分子——詹姆斯·乔伊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① 弗洛伊德·戴尔致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

^② 最初发表于《意象》第四期（一九一五），第1—21页。再参看《弗洛伊德论文集》第四卷，第398—317页。

第三章 弗洛伊德主义 在英美两国

除了对一般公众有着吸引力外，弗洛伊德主义首先对心理学，尤其对精神病理学或“医学心理学”是一大贡献。这一学说对受过教育的外行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因为它大胆地论述了普遍关心的人类行为的那些方面，但直到那时，这一学说还未成为人们在餐厅或客厅里交谈的话题。这一定有着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它的声望在大战一结束的那几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即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竟成了知识分子和富人们的玩物，成了咖啡馆、非法酒店里以及沙龙中无休止讨论的主题。它所遭到的反对表明，在那些赞成过去标准的圈子里，它并不为人们所接受；它只为许多较年轻的知识分子热情接受，这一事实也许表明，它向他们提供了批评的武器，以反对直到最近才为他们抛弃的那些标准。战后的一代人对精神分析学的正反两方面优势均感兴趣：它给了他们一个显然无可非议的“科学而明智地嘲弄”新价值的方法，它还提供了一个寻求人类行为新基础的机会。弗洛伊德的著作可以作为革命的文献；它偏离了过去的方向。

很少有人认真而充分地考虑过在他的著作中寻求可供选择的社会或道德纲领。弗洛伊德主义仅仅向个人主义者指出了一种保护自己以防止较古老的文明明显崩溃的方法。战后的世界首先通过这门新心理学寻求适应性，后来——当这个世界对新心理学感

到厌倦或发现它不适当时，就在经济上的抗议中寻求解脱。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形象统治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① 年轻的男女首先抛弃了自己文明的心理和伦理的根源；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则倾全力研究他们世界的经济结构。他们对最近才发现的普通人产生了兴趣，因此便组织起来反对世界的种种经济罪恶。正是因为“道德的抗议”，人们才联想到弗洛伊德的广泛影响。^②

“对标准的过高评价”似乎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即对战前和战时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采取极端的反对态度。以二十年代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话来说，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被搞乱了思想的人道主义者。对人道主义的每一种美德，这些人道主义者都有着对立的東西……然而，唯美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是同一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生产力……被看作是某种与诗歌和学问不相干的东西。”^③ 既然格林威治村以前曾作为来自美国文化背景的难民的避难所，因此这个地方肯定能成为某个展现出美国艺术家豪放不羁生活的地点，并且还可成为《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各家报纸讨论的中心。村民们思考和谈论的东西如果不是头版的稿子，至少也是很好的社论材料。^④ 就这个丰富多彩但已解体的知识分子集团仍有着的一套一致的指导原则而言，马尔科姆·考利已经系统地阐述过了。主要的攻击对象是“社会的标准”；正

① 参见弗洛伊德·戴尔，《国家：自传》（纽约，一九三三），第293—294页。

② 尽管精神分析学通常被因循守旧的人用来同行为上的激进主义相联系，然而它却多次提供了讨论“争权夺权”的动力新方法。但是，它可能会不合人意地与推销员和全体人员工作的心理相联系。因此看到通俗的畅销杂志上登载改编过的《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和《释梦》，就不感到吃惊了。见《美国杂志》，第九十二期（一九二一）第11—13页；第九十九期（一九二五），第29页。

③ 马尔科姆·考利，《流亡者归来：各种思想的叙述》（纽约，一九三四），第38页。

④ 参见乔治·布雷特，《曼哈顿的蒙特马特》系列文章，载纽约《世界电报》五月号，第16—21页，一九三二年。

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重申异教徒的自由生活；他们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向精神分析学家忏悔罪过，来摆脱顺应不良的心理源泉。^①

在保比·爱德华兹的颇有争论的杂志《芦笛》的那几页中，有关格林威治村的道德问题总是争论来争论去。爱德华兹的主要任务是双重的：替这个村要求艺术和道德上的先驱地位，同时保护其名声以防那些想要对它进行诽谤的人的破坏。这两个任务并非完全不一致。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说道，“格林威治村经历了激进主义、放纵、弗洛伊德主义、自由性爱和虚假的陷阱——并且使那一切都完结了。”“这儿是全美国罕见的地方。这儿有理想，有适度体面的举止，有对艺术表达的相对严肃性。”一般说来，他对精神分析学发表的意见时常是半严肃，半轻率的。“性的主要动机是潜意识心理的可怕骚动。而这一潜意识心理显然并不详细研究其他东西。它是我们所继承的邪恶的动物的心理……如果你不让自己的潜意识心理为所欲为，你就会获得从损坏消化系统到使你成为一个追随时尚的人这一切行动的情结。”^②

在一九二三年二月的那一期杂志上，爱德华兹说，他自己讨厌“这种反清教徒的陈词滥调”，而这种陈词滥调却形成了格林威治村里许多理智讨论的实质。一九二三年七月，爱德华兹说，弗洛伊德进入这个村的通道，穿过华盛顿广场书店；同年12月，社论的恶意变得尤为强烈了：

弗洛伊德的狡诈，即精神分析学极大地败坏了格林威治村和美国文学的声誉这样令人窘迫的主题，现在依然存在。

① 考利，《流亡者归来》第69—71页。

② 保比·爱德华兹，《社论》，载《芦笛》第8期，（一九二一），第25页。

当然，可怕的人们直率地谈到可疑的事，而不幸的是，读者大众并没有对卫理公会学院的课程表中没有排的课程感到好奇……比较好的村民们对弗洛伊德化的聚会和令人讨厌的聚会同样大为不满……

人们可以看到，究竟谁没有研究过医学，……弗洛伊德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正如许多对德语知识模糊的人所解释的那样，最坏的可能性就在那位不幸的奥地利学者的混乱心理——浪漫主义的随笔之中。

对于村民们来说，他们藐视并已经摆脱了的环境需要标签，而这门新的心理学则较方便地提供了这些标签。清教徒这个术语从自身的历史背景中分离了出来，扩展到包括民族道德和事务的几乎所有保护人的程度。前辈开拓者们罪孽深重的美德降临到后代的头上，而他们的后代只沾染上了洗礼无法消除的原罪。总之，这个民族成为严重的道德疾病——压抑的牺牲品。清教徒“压抑了”所有对理智生活的正常反应，结果其后裔都染上了性饥饿症，这实在令人可怜。物质主义认为正常的生活是不明智的，因而将其忽略了，而成功则代替了性欲。所有这一切不仅是谈话的话题，也是战后一些论述美国文化的著作的主题。^①“年轻的美国”的一位最敏锐的观察者里奥·斯坦指出，美国缺乏经验和天真，这种情

^① 瓦尔多·弗兰克，《我们的美国》（纽约，一九一九），《在美国的丛林中》（纽约，一九三七），《选词：一本有关书籍和戏剧的非正式的书》（纽约，一九二四）；哈德维克·赫曼森，《逆流》（纽约，一九二二），《中间的道路：美国纪事》以及其他著作。哈维·奥希金斯的《流行的美国思想》（纽约，一九二四）从这种观点上来攻击过去的杰出的美国人。参看伦道夫·保恩，《索尼亚罗尼斯巴的肖像》，收入《一个文学上的激进分子的历史和其他文章》（纽约，一九二〇），《清教徒的权力意志》，收入《七种艺术》第一卷，第631—637页。

况由于对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将得到改善，这一研究将揭示出在浅薄的美国还不为人知的人类心灵深处的东西：

因为与我们乐观的自满情绪的外壳相比，我们的经验显得迟钝了，所以这种经验没有教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将从科学中学到。尤其是与弗洛伊德的名字相一致的更为新颖的个人心理学，正在向我们讲述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在这里接受更新的个人心理学要比在更加明智和沉思的文化中心容易得多，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从总体上来说，我们感到更少地受到它的玷污。^①

许多村民指出，顺应不良的秘密就在于婚姻制度。当美国商人在表明压抑对个人幸福的影响时，就普遍地难以进行下去了。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法——但有着不断的讨论和许多实验。因为弗洛伊德为那场“美国的大病”提供标签是颇为自然的，所以把他作为性实验的权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在性道德方面带来这场革命。这场革命简直把他给吸引住了——犹如一种为其观点和行为辩护的方法那样吸引了哈弗洛克·伊利斯、克拉夫特·伊宾以及其他许多人。人们呼吁的是“不落俗套”和“容忍这种实验到赞许这种实验，而不是抱着从谴责到容忍的态度。”^②这种态度的动机并不完全是虚假的。对许多人来说，性自由是通向婚姻幸福更安全的道路；选择伴侣需要一番考虑，结婚不应被当作事务上的安排，或看作一种保证财富和权力安全可靠的方

^① 里奥·斯坦，《美国的乐观主义》，收入《七种艺术》第二卷（一九一七），第90页。

^② 卡罗琳·F·威尔，《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的格林威治村》（波士顿，一九三五），第236页；参看第211，255—256页。

法。^①然而，对许多实验者来说，爱情并不是谈话容易解开的谜；现代性选择的自由并不保证人们幸福。确实，“现代主义”经常那样使人迷惑不解，因而妨碍了婚姻的和谐。^②变得“摩登”起来的欲望与男女人的基本本能背道而驰，因而并不有助于改善一种公认的恶劣环境。人们被领向远离幸福的地方，通过升华，达到为文明服务的目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继续取决于战胜自然。”^③结果，现代主义者便反对种种性的情感概念，反对男性占有一切：“现代妇女——某些现代妇女——正致力于反对人们把她们当作性爱的对象而予以过高的估价。”^④现代主义者和保守派都否认性的理想作用：“对这个宇宙中的人类这一生物来说，具有美就意味着具有性欲——”并且“〔人类几乎不能理解〕性爱的极大奥秘，而激进分子和保守分子都设法贬低它的地位：前者将其视为罪孽，后者则把它当成一样微不足道的东西。”^⑤

尽管许多诚实的人并不想利用自由或把自由恋爱看成“秘密”的特权，但是那些把格林威治村看作有罪的地方的人却情愿相信，所有的“现代主义者”已沉溺于异教的放荡之中。显然，在禁止和非禁止这两个极端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中庸。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通人把目光转向格林威治村时，便带着恐惧、快乐和羡慕的

① 戴尔，《回家》，第288—289页；参看他的《机器时代的爱情》（纽约，一九三〇），该书详细研究了现代性行为。再见他的《婚姻和自由》，载《解放者》第四期（一九二一），第16—21页。

② 这样，我们便有了费里克斯·菲和乔伊斯·泰南特的例子。由于前者的“现代思想”，他们没有“获得成功”。《怪物》（纽约，一九二〇），第344页。在接下来的了一本《多刺的灌木林》中，第128页，费里克斯由于皈依了“现代主义”，因而对现代婚姻的讨论表示不满：“……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他和罗斯·安娜的婚姻似乎是为了得到旁观者的利益而进行的一次社会性表演吗？”参看路德维希·路易森，《斯梯芬·伊斯考特》（纽约，一九三〇），第193页对保尔与露尼特·戈罗弗的婚姻关系的冗长讨论。

③ 路易森，《斯梯芬·伊斯考特》，第211页。

④ 出处同前，第216页。

神色。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尤其是它那急于参与较小的社会革命的那一部分，总是乐意承认，某某人是个人行为问题上的指导者。在早期的生活中，他们就“认识到，只有在无法更新的旧时代才有安全的实用性和愤世嫉俗性。”^①弗洛伊德对性的讨论很久以前就得到了阐释；精神分析学正确和错误的实践都成为传播这门新心理学的方法，因而它在一九二〇年便受到了广泛的误解。精神分析学具有新思想新时尚的吸引力；因此它给读者留下了“通俗杂志”和大都市报纸所能给人的那种印象。对性的讨论适应了某种需要，因为至少二十年代的青年人认为，它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除了另一些东西外，精神分析与战后一代人中追求更大自由的欲望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拉比·斯蒂芬·威斯在《纽约时报》上报道的一篇布道文中呼吁，在“杂乱无章的讨论”主要问题这方面，需要有更大的节制：“让精神分析学继续存在于科学家的实验棚和医生的实验室里。”^②性具有自己的位置，但它应该仍然保持在那儿。用性欲来解释一切显然是荒谬绝伦的。人类不只是依赖性而生存：“他有着要求欣赏博拉姆斯协奏曲、自由体诗和好莱坞电影的欲望，还有着要求参与制订宪法修正案的强烈而无法满足的欲望。”^③弗洛伊德既不是这个运动的创始者，也不是这个运动的指导者。他写成了几本书，并首创了一种新的临床治疗程序，而这

① 约翰·F·卡特，《该其中一人所作的〈这些任性的青年〉》，载《大西洋月刊》，第一百二十四期（一九二〇），第302页。也许年轻的美籍急于寻求道德和审美上的指导的一个显著迹象就是刊登在格林威治村的小型杂志《花花公子》第一期（一九二二）第6页上的宣言：“劳伦斯、阿瑟·叔本华、瓦尔特·惠特曼、弗里德里希·尼采、耶稣基督、罗伯特·希利尔、伊利·福尔、威廉·布莱克、约翰·彼勒、毕肖普以及小爱德蒙·威尔逊、奥斯卡尼勋爵、克利夫·贝尔、斯罗门王、卡尔·桑德堡以及所有花花公子，让他们代替我们说话吧！”

② 《纽约时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6或第3页。

③ 李奥拉·帕拉兹斯，《性的单一性》，载《论坛》第七十四期，（一九二五），第111页。

几本书却为二十年代的男女青年所任意诵读。

由于许多宣传普及者相信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以及其他一些人，因此公众反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便得到了极大的刺激。^①这些宣传者中，为首的是安德列·屈顿，^②布里尔，弗雷德里克·彼尔斯和乔治·格林。^③屈顿的著作试图减轻对困难的任何和所有恐惧；它们与读者聊天，好似它们的作者在饮“精神茶水”时与妇女俱乐部成员聊天一般。尽管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只是在使读者更加迷惑不解方面才获得了成功，但屈顿却带来了弗洛伊德著作的一种“舒适自然地简化了的版本”，这种版本任何人都能理解。^④这种“简化了的版本”可以进一步在刊登在英语世界的报纸和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中极为频繁的引证中找到。总而言之，精神分析学的流行概念是什么呢？

一方面，精神分析“谈论梦”。大多数人知道，梦具有同人物索引一样的新意，梦的解析成了沙龙里的游戏。男男女女接受劝告，去收集自己的梦，并借助于那点浅薄的学问来搜查“暗藏的情结”，从而形成对朋友的性格的评价。对梦如此一知半解的分析，是当时小说中讥智讽刺和严肃思考的主题。

① 马克·沙利文，《我们的时代》第四卷，第171页，估计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将会有二百多本论述弗洛伊德主义的著作。”他并不想将这些书名罗列出来。

② 《精神分析学的简单知识》（纽约，一九二二）；《精神分析学，其历史、理论与实践》（纽约，一九一九），以及其他的著作。彼艾尔·罗文在《芦笛》第七期（一九二〇）上写道，“象赫尔伯特·斯宾塞在达尔文学说上起了相似的作用一样，屈顿是个天才的魔术师，他的魔杖使多种学派复杂难懂的技术变得简单了。”

③ 布里尔，《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纽约，一九二二），弗雷德里克·彼尔斯，《我们的无意识与怎样使用它》（纽约，一九二二）；乔治·亨利·格林，《课堂中的精神分析学》（纽约，一九二二）。参看露西·赫尔，《解释弗洛伊德学说》，载《学者》第五十五卷（一九二二），第302—304页。

④ 伯纳德·狄茨尼，《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的消息灵通人士》，收入《攻击与辩护》（波士顿，一九三六）第224页。

精神分析也被一般人看作是性放荡的理性化；实际上，一般人不得不注意到这个事实，因为社论和牧师们的布道都向他们指出了这一事实。对弗洛伊德开创的放肆时代的抗议不断加剧，这一时代被“科学看作是替伤风败俗行为的辩护。”^①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这种误解遭到了那些研究过弗洛伊德理论的人的强烈反对；但那些对弗洛伊德理论一无所知的人则几乎没有听到过反对滥用这一理论的抗议。因此，“风靡一时的弗洛伊德主义”承认了弗洛伊德早已就警告过的一切无法无天的行为。

精神分析学也是沙龙里交谈的话题。它可能是进入“最好的团体”的入口。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山多·弗伦兹指出，在美国，这种兴趣“有点肤浅，而较深刻的一面则多少被忽视了。”^②精神分析学是“谈论自己”的讨人喜爱的借口。这样，精神分析学的术语便成了“家庭用语”——压抑、固恋、升华、情结（所有行为方式或态度都是“情结”），防御机制——是几乎任何时候都贴在一个句子上的、受到滥用的标鉴，或者就包括在对性格的扼要分析之中。

在一些人看来，所有精神分析学家都是庸医；另一些人则认识到这一新实践的价值，但不愿意指出它遭到了滥用。因为这种新的实践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发展的，而且这一套工作规律至今还没有被广泛接受，所以精神分析学似乎轻而易举就成了庸医的牺牲品。仅在伦敦，就流传着一种怨言，“有许多所谓的男女‘精神分析学家’，他们不具有任何资格，无论在医术上还是在心理学上都没有经过真正的训练，但却利用神经质或患歇斯底里症的妇女的轻信，来设法获得较高的酬金。”^③人们希望这种情况将会产生出“自

① 《伦敦时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第10页。时报的文章继续反驳这一断言，解释精神分析学的真正含义。这也是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纽约时报》第14和第5页上社论的要点，该社论批评了契斯特顿对弗洛伊德学说发表的肤浅评论。

② 《纽约时报》，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第二版，第4和3页。

③ 书信，载《新政治家》第二十卷（一九二三），654页。

己的矫正方法”——一场全力反对这种庸医医术的战役。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对任何研究过“移情”的临床困难并理解医生与患者关系的内部本质的人来说，很明显，在不熟练的人手中，精神分析学“比没有价值更为糟糕。”^①

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接受还掺杂了错误的解释和表面的热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弗洛伊德及其理论竟激发了他自己预料到的两种反应——愤怒和恐惧——以及他真正害怕的一种反应——快乐。愤怒是诸如奥斯特顿这样一些人表达出来的，他们否认精神分析学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真正的科学不可能这样流行：“真正科学思考的特点在于，除了极为小心并使常识变得极为简单的情况以外，一门科学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是不可能被一般地运用于公共事务的。”^②“精神分析信徒们的罪行”在于，他们讨论了“文明人在人迹混杂的公众场合不去讨论，或者如果特别敏感的话，根本不去讨论的问题。”^③反对者们则怀疑，精神分析学是否只提供了谈话的借口，而从正直体面和优雅得体这方面来说，在文明的讨论中，这种借口很可能不予考虑。

再者，如果弗洛伊德的发现得到普遍的运用，那么在正常与反常之间就不再有任何分界线了，每个人都可以求助于对从未患过的疾病进行郁郁沉思的反省。^④一个人怎样才能具有足够的辨别

①. 《社论》，载《纽约时报》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第12和第5页。

②. 吉尔伯特·瓦·奥斯特顿，《精神分析的游戏》，载《壹纪》，第一百〇六期，第35页。参看《伦敦时报》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第12页。

③. 《社论》，载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第14和第5页，参看《纽约时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版，第5和第2页；《受惊的精神分析学家》，载《民族》第一百一十二期（一九二一），第908页；《分析精神分析学家》，收入《对种种评论的评论》，第七十六期（一九二七），第322—323页。

④. 《纽约时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第7页和第1页；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第24和第2页；《伦敦时报》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7页；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7页。

力或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认识，自我控制永远是防止“变态”的充分保障呢？据说，精神分析学鼓励了悲观主义的生活观，毁灭了人的一切或大部分幻想。因此很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这门新的心理学：例如摩西·罗杰斯在读了一百〇二本论述精神分析学和有关学科的书后，便对生活感到绝望，并打开了煤气。^①

尽管有着这种比较阴郁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还是把这种“一时的风尚”当作颇受欢迎的娱乐来欣赏。记者的反应是，乘上一列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去报道“这位伟大的人物”的外貌和生活习惯。^② 好莱坞则希望诱惑弗洛伊德与写电影剧本的作者合作，并劝说他们对恋爱方面较为深刻的心理问题作些阐述。^③ 精神分析学公开承认的这些秘密以通常的空间速度很乐意泄露给杂志上的报道。^④ 来美定居或访问的精神分析学家本身也是“很好的稿子”，公众随手就读到了有关与他们交谈的报道。^⑤ 对工厂女工的

^① 《纽约时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第7页和第1页；参看《纽约时报》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第24和第2页；《伦敦时报》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7页；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7页。

^② 考尼利尔·斯特拉顿·帕克，《心理学的首都》，载《眺望》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第551—555页；雷蒙德·雷可利，《访问弗洛伊德》，载《展望》第一百三十五期（一九二三），第27—29页；奥狄特·潘纳提埃，《在维也纳的约会》，载《生活的时代》第三百五十一期（一九三六），第138—144页。

^③ 《纽约时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七版，第3和第8页；再参看《伦敦时报》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第8页对在维也纳拍摄“由弗洛伊德教授监制并解释其理论体系”的一部“关于精神分析学”的影片进行了报道。《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九版，第3和第7页报道说，弗洛伊德可能被邀请来美国帮助拍摄电影《阴部的胜利》。

^④ 参看鲁西安·卡雷，《接受精神分析有何感觉》，载《美国杂志》第九十一期（一九二五），29页。弗吉尼亚·特亨·凡·德瓦特，《我接受精神分析》，载《世纪》第一百一十三期（一九二六），第224—229页。

^⑤ 布里尔，《纽约时报》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三版，第7和第1页；《美国杂志》，第九十二期（一九二一），第11—13页。阿德勒，《纽约时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第二版，第5和第3页。魏特尔斯，《纽约时报》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十版，第7和第1页。弗伦兹，《纽约时报》，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第二版，第4和第3页。

劝告则领略了这门“新心理学”的兴趣和风味。①

对流行的处理来说，这一术语显然既不过分困难也不过分单调。尽管知识界通过了解这一理论而获取了术语，甚至可以理解这些术语，但对这些术语的广泛讨论却唤起了政府报刊的最大努力，试图使得这些术语生动多姿。所有的科学术语通过把抽象的本质与其最接近的类似情形相比较，因而决定这一抽象的本质。就这点来说，也许所有科学术语都是隐喻。但“无意识”这个术语却永远是心理活动领域得到的毫无特色的标签。如果无意识是“没有意识”，那它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描述才能使它在公众的头脑中留下印象呢？我们怎么能谴责无意识本身、或向那些并不愿意借助于抽象概念进行工作的人解释它呢？一旦人们决定赋予这个术语什么样的道德色彩，那么取自其中的陈腐题材就有了广泛的挑选余地。无意识是“野蛮的”——也就是说，它与我们身上的动物本性相一致，正如有意识的生活证实了我们的理性本质一样。

无意识似乎是一个和那些动物园相同的地区，在那里，所有的饲养员仿佛都罢了工。许多没有注意到的、不受怀疑的欲望和激情在自己的笼子中不断吼叫和发怒。让不幸的患者安静下来的唯一希望就是，让精神分析学家打开笼子，让里面的动物自由。②

① 卢汉，《转动者和摇动者》，第510页。“刺激因素”的名单中也许包括审问利奥坡德和利奥波（一九二四）时到场的十位“著名的精神病理学家”，报纸上报了这一审问。参见葛拉斯·亚当斯，《心理学的兴起和衰落》，载《大西洋月刊》，第一百五十三期（一九三四），第86页。

② 阿瑟·E·J·莱吉，《精神治愈》，载《评论季刊》第二百三十八期（一九二二），第260页。注意：精神分析学家是如何与暗喻相一致，成为“可驱人物”的，当管理员（即潜意识压抑力）不在时，他便偷偷地走进去放走了动物。

无意识是邪恶的，它能策划阴谋诡计，反对有意识头脑的“法则和命令”。这样看来，给它贴上心理生活的“马基雅维里”这一标签是颇为合适的。“很显然，一旦潜意识^①的阴谋为我们所知，我们自己一般是能够对付的。只有当那位马基雅维里的阴谋隐藏起来不为我们所知时，他才能伤害我们。”^②

很显然，无意识也是原始的、神话式的洞穴；一位批评家认为，利比多是“沉迷于无意识之中”、令人讨厌而“凶恶严格的监护人。”^③在阿尔多斯·赫胥黎看来，“别人告诉我们”，无意识“是某种类似洞穴或地狱的地方，而与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责任格格不入的所有邪恶思想和欲望都被送到那儿去了。”^④契斯特顿谈到，无意识是“某种有关每个人的荒谬神话，这些人的身上都有着一种上了年纪、长着畸形小头的猴子。让人的身上长有猴子，这是十

① 外行几乎从来不费心思地去把潜意识与无意识区别开来；对他来说，这两个术语是可以交替使用的。有两个不相关的术语表明了不可的精神领域：——潜意识(Unterbewusst)；——无意识(Unbewusst)。他将后一个术语作为心理解剖学的概念，并对之越来越充分重视，因此它得到了进一步澄清。歌纳斯特·琼斯在《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生平及其著作》中提供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评论：“弗洛伊德很注意，他从不使用潜意识(Unterbewusst)这个术语，他认为，这个术语将人引入歧途；这仅仅指出了某种略微更少意识的东西。然而，在先前的一个场合，他用了法文的下意识(Subconscient)这个词。”(第一卷，第403页)

在抑制和压制这两个术语上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后者被随便而且常常错误地使用于弗洛伊德早期作品的翻译和二十年代初对弗洛伊德的通俗评论中。弗洛伊德原先用的术语是：压制(Unterdrückung)；抑制(Verdrängung)。

② E·W·，《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知识》，载《生活的时代》，第三百〇九期(一九二一)，第101页。

③ 乔治·M·卡伦，《遭到攻击的精神分析学》，载《生活的时代》，第三百一十期(一九二一)，第107页。

④ 阿尔多斯·赫胥黎，《我们当代的欺骗行为》，载《论坛》，第七十三期(一九二五)，第317—318页。

分难以做到的，关于这一点，作家们写了一些令人沉思并使人忧郁的诗歌，同时伦理道德文章也热烈地辩论了究竟是人服从猴子还是猴子服从人的问题。”^①只有这些例子中的最后两个才试图认真地告诉或影响读者，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潜意识压抑力（一个本身就足以成为隐喻的术语）分别被叫做“警察”、“监察人”或“卫兵”。^②

谈到的所有这一切应该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弗洛伊德其人非常出名，其理论很快就为人们接受了，但却遭到了严重曲解。鼓吹者和反对者都参与了诽谤这种气氛的行动，并使一般外行人很难掌握弗洛伊德主义的真实意义。但要任何有思想、有文化的人无论在什么方面都把自己与知识界相联系，而不能接触新的心理学，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他无法逃避接受过多的新心理学知识。如果他深居简出，那只能在报纸或杂志上发现或注意到，它在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运用，而对这些作家的作品，他一般总要过目细读的；如果他不读书，也不与人们谈话，那么他就不会受其影响了。

二

知识界的反应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性质上都与一般人的反应迥然不同。这是更为认真的接受；好奇的可原谅的动机是不足以

① 奥斯特顿，《精神分析的游戏》，在上述引文中，第41—42页。

② 参看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第14页的《伦敦时报》，报道了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琼斯先生作的一次讲演。他实际上使用了同样的“扩展了的比喻”，而弗洛伊德则把这种比喻用于《精神分析学引论》（266页），即他受欢迎的最早一次讲演中，事实上，弗洛伊德因为仅仅编造了一个神话或是一个与不存在的东西相一致的“寓言的‘现实’”而经常遭到指责。参看赫晋黎，《我们当代的欺骗行为》，在上述引文中第317页；塞缪尔·唐纳德纳，正如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纽约时报》第八版第4和第6页所报道的那样。

解释他们的兴趣的。知识分子宁可彼此“进行精神分析”，而不愿吃东西。他们受到“有关利比多的这种行话”的吸引如此之大，以致于苏珊·格拉斯拜尔竟在绝望中呼喊，“‘你不能在没有听说某个人情结的情况下去买……小果子面包。’”^①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浦把晚上的时间用来搜寻“每个人的构造中的阿基里斯脚踵……”^②哈津斯·哈坡古德注意到了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日益衰落的论述：“在那些日子里，每个汤姆、狄克和哈里都在曲解和误用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一般概念。对一套新思想的自然夸张常常使这些新思想十分荒谬，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③既然梅波·多吉·斯泰恩于1916年第一个接受了精神分析学，所以她的许多朋友也都尝试了一下。他们这样做有着种种原因——出于好奇、厌烦或真正的需要，为达到检验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之目的，或为了使他们得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④

弗洛德·戴尔在与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有关的问题方面，被许多人当作权威，或至少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讨论带头人。他把自己对精神分析学的体验作了一个相当全面的描述。通过阅读布顿的《忧郁症的剖析》，他早就对这种新理论发生了兴趣。而早在这之前，他就对他一开始来到“这个村”时就听到的“精神分析学行话”习惯了。第一部小说写了一半，他就患上了“创造性健忘症”；

① 阿尔伯特·帕里，《顶层与骗子，美国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历史》（纽约，一九三三），第278页。

② 玛格丽特·安德森，《自传：我的三十年战争》（纽编，一九三〇），第186页。

③ 哈津斯·哈坡古德，《现代世界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纽约，一九三九），第382—383页。通过分析自己，哈坡古德克服了自己对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即精神分析学需要很大的代价，他收集并阅读了自己所有的书信：“……这些真实的文献使我找到了精神病的起因，从而净化和纯洁了受难的人。”

④ 约翰·法拉，《现代小说中的性心理学》，载《独立》第一百一十七期（一九二六），第666页。

因而被迫停止写作。接受了“最亲爱的朋友和先前的情人”的劝告后，他就去找唐纳鲍姆医生给他看病。唐纳鲍姆医生答应用较少的费用给他治疗。这种安排是理想的，是每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可能“幻想”的分析情境。戴尔立刻表示反对：“记忆、梦和联想象从不停息的急流一般，从我脑中奔涌而出。”他同意在治疗期间不谈恋爱，以免干扰自己的感情生活。极好的合作省去了精神分析学家的许多不便：“我的精神分析医生没有给我解释我的梦，而让我自己去解释；他也没有告诉我说，我有可怕的恋母情结，并且还有自恋，还有大量的无意识同性恋，以及许多听来可怕的特质；我自己把所有这一切都找了出来，并且告诉了他。”^①戴尔不仅对这些结果感到高兴，还为这门新心理学作为“和哥白尼、达尔文、马克思的思想同样重要的一种思想……”而欢呼；不久，他的朋友便接受了精神分析学，并在交谈中使用较短的心理学语言。

由于几方面的原因，精神分析学为这位二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喜欢。没过多久他就抛弃了（从极大的程度上说来是玩世不恭的）传统道德和社会结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居住在格林威治村就是对那一点的证明——他迄今仍不愿接受另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体系，譬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在二十年代，他所需要的是一种方法，一种探索自己灵魂的心理方法，并为这一行动辩护；他之所以欢迎精神分析学，是因为它没有立法来反对他的欲望，或把这些欲望限制在他所（就目前来说）仇视的社会道德观念中。精神分析学被迫制定了自己反抗传统的方针。约瑟夫·弗里曼很小心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村里的男女青年对自己所进行的反抗并不总是绝对自信的：“清教徒的儿女们、艺术家、作家和大批来到格林威治村寻找真诚和自由的感情和理智生

^① 《回家》，第93，295页。参看《文学的自我分析》，载《现代季刊》第四期（一九二七），第149页。

活的空想家们都感到，背上有他们正在试图摆脱的妖怪的冰冷呼吸。因为他们不可能在没有负罪感的情况下放弃追求，所以他们夸大了快感的重要性，使之理想化，甚至对之顶礼膜拜。”^①

战后二十年代的反叛从本质上来说，是对道德和社会诸多干扰的“浪漫式抗议”。当然，甚至在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早期，人们就对艾玛·戈德曼的《地球母亲》和麦克斯·伊斯特曼的《大众和解放者》确实产生了兴趣；卡尔·马克思没有被人遗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也有许多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次反叛至少在目前来说，是由个人对灵魂的探索和一种如此自由开放的思想占主导的，因而他能十分自由地接受矛盾的理论，而丝毫不受其干扰。精神分析学之所以为其中大多数人所喜欢，其原因在于，它是新颖的，非正统的，并且令人吃惊地坦率，同时还在于，它暗示了——尽管它不一定向人们忠告——一种对性问题更为自由的想法。

这是二十年代的“心理躁狂症”，即“对复杂的精神分析无法满足的激情。”^②它竟然影响了二十世纪小说的质量和性质，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当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各种理解水平上受到争论时，作家们便把对正在接受治疗的人物的研究作为创作的原型。这类小说的主人公才是临床治疗的不常见的真正主体，但他常常是苍白、害羞和敏感的，沉湎于对世界过多的内省而郁闷的沉思之中，这倒使他显得苛刻而讨厌。他对异性的体验不如理解上的冒险那样重要。一个单一的动机无法解释一个单一的行为；相反，任何一个行为都含有与人物的“隐秘生活”有着复杂关系的种种不

① 约瑟夫·弗里曼，《美国的一个实证：对反叛者和浪漫主义者的叙述》（纽约，一九三六），第117页。

② 豪斯顿·波特逊，《混乱的曲调》（纽约，一九三一），第8页。

同动机。①批评家们往往抱怨把一切叙述得清楚明白的拙劣做法，因此把精神分析学引进阅读中来了。精神分析学成了休憩室里的闲聊，正在“非常充分地在书页里展开。”②

事实是，许多作家急于寻找一种塑造人物的方法，而这种方法避免了简·奥斯汀的典雅、狄更斯的感伤的滞重以及豪威尔斯的令社交界愉快的现实主义。他们感到，性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只是最近才在社会限制的多种层次下发现了这一问题；精神分析学为他们的目的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描述性术语。因此他们用复杂代替简单，反常代替正常，新奇代替传统。他们常常拙劣地运用这些素材。他们经常利用弗洛伊德——一般情况下是精神分析学来作为发掘对性的兴趣的借口。揭示这种发掘的小说比起趁机利用对这一情境的流行兴趣来，更有持久的价值；也许没有一部小说企图立刻受到欢迎。然而，并非所有作家都是自己的工具的笨拙操纵者。至少有些作家成功地得以接近迄今很难界定的解释人类情境的方法。

二十年代的小说反映了一——并且相当自然地——知识界对精神分析学的偏见。马克思韦尔·波顿海姆对这种小说进行的几种分类或许是粗糙而专断的，但它们却回敬了审视：

迫不得已地用笨拙的风格写成的肉感情节剧和在惠特曼与波德莱尔之间不成功的摇摆，譬如瓦尔多·弗兰克的《拉哈伯》，在一类小说中，肉感（sensuality）采取了一种沉重、愚蠢、天真但却严肃的态度，譬如舍伍德·安德森写的故事

① 约翰·卡罗·兰色姆，《弗洛伊德与文学》，载《星期六文学评论》，第一期（一九二四），第161页。参看亚当斯，《心理学的兴起和衰落》，在上述引文中，第85页。

② 霍奥·里德，《文学中的精神分析》，载《自由人》第五期（一九二二），第490页。

和小说。在这些故事和小说中，年轻人仰面朝天地躺在玉米地里，感到受到自己身体的压抑，等等；有一类小说，在其中肉感变得近乎放肆，近乎伤感，而且年纪轻轻就模仿那老于世故的样子，譬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有一类小说，在其中肉感既卑鄙又赤裸，它与渴望商业上的成功，即西奥多·德莱塞的冗长小说中的某种举动作斗争；有一类小说，在其中肉感嘲笑自己，并想知道，是否值得用已作出的努力来得到这种收获，即展现在本·赫契特的《厄里克·多恩》中的一种特性；以及那些没有结尾的小说，在其中，肉感追逐浪漫、高贵和家庭的的天伦之乐。^①

在这些种类中，有一些只是偶然与“心理分析小说”有关。精神分析学也许已向许多小说家指出，广泛地暴露肉感是获得人物塑造艺术的有效方法，但那是极不可能办到的。波顿海姆的批评性反驳及其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精神分析疾病”的征兆。它们表明，批评家的头脑偏离了对弗洛伊德影响的实际研究程度。

如果说精神分析学向这一时期的文学贡献了什么值得保存或甚至值得研究的东西，那么在过多地表现肉感或青春期对道德观念的种种攻击时，是找不到这种东西的，但在肉感主张反省或至少向它让步时，倒可以找到。在这十年快要结束时，有一位批评家说，将来的小说需要一种强烈的、“有活力的人的头脑来综合这些折磨人的绝望之感——一种现在不可避免的欧洲思想的要素——同时带有对大地的渴望，这种渴望必定是试图创造大地形象的基础……简单的形式不足以对他一定要了解的生活进行分

^① 马克思韦尔·波顿海姆，《精神分析与美国小说》，载《民族》，第一百一十四期（一九二二），第684页。

析，因为那种生活由于摆脱了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对他的意识的作用所造成的原始恐惧而变得复杂化了。”^① 那些最咄咄逼人的、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思想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尽管对建立思想体系有兴趣，但却不象为与令人不满足的环境有关的一种观点和一种立场进行辩护那样饶有兴趣。

有些小说揭示出，作者是很严肃的精神分析学研究者。因此如果我们想得到清晰的画面，就有必要不顾其内在价值去考查这些小说。譬如在路德维希·路易森的小说中，《斯梯芬·伊斯考特》和《内部的岛》^② 就运用了精神分析法，虽然并不总是很微妙的，但常常是很有效的。前一部小说论述了婚姻不幸及其心理学含意这一问题。这部小说基本上是对真正的婚姻和谐的捍卫和对性实验方面的“现代主义”的抨击。在《内部的岛》中，阿瑟·列维加入了精神分析学者的行列，并从这一居高临下的角度来观察现代世界。这些不是伟大的小说，当然也不是肉欲的粗俗展览。它们描绘了一位将自己的精神分析学知识转化为某种创作目的的颇有才能的艺术家，同时也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对一位明智地使用它的作家的价值。^③

二十年代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接受并不总是严肃诚恳的，或不加区分地盲目热情的。以忧伤或惊异而引起人们注意的过度行为也受到了讽刺。被自己的“逆行”引向精神分析医生诊所的那些老年女士们的画像非常怪诞，对作家来说，这是非常合适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罗斯·麦考莱的《危险的年代》中所强调的是希莱

① 布雷尔·潘顿，《小说形式之评论》，载伦敦的《阿美罗狄蒂特》第六期（一九二九），第443页。

② 纽约，一九二八。

③ 廉拉德·艾肯、瓦尔多·弗兰克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以及一些辩护也在这儿一并讨论。

丽夫人寻找一个伴侣，这样她便可以与这位伴侣叙谈自己的情况了。对希莱丽夫人来说，精神分析是对孤独女子的祈求的回答；它“比忏悔好得多——对牧师们来说，除了只需要最不愿意去细想的、令人害怕的过去的那些部分外，他们甚至对听到这些东西也毫无兴趣，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才这样去做；你们也会对这些感到厌烦的。”^① 精神分析的谈舌闯入了迄今安宁的家庭环境，这是第一次由省城剧作家创作的一部戏剧的主题。那部剧名叫《苏珊·格拉斯拜尔受压抑的欲望》。^② 使得斯梯芬与亨利艾达·布鲁斯特分手、随后又重归于好的方法，是一般的表现手法，但亨利艾达那天真烂漫的妹妹麦贝尔却写了几首诗，这些诗愉快地讨论了对弗洛伊德主义普遍感兴趣的时髦的天性。在这一时期所有的讽刺文学里，作家们非常注意误入歧途的努力，从而使得精神分析学成为一门熟悉的学科和过高估价对婴儿性欲处理的倾向。在受到讽刺的主题中，还有非专业的精神分析学家；^③ 性本能的问题，《维也纳人的错误》，^④ 把精神分析学运用于传记和历史的倾向，^⑤ 以

① 第80页，再参见第85—86，65，84页。

② 发表于《戏剧》（纽约，一九三〇），第231—271页。一九一七年首次上演于马萨诸塞州首府。鲍比·爱德华兹，《社论》，载《芦笛》第十三期（一九二三），第14页，谈到《受压抑的欲望》将弗洛伊德介绍给了许多人，那些人为了理解这部戏剧而不得不去谈他的著作。“正是由于这场小戏剧运动记载上的污点使得这种非常可恶阴险的德国宣传差一点被他们无知地传播开来。”

③ 参看阿尔多斯·赫胥黎，《理查德·格瑞诺的滑稽历史》，载《忘却》（伦敦，一九二〇），第65—68页。

④ 参看阿尔多斯·赫胥黎，《滑稽的成果》（伦敦，一九二三），第49页。

⑤ 西蒙·斯特朗斯基，《欧几里德的耻辱：精神分析学》，载《大西洋月刊》第一百二十四期，第322—337页。此文是对《欧几里德最初五本书中的性因素》这一有前题的书的“评论”。

欧几里德对“永恒三角”的依恋，据说可以追溯到“由于二岁时，这位几何学家站在父亲一边，依恋祖母而得到发展的一种深深的依恋……”出处同前，第333页。

及文学批评中的精神分析学介入。^①

尽管二十年代的许多作家后来转向研究经济压抑，并且对其中许多作家来说，精神分析学只是人们嘲笑的对象，但它最终还是对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术语本身几乎没有价值。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的方式失去了某些本质特征和重要性，并且还有这种可能性，即它不愿意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尽管弗洛伊德主义以修正了的形式出现，并且具有较少的诡辩和绝招（比标志着它在二十年代出现而又弄得很糟的诡辩和绝招少得多），但它还是注定要持续到三十年代。

三

弗洛伊德是一时的风尚吗？一旦研究精神分析学和谈论它的作用不复存在，那么精神分析学就注定要消失吗？三十年代，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对我们的道德和社交界有着威胁而对之进行的攻击几乎没有平息，但对于它的学说的真正价值的争论倒需要得到解决。医学界的同行仍然在争论精神分析疗法的合法性，并没有放松对庸医们的惩戒。^②主要的问题是弗洛伊德作为科学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地位。他总是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学是一门科学，其完整的过程是以科学假想为基础的。^③心理生活的解剖图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它能避免任何“精神渲

^① 哈弗·威克汗姆，《莎士比亚谋杀了自己的父亲吗？》载《天主教的世界》第一百三十四期（一九三二），538—546页，此文是对论述哈姆雷特动机的弗洛伊德—伦克的理论的讽刺。

^② 参看泰伦斯·格林尼吉，《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载《旁观者》第一百六十二期（一九三九），第490页。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英国医学协会回避了“精神分析学的危险”这一话题，正如《伦敦时报》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第9页，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第14页，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第9页，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第8页，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四日第10页上所报道的那样。

^③ 参看《新介绍性演讲》第三十五讲，第248页。

泄”并由于无意识加入到心理世界中而能解释所有的心理行为。^①然而，科学的谨慎不允许这一领域内的许多工作人员赞同他的学说。他们讨论弗洛伊德的理论，好象他们是某个俱乐部的成员，正在通过他的成员资格审查似的。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打算消除精神分析信徒们的疑虑；科学家们提供的答案甚至更不能令人放心：

(一)这样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即把无意识作为合法的科学调查领域来接受。一个人只能猜测无意识的意义和实质；如果这一猜测要获得科学的认可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受到限制。再者，“一般认为，无意识并不直接为人们所知。如果它为人们直接所知，那么它就不会是无意识，而是意识了。因此，只能从发生在意识中的事件中去推断它的存在……无意识成了装讨人喜欢的理论的布袋和繁殖丰富的神话领域，而这些神话则非常愿意被具体化为教条。”^②

(二)因为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无意识，所以他不得不依赖隐喻来描述心理生活。因此他的著作只是一种“诗化的理论”，主要由于与冷静的科学调查相似而得以发展。^③

(三)就基于本能生活之上的概念在一个狭小的临床结构中产生作用来说，这些概念可能是正确的。但从治疗向思考的转变包

① 参看琼斯，《精神分析学》第11—14页，参见西奥多·斯克罗斯德，对《精神分析学决定论的推论》，收入《公开的法庭》第四十一期（一九二七），第90—102页。“如果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对自己来说具有意义或价值的话，那么他的前提就一定是决定论的，也是不道德的。”出处同前，第97页。

② 委德，《倒退中的心理学》，载《政治家和国家》，第九期（一九三五），第956页。

③ 大卫·B·克莱恩，《心理学与弗洛伊德：一种历史批评的评价》，载《心理学评论》，第四十期（一九三六），第447—448页。弗洛伊德把相似作为一种有说服力的科学描述方法来使用，克莱恩为此辩护。参看贝伦·沃尔夫，《精神分析学的曙光》，载《英国的信使》第三十五期，390—391页。

括了对价值的重新解释，而这一点弗洛伊德则做得还不充分。^①

与这一讨论同时进行的是有关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关系的讨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在一般人的头脑中取代了弗洛伊德，所以弗洛伊德关于社会的预想被认为是重要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精神分析疗法是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中疾病的极好方法。^②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精神分析学是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因而否认治疗的价值，如果其目的是把患者送回到社会中，而根本不想改变这个社会，或者与社会的罪恶作斗争的话。^③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无意识神话”使人们专注于迷信和联想问题，所以这些批评家们坚持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绝不可能运用于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④

^① 卡纳·兰狄斯，《精神分析学和科学的方法》，载《科学》丛刊，第九十三卷（一九四一），第486页。再参看奈特·顿拉甫的严厉抨击，正如《纽约时报》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第十九专栏第1页报道的那样。瓦尔德马·坎普福特在《纽约时报》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第二版，第八专栏第1页的评论：“正是在弗洛伊德学说上发家的人激怒了任何熟悉自然科学的严格方法的人。”

^② 奥斯本，《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第245—266页，哈里·斯洛考威尔竟然坚持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使用了相似的策略和从事相关的职业，因而不管怎么说，两人都作出了对方能够使用、从而完成各自形式的贡献。”出处同前，第320页。在对卡夫卡和托马斯·曼这些现代作家的研究中，斯洛考威尔交替地使用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或将二者相结合。

^③ 弗朗西斯·H·巴特莱特，《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载《科学与社会》第三期（一九三九），第69页；考德威尔，《幻想与现实》，第185页；瓦尔多·弗兰克，《而格蒙·弗洛伊德》，在上述引文中，第536页；奥顿，《心理学与当今艺术》，收入《当今艺术》（伦敦，一九三五），第19页。

^④ 锡德尼·胡克，《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油与水》，载《公开的法庭》，第四十二期（一九二八），第20页。因为弗洛伊德的学说没有充分论述精神病的社会因素而对其进行批评的，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一些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最近对弗洛伊德的“生物学方向的价值”提出了批评，并指出，文化的决定因素（不一定是经济上的）在分析中应得到更全面的注意。在这些人中，最积极的有卡伦·霍尼和亚伯拉罕·卡狄纳。参看伊利索·韦瓦斯，《而格蒙·弗洛伊德的哲学遗产》，载《坎尼恩评论》第二期（一九四〇），第173—185页。如果想知道最近对“新精神分析信徒”的批评，请参看赫伯特·马库斯，《性交与文明》（波士顿，一九五五），第238—274页。

这些辩论证明了两点：对弗洛伊德的广泛而反复无常的兴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位，并正在为严肃思考弗洛伊德主义在现代思想中的地位所取代；二十年代的心理个人主义现在正在逐步消失。

与宗教界和新闻界的由来已久的争论在整个三十年代一直持续不断。弗洛伊德主义仍然被认为是信手可抓住的替罪羊，它甚至为政治上的操纵提供了材料。^① 弗洛伊德的《幻觉中的未来》^② 的出版更加违反了宗教界的敏感性。教士们相信，弗洛伊德不仅释放了好几群魔鬼，而且还盗用了忏悔这种体面和传统的驱除道德魔鬼的方法。“弗洛伊德式的忏悔”是不值一提的，因为它那外行的教士们不能给它带来一种道德体系，而只是满足于把丑事告诉他们的罪人。他们“没有力量传达赦免罪过的那种无价的优雅方式。”^③ 善恶必须得到清楚的确定，这种确定永远是宗教的责任和特权。^④ 弗洛伊德的精神病患者竟然与正常人相同，这种看法

①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纽约时报》第一版，第二专栏第3页报道了《忠诚的新达尔病囚》。纽约州参议员威廉·拉斯罗普要求该州立法机关提供调查精神分析学家所需的经费。

② 参看阿金森·李对该书的评论，《弗洛伊德的幻觉》，载《伦敦评论季刊》第一百五十九期（一九三四），第507—513页。

③ 克罗德·C·H·威廉逊，《精神分析学的危险》，载《天主教世界》第136期（一九三二），第296页；参看雷吉纳德·J·丁格尔，《心理学和原罪》，载《哥柏林评论》第二百期（一九三七），第134—144页。

④ 赫伯特·S·斯温滋，《精神分析与魔鬼》，载《共和国》第二十五期（一九三七），第659—661页。“……‘本能’就是披着科学外衣的魔鬼的伪装”。出处同前，第661页。参看《丹尼斯·德·鲁日蒙》，《魔鬼的作用》（纽约，一九四三）；在《坎尼恩评论》第四期（一九四四），第150—156页，瓦利斯对这两本书进行了评论，“精神分析学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将‘罪恶’和‘罪恶’变成主观机制的企图，而医学则能学会控制这些主观机制……在精神分析学信徒的眼中没有魔鬼，只有对魔鬼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在犯罪情结的投射中产生的。治愈了这一情结，就不再有对这个魔鬼的信仰，也不再有任何魔鬼的信仰了。”瓦利斯摘自《鲁日蒙》，第164页。

也使受惊吓的公众大为不满。^①这一次批评家们对“精神分析运动”在目的上的失败表现出沮丧和失望；他们的目的是，使我们摆脱清教徒的戒律，或用一种较为健康的性观念来代替这一运动要求我们抛弃的那种观念。^②例如，弗洛伊德对“行为的理智根源”的先入之见可用来与加速希特勒复活的那些“浪漫主义概念”进行比较。^③

这些反应中的大多数是二十年代那些看法的继续；其中可辨别出的是对理解弗洛伊德作出的努力，以及对于给弗洛伊德应有的地位所下的较大的决心。从事实的心理学家们试图认真清理早就由任意使用术语造成的“言语的混乱”。^④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一般的人已经把精神分析学——尽管可能从未听说过弗洛伊德——看作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已经开始对新的“风气”——沃森的行为主义感兴趣了。^⑤精神分析学未能防止、描述或有效地挽救1929年大萧条，这一点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种转变的原因。几乎从三十年代初开始，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变革就强调对统一的社会计划和标准的迫切需要了。也许这一点十分简单：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疾病广泛传播时，是不允许人们获得探索个人心灵这种享乐的。

^① 沃特豪斯，《精神分析学：成功还是失败？》，载《伦敦评论季刊》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三一），第29—30页。

^② “……精神分析学家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到底，也不能使我们摆脱清教徒的性情结，或是给我们一种大胆的新道德，来代替禁欲主义的基督教伦理观。”沃尔夫，《精神分析学的衰落》，在上述引文中，第376页。

^③ 高德弗洛尔·狄蒙比尼斯，《弗洛伊德，希特勒式的浪漫主义神秘起源》，载《法兰西信徒》第二百八十五期（一九三八），第478—483页。也就是说，在使用非理性和对非理性的热情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和希特勒是相同的。

^④ 卡尔·曼尼吉，《伪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言讲表达的危险》，载《展望》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三〇），此文试图十分小心地向外行解释诸如困惑、压抑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

^⑤ 亚当斯，《心理学的兴起和衰落》，在上述引文中，第86页。

在与约瑟夫·弗里曼有联系的那个团体看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是同等正确的，但显然不可能使其中一种学说与另一种学说相一致。弗里曼说，一般的精神分析学家把“激进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看作是精神错乱”，精神分析学也许常常为激进分子提供了逃入资产阶级社会的后门。但对忠实和热情的激进分子来说，精神分析学却不再提供三十年代问题的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了：“经验使我们相信，弗洛伊德发现了有关性的重要真理，性欲是一种决定性的人类行为，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作为社会学的一种体系〔弗洛伊德主义〕来说，却是毫无价值的……现实世界中重要的东西并不完全是精神分析学所探索的对象之根源。”^①

四

当一批流亡国外的人于一九二七年在巴黎出版杂志《转折》时，《释梦》已问世近二十七年了。在不断干预的那几年里，释梦的新方法出现了许多情形，批评家们并没有认真对待梦向创造性头脑提供了线索这一观念。^② 主要对美国作家来说，《转折》这份试验性杂志较早地开始哀叹二十世纪语言的衰落状态。因为尤金·约拉斯当编辑，因此该杂志将自己的抗议组织成一种“信条”，而这一信条对理性的交流方式的谴责是肤浅的；它还坚持认为，“夜生活的语言至少一定能补充它”。当美国的《小评论》仅仅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当作“新写作方法的探索”来发表时，《转折》就把《进展中的工作》看作是反对“言语”的文献。《转折》继续作为这

^① 弗里曼，《美国的一个实证》，第301页。弗里曼恢复了过去曾对精神分析学的那种极大兴趣；小说《永远不要后退》（纽约，一九四三），把精神分析的报告作为一种结构上的媒介。

^② 其中有普雷斯科特，《富有诗意的思想》。

一“新语言”设防的防区，并为之而不屈不挠地与《现代季刊》、《本季度》和温德哈姆·路易斯的《敌人》这些对手作斗争。^①虽然《转折》对梦的机制只字未提，但通过这种机制可以演绎和模仿“无意识的语言”，然而它却充分意识到了梦本身可以作为获得“新理解”的重要线索：“对梦的研究……是一种诗学——美学的解放。它巩固了我们的艺术直觉，并赋予诗歌创作一种非常可能通向玄学和神话的普遍意义。”^②

这种摆脱语言束缚而获得的解放，根据约拉斯的观点，是一场争取文化复兴的更大斗争的征兆。这场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深为关心语言，而是创作上的个人主义的斗争。“在一个变化动荡的世界里，永久确定了的语言为创造性表达的目的服务这一设想已再也站不住脚了。”^③

尽管弗洛伊德原先详细阐述了释梦的方法，但根据约拉斯的观点，却是荣格论述了梦的象征对艺术家的重大意义。艺术家必须求助于精神分析来观察释梦过程，但精神病患者和诗人不能被归为同一个人。荣格在《转折》上初次发表了长达数页的文章，强调这种对于精神分析疗法的反驳，并强调了诗人的想象是一切艺术的深层储藏库中的一部分。诗人远比精神病患者伟大：“他是集体的人，是人类活跃的无意识思想的传播者和创造者。”^④

艺术家不仅仅是印象流经的“渠道”。他必须有意识地重新组

① 《现代季刊》是马克思主义评论的刊物。它由卡弗顿主编，该杂志为这场争论出了一期专集。在数篇社论中，《本季度》（第三期，一九三〇，第129—141页）宣称反对“语言的混乱”。温德哈姆·路易斯在二十年代后期驳斥了《敌人》第一期（一九二七）中的那种看法，《敌人》是几乎只发表路易斯文章的杂志。

② 尤金·约拉斯，《梦》，载《转折》第十九—二十期（一九三〇），第47页。

③ 约拉斯，《标准英语正在死亡，伟大的美国语言万岁》，载《转折》第十九—二十期，第141页。

④ 卡尔·G·荣格，《心理学和诗歌》，载《转折》，第十九—第二十期，第41页。

织自己在无意识中经历的东西。因此，艺术家认识到所有伟大真理的根源，能够把自己梦幻的生活变成一切时代的哲学。“一种有意识的生物的本能——理智和理性——在客观现实的名义下所知道的并不是真实。与生命混为一体的最大的现实，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即无意识中获得。”^①

在《转折》第二十七期上，约拉斯公布了他寄给自己熟悉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问题的答案。人们向这些人提问，他们是否“感觉到需要一种可用来表达他们夜间头脑中的多种经历的新语言？”人们进一步要求他们转述“（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的祖先的所有神话和象征。”^② 这些答案组成了关于精神分析学影响创造性头脑的现代专题讨论会。只有其中的一篇论文或者抛弃或者不知道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其中许多论文很乐意断言，梦对于创作来说，是重要的，还有一些论文同意：为了使语言本身与梦相适应，语言不得不发生一些变化。荣格与弗洛伊德在这一观点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他们在强调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所导致的，而这一分歧并没有被这一系列问题所解决，但荣格的理论却似乎没有得到大量实际应用的确证。^③

然而，梦本身就是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著作在两方而影响了三十年代文学的写作手法和情节结构：（一）释梦揭示的方法是对实验性写作的重要贡

^① 阿尔伯特·伯昆，《生活的夜晚一边》，载《转折》第二十七期（一九三八），第201页。

^② 尤金·约拉斯，《对夜间精神和语言的调查》，载《转折》第二十七期，第233页。

^③ 《转折》开始发表一些超现实主义者的文章，但约拉斯关于语言和创作的理论，在坚持认为无意识具有神秘的宗教资源，同时梦对于现实来说最终是重要的这一点上，与超现实主义不同。参看他的《我看过魔鬼和天使》（巴黎，一九三八）第9—13页。

献，对这些贡献的认识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的作品。（二）梦本身就在情节结构或对动机的解释中占有一定位置。它是一种手法，通过这种手法，读者能够预料到一个动作的发生；它提供了人物的内心生活画面。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希望相信，自己不仅仅具有一种将一个故事限制在一种结构中的专断手法。对他来说，梦是暗示人物动机的复杂性和行为的多种可能性的方法。譬如，康拉德·艾肯——他在一九一五年就读过弗洛伊德《释梦》的英译本——认为，梦是解释行为之根源的基本方法。在《伟大的循环》（一九三三）中，安德鲁·凯瑟的精神崩溃在一段冗长的梦中得到了解释，这个梦将我们带回到他的孩提时代，并提供了所有基本的线索。对梦的这种运用（经常受到熟练的介绍）也可以在瓦尔多·弗兰克、路德维希·路易森、托马斯·曼和阿瑟·考斯特勒的小说中看到。

精神分析学运用于文学和批评这一点在三十年代重新受到了挑战。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使许多作家高兴的方法。约拉斯感到，弗洛伊德“由于把一切都变成精神病的教条，……从而消除了对审美理解至关重要的诗人天才这些层次。”^①然而赫伯特·里德则重视精神分析学的那一方面，因为它能使批评家断定精神病在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文学中有大量的东西处于现实的分界线上；对于批评家来说，能够通过某种科学的演变过程来决定这一分界线，是颇为有用的。”^②

对精神分析学的这种讨论的本质表明了对基本审美问题的认真关注。托马斯·曼^③的两篇论文有助于确立弗洛伊德在当时伟

① 尤金·约拉斯，《文学与新人》，载《转折》第十九——二十期，第15页。

② 摘自兰姆塞，《心理学与文学批评》，载《标准》第十五期（一九三六），第631页。

③ 《弗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载《标准》第十二期（一九三三），第549—570页，以及《弗洛伊德与未来》，此文是为纪念弗洛伊德诞辰八十周年而作的一次发言，后压缩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三六），第3—4页及以下各页。

大的思想家中的地位。但是对小说“装扮成临床报告”这种现象的抗议无可非议地持续着。“在写得出色的病例报告和道道地地的心理小说之间，存在着一种合理的区别吗？”里奥·A·斯彼吉尔^①质问道，并对滥用一种理论可能导致的无法无天行为迷惑不解。然而，即使在这儿，批评也由于一种本身就是弊病的认识，而不是由于错误的理论而得到了缓和。

在对弗洛伊德的反应中，也许可注意到某些重要的特异性。一方面，当二十年代只产生出有关弗洛伊德美学思想的零星文章时，三十年代的人们就探索最近发现的无意识中的语言学和美学的前景。年轻作家的大量精力和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学批评和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创作问题上。弗洛伊德主义尽管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却得到了一种比它在二十年代获得的评价更为认真的评价；它在二十年代的理智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检验，并且很快就获得的价值足以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价值相媲美。相对来说，精神分析学在三十年代的抗议小说中的作用是较小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小说描述的现实是实在的和粗糙的——警察的世界、面包生产线和工会会议大厅。对人类行为“阙下”源泉的发现引起了对文学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强烈、而显然是永久的兴趣。

在一九四〇年以后的那些年代里，形成了文学批评兴趣方面的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荣格在影响精神分析学的批评作用方面所取得的迅速进展。使这种发展成为可能的两个原因是：对神话的兴趣的增长以及这个愿望，即荣格想将原型的理论扩展到超越狭隘的家庭基础这种地步。尽管对荣格缺乏精确性和过分强调精神病医生在患者生活中的作用的倾向进行了不少批评，（参看爱

^① 《新行话：文学中的心理学》，载《塞沃尼评论》第四十期（一九三二），第476页。

德华·格洛伍尔著《弗洛伊德或荣格》，纽约，一九五〇），但是他的分析类型对那些根据神话和原型的起源来解释文学的人有着一种奇特的吸引力。在第二种发展中，将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技巧细心地运用于文学批评和语言研究中。这些调查研究中最成功的便是恩斯特·克利斯的《艺术的心理分析探索》（纽约，一九三二）。这本重要著作将精神分析学的许多作用引进了最近的批评，并将现代批评提供的一些方法运用于最近的批评中。该书第十章《审美的模棱两可性》（与亚伯拉罕·凯普伦合写），是将精神分析心理学最彻底地运用于批评实践的一个例子。这两种主要的发展在侧重点、范围和结果上都是大相径庭的。当原型批评（莫德·鲍德金的著作中论述了这种批评模式）在目前更为流行时，假设象克利斯这样的人的比较认真谨慎的著作也无法容忍超越它，那就毫无道理了。

第四章 影响问题

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如此复杂多变的发展历程，因而要将真正的影响与仅仅浮于表面或显然虚假的影响区别开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的述评迄今为止应该为这一非常明显的困难提出原因了，但是我们仍可以设法在概要的鲜明中心之地指出这些原因。

(一) 无论是医学界，心理学诸流派，还是一般的公众，都没有立即欢迎或接受精神分析学。至少是过了二十年之后，这门新兴的心理学才为人们小心谨慎地接受；至于它受到一般公众的或贬或褒的注意，则至少是二十年后的事了。

(二) 弗洛伊德及其最早的合作者带着这种印象，即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探索古老问题的新方法，从而在一些概念名称或术语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验，他们希望，要么用原先使用过的老术语，或者通过发明新的术语来将这一新方法与老方法区别开来。当弗洛伊德主义在人们的各种理解水平上得到讨论时，弗洛伊德本人正在修改他的术语，并扩大其涵义，努力使之更为精确，或更加全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弗洛伊德试图准确或适当地确定心理的布局。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四年，他一直在稳妥地改进并界定与对无意识生活的机能反应有关的术语。

(三) 由于持不同意见的精神分析学者采用了弗洛伊德的术

语并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因而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弗洛伊德为利比多下的定义和荣格对这一术语的运用之间，在弗洛伊德对梦的象征的暗示和斯特凯尔对梦的象征的运用之间等问题，加以区别。

(四) 在一种理论本身还没有得到最后的估价时，对一种概念或一种理论主体的看法往往就早已在一般人的头脑中固定和不可动摇了。

(五) 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还有其他困难有碍于正确而明智地把握弗洛伊德主义：专门性研究的问题，以及向“随意和轻描淡写地讨论”的领域转移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普及推广方而不断增加的困难，即流行的折衷主义所使用的“虚假的入口和出口”。

(六)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社会的职业上和伦理道德上的保护人对变化是颇为敏感的，因而产生了大量善意但却明显抱有偏见的敌意，而敌意则是传播任何看法、概念或思想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因为它得到了机能偏见的帮助。我们对邪恶的看法从极大程度上说来，是来自于对邪恶怀有敌意这一根源。尽管对邪恶的抽象思考可以使哲学家或神学家满意，但诗人或一般大众则几乎要到“明白”这种抽象概念时才会感到满意。这一点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加以充分证明，用这种方式，抽象的概念经过一番精心装饰，便一一展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观察者眼前。它是极为流行的寓言的基础。

至少二十年代的作家们对弗洛伊德主义的确切含义有点迷惑不解，这一点根本就不令人吃惊。作家把自己的先入之见和偏见相混淆了。二十年代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由于一听到精神分析学的术语就立即接受，或者至多不过附加上一点对这些术语的扼要描述，因而使这个问题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因此，弗洛伊德所界定的压抑这一术语在讨论中就失去了不少原先的含义，但它

从在其中发现了读者的特殊领域里却获得了新的文化成分。因此，压抑这个单一的术语便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作如下表述：弗洛伊德给这个术语下的定义：压抑，即减去由于对其本来意义的草率归纳和不充分认识而失去的东西，加上附着于已经改变了的概念之上的文化成分，便等于美国的习俗强加给自由的性表现，或新清教主义的压抑。

当然也必须考虑到比喻的因素。因此压抑的机制经常为对受压抑的个人或受压抑的民族的描述所取代。就一个术语的非专业或美学上的用法而论，实例本身倒比它试图阐明的术语更为重要，因此这一术语就获得了它的表明特征，同时失去其本来的精确性或“抽象的纯洁性”。

所有那些过分的或极端的反应，即作为阻碍清楚理解的障碍的那些反应——诸如愤怒，恐惧，热情——都影响了弗洛伊德初次步入理智社会的本质。如果考虑一下“理解的水平”，那么在任何一个理解水平上，一位作家也许都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识，碰到一点精神分析学的理论：

(一) 准备理解的水平：这种理解也许只能通过理智地阅读原文资料来获得。象瓦尔多·弗兰克、路德维希·路易森以及托马斯·曼这些人就有条件这样做。^①

弗洛伊德←→作家

^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运用了这一理论之后，这一理论仍然是正确的，一成不变的；也不意味着它要求仍然是正确的或一成不变的。他也许毕竟会发现其中某些部分顽固不化和非常之难，不能适应审美的目的。因此他可能改变它，并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尽管一种理论在这种变形过程中失去了部分或所有“在实验室或讲堂里的效果”，但艺术家仍可以在消除一个学科与另一个学科之间的障碍方面起着出色的作用。

(二) 翻译的水平：这里必须增加一个第三者，以便使至少三人参与“这种了解的过程”——例如，弗洛伊德，布里尔和康拉德·艾肯，或弗洛伊德，布里尔和尤金·奥尼尔。

弗洛伊德 ↔ 翻译者 ↔ 作家

(三) 总结或评述的水平：这里，创始人、翻译者和讲解者都在作家发现这一学说之前介入进来了。

弗洛伊德 ↔ 翻译者 ↔ 讲解者 ↔ 作家

或

弗洛伊德 ↔ 讲解者 —— 翻译者 ↔ 作家

(四) 局部表现的水平；例如“梅波·多吉·斯泰恩晚会”或伍尔芙家中的茶点。这里设置了许多障碍，任何一个或所有这些障碍都可能在特定的场合中出现过：用来介绍主题的方法，在主题尚未被介绍时就已开始的讨论，对“带头讨论”或这一理论似乎与其最有关的那个人或那些人的偏好，最后，就是其他理论的介入——例如哈弗洛克·艾利斯、韦斯特马克或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由于这些学说的介入，讨论的主题变得丰富多采了。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那样，舍伍德·安德森在弗洛伊德主义中受到的“教育”也具有这样的性质。^①

弗洛伊德 ↔ 翻译者 ↔ 讲解者

或

^① 玛格丽特·安德森，《我的三十年战争》，第38页；舍伍德·安德森，《回忆录》（纽约，一九四二），第243页。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作家的天性沉重地压在他与弗洛伊德主义学说的关系上，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决定的因素——尽管在一些方面，它被经验所改变。因此，某位作家或许会说：“这是我始终知道的一切——我所描写的一切”；或“这是有趣的，它可以帮助我看得更清楚；我可以利用它”；或“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我允许的话，它就会干扰我对人类事务的正确评价”。作为这些所表达的这个或那个看法的结果，作家或许很快就不去考虑弗洛伊德主义，痛痛快快地讽刺它，或虔诚地接受它；或者他可能冷静地去考虑弗洛伊德主义本身，而嘲讽那些有文化但却很愚昧的热衷者的闲言碎语。① 第四个水平上描述的那些情况是不胜枚举的，它们是二十年代传播任何一种理论最有效的媒介。它们同时还是一种曲解的手法。这种人为的情况较大地影响了本世纪各种理论被接受的方式。② 瓦尔多·弗兰克在自己的一部小说中描述了好几种探讨弗洛伊德学说的途径，这些途径对年轻的知识分子是敞开着。有一次，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弗洛伊德偶然提到了那次谈话；在这里，他倒成了社会的某种替罪羊：“未婚男子和已婚的女人应该

① 参见菲利斯·麦金莱，《心理变态者的悲剧：普宁先生的痛苦病例》，载《论坛》，第九十四期（一九三五），第32—33页；

去发现你自己的失败吧
免得象可怜的普宁那样，孤身独坐
不再是主人，不再是客人，
不被哀悼，不受尊重，不受压榨！

见詹姆斯·瑟伯与怀特，《性欲是必不可少的吗？》（纽约，一九二〇），瑟伯，《不要干涉你的思想》（纽约，一九三七）。

② 例如，见卡尔·凡·韦契坦对伊迪斯·戴尔（梅波·多吉·斯泰恩）家中一次晚会的描写，载彼德·韦夫勒，《他的生平及著作》（纽约，一九二二），第136页以下各页。

给弗洛伊德一百万美元；说真的，已婚男人应该向他要一百万美元；说真的，职业性妓女应该将他绞死，因为他造成了大量失业的巨大痛苦……”

在一个较为温和的夜晚，弗洛伊德在与马克思的斗争中不幸得了第二名。当时在场的有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一位共产主义者，还有几个只是偶尔发些议论的人。那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那位马克思主义者在发言；而那位弗洛伊德的信徒只写了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专题论文，但由于他难得有机会发表他的观点而恼羞成怒。“他们又吃又喝：卡里斯因没有说过野蛮人这个词而触犯了自己的虚荣心。精神分析学的真理并不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而存在……”然而，后来，卡里斯却有了足够的机会来讨论他的理论和论证他对这些理论的实际运用。^①

看来，创造性艺术家在一种复杂的环境下工作，他本来对人类行为的天真看法不断受到那种环境下的各种情况的限制和修改。思想、概念和理论几乎从不在纯粹的状态中被人接受。正如创作行为经常得到来源于那种环境的暗示和精神错乱的帮助一样，它同时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妨碍。这种妨碍在许多场合下得到作家本人意愿的独立性的帮助和支持。那些对世界抱有十分健康和独立的看法并自信已掌握了娴熟技巧的作家们，由于得到周围环境的显然微乎其微的帮助或妨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或令人满意的作品。确实，创造性艺术家的任务是独立工作，不受周围环境的制约，或至多起到评价或分析周围环境的作用。

必须考虑到审美观点的特殊性质。在长时间初步的讨论和思考之后，当作家屈服于艺术的必然性时，对他来说，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他通常并不开始将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排列在桌面上，

^① 弗兰克，《新郎来了》第332，309页。

也不在一开始就将那些断片拼合起来。首先，创造性艺术家意识到这种思想，并希望赋予这种思想以这种或那种美学形式。他使用了自己暂时不在其中的世界的暗示，这一点将取决于他已认识到了这些暗示与他对这一思想的掌握和看法有着相关性。因此在这种实践的时刻，理论就低于审美实践了。

影响的线索可以在相关这个词中找到。然而，这却不是一首诗、一个剧本或一部小说发表后批评家们发现的那种相关性。这是暂时理解的相关性，是理论为作家提供的帮助。理论的这种独立性为作家提供了大大胜过他那理智指导的优势。那些理智的指导者其实是作家的仆人，而不是主人或导师。对它们的识别通常是根据一种美学的而非科学或哲学的观点而受到限制和改变。因此，一位作家便从中进行自由选择；对它们来说，他的选择并非永远准确或永远公正。在创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地或坦率地听从艺术家意旨的支配。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关于影响还能说些什么呢？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审美经验是创作的一瞬间，是在时间上受到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过去和未来束缚的审美表现。换言之，在作家屈服于审美决定的必然性之前，他的理智环境影响并改变了他的态度和观点。这样一个事实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发表或被展出，那么它就再一次受到它的环境的判断和批评。

在创作活动前所进行的理智和社会学知识上的准备，当然就是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所熟悉的理论的总和，然后再加上他赖以熟悉这种准备工作的环境。这种准备对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吸引力以及它们与作家本人的兴趣相符合。来自心理学学科的暗示对他来说，似乎比来自物理学或化学领域的暗示更为合适；如果他对理解人类行为的动机感兴趣，或者如果他对通过将自已的经验与社会经验的比较来检验自己的经验感兴趣，那么

这一点就尤其是正确的。主观经验和社会经验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与艺术家观点的最终性质有着重要的关系。艺术家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有着一一种不安定感，这是颇为正常的。这种不安定感是由他与社会规范的分歧而造成的。当艺术家的环境显得稳定或混乱时，这种不安定也许是很大的，也许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对时代的不稳定性通过强化艺术家对不稳定的感觉来对他发生作用。这种不稳定性对现代美学的特殊贡献在于，它加强了艺术家想为政治、社会和哲学问题提供美学的解决方法的欲望。他急于想获得新知识，怀疑和藐视传统的知识。因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综合能力，所以他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创作活动才在主观兴趣和自信的范围之外的世界中做好了准备。首先是在需要安定的强烈程度方面，艺术家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也许在带有情感和偏见的观点方面，他不同于哲学家和科学家，因为他将那种观点带给了理论界，并且半认真或完全认真地对此进行了考查，而且他的这种考查经常是不加区分的。

精神分析学由于对艺术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而比其他理论体系拥有优势。它毕竟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新的和大胆的解释。一方面，它夸大了艺术家本人的主观重要性，因为它暗示出了独立行为的深层的和重要的来源。另一方面，它向艺术家提供了研究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世界的新线索，这些新线索是更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们在表面性质上是反对对习惯行为的固有看法的。弗洛伊德很可能比其他理论更加强烈地影响了当代作品，因为他所论述的主题与审美兴趣的关系更加密切。但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子外，他并没有对创作活动起到支配作用，正如在创作活动的大多数例子中一样，美学观点的独立性强有力地表现了自己。大体上说来，弗洛伊德的影响与其说是显然可见的，毋宁说是隐含不显的。审

美独立性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总是将原先的学说从本来的系统而明确的特征向矛盾而非系统的影响方面转变。原先的学说失去了它原来具有的教条或说教的特点；如果它不受限制而被接受的话，那它就必须具有上述这些特点。在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教条的肯定态度和主观的怀疑态度之间的一种很强的或非常重要的张力。仅仅通过衡量文化史的外部事实来判断影响也许是不正确的。因为一部艺术作品仅仅与一种理论体系相一致——也就是说，一部艺术作品的结论或特征与某种心理调查或哲学体系所提出的结论或特征相类似，而假设某种影响已产生，这就更加不正确了。

对影响的估量必须考虑几种情况：一种理论体系流行的程度；在艺术家生活于其中的时间和地点内，那种理论体系所经历的讨论之程度和性质，以及艺术家对一般的理论化和具体的理论体系的态度。我们需要根据精确的理论来确定艺术家变化的性质和特征。这一过程可能是困难的，但也是很值得的，因为它远比证明一个观点更为重要。它严格地注意美学观点的特殊性；它最终导致一种对我们文化史的诚实和确切的评价；同时，它还向艺术家提供了一种颇有价值的个性完善。

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艺术家的地位受到他同时代人的专门性批评的强烈影响。当然，有许多批评家本人也是艺术家，也有许多艺术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偶尔也从事批评。然而从极大程度上来说，批评是一个脱离了创作的领域。批评家与其时代的关系是理智的，而且常常是自明的。他对自己时代的思想和理论的看法通常要比艺术家对自己时代的思想和理论的看法更为客观，因为他不必直觉地领会这个世界，而倒应该理智地对之进行评价。因此，他从一个更有利的立场来理解意识形态，但却不大能同情创作的甘苦或理解创作结果的模棱两可的性质。因而批评家更接

近理智的世界，而说明审美对理智的世界所作的贡献的价值是他理想的任务。他的时代的争论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说来就是他自己的争论，而且他自己就是兴趣和信仰的一位仲裁者。批评家的倾向和气质的影响常常在于他对一种与另一种思想体系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的偏爱。他根本不向自己的社会解释艺术家，而倒是常常独断地选择一种理论体系或几种理论的综合体，并且从这种居高临下的角度来考察所有的艺术作品。

批评家的作用是相当客观地审视自己时代的思想体系，并观察这些思想体系在美学上的应用或者与美学的差异。他还必须相当公正、相当理智地辨别出理智或科学观点与情感与美学观点之间在伦理道德上的重大差异。因此，精神分析学家的目的并不是再现人类生活的悲剧，而是要铲除这一悲剧。坚持认为一部小说完全与一系列精神分析的病史别无二样的批评家实际上未能领会一位患者与一位虚构人物之间的本质差别。不仅如此，由于他无法看到精神分析医生科学地、客观地观察自己的患者，而作家却常常主观地观察自己的人物，因此他便犯下了最大的错误。精神分析学家的作用既是明确的又是规定好的；而作家则根本不用同样的方法去向自己的人物或读者提出忠告。他也无须去科学而审慎地审视自己的人物。因此，没有一位作家拘泥于字面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主义的”；也许一个人只可以说，他一直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审美前景感兴趣，并在一种或另一种不完善的程度上利用了这一学说的审美可能性。

二

然而，让一位批评家来评判精神分析学本身，即用一种评价它对文学所产生的好的或坏的影响以及它对艺术家个性的一种新解释的启发的观点来评判它，这倒是另一码事。这是一种合法的

职业，它不属于对单部作品的考查，而属于美学领域，说得更具体一点，属于审美心理学。既然这样一部作品对一位艺术家最后评价自己是颇为重要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观察精神分析学对美学的贡献了。

作家完全能够在许多地方发现精神分析。与精神分析密不可分主题，性的自由，无论在因果关系上或作为与之相关的问题上，都常常与精神分析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不仅加速了颇为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而且还有碍于理解这种实际存在的理论。那么，弗洛伊德对文学的贡献便可以看作是双重的，他的名字和理论与分析人物和社会的联系；使他的理论的某些部分适合于写作和风格的理论。对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学对于艺术家论述得还不充分，但他关于艺术的声明也不如他对艺术的主题和风格的贡献那样重要。

至于前者，他的评论是不多的，而且都是分散零星的，尽管他是哲学和种族学这些领域中的大胆历险者，而且就美学和文学批评而论，他的精神分析学信徒并不具有他所具有的那种谨小慎微。^①对弗洛伊德来说，艺术家是“精神病患者”，他在艺术中寻求并试图发现对他那“受阉割的欲望”的“替代的满足”。

艺术家本来是这样一种人：他因为不能象最初所做到的

^① 参看奥托·兰克《诗歌和传记中的乱伦动机……》，《艺术和艺术家》（纽约，一九三二）。

弗洛伊德关于艺术家的论述都包括在《西格蒙·弗洛伊德论文集》第四卷中，《诗人与白日梦的关系》第173—183页，《对爱情心理学的贡献，……》第192—202页，《对精神作用的两个原则的详细论述》，第13—21页，《列奥纳多·达·芬奇：婴儿时代回忆的精神性欲研究》（纽约，一九一〇）；《精神分析学概论》，第二十三讲，第326—327页；《文明及其不满足》，第38—39页。参看路易斯·弗雷伯格，《弗洛伊德论艺术的作品》，载《文学与心理学》，第六卷（一九五六），第116—130页。

那样与抛弃本能满足的要求达成妥协，因而便偏离了现实，然后，他便充分发挥了他的性欲的和含混的欲望在幻想生活中的作用。但他往往能找到从这一幻想世界返回现实的途径；他具有特殊的才能，因而采用某种模式使其幻想变成一种新的现实。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幻想作为对实际生活的颇有价值的反映，是颇为正当的。因此，通过某种途径，他实际上成了他想成为的英雄，国王，创造者和特别讨人喜欢的人，而不需要去寻求创造外部世界的真正变化的迂回途径。但这一点只有他才能获得，因为对于现实所要求的那种抛弃，其他人也和他一样感到不满，同时也因为这种由现实原则来取代快乐原则而引起的不满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①

因此艺术家便帮助这个世界缓和了对“现实原则”的影响，因为就阻止欲望与粗俗的外部世界的冲突而论，他更加熟练；“……他使得其他人也能够从那无法接近的自己的无意识满足的源泉中得到安慰。”^②

治疗趋向美学的这种发展很可能把艺术家看作是成功的精神病患者；而患者则应当抛弃精神病，或利用有效的升华来改变它的方向，这样艺术家便由于自己的精神病而受到称赞和尊重了。这一点假定，本能生活与想象生活之间有着一种密切联系，而且还更加倾向于轻视摆脱现实的主观方法的创作活动，而不轻视形成现实的客观计划的创作活动。正是从这一点上，文学批评家将治疗的情形向传记的领域和对文学的“临床解释”方面转移。许多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嘲笑这种见解，认为这正是非法闯入正规美

① 《对精神作用的两个原则的详细论述》，在上述引文中，第19页。

② 《精神分析学概论》，第327页。

学禁区的又一证据。^①明白这种探索想象生活的方法是如何导致滥用现象的出现，这倒是很容易的。例如，一位叫阿尔伯特·莫德尔的极端主义者就拘泥于字面解释来接受精神分析学的催眠术的：“一部文学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就象梦与患者的关系一样。”对创作天才进行大量的重新解释之根源可以在“作者婴儿时代的性爱生活中”发现。“我们说，天才是发现一种新的真理或描绘美的人，这时，我们的真正意思是，他是这样一个人：在经历了压抑之后，只能从社会不愿承认的事件中得出某些结论……”^②

对于那种批评的文学大为有利的东西的确是无足轻重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伊德本人要对将治疗直接转变成美学这一点负责。这是不能被简单地忽略的，因为它是整个描绘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说将临床的证据应用于对文学的讨论中是不好的或歪曲的。对诗人的研究要求不歪曲诗人创作的诗歌。这种传记分析的最大缺陷主要在于，它忽略了作品，或仅仅将作品用作对作家进行分析的附加证据。

有些批评家并没有求助于弗洛伊德关于艺术起源的论述，倒是求助于精神分析学研究的结果来发现关于想象生活的线索，那些批评家进行更为乐意的选择，并在避免极端主义的结论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们相信，这些情形是真实的：梦是对想象生活的一种新解释的线索的丰富源泉。因为显梦得到了确切的解释，

^① 克利弗·贝尔，《弗洛伊德博士论艺术》，载《民族与雅典娜神庙》第三十五期（一九二四），第890—891页。罗伊·弗莱尔，《艺术家与精神分析》，载《新批评：现代美学与文学批评文选》（纽约，一九三〇），第193—215页。参看布拉姆的评论，《不可能达到的纯洁》，载《口唇》第七十八期（一九二五），第318—323页。也可参见莱昂耐尔·特里林对这一点的诚实而坦率的讨论，《西格蒙·弗洛伊德的遗产》，载《坎尼恩评论》（一九四〇），第二期，第162—168页。

^② 阿尔伯特·莫德尔，《文学中的性爱动机》（纽约，一九一九），第5，11，114页。

揭示了有关无意识的重要事实，所以他们便被迫相信梦的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有着紧密的一致性。因为在梦的状态中，对实际控制中止了，所以想象得到了相对自由的活动，并“创造了一个完全幻想的或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想象随心所欲地活动。”根据弗雷德里克·C·普雷斯考特的观点，这可能是更为清楚地理解诗人的想象的源泉。在“梦幻意识的自由活动中”，思想失去其分析和抽象的特征而变得“纯粹想象的和具体的”了。诗人也同样有着患者在分析的情景中遭遇到的这种困难，尽管对诗人来说，这种困难较容易得到克服，而且结果一般说来也比较令人愉悦，也就是将付诸视觉的、具体的东西变成文学的任务。比起“事务家”来，诗人较少受到一般强加给自由表达的限制的干扰；在这一方面，诗人的头脑颇为有利地与儿童的头脑进行了比较。原始而幼稚的头脑要比那种先进的头脑更富有诗意，而那种先进的头脑已被“逼迫”而成了有目的的思想。“小孩子有着性爱和贪欲，他们那未受指导的、毫无目的的、曾发生过兴趣的头脑，通过压抑和这种或那种规则，到后来便发展成一套他赖以生活下去的习俗和一种法规。”

诗人很随便地考虑这些限制，比较容易能回到孩提时代那令人满足的混乱中。^①因此，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优美地传达他的梦的生活，同时又要尽可能小地受到他的世界的富有理性的和抽象的活动的干预。他的任务就是使“无意识成为有意识”，而不是在这样做的时候破坏它的美。当然，普雷斯考特将所有其目的是说服或劝诫的诗歌，即说教的或哲理的诗歌统统排除在外，因为这些诗歌的素材是从理性的、醒着的头脑中获取的。对他来说，“无意识的想

^① 普雷斯考特，《诗人的头脑》，第17、43、69页。东里尔医生说，他和普雷斯考特经常讨论他的著作，并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检验。普雷斯考特也帮助东里尔从事翻译工作。《十二月会见》，一九四二年。

象”所理解的“并不是我们迅即而自私的欲望，而是我们与本民族成员共同具有的更深的感情和愿望。”^① 探索诗歌创作的这种方法包括两种不同的想法：首先，证明诗人的许多灵感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尤其是出现在梦中；其次，研究梦的生活的机制以及其与诗歌表现手法的联系。这两个问题普雷斯考特都很关心，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描述过这些过程，通过这些过程，潜梦变成了显梦，即成了“梦的工作”：“如果我们将形成诗歌意象时头脑的相应活动称为诗人的工作（或诗人的劳动 Dichtearbeit），那么问题便在于，一个问题的原则到何种程度才能用于另一个问题的原则。”

对于表现梦的工作的每一种手法，诗人都有着相似的方法。诗歌的意象往往是合成物；暗喻中含有大量的含糊意义，足以使之暗示多种具体的意象——它是一种浓缩的模式：“……而在真正的散文中，词语应该具有一种意思，……在真正的诗歌中，词语应该具有尽可能多的意思。”^② 同样，小说中的人物的构成也可以与梦中人物的构成和验证过程相比较，尤其在自然生成的人物这种情况下，作者将自己也分割了开来，参与塑造人物。^③

^① 出处同前，第116页。在这一点上，普雷斯考特避开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概念，而接受了荣格关于普遍或“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外部世界认为，“善良”——即神秘主义者的原动力精华——的作用是使得诗人的形象变得崇高。“我认为，仔细的考虑也许可以表明，个人对社会或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中的道德的责任是一回事，而梦幻的、无意识的思想中的责任则是另一回事；虽然梦幻者在狭义上说来摆脱了社会的责任，但是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与种族的思想发生了联系，因此他便受到更大的控制。”出处同前，第116—117页。

^② 普雷斯考特，《诗人的头脑》，第169，173页。“真正的散文”和“真正的诗歌”这些术语指弗洛伊德早些时候提及的一种区别方法；他宁愿这样认为，诗歌不是正规训练的产物，而是“诗人的”灵感的某种形式的产物。“与创作诗歌相同的创作才能也能创作出叙述体或戏剧形式的散文体小说。”出处同前，第8页。

^③ 曾在小说中出现的自传人物与梦中出现的自我相似。弗洛伊德说，“梦是绝对自我的”，“如果我不知道除了这背后的梦中出现的人物，那我就得去寻找我的自我，遵守下列规则：在梦中受到我随着时经历的那种情感支配的人，总是掩饰我的自我的人。”《释梦》，第299，300页。

对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性发掘利用常常显示出滥用和误解。批评家不仅通过把当代作家逼入理论的鸽巢孔而经常犯下违背善意批评意义的罪过；他们还经常错误地论述弗洛伊德本来关于艺术家心理特征的评论。然而，据说至少有三位现代批评家在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材料方面显示出了卓越的才智，赫伯特·里德，爱德蒙·威尔逊和肯尼斯·伯克在合理评价弗洛伊德对现代美学的意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对精神分析学说的使用方面，里德是相当公正的；因为他认为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的理论都适合他的目的，所以他便从这三者的理论中进行选择。里德认为，现代心理学对美学的重大影响在于，它要求批评家去注意诗歌形式的“有机”来源，即“现代心理学自身的规则强加给诗歌的那种形式，而不去考虑传统诗歌的特定形式。”这种对创作的心理来源的重新研究要求我们对自己关于艺术家个性的概念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修正。里德在艺术家的个性和特征之间进行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区分。他说，“由于某些也会在个性中出现的冲动和压抑，”特征“可以解释为个人身上的某种气质；……按照某种颇有规律的原则来抑制本能冲动的一种持久性的气质。”因此，艺术家的个性经常与其特征发生冲突，而这种特征则设法阻止他充分利用审美表现的无意识起源。因此现代表现的特征可以按照对心理行为的现代分析来解释。由于自我尽全力限制本能的肉体力量，因此，这种力量便受到了约束和调节。“在意识中受到压抑的东西也可以在想象中发现是活跃的，这种想象与弗洛伊德的前意识术语也许是一致的。”里德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在他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讨论中得到了说明：

普鲁斯特用意义与精神分析学的科学词汇相差不大的词语来描述的，正是压抑和潜意识压抑力的意识阶段、无意识阶

段、甚至前意识阶段的心理现象。但我非常怀疑普鲁斯特是否对精神分析学有着确切的认识；在许多方面，我们必须将他的作品看成是对弗洛伊德的肯定或预示和确认。普鲁斯特谈到了心脏(heart)，而弗洛伊德则谈到了心灵(mind)；但这些不过是可以相互交替使用的概念。^①

里德对批评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仔细地描绘了审美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学批评与对艺术家心理的分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尽管这两种活动可以互相帮助。再者，批评家必须证实自己的身份，并标明自己与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界限。里德说，“心理学家对文学的价值是漠不关心的……尤其当这种价值表现出对某种客观标准或传统影响下的主观幻想的修整时，他甚至肯定会悔恨这种价值。”不管哪个领域与艺术家的偏见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仍然没有一部艺术作品能够简单地来源于对这一领域的理解。然而，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则可以帮助批评家“比正常的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更迅速而且更理智地认识到诸如爱情的主观性和决定论的总法则这样的事实，而我们所有的情感和理想则都约束在这一总法则之中。”^②

精神分析学提供了对审美意向的合理解释，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创作的问题。再者，对心理布局的弗洛伊德式分析——即对伊底、自我和超我的讨论——是颇为方便的，因为它与对人在心理暗喻的范围内能够具有的无意识生活的描绘是同样准确的。弗洛伊德在把艺术家当作精神病患者来分析这一点上，也许不是完

^① 赫伯特·里德，《现代诗歌的形式》(纽约，一九三三)，第5，13，17，20，28页。

^② 里德，《批评的性质》，收入《文学批评论文集》(伦敦，一九三八)，第126，127页。

全正确的。然而，里德说：“值得我们注意的基本点是，精神分析学似乎表明，从倾向上来说，艺术家最初是个精神病患者，但在成为艺术家时，他便似乎逃避了其倾向的最后结局，通过艺术找到了返回现实的途径。”^①

对爱德蒙·威尔逊来说，精神分析学理论的体系对批评家试图判断自己同时代人的优点，是有所帮助的。威尔逊关心的是两个问题：审美活动在其中产生的思想结构，以及在对一个作家作最后的评价时，心理变化过程所提供的辅助。但威尔逊并没有接受对作家进行的全面精神分析。他说，批评家不是科学家，科学家可以混合自己的元素，并预料到这些元素结合之后的结果。弗洛伊德主义者向“早已经顺利开始了的”一个重要倾向提供了某种精确性和暗示，那种倾向是“借助隐于文学作品背后的个性来解释那些作品。”威尔逊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研究，但将这种研究看作是病史而不是评论。这种方法由于有容易令人误解的简单化，因而有着潜在的危险：“这种方法导致了坏的结果，在这些坏的结果中，批评家用有限的证据建立起了精神分析的机制，然后仅仅向我们提供了基于这种机制的假想作用，而不是基于对作家生平及作品的真正研究的一种夸大的描述。”

在这种告诫中，威尔逊不只是注意那些认为拙劣的精神分析创造出好的评论的人。精神分析学就象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批评家自己的知觉的思想意识发展。他还必须能够将优秀的文学与拙劣的文学区别开来，或根据一部作品的形式的优美或缺乏才能来对之进行评价。“从历史和传记的观点来看，不管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解释多么彻底和全面，我们都必须作好准备，努力用艾略特和圣兹伯里所用的方法，去评价不同时期和不同个性的作品所取得

^① 出处同前，第140页。

的相对成功的程度。”^①

既然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与批评家的任务有关，因此这二者的理论便增强了批评家的理解，并丰富了他的感性认识，以使得他也许能公正地评价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威尔逊的主张使得批评家既能反对对文学的纯粹思想上的解释，又能反对对文学的纯粹结构上的批评。小说是对一种心理学理论体系的补充；通过研究小说，我们可以对心理学理论体系有更多的了解，而通过研究心理学理论，我们则可以对小说有更多的了解。首先，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观点。当这种观点在其批评实践中发展时，它便导致了古代及现代文学的显然令人满意的和富于人性的评价。就文学趣味而论，节制的美德在于它对批评家的“资质”(equipment)的诚实而敏感的使用，以及它熟练地避免了走向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的严重的教条主义。这种节制是颇有必要的，而且尤其对一种职业有所帮助，因为在这种职业中，人们对“特殊的戒律”的使用总是可疑的。^②

肯尼斯·伯克在做其他一切使他感兴趣的事时，都采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术语和理论。在所有现代批评家中，他最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些有助于形成我们的理智和批评的方式的不同影响。对他来说，批评的最大需要就是扩大大概念使用的范围，以便这个范围可以满足现代人思想的复杂的智力需要。因此，人们遇到了对我们时代的理论家的各种令人迷惑不解的幻觉；在伯克的批评观念的宽敞界限内，同样也存在着意义和术语的不断的变化。伯克认为，

^① 爱德蒙·威尔逊，《对文学的历史解释》，收入《批评家的意图》，多纳德·A·斯道弗编（普林斯顿，一九四一），第55，57页。

^② 在威尔逊的文章中，将精神分析学的暗示运用于文学的有这样一些：《狄更斯：两个吝啬鬼》，《公正地对待伊迪斯·华顿》，《菲弗克苔茨：创伤与弓》，收入《创伤与弓》（纽约，一九三七）；《对亨利·詹姆斯的模棱两可的解释》，收入《三重思想家》（纽约，一九四八）。

对现代思想的简单而系统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因此，适当的方法就与其主题一样，是复杂的；他提出了他所谓的“不协调的透视图”，利用这张图，人们可以看到各种观念和理论，它们都喜剧性地默认与其相对立的观念和理论，并且默认它们的相互排斥现象造成的混乱情形：“人性启蒙的进展仅仅将人描绘成不是堕落的，而是犯了错误的。当你补充说：人们是绝对的错了，所有的人都面临着他们必须象傻瓜一样行动的种种情形，而且每一种洞察都包含着其本身特有的那种盲目性时，你就完成了喜剧的循环，再一次回到了隐含在伟大的悲剧之下的那种谦卑的教训上来了。”^①

对现代思想的所有这些贡献似非而是地既有助于解释又有助于评论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伯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词汇。如果这种词汇不是拘泥于字面意义地得到使用，而是灵活地并且从他所谓的“喜剧的自我意识”的角度得到使用，那么这种词汇就能帮助我们理解整个世界及其中的思想和躯体的自相矛盾的行为。这正在使模糊发挥作用；它要求人们耐心地并且永远不断地抛弃容易阐明的欲望。

正是在头脑里的这种观点之内，我们必须探讨他对精神分析学术语的使用。同其他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向现代人的头脑提供了一套术语或概念，而在这些术语或概念的背后，却隐藏着非常活跃的理论内核。伯克所做的一切实质上是将这些概念彼此区分开来，把每一个概念当作一个暗示的单位，然后检验这些概念是否与其他出自不同根源的概念有关。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其他的概念，直至所有的概念都彼此有所启发，而不是毫无逻辑地补充。

^① 肯尼斯·伯克，《对历史的看法》（纽约，一九三七），第一卷，第51—52页。

我最愿意做的只是采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有代表性的章节，将其抄录下来，并加上些评注。这些评注往往是他思想的直接引申。在另外一些场合，这些评注却成了使其表现手法别具一格的尝试，那些表现手法与一般的解释方法是有关的。最后，弗洛伊德的透视图主要发展到了能够用图表来说明精神病理学领域的地步，而不是说明审美领域的情境；但是既然我们在这儿考虑这两个领域相似的特征，而不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所以有些评注则企图指出，文学批评家应该附和弗洛伊德到什么程度，他必须增加的另一一些精神分析的材料是什么。^①

就精神病患者和诗人的行动都富有象征意味而言，精神分析学进入了美学。但文学批评必须注意到精神病的象征与诗歌的象征之间的本质差别。同样，就诗人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主体而言——也就是说，他情绪的集中与精神病患者的情形是一样的——但只有当我们再次说明精神分析学和美学之间本来的目的不同时，概念、迷念和术语才可以被认为是互为补充的。由于用如此必要的小心谨慎来使文学不失去它在科学实验室里的特征，伯克便将这些来自精神分析的启示看作是梦的象征，性的动机以及自由联想的方法。纯粹的临床强调得到说明之后所剩下的一切便可以归在“作为梦幻的诗歌”这一术语之下了。首先，梦的作用的特殊性被称为浓缩和替代，它由于“在创作上违背了”正统的句法和感觉现实的逻辑而具有价值。最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主义必须受到美学理论的限定，直至达到这样一个程度：重新调整精神分析医生的诊所对某些东西所给予的重视，同时还要包括无

^① 肯尼斯·伯克，《弗洛伊德——及诗歌分析》，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四十五期（一九三九），第391页。

论精神分析学忽略还是低估的其他概念。^①

三

诸如此类的批评，由于其本身的信息，并且由于它为最后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作美学估价提供了启示，因而证明给予某些关注是颇为正当的。我们也许注意到，批评家们已经对两种类型的探讨表示了关注。艺术家的心理特征，以及在考察新近对修正和改变文学形式和风格特征所作的努力时，精神分析学所提出的建议。这后一个问题对研究现代美学是十分重要的。

二十世纪的实验性写作在无意识中看出了一个语言学问题，这个问题就形象化描写和象征主义而论，是需要重新审视的。许多作家倒情愿采用这种手法，即超越以流畅的形式来安排词句、并停止对头脑的时空控制的单纯的“意识流”手法。对他们来说，这个意识“之流”(stream)必须和无意识心理生活的“流”(flow)一样。因此就出现了不少现代实验性作品的怪僻性和难以理解性。与无意识的理想化的近似是不可能文学中找寻到的；甚至当词语最富于创作力时——也就是说，当这些词语暗示出多种意义、并且十分容易地适用于视觉的传播时——它们仍然是词语，而且本身只是间接地再现了富于情感和生动具体的“无意识生活。”然而词语毕竟是作家的工具。作家不可能使用颜料或电线；也不可能象一位愤怒的批评家所表明的那样，会把一页纸空着不写。^② 如果无意识是那样地难以再现，那么为何又要去打搅它呢？

^① 对弗洛伊德分析梦的语言和含糊歧义的重要运用出现在威廉·燕卜苏的著作中。尤其是《含糊歧义的七种类型》(伦敦，一九三〇)，里面处处可见例证，再参看《爱丽丝漫游仙境》，收入《田园诗的几种变体》(伦敦，一九三五)。

^② 约瑟夫·普雷斯考特，《詹姆斯·乔伊斯：词语的研究》，载《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第五十四期(一九三九)，第314页。“乔伊斯将他的下一部作品称为白纸的书板，并将用几百页装订缜密的纸来款待读者，其中每一页都将不带有印刷机的油墨……”

为何又要否认我们的习惯性联系，而去发现甚至连弗洛伊德也承认，只有通过谨慎和苦心的推断才能进入意识头脑的东西呢？难道富有隐喻的描写还不如“忠实的转达”那样令人满意吗？实验者们往往回答道，鉴于各种原因，这种描绘是在艺术的可能性范围之内——尽管也许并不在读者的理解范围之内^①——去再现无意识的。他们相信，这种“新的写作”应当遵循的并不是一般的联系法则，而是无意识本身的意旨。既然这是对制约着联系法则的一种抵制，因而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带有许多二十年代的反叛特征的极端个性化的例子。超现实主义就是它的养子。超现实主义者往往直接求助于无意识本身，而不去考虑可以接近意识的中间途径。弗洛伊德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法“发现”了无意识，他还发现，我们可以通过衡量特异和伪装来接近无意识，而这种特异和伪装恰恰识别出了它那冲破禁锢到达现实的企图。超现实主义者希望将梦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根据这一点，他们自然想“使现实屈从于梦想”）。超现实主义是出自弗洛伊德对人的无意识头脑进行探索的一个极端例子。但是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探索，并非仅仅“停留在里面”，而是通过这种途径来估量人类心理的复杂而深邃的源泉。正如赫伯特·穆勒所指出的那样：“他（弗洛伊德）设想，无意识只因为是更基本的东西而成为首要之物，因此他总是企图去控制它。他们（超现实主义者）则将其设想为美和真的源泉，因而试图对之进行发掘。”^②

^① 我们尤其用《转折》来宣布，“让头脑简单的读者见鬼去吧！”《宣言》，载《转折》第十七期（一九二九）。

^② 赫伯特·穆勒，《超现实主义：一种持有异议的看法》，载《一九四〇年散文和诗歌的新方向》，詹姆斯·劳夫林编（诺福克，康涅狄格，一九四〇），第553页。参见肯尼斯·伯克，《超现实主义》，同上书，第563—579页。穆勒的那篇论述超现实主义的文章尽管颇为明智和有趣，但却又一次表明了他对文学中的非理性的愈益增长的不信任感。几乎在对非理性主题的每一种文学上的用法中，他都看出了一种与现代社

弗洛伊德与超现实主义思想的暗中契合——安德列·布勒东曾打算成为一位精神病医生——使人们把注意力放到了梦的生活的可能性上。超现实主义者的意图不仅是为他们自己发掘这些可能性，而且还要将非理性或无意识的生活鼓吹为所有人的财产。他们试图与共产国际携手联合，要求在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和限制的同仇敌忾的基点上建立亲密的关系。

然而，正是他们对美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东西。大卫·加斯考恩（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就不再是其中的一员了）说，“通过不断地倾向于排除将……印刷书页或画架与真实生活和行动的世界相分割的障碍，来‘无限地扩展文学和艺术的界限’，这就是他们的目的。”^③更具体地说，他们对发掘无意识隐喻的审美可能性是饶有兴趣的，他们希望在无意识之内发现一种形象化描写和句法丰富的五色缤纷，“一股以意象的形式迸发而出的非理性思想的永恒之流。”

超现实主义一开始就是达达主义的破坏性因素。达达主义是一九一六年在瑞士的苏黎世骚然兴起的，后来在巴黎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二年。也许正是这种使叛逆服从某种审美修养形式的愿望，才导致了超现实主义的建立。用他们最初宣言中的话来说，超现

会的邪恶势力的可疑联系——更为具体的是与希特勒有所联系。在他的《科学与批评》（纽黑文，一九四三）（这是一本在其他方面颇为适中和卓有见地的著作）中，他提及了心脏的这种变化，“……在我这本几年前写的论述现代小说的专著中，我论述了劳伦斯作品的明显局限性和过分之处，但结尾却强调了这些作品的价值。我猜到，或许正确或许错误，在一个科学主宰的时代，文学和哲学都需要他对‘不为人知的存在方式’的富有激情的表达，以及他对旧的感情方式的加强和发扬。今天，我仍应当紧扣本章所提供的几乎任何一个句子。然而，我也应当转变我的著重点，更加着重研究劳伦斯的方法的危险性。在希特勒能世界里，颂扬无意识的人并不少，他们在本能和非理性启程后重振旗鼓。”同上书，第16页。

^③ 大卫·加斯考恩，《超现实主义简评》（伦敦，一九三五），第19页。

实主义希望打破理性主义的限制，因为“逻辑的方法现在仅仅被应用于解决人们附带感兴趣的问题……在文明的色彩笼罩下，在进步的假象掩饰下，所有那一切或许正确或许错误地被看作是幻想或迷信的东西，已经从人们的头脑中驱除出去了。”^①

对弗洛伊德的依附并不只是偶然的。超现实主义的实践是首先拒绝自我、升华以及抑制的一切限制；其次，将无意识当作与正常规范的审美道德分离的源泉来使用，最后，则彻底摆脱出精神分析学家的控制和无意识的折磨，而对于这一点，精神分析学家当然予以首要的重视了。超现实主义理论接踵而来的附加物则接受无意识的欲望或愿望，将其作为活动的富有诗意或其他特征的结果。

超现实主义美学和伦理道德的三个原则被称为客体冒险(Objective Hazard)，感觉分离(Estrangement of Sensation)和忧郁(Black Bile)。第一个原则也许是最严格地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它一开始就假想，无意识欲望是行动的独一无二的决定者。弗洛伊德那种对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小心谨慎和近乎毕生的专注就这样一举被清除了。客体冒险对精神分析学的谨慎小心的这种榜样根本不屑一顾。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尽管无意识的冲动赞同本能欲望的直接满足，但是这种冲动停止住了，同时其精力也由于对现实的强烈震惊以及自我试图保护心理不受其痛苦经历的重复所作的必然努力而受阻了。超现实主义者们认为，在自我及其社会助手方面所作的这些预防性努力不过是些干扰物。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必须跳出自己的囚笼，以找到野蛮和强烈的满足。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是有欲望的，因此我们发现了

^① 引自上书，第59—60页。

阻止这些欲望实现的障碍；我们正在为实现我们的欲望而战斗。我们正在与阻止它们实现的障碍作战。我们的伦理道德引导我们到达一种欲望的伦理学，因为艺术家在遵循弗洛伊德称之为与现实相对立的快乐的原则时，所表达的欲望比其他人更清楚，而且艺术家在希望这个领域里还带了个头。^①

这三个原则中的第二个，即感觉分离，当然是与无意识的语言和逻辑习惯相连系的，正如它们显露在显梦中，并且暴露在精神分析学家发展起来的其他情境中那样。超现实主义文学把语言的怪僻性以及易于理解的比较的不合逻辑的中止视为对它表达现实至关重要的东西。“产生出分离的一切因素，从一辆破烂不堪的机动车到基奥普斯的金字塔，从海洋上的生活到哈莱姆的萨福伊舞会，都可能产生出这种分离，并因此而富有诗意。”^②在超现实主义美学中，决无所谓形式美可言。超现实主义依赖于使人震惊——喜剧性地令人震惊——转达其无意识现实的富有诗意或形象化印象的混乱的持续性。形象应当“使两种彼此间隔遥远的现实融为一体。”因此劳特埃蒙（十九世纪的超现实主义先驱）笔下的形象，“‘在一张分割开来的桌子上，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雨伞的偶然相合，’”成功地使得“在一个与两方面都同样不相关的平面上，两种彼此间隔遥远的现实融为一体。”^③超现实主义经常求助于梦的报道，就象梦常常提供这种巧合的例子那样。但是超现实主义以后的声明则引导人们去相信，他们并没有完全满足于梦的

① 尼古拉斯·克拉斯，《超现实主义的意义》，载《一九四〇年散文和诗歌的新方向》，（诺福克，康涅狄格），第389页。

② 同上书。

③ 加斯考恩，《超现实主义简评》，第66页。

报道所必须提供的东西。卡拉斯说，“我认为我们夸大了诗的价值，并不是无意识意象的价值，而是自由联想法的价值，这种方法正是精神分析忏悔的做法(modus operandi)……在(诗人的)照看下，没有哪位精神分析学家象一位神、一位父亲或一位情人那样，去指挥诗歌的节奏；除非诗人自己发现节奏，否则他的意象就继续是毫无生气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手法的局限性——这是超现实主义者们无论如何也没有真正考虑到的——在危及到超现实主义表现的新鲜性和独创性时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因为梦的象征和意象确实以单调乏味的规律性和相似性反复出现。超现实主义诗人与精神分析病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必须再一次得到强调：“弗洛伊德的病人只是一些受害者，根据他所创造出的唯一事实，诗人是一位英雄，一位自认为遭受苦难的英雄，他感到自卑，这往往是很可怕的，但是他却发现了一个他可以去探索并征服的世界，这还是一个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世界，不可能被贬低到病人的行列中。”^①

这些原则中的第三个是忧郁，也就是布勒东所称的黑色幽默(l'humour noir)，这是一种摄取了的反讽，是在诗人意识到无意识现实的强烈不一致时所表现出的非理性的大笑。弗洛伊德在他那本《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已经表明，隐藏在笑的背后的意图可能是相当残酷的。

由于弗洛伊德的发现，超现实主义才竭力深入到情感反应的过程中去，因而发现，当反讽变得富有革命性时(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它就成了某种比我们在使用反讽这一术语时可被理解之物残酷得多的东西……它是那种最为令人讨厌的大

① 尼古拉斯·卡拉斯，《词语的说明》载《放火》第一期(一九四二)，第16页。

笑，而且带有最使人烦恼的效果。^①

这种笑并不排除对猥亵描写的兴趣，尽管它并没必要去加强那种兴趣。它是一种与打乱了善恶的意识标志的震动有关联的幽默。

完全非理性的这些或那些标志必定与弗洛伊德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的历史相联系，这种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超现实主义者们本身却表明了它受益于弗洛伊德的限度。他们只接受他对无意识的描述，此外拒绝其他一切观点；而他们之所以接受那一点，并不是因为弗洛伊德本人为之作过介绍，而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他们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也许与其说有建设性，倒不如说更有表征性。

在他们对轻信的从不间断的抨击时，某些价值还是必须得到承认的，因为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形象化描绘常常也会意想不到地动人 and 有效，而且对不一致的创造性再现对于有关“艺术的精神意义”的乏味滥调来说，也是一个永不间断的障碍。

四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结果，作家修正了将自己视为一位艺术家的看法，并修正了自己对读者的责任感。实验性作家们期望自己的读者以一种颇有独创性的方式参加到创作活动中来。十九世纪小说的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欣赏的那些平凡的要素并非那样轻而易举就可理解。如果一位作家并不只是反复无常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的意象并不是那样模糊，以致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是何意义——那么读者就可以为自己发现这

^① 卡拉斯，《超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上述引文中第390页。至于对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中的超现实主义渊源的简明扼要的研究，参见华莱士·弗里的《超现实主义时代》（纽约，一九五〇）。

些意义。传统的戏剧批评家往往谈到一种判断上的中止，这种中止对于接受戏剧习惯是必不可少的。现代作者为了可以和读者一起探索梦的意识的曲折途径，常常被迫求助于“潜意识压抑力”。弗洛伊德把“辅助性阐述”说成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潜意识压抑力便对已经完成了的梦起作用了。当读者说，“这是奇异的，这是荒诞的”时，他实际上便以与梦的自我本质上相同的方式作出反应了，这时，梦的自我就说，“哦，这毕竟只是一场梦。”

在这一点上，病人与读者之间的相似性便破坏了。就采用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将有助于使理解的途径更简单这一点而言，读者可以这样做；但是他就象一位传统小说的读者对将反派角色置于死地或让女主人公享受到正式婚礼不感兴趣一样，对于“治愈男主人公的病”也感到索然无味。在某一点上，审美的和科学的观点往往分道扬镳。精神分析学也许对艺术家有着丰富的启迪，但是治愈男主人公的病却不属这样的启迪之列。^①

弗洛伊德的疗法几乎完全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的，但是我们当代知识界却将他有关性格的结论当作可以普遍应用的东西加以接受了，这是由于两个原因：（一）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和《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已经表明，正常和非正常之间的差别首先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每一个人至少有着潜在的精神病因素。（二）对自己周围的生活以及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观察，也将导致年轻的知识分子作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结论。

变态心理学对性格分析的影响是很容易得到承认的。不管我们二十世纪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正象路易森的《内部的岛》里提到的那样），还是一位患者（正如阿瑟·科斯勒的《到

^① 参见第八章，对舍伍德·安德森与精神分析学的讨论。

达和离开》中提到的那样),有关他性格的某些结论总是从分析的环境中衍生出其心理特质。我们在传统小说中称之为“意志斗争”的东西,对于“诊所小说家”来说,便成了反对压抑力的斗争。也许本来可以被认为是命运的光荣屈从或是孝道的美好表现的东西,往往却被解释成为一种孩提时代的固恋或一种“父母的情结”。^①介绍精神分析学理论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存在着一种对精神病学的恢复了的兴趣;它们被看作是世界的镜子。其危险性在于,对“反常或怪僻”这种专注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只是证明这一点:人们常常会发精神病或变得反常。莎士比亚笔下的傻瓜是高尚的人,往往在胡言乱语的掩饰下转述重要的真理,他们常常感到这样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关闭了论说“常识”的大门。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王子在这方面毕竟是一位明智的人,他的同情和天真达到了不为周围那些雄心勃勃和敏感的人欣赏的深度。但是二十世纪的作家并没有去假想,正常和反常并不是孤立的类型——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倒是常常把反常当作了正常。这种悲观主义的生活观是反叛传统的一部分;洞察力常常会失去。自然主义者的悲观主义假想,外部的力量并没有为个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人不过是这些力量的玩物而已。心理小说家的悲观主义就是这同一种自然主义的延展。弗洛伊德解释道,精神生活的真实没有不带有自己的原因的。心理小说家喜欢将自己的悲观主义看作具有一种更深的色调。在这种类型的一些作家看来,对生活的寻求更精确地说来,就是一种“对死亡的追求”。人们可以通过这段评论来解释所有这一切,即现代人并不赞成任何固定的幻想,但是范围更大的世界性否定

^① 这样,在梅·辛克莱的《哈里特·弗雷恩的生与死》(纽约,一九二二)中,第97页,仅仅作为掌握自己丈夫的一种手段,普里西拉病倒了,那是“纯粹的歇斯底里症。罗宾并不爱她,而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则逐步来调整现实的欲望。当这种机会为社会抗议而奉献时，许多这样的小说家便很高兴地转向它了，因为它至少提供了外在于自我的攻击目标。^①

弗洛伊德主义在离开自己所起源的临床环境后便误入了歧途，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粗略地概括出弗洛伊德对文学的贡献。（一）《释梦》以及尤其是论述“梦的工作”的那一章从多方面影响了作家。它指出了一种无意识生活的实在，在这之中，行为的方式并不是表面的，而是复杂的。它使得梦作为对性格动机的便利概括面出现，而且甚至还作为情节结构本身的一个部分出现。它使作家去注意对一种新的语言的需要——一种以浓缩、置换、多重决定以及辅助阐释为基础的言。在这样做时，它便向实验者们提供了这一想法，即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荒诞手法”——也就是说，抛弃那些符合逻辑和句法的东西，接受那些不合逻辑和不合语法规则的东西。

（二）《性论三讲》连同这一时期的另一些著作，以及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介绍性讲演》提供了一整套心理学术语，这些术语常常与其说得到判断上的应用，倒不如说是被灵巧地应用了。在小说家们发掘了多年的传统情境中，心理小说家竟在处理方法上作了一些改变。父母——子女关系，如果允许延伸到青春期以外，并导致一种接踵而来的具有“男性特征”的轻蔑的话，便被当作恋母情结的一种形式加以处理了——尽管个别作家赋予这一概念以自己的修正。“永恒的三角关系”依然是三角的，但是这种关系却常常被当作现代性伦理道德的一个问题加以处理了。失调的种种形式常常被看作是自我固定或自恋的征兆。

^① 在二十世纪小说的这个方面，阿德勒和荣格的流行观念也都起了一个作用——尽管这些一般都与（如果就实与一些东西有关的话）它们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来源有关，“自卑情结”和外感—内感种类的划分常常都总括为“弗洛伊德的本能”。

(三) 弗洛伊德有关社会和神学问题的专论只产生了一点间接影响。社会机构以及艺术只是幻觉这一悲观主义结论偶尔也激励作家们去强调他们对现代悲观主义的研究。例如，瓦尔多·弗兰克就将一种机构的改变看作对社会变革是不适当的，因为在极大的程度上，机构“阻碍着权力和秩序的幻觉”。弗洛伊德有关某些种系发生型式反复循环的学说在《图腾与禁忌》中得到了发展，这一学说影响了托马斯·曼对约瑟夫故事的处理。曼也满怀希望地强调，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学的前途的简略提及是这样——一个任务，即要通过使其与文化和社会的结合越来越有吸引力，并使其控制伊底的任务也相应地容易些来确立和加强自我。

(四) 临床的情形本身就是造成许多附带的次要情节的原因，特别是导致了讽刺的产生。抵抗的概念要求既对讨论，又对文学中这种讨论的讽刺产生很大兴趣。移情的情形对讽刺也是理想的材料，并且一般都不无讽刺地得到处理。精神分析学家本人就是一种新的小说的典型人物——尽管这一点是极其可疑的，即他将进入小说的情景中，而小说则正是和蔼可亲和颇有勇气的内科医生欣赏已久的。

在对二十世纪写作的形形色色的影响中，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影响之一。然而，他只是一大批思想家同人中的单个成员，那些思想家们对二十年代思想和小说都有着某些影响。现在，通过考察一大批小说家的作品细节来估价弗洛伊德影响的多种形式和力量，已成了我们的一大问题。在那些受影响的小说家中，有詹姆斯·乔伊斯，劳伦斯，舍伍德·安德森，瓦尔多·弗兰克，弗朗兹·卡夫卡，以及托马斯·曼。

第五章 对乔伊斯的影响

与乔伊斯的名字相关联的四本书提供了大量有关他的自传信息。① 伴随着乔伊斯而发展起来的那些观点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②一书中得到了仔细的阐述。尽管乔伊斯否定了这些观点中的绝大部分，但这些观点都从未离开过他。他一直都在加工处理的都柏林材料首先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③中得以成形，然后又在《尤利西斯》④和《芬内根的苏醒》⑤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

① 包括他薄薄儿几卷诗文集，这些对选辑他的散文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刘易斯·戈尔德，《詹姆斯·乔伊斯》（伦敦，一九三三），第9—21页，和丽贝卡·韦斯特，《奇怪的需要》（加尔顿城，纽约，一九二八），第1—215页，试图把这些诗歌列入乔伊斯“真作”之中，并找出这些诗歌与乔伊斯散文作品之间的某种关系。参见乔伊斯的诗歌，及威廉·Y·提霍尔兰编的《室内音乐》（纽约，一九五四）。

② 写于一九一四年之前；从一九一四年二月到一九一五年九月，由伊兹拉·庞德发表在《伦敦自我中心者》杂志上；出版于纽约，一九一六年，伦敦，一九一七年。

③ 写于一九〇七年之前；出版于伦敦，一九一四年，纽约，一九一六年。

④ 这本书复杂的出版史在赫伯特·戈尔德，《詹姆斯·乔伊斯》（纽约，一九三九），第291—324页中有所介举。还可参见罗伯茨“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文献目录笔记”，载《版本记录》杂志，未详细说明，一九三六年第一期，第565—579页。有关乔伊斯声望的最完整的思考和有关乔伊斯评论的概论总结也许要算马文·马格兰纳和里查·M·凯恩合写的《乔伊斯：其人、作品及其声誉》一书（纽约，一九五六）。

⑤ 此书的前三部分分期发表在《转折》杂志上，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第十一期，第十三期，第十五期和第十八期（一九二七—一九二九）；此书的其它部分发表在《转折》杂志的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六期和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出版于纽约，一九三九年。

这几本书所表现出来的三种主要影响是：乔伊斯在他的大学生活中得到的很可能并不系统的天主教学识和耶稣会教义方面的教育，作为当时每一个善于思考的爱尔兰人生活背景一部分的爱尔兰神话和政治传统，以及乔伊斯很可能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对音乐的酷爱。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所有这三个方面，他从来没有忘记或停止使用给他提供了这三个方面的都柏林素材。体现在乔伊斯的多声部作品中的次要主题，包括他母亲的逝世，他对父亲之伟大的幻灭感，他自愿离开都柏林流亡他乡，这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对自己短篇小说中所描绘的生活所持的态度，此外还包括都柏林的文学生活。乔伊斯思想的奇异特点在于，尽管他尽力在外表上否定那些使他的信仰动摇或产生怀疑的大多数观点或理论，但他从未真正放弃过任何这样的观点和理论；他那富有挑战意味的“我将不为上帝服务”(non serviam)总是由于他不情愿放弃任何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传统习惯而得到了缓和。他喜欢他所憎恨的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乔伊斯作品中流亡主题的重要性。他一九〇二年以后的生活就是不断的向他的故乡城市靠近或远离。巴黎、都柏林、苏黎世、的里雅斯德港、罗马、都柏林、的里雅斯德港、苏黎世、的里雅斯德港、巴黎：他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旅行路线反映了他离乡背井后的动荡不定的生活。从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四年，他在的里雅斯德港和罗马两地之间轮流居住，头脑中反复思考着有关《尤利西斯》的构思，就他的早期作品出版问题同他的出版商们争来吵去，在的里雅斯德港的伯里兹学校和商业学院教授语言课。一九一四年，作为一位发表过作品的作家，乔伊斯在伊兹拉·庞德的帮助下，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一九一五年初，他全家迁居到苏黎世；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多时间，直到战争结束，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流亡。

这些漫游式的迁居对我们的研究不无重要意义。乔伊斯迁居欧洲大陆的结果是，极大地扩展了他知识兴趣的视野。的里雅斯德港知识分子生活的欧洲大陆风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他最不愿意尊重自己的故乡的传统。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柏林人》都没有展现出任何让读者震惊的东西。这些故事都是按短篇小说的最优秀传统写成，技巧娴熟而敏锐，精当地描写了爱尔兰市民的生活。所以，我们完全可能分享保罗·埃尔默·莫尔第一次读到《尤利西斯》和《进展中的工作》^①时所感到的惊诧，虽然我们不一定非要分享他在文学评论方面的迟钝感觉。他发问道，一个“有能力写出《死者》最后一个场景的人，怎么竟然沉迷在《尤利西斯》的道德泥坑里，并且能一直在《进展中的工作》的语言上的错误百出中装腔作势？”^②

《都柏林人》与《尤利西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差别不在于主题，因为两本书处理的是同一素材。这一巨大差别诚如莫尔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在于“道德方法”吗？莫尔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其原因是很明显的。乔伊斯是一个转变着的人物，他在爱尔兰学校所受到的教育，他对阿奎那有关伦理学和美学问题的苦心思索，对此他在《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曾为我们作过栩栩如生的描绘——这些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对最终评价他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住在的里雅斯德港、罗马和苏黎世时所受到的欧洲大陆的影响。鉴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他在的里雅斯德港和苏黎世的主要经历：（一）早在一九〇一年就可

① 《芬内根的苏醒》分期发表于《转折》杂志时的暂定书名。

② 保罗·埃尔默·莫尔：《詹姆斯·乔伊斯》，《北美评论》一九三五年第五期，第139页。莫尔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尤利西斯》“把艺术当成脱离生活责任的抽象物去追求……。”因此，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之后的文学生涯中，反映出一位现代派作家蔑视对良心的道德要求的欲望，以及他对“崩溃的热望”要优先于对人文主义传统的热爱。出处同前，第140—155页。

以找到他对欧洲大陆的事物怀有兴趣的证明，他当时十分赞赏地评论了易卜生的一出剧。(二)他在《室内音乐》诗集^①中发表的那些相当浅薄的诗表现了他寻找读者的最初努力。(三)《都柏林人》完成于一九〇七年；该书于七年后出版时，乔伊斯注意力已经离开了书的形式，但却没有离开书的内容。

到了一九〇七年，乔伊斯已结束了他对过去的精神所唱的颂歌，他此时正忙于创作那部解释他否定这个过去的作品。^②《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挑战性的格调结束，这一格调始终贯穿于乔伊斯此后的整个理智的经历。“我将不为上帝服务”，斯蒂芬说，他是说到做到的，绝不是说着玩的，他的意思是说，以往的众神都已逝去，他只为自己服务。当乔伊斯动身去欧洲大陆时，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下面的这个方案上，《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里曾清楚地预示了这个方案的实现：(一)保持自己的完整性；(二)满足他的知识趣味；(三)在艺术中寻找普遍性。乔伊斯在这本书中如此煞费苦心所描写的不仅仅是传统，而且还包括斯蒂芬-乔伊斯对传统的态度。^③在完成《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里雅

^① 出版于伦敦，一九〇七年，纽约，一九一八年，另一本薄薄的诗集《一便士一首诗诗集》，由西尔维亚·比奇一九二七年在巴黎出版。

^② 需要了解这本书的进展情况，参见《南方评论》一九四一年第七期，第171—186页。西奥多·斯本塞的《〈斯蒂芬英雄〉：詹姆斯·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未发表的手稿》。《斯蒂芬英雄》比《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长得多的早期草稿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带有新增加页数的新版本问世于一九五五年。它与《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达德路斯一家家庭成员的更加广泛和全面的描绘。此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乔伊斯动身去欧洲大陆时，所放弃的都柏林生活和背景的机会。“……手稿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斯蒂芬有关艺术及其与生活的关系的观点。”出处同前，第179页。

^③ 这种态度的情感特征，在乔伊斯唯一的发表过的剧本《流亡者》中得到了较为深入却又十分乏味的处理。《流亡者》写于的里雅斯德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在苏黎世首场演出，一九一八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参见伯纳德·班德勒I，《乔伊斯的流亡者》，发表在《猎狗与号角》，一九三三年第五期，第266—285页。

斯德港，乔伊斯已经开始《尤利西斯》的初步构思了。完成这部小说进展缓慢而又断断续续，并且还受到他对形式和风格的看法所进行的修正的影响。

在乔伊斯开始创作《尤利西斯》时，可能受到了许多新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精神分析学。在乔伊斯开始写作《尤利西斯》之前的七年是精神分析学最为硕果累累的早期，的里雅斯德港和苏黎世两地都是这门新心理学的重要中心。乔伊斯很可能在的里雅斯德港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就象他热切地阅读能为他提供新的视野的其他人的著作一样。他在苏黎世生活了三年多，这地方虽与世隔绝，但乔伊斯仍继续从事创作。他对过于经常地占用他时间的琐事十分讨厌，但还是注意到他那一批人中的其他知识分子。^① 苏黎世也是荣格学派精神分析学的中心。如果说乔伊斯被精神分析学迷住，或说他在苏黎世逗留期间，全力贯注于精神分析学，这将是错误的。但是，他肯定对精神分析学颇为了解。他至少与精神分析学有一个重要联系。哈罗德·麦考密克夫人这位已故约翰·狄·洛克菲勒爵士的独生女儿，这时在苏黎世向乔伊斯提供了一千瑞士法郎的资助，后来因乔伊斯拒绝接受用精神分析法治疗而收回了这笔馈赠。^② 乔伊斯与苏黎世精神分析学派的联系，尽管最多不过接触一点皮毛，但仍旧很有趣，因为这表明他已经注意到了精神分析学，一定对它很有了解，并且很可能为它运用于文学的前景所吸引。

凭着这样不充分的证据，一些评论家便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内根的苏醒》欢呼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而创作出来的

^① 参见弗兰克·巴德金，《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创作》，（纽约，一九三四）在第26页，巴德金还提到荣格是“理智气氛”的一部分。达达主义产生于一九一六年的苏黎世。

^② 戈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237页，第264页。戈尔曼说乔伊斯“坚决而气愤地”拒绝接受荣格医生的精神分析学治疗。

文学作品。比如，玛丽·科拉姆把这种影响看作是必定的：

……〔弗洛伊德应用的方法〕的确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结尾处莫莉·布卢姆著名的独白中所遵循的过程……乔伊斯那令人费解的新作《进展中的工作》试图把对无意识生活的揭示向前推进几个阶段，大大超过《尤利西斯》……〔他〕试图描绘心理的全部夜生活……乔伊斯对内心独白的熟练掌握是他很可能在写作技巧上保持难以超越地位的第二个因素，对于这一技巧的熟练掌握，他毫无疑问地应当大大感谢弗洛伊德。①

同科拉姆夫人一样，莱昂内尔·特里林把自己的看法建立在对内部证据的研究之上：“詹姆斯·乔伊斯对意识逐渐消失时无数状态的探究，他把词汇当作事物来使用，这是弗洛伊德释梦方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他感到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普遍感觉，还有他的家庭主题，这一点也并非最不重要，这一切也许最彻底、最有意识地发掘了弗洛伊德的观点。”②

这里还应该考虑到另外两种评论。这两种评论都基于荣格和乔伊斯居住在苏黎世这一偶然事件。哈里·莱文说，乔伊斯“几乎不可能抵制”苏黎世学派的影响。他把梦的工作看作是“乔伊斯进行自由联想和系统地扭曲语言的特许证。”③另一位评论家是尤

① 玛丽·科拉姆，《从这些根源出发》（纽约，一九三七），第346—349页。斜体是由我所加。（这里改加黑点——译者。）

② 莱昂内尔·特里林《西格蒙·弗洛伊德的遗产》第二部分：“西格蒙·弗洛伊德的文学和美学遗产”，《坎尼恩评论》第二期，第157页。斜体是由我所加。（这里改加黑点——译者。）

③ 哈里·莱文，《詹姆斯·乔伊斯：评论入门》（诺福克，康涅狄格州，一九四一），第89页，第185—187页。斜体是由我所加（这里改加黑点——译者）。莱文后来指出，似乎是在《芬内根的苏醒》中得到了形成弗洛伊德梦构成机制和机智的影响：“他的新词是弗洛伊德区分开的三种词汇机智的结合产物——压缩、替代、暗指……通过‘混成词’，乔伊斯可以在他的困窘中逐渐灌输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口气。”

金·约拉斯，他是《转折》杂志的编辑，新的“夜晚语言”的提倡者。他同乔伊斯关系十分密切，是倡议乔伊斯写作实验那批人中最积极热心的一位；他自己本人对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对释梦心理学非常感兴趣。约拉斯有时似乎是在形成一种美学观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释乔伊斯投给他的杂志的稿子，并论证其合理性。^①我们在詹姆斯·劳夫林加在杜夏丹的《月桂树被砍掉》后面的评论附录中，会遇到下面一段话，这是毫不奇怪的，“尤金·约拉斯不久前向我指出，乔伊斯在构思《尤利西斯》时所居住的苏黎世，是精神分析运动的一个活跃的中心。乔伊斯不可能接触不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或不受到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研究的影响……”^②

一九四三年八月，约拉斯告诉我，乔伊斯在苏黎世，后来在巴黎相当熟悉荣格，乔伊斯了解精神分析学的文献，他在《芬内根的苏醒》中，应用了弗洛伊德《释梦》中的启示。在另一处，约拉

^① 《转折》杂志主要由于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分期刊载《进展中的工作》而闻名。这家杂志创刊时发表的是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有一段时间它象特载乔伊斯的作品那样特载了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作品。最后，乔伊斯终于彻底断绝了同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关系，他任何时期的语言哲学和美学都无法同超现实主义相比较。《转折》杂志后几期发展了约拉斯自己的哲学，他称之为“维尔提格拉主义”(Vertigralism)，参见他的论文《超现实主义：珍重再见》，刊在《幻想曲》，一九四一年第七期，第23—30页。

^② 艾杜阿·杜夏丹，《我们不再到村子里去了》(诺福克，康涅狄克州，一九三八)，第149—150页。斜体是由我所加。(这里改用圆点——译者)

其他把乔伊斯和弗洛伊德联系在一起的评论家有：詹姆斯·道格拉斯，他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伦敦《邮报》上发表了《尤利西斯》的书评。一般的反应是大声责骂，把精神分析称作“肮脏而堕落的迷信……”由戈尔曼引入《詹姆斯·乔伊斯》，第296页。米德尔顿·默瑞，《新观察》，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伯纳德·德沃托，《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刊登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一九三九年第二十期，第15页。

德沃托说，“要是没有弗洛伊德交到他们手中的工具的话，”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都不可能“创作出巴乌斯的作品……”海伦·V·麦克林，《弗洛伊德与文学》，见《星期六文学评论》一九三八年第十八期，第18页。

斯又说：“乔伊斯对生活中的非理性表现形式非常喜好”，但是他与超现实主义者和精神分析学家毫无相同之处。他十分有兴趣谈论和描绘他自己的梦。约拉斯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下面这个合理的结论，乔伊斯对所有传统的和现代的理论都很感兴趣，他在许多理论中都发现了文学前景。^①

如果约拉斯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直接提到这种影响，斯有这些评论参考看起来最多不过起了一个证实作用，最少便是不必要的。^②在《尤利西斯》之前没有出现任何提及精神分析学家的任何参考材料；在那本小说中有关图书馆那段情节中，斯蒂芬·达德路斯提到过：“圣·托马斯……我非常爱读他原版的那些该死的大部头著作，他是从与维也纳学派不同的立场去描写乱伦的。……”（《尤利西斯》，第203页）仅靠这一条提及^③了精神分析学的地方，似乎不能对这个问题下定论，但它足以证明，乔伊斯所考虑到的事物中，包括了这门斯的心理学。乔伊斯的最后一部作品《芬内根的苏醒》多次提及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名字以及精神分析学术语和理论。在小说第一部分，他把这两个人的名字结合在一

① 尤金·约拉斯，“我的朋友詹姆斯·乔伊斯”，见《党派评论》，一九四一年第八期，第82—93页。

② 我们目前几乎没有任何乔伊斯涉及美学或影响问题的信件。戈尔曼《詹姆斯·乔伊斯》一书中所印的信件都是有关出版方面的乏味细节。正如大卫·达歇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给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的评论界朋友和传记作者好象合作参与了一个隐瞒乔伊斯创作来源的不曾揭起的阴谋似的。”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书信》集（纽约，一九五七）中只有很少几处提到精神分析，而这些提及除了一些带着边鄙的见解外，仅仅具有很小的重要性。参见，例如一九二一年六月的一封信，信中他把荣格描绘成“不能与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医生相混的瑞士医生，他们是很难区分的两个人”，他还抱怨他“以那些精神有些失常的绅士淑女为代价（这毫不言过其实），着自己寻开心。”（第166页）。

③ 到目前为止，从麦尔斯·L·汉雷的《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词汇索引》一书（波迪逊，威斯康星，一九三七）可以下这个结论，乔伊斯没有提及过任何“维也纳学派”的名字。

起并且讨论了弗洛伊德在一九〇五年首次发表出来的那些理论：

……我们是对虱子尽过自己不苟言笑的一份力量的可怖的老精灵，当他们年轻、容易同他们结交朋友时，没法找到一个房间的边缘，我们对他们用的是何等玄妙深奥的简括啊！可以……告诉……父亲在这样棒状的上下文中，并不总是那样不动声色的亲属（经常被举出来遭到我们的拒绝）他常为我们付肉丁烤菜的钱并且迈克尔利看起来的那样，给我们这种天真、幼稚、令人不解的副词，这可能暗示着女性阴部的镜片下面，最后，这是什么样的神经衰弱的情欲横溢啊，内分泌松果腺型，家系的倒置以具有吸引力的痛剧方式出现在她过去中的现在，还有一种对社交的男性生殖力之神普里阿普斯似的渴望，在母族之前有父族，这根本上是当她很愿意提及她在想象中面对的一些触角时，就在她淫荡的成熟分裂下面摸索。^①

乔伊斯在许多地方提及了精神分析学术语和概念。他谈论“那个地狱边境般的深渊是他的潜意识”（《芬内根的苏醒》，第224

^① 詹姆斯·乔伊斯，《芬内根的守灵》（纽约，一九三九），第一部，第116页。这一段落的意思如下：

我们这些冷静研究过儿童早期性生活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发现了有关儿童的奇怪事情。例如，我们可以说，父亲不仅仅是在房子里付账单的人，我们可以向你保证，在一次精神分析中，相当无意地说出的话语，经过仔细观察后，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最后，我们可以讲出一个精神病患者，某一类型带有“恋父情结”的女子淫狂（对荣格的《心理学类型》一书的涉及）在真正做些什么，当她提起一个她弄迷态的男人的时候。

“对社交的那种在母族之前有父族的男性生殖力之神普里阿普斯似的渴望”暗示，病人有些倾向于自恋；“她过去中的现在”涉及到弗洛伊德对幼儿性欲在成人行为中的持续的强调（这一事实在“有吸引力的”这一形容词中也得到了暗示）；“痛剧”当然是一个混成词，指的是“痛苦”加“戏剧”。除了两个关联外（“年轻”和“某一类型的”），所有这些介绍都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性论三讲》一书中。

页)；他在词组“他在被分娩出来前做自我训练的准备”(第274页)中，暗示了弗洛伊德有关生的痛苦的言论；他在下面这个句子中包括了阿德勒的一个术语，“查理·德·辛普勒斯在他寿终正寝前感到一种虚弱的情结(infirmierity complex)”(第291页，注释8)；他把弗洛伊德描绘成“那个淫荡的时常脱缰的蓝色的马红色的一切顺利卡车一切心理创伤的指挥！(the lewdningbluebolte-redallucktruckmconductor)”(第378页)为商恩为自己辩护，反驳有关他乱伦的控告时，他说：“有人也许会暗示，这是我错了的男女(an aughter)的印象。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从来没有犯过比此更大的弗洛伊德式的错误了，为你自己开脱吧！”(第411页)^①

在厄尔维克被控告犯有乱伦罪的那个法庭审判场面里，杨恩(商恩的同一个“人”)对“法官们”说：“你们知道心理书法的一个年轻的过继门生，科文这个名字吗？……”(第482页)虽然杰丽(协姆)面不是凯文在《芬内根的苏醒》中与乔伊斯关系最密切，但人们很容易想到乔伊斯在这里把自己说成是“心理书法”的学生。^②在审判临近结尾处，厄尔维克的梦评论了精神分析学对二十世纪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上帝在开玩笑。旧秩序发生的变化，就象第一个秩序那样持续着。三个男人中，就有一个男人的良心有个漏洞，每两个妇女中，就有一个妇女头脑中有个笑话。”(第486页)^③

① 在我们注意到商恩是在梦中伪装过的厄尔维克本人(他还是维克的儿子凯文)时，“男女(an aughter)一词可能令人困惑。“男女”当然意味着“另一个”(other)加“女儿”(daughter)。

② “过继门生”(stepschuler)一词可能暗示乔伊斯把精神分析当成他通过在里雅斯德港和苏黎世经历获得的“第二个理智的父亲”。

③ 这些话是“法官”中的一个人讲的，他然后又接下去质问，商恩—厄尔维克，他采用的方法令人想到对精神分析医生—患者关系的讽刺。“法官”对自己的提问洋洋自得，“我再一次对你艾玛形象的流浪汉气质饶有兴味”。“艾玛形象”(irmages)一词也许是“艾玛”(Irma)和“形象”(images)的结合；弗洛伊德的《释梦》总是提及他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梦，“艾玛药剂”之梦。参见《释梦》，第二章，第80—102页。“法官”用法律和精神分析的相结合术语向他的愚者—被告建议道：“把那个从你头脑中赶出去，承担起责任这个责任。下一句话要依据你的回答。”《芬内根的苏醒》，第487页。

最后，在“审判”后面的一个对话中，乔伊斯又一次提到了精神分析学，从他提及的方式看，他也许就是要暗示他自己同精神分析学的关系。

你有一种处于专家的自恋和女臀过肥的倒置之间的同性恋的凯西耶斯(catheis)。你去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吧！——哦，叫花子，我需要任何从你那一窝混血儿中来的护士专业的同情，另外，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己用精神分析给自己治病(让困惑永远伴随着你们一伙！)，根本不用你们的干涉或其他任何偷鸽子人的干涉。(第522页)

如果在以上段落中我们发现乔伊斯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并不是过于想当然的话，乔伊斯的态度则可以概括如下：乔伊斯希望“不要有人干涉他”；他很懂得如何分析他的人物；另外，无论精神分析学走到哪里，理智气氛都被一些术语和仅仅一知半解的概念搞得茫然不知所措。对于其他那些想要深入到他生活秘密中去的理论家们，情况也是如此。

《芬内根的苏醒》中的这些参照^①表明，乔伊斯把精神分析学作为他文学生涯中唯一合法影响来遵循。其实这根本不是事实。乔伊斯有许多感兴趣的东西，而每一样都在形成他最后两部作品

^① 这个单子一点也不完全。同时参看第一部分，第119页，第123页，第173页，第176页，第187页；第二部分，第271页，第290页，第295页，第299页，第337页，第363页；第三部分，第417页，第422页，第439页，第460页，第470页，第474页，第476页，第480页，第481页，第513页，第524页，第526页，第527页；第四部分，第623页。第515页上的一段特别令评论家们感兴趣：“也许，你在升华你的布莱主标间歇性嘲弄的(blepharospasmoekical)压榨的词语过程中，并不很成功，似乎是这样吧？”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也许(也很幸运——或许加上巧合地)作者在用他的词汇文字游戏伪装厄尔维克被抑压的精神生活时并不十分成功。如果乔伊斯完全成功的话，就没有任何评论家能设法解释这本书了。

中的不寻常人物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提及精神分析学对《芬内根的苏醒》的结构并不只是偶然的。在那些有助于形成那部作品形式的几种理论中，有精神分析学和维柯的历史循环理论。

精神分析学在乔伊斯文学生涯中的实际位置是什么呢？（一）我们相当肯定地认为，在乔伊斯离开都柏林去欧洲大陆许多城市旅游之前，从未有过或从未了解任何有关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知识。（二）我们掌握的一些传记资料可以使我们肯定，他首先在的里雅斯德港偶然接触到了精神分析学，然后又在苏黎世对精神分析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了解。（三）从内在的证据看，我们可以断言在他写作《尤利西斯》期间的某个时候，他了解了精神分析学，到1922年，他已经阅读了弗洛伊德几乎全部的著作和荣格的一些著作。很清楚，他的有关知识决不是表面的，因为他在《芬内根的苏醒》中对精神分析学的提及，表明了一个门外汉对精神分析学术语和概念异乎寻常的熟悉程度。在乔伊斯转向文学实验和他在精神上抛弃早期传统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吻合。换句话说，乔伊斯对“新的众神”的追求使他确信，文学中的一种新方法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

这一新方法绝不是乔伊斯的创造。一八八七年，艾杜阿·杜夏丹创作了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月桂树被砍掉》。^①事过四十四年之后，杜夏丹解释了他所做的事情。他称之为“内心独白”的，

……是一个情节中一位人物的言语，其目的是把读者直

^① 自从乔伊斯对这本书的兴趣宣布后，此书的英译本以《我们不再到村子里去了》为书名问世，译者为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乔伊斯第一次阅读杜夏丹的小说是在一九一七年。

接引入人物的内心生活，不用作者的任何解释或评论式干涉；同其他独白一样，它在理论上没有听众，也不是从嘴里讲出来的。但是它与传统的独白有下列几方面的区别：在内容方面，它是那些存在于最靠近无意识的内心最深处思想的表达；在性质方面，它是超越逻辑组织的言语，当深层思想产生和到来时，它就把它再创造一番；在形式上，它应用切成句法最小单位的句子；这样总的说来，它满足了我们当今为诗歌所规定的那些要求……①

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作者意图表白。但应该指出其中几点：（一）与“传统的独白”的十分相似之处；（二）把独白的特点归结成“一个人物在一段情节中的言语”——就好象唯一必要的区别是人物对自己而不是对他人讲话；（三）杜夏丹坚持认为，那些思想是“存在于最接近无意识的地方”，这一宣称在他的实践中没有得到证实。他小说中的大部分思想很明显靠近意识，它们离意识那么近以至于主人公转而同他的朋友夏尔瓦尔尼谈话时，从独白到对话的过渡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只提供出很少（要是提供了的话）有关这两个层次之差别的信息。

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都被“内心独白”的概念和“意识流”搞糊涂了。的确存在着一种最根本的差别，这一点杜夏丹已经讲清楚了：普通正常人的外部言谈与其背后的思想或完全独立于任何言语的思想之间有着差别。但是意识流还够不上一个明显的定型，它不能包括它通常称之为意识流的各种写作形式。应该进行进一步的分类，这样人们才能经过初步观察看出任何一种特殊的

① 出处同上，第153—154页。劳夫林在他的评论附录中引用过。原文出自艾杜阿·杜夏丹的《内心独白：在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出现、起源和地位》，（巴黎，一九三一）。

“流派”打算做什么。首先，内心独白是心理小说的一种自然的风格上的同伴。无论如何，它以这样的设想为基础，即人物性格不是固定不变的，意图正如从一个人物明显的行动或言谈表达中可以得到发掘一样，它也可以从他的精神生活中得到发掘，而且还可以用后者取代前者。“这一技巧意味着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如下事实，性格一直是处在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情绪从来就不是任何静态的东西，而是一种流动的形式，‘记忆与欲望的混合’，人们的这一认识标志着心理小说传统的一个重大新发展……”^①

意识到现代心理学的作家们经常改变他们关于个人动力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任何特定的行动都不能简单地得到限定或表达，传统小说描写的那些社会举止细节，在他们看来十分肤浅。他们需要某种能够看到他们人物意识下面的工具。他们感到传统小说不管它如何试图变得复杂，只能做到对其人物进行分类——而在他们的判断中，“分类就意味着宣告不适用。”

意识流小说所采用的技巧的目的，是为我们捕捉那些由头脑负责保持在意识之外的人类行为的来源。它希望用我们心理生活的无条理性去代替我们受到控制的醒来的生活的有条理性。

他所确定的特色是发掘我们意识过程中的无条理的要素。这种无条理性是我们正常和异常心理状态所共有的特点。思想的自然联想是极其捉摸不定的。我们的心理是如此不完善地给合在一起的一堆记忆、感觉和冲动，除非受到某种拥有压倒优势的动机的严厉控制，它很可能任凭每一个歪风似

^① 大卫·达歇斯，《小说与现代世界》（芝加哥，一九三九），第26页。在最近对意识流小说的研究中，作出了有用的区别：意识流指的是小说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小说中应用了几种开发意识多种层次的技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技巧是内心独白。参见梅尔文·J·弗里德曼，《意识流》（纽黑文，康涅狄格州，一九五五），以及罗伯特·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一九五四）。

的启示所摆布。①

当我们想到一切社会生活的两种必不可少的管辖者——空间和时间是意识控制的一个重要部分时，我们可以意识到，意识流小说推翻了小说表现三根支柱中的两根。②实际上，当我们不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时，我们就是无意识的。意识流小说没有抛弃时间——空间，因为甚至连一股水流在流动时也有快有慢，并且存在于空间之中。但是，这两个基本范畴现在是研究人类复杂行为的辅助物；时空组合被用来代替已被接受和承认的普通醒来的生活的模式。

意识流小说似乎只得到了极其狭窄的描述，人们几乎忽略了它的各种变体。所采用的表述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这一新技巧提供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深度。“意识流”这一名称不能真正地阐明已得到人们所认为的那种广泛多样的使用。实际上至少存在着四个层次的写作，每一个层次都具有它自己对时间和空间的参照系统。③

(一)传统的层次，它很情愿运用一切人们所接受的意识控制，并且采用我们所习惯研究和适用的可以得到承认的交流系统。在这种写作方式的范围内，所有或几乎所有类型的行为都可以得到描写，但是它们必须贴上标签或可以在普通理解力的范围内得出推论。因此，当塞缪尔·巴特勒讲到欧纳斯特·庞提费克斯向他父母汇报他在学校的生活时说，他描写了一种情景，在另一写作层次上则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里欧纳斯特的无

① 约瑟夫·沃伦·比奇，《二十世纪小说》(纽约，一九三二)，第517页。

② 第三个支柱人物是心理小说家的出发点，因此他很愿意暂时舍弃其他两个支柱，或重新估价它们，因为他感到传统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充分再现第三个支柱。

③ 还有其他技巧，其中包括内在分析和感觉印象，梅尔文·弗里德曼在《意识流》中对它们进行了充分讨论。参看弗里德曼，第一章。

意识自我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他的意识自我不能胜任的抵制，在一阵昏厥中从椅子上跌倒下来。”^①这种小说当然能进行众多复杂的分析，特别是当它运用詹姆士的“中心理解力”(central intelligence)的各种变体时更是这样。但它还不是一部意识流小说；其人物内心思想的内在分析保持在客观叙述的范围之内。大概内在分析的技巧在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中最为靠近意识注意的边缘。

(二)“前意识”^②层次——或“意识的白日梦”层次；固有逻辑性的言语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较大的流动性和与句子结构和词汇意义的规则较小的明显连系。这是艾杜阿·杜夏丹小说中的一段“内心独白”：“马车沿着大街前进……在那数不清的人群中，我是孤身一人，我走我自己的路，这是与其他路颇为不同的一条路；所以，现在，在这里，报时的钟声在敲响，这个生活的世界，所有这些都来到我的心中……”^③这是“白日梦”，它参照的总是运动着的世界。除少数几部外，所有的现代小说都在这里或那里运用过这种手法，旨在暗示一种从无意识的解脱或把读者带回到可以认出来的世界上去一会儿。^④在这个层次上，时空参照都是模糊不清的，但人物为了辨认的目的借用传统观念中的时空概念，经常既提到当时的时间，又提到空间中的物体。

(三)“潜意识”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有意识的头脑对意志的控制放松了很多。有时这种控制就好象干脆中止似的，但是它仍

① 《众生之路》，转引自比奇，《二十世纪小说》，(纽约，一九三二)，第33页。

② 弗洛伊德对“前意识”的解释，参看上面，第28—29页。参见弗洛伊德的《诗人与白日梦的关系》，在上述引文中，第173—183页。

③ 杜夏丹，《我们不再到村子里去了》，第109页。斜体是由我所加(这里改用黑点——译者)。

④ 例如，见康拉德·艾育，《蓝色的旅行》(纽约，一九二七)，第10—12页。戴墨雷斯特在船上与那位美国商人的相遇。

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想^①和形象流动的内容，如果不能准确决定其方向的话。精神分析学的类似情况可以在分析者对病人的回忆所实行的“善意的专制”中发见。在这里，梦常常象在治疗中一样得到了有效的使用，但是心理生活的流动却不是受梦构成的机制所管辖。即然意识相对来说是模糊的，因此就必须为理性的时空连续统一体提供某种替代物。这种替代物通常产生于作家自己的想法中，为了为读者提供有关环境的线索，作家们使用了众多的巧妙手法，这些手法有些是确有效用的，有些仅仅是矫揉造作而已。这个层次上最好的例子也许要算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和《喧哗与骚动》。

（四）“无意识”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文学风格和文学内容两者都试图同理性控制彻底决裂，并试图接近心理的无意识行为。在这最后一种情况中，理性控制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以潜意识压抑力的形式出现，但他们的作用首先是歪曲，而不是阻挡无意识表达的流动。在这个层次上，梦工作的机制特别有效，任何对实际时间或空间的参照都以弗洛伊德称之为“辅助阐述”的形式出现。这一形式的最好例子当然是乔伊斯的《芬内根的苏醒》，虽然康拉德·艾肯的《伟大的循环》^②有时也使用了梦的语言以发挥其作用。

虽然意识流小说早在弗洛伊德有关梦的著作或其后有关无意识的描述之前就存在了，但是，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促成了一种最初有限的形式的变体。要用对意识和无意识的参照测量任何一部确定小说的“流”的位置是有可能的。要决定对心理生活的

^① 潜意识这一术语在这里的应用完全是任意的，并不论证精神分析学中潜意识与无意识之差别。

^② 第86—161页。可以说绝大部分超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超现实主义诗歌）是在这一层次上创作出来的。

某种文学再现上的准确性，也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心理的一次准确录制就必然是了不起的，或者甚至是好的艺术。

对意识流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具有某些审美重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分析者在同艺术家合法作用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如果心理学领域和艺术领域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的话，治疗情形的准确录制——一部精神分析学的“病史”——就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弗洛伊德本人清楚地看到，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在考虑一位诗人所报告的梦时，我们可以经常假设，他已经把那些他感到不安和无足轻重的细节排除在外了。”^①对于一切可能因受欺骗而接受那些变幻莫测的艺术家们所报告的梦的优秀分析者来说，这是一个告诫。解决我们所关心的审美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一个“完全准确”的梦的报告，也许不象一份市场价格报告一样乏味枯燥，但它仍然还够不上好的写作。我们可以简要地回答这个问题：

精神分析学家和艺术家都可以把梦或其他接近无意识的方法作为合理的材料来使用。但是，他们其中一方的目的从根本上不同于另一方的目的。精神分析学家感兴趣的是严肃的事实；艺术家感兴趣的是富于想象力的阐述。一方也许会把移情之爱看作危险或对“治愈”的障碍，而另一方却会把它当成讽刺或悲剧的材料。但是，艺术家从科学家那里借来了他的工具，这种情形依然存在；疯狂任性的情怒，尽管可以被称为是神授的，但不能产生出伟大的艺术。

最后提出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颇为适当的。模糊晦涩到什么程度可以有助于修饰艺术，在哪一点上它不再是模糊晦涩的表达，而成为只是表达的模糊晦涩？我们是否应该仅仅由于一部作

^① 《释梦》，第378页。

品晦涩难懂就不去考虑理解它呢？当一位艺术家使用一种在他看来是揭示无意识的技巧时，他的作品通常是带有评论和解释的——正如病人的梦在其变成可理解的而不是意识的（因为尽管显梦对于醒着的头脑来说是荒唐的，它是有意识的）之前，需要大量的解释和阐述。也许阐述和评论是实验写作的不可缺少的伙伴，至少在此类阐明的手段成为读者自己的一部分理智装备之前是这样。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实验性作家在其作品中附加注解或为什么刊印在《转折》杂志上的《进展中的工作》在其以完整形式问世前的大约八年里引出了一部解释性的论文集？^①这样的解释也许既合理又正确；一旦一部作品最终引起人们有意识的注意，它将等待着人们对它实行基本的审美判断。与一切艺术作品有关的两个问题也就能在这里用上了：（一）艺术家是否理解了他的材料，他的材料是否用得明智而妥善？（二）使用的方法是否具有使之得到合理使用的美学意义？简而言之，艺术家不能使用其他材料而收到更好的效果吗？对于乔伊斯来说，我们至少可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

三

《尤利西斯》不是一份无意识的文献。它是具有叙述连贯性和严密情节结构的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客观陈述。在这部作品中，可以找到从传统的到无意识的所有层次的写作。但是，明显的审美事实是，它特别强调了外部世界冲击下的内部世界。乔伊斯一旦决定放弃固定叙述的普通原则，他就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创造性去寻找替代物。可以发见一些杜夏丹影响的痕迹，如在第一个情节中，我们发现斯蒂芬、巴克·米立根和海涅斯在吃早饭，后来

^① 塞缪尔·贝克特等，《我们对他为〈进展中的工作〉的词汇污染进行的事实创造的探索》（巴黎，一九二九）。

又发现他们在海滨。这里是对主题的清晰陈述：忒勒马科斯在家里，很不愉快，受到良心谴责的折磨，他准备好去从事一项他自己也不知道其所以然的追求。

那一天(一九〇四年六月十六日)的细节既不动人，也不是悲剧性的。从一切表面意义上看来，这是平平常常的一天，从早晨七点斯蒂芬的寓所马泰罗塔开始，到第二天清晨三、四点，广告承揽员以及让一位高傲的歌唱家戴了绿帽子的莱奥波尔德·布罗姆的家中结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① 斯蒂芬从他的学校校长那里领取了工资，过后又出现在图书馆里解释他有关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理论，在书店闲逛时看见了他的妹妹狄丽，又一次出现在产科医院，在那里他第一次同他的“精神上的父亲”布罗姆谈了话，然后离开产院去好几家小酒店进行了一连串的胡闹狂饮，在妓院历了一次险，得到了布罗姆的关照，布罗姆还表示要留他在家过夜。布罗姆以伺候他的妻子、他的猫和他自己吃早饭，开始了自己的一天，参加了派狄·狄格纳姆的葬礼，吃了午饭，为他的妻子到处找一本书，逛进奥尔芝德酒吧间，去给玛莎·克利福德写一封信，这是对他妻子通奸的一种悲哀的补偿，在巴尼·克尔南的酒菜店里，偶然碰见了爱尔兰鼓吹爱国主义的人，在海滨上与格蒂·麦克道尔调情，去了一趟产科医院，从那里跟踪斯蒂芬到妓院，照顾他并陪伴他到布罗姆家，在那儿他们喝了一杯可可，谈论了许多方面的话题，但却没那么多共同的兴趣；最后，他未

^① 有许多《尤利西斯》的概要可供读者参见：斯图尔特·吉尔伯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研究》(纽约，一九三四)；里查德·凯因，《惊人的旅行者》，(芝加哥，一九四七)；还可以参看里查德·艾尔曼，《〈尤利西斯〉的背景情况》，刊在《坎尼恩评论》，第十六期，(一九五四年，夏)，第337—386页，和休·肯纳，《都柏林的乔伊斯》(布鲁明顿，印地安那，一九五六)；菲利普·托因比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研究》，一文载西昂·肯文斯主编的《詹姆斯·乔伊斯，二十年评论集》(纽约，一九四八)，第243—284页，特别有价值。

能劝动斯蒂芬留下过夜，他爬上床去躺在毛利·布罗姆身边，他并非在那几个小时里第一个与毛利同床共枕。

然而，戏剧性表现在内在的冲突：这两个男人是在复杂的精神和物质背景下得到描绘的。这是客观处理过的内心世界的叙述。斯蒂芬和布罗姆的头脑整整一天都在徘徊——也就是说，他们的意识状态从完全控制摇摆到白日梦，再摇摆到无意识的幻想和幻觉。

由于《尤利西斯》在意识下面考察大脑的状态，因此，情节结构需要用迂回的方法得到表明；也就是说，它千万不能过分明显地闯入读者的意识。人们会在主题出现在后面的情节中时，抓住主题的重复，然后发现叙述的连贯性。一块肥皂的喜剧性主题（在一天里布罗姆一直把这块肥皂轮流从这个口袋放进另一个口袋，最后在“伊萨基岛”情节片段里把它拿出来用）的目的是作为一种次要的俄底修斯式长久历险主题，它与布罗姆的情感生活的联系对乔伊斯探讨他的性格是很重要的。同样，宣布美国福音传教士杰·亚历山大·道威抵达的小册子和有关客船“斯洛克姆将军号”被击沉的消息，也偶尔不显眼地重新出现在后面的情节里。前面的小册子也是时间顺序的一条线索，它被揉皱扔进河里了，在叙述的结尾处，它飘到海湾里，然后进入大海了。乔伊斯还使用词汇主题，这些词汇主题在潜意识头脑中重新组合时，以变化过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后面的情节中。例如，布罗姆头脑中波伏埃（菲利浦·波伏埃，布罗姆那天早些时候曾读过他的获奖小说）和普尔伏埃（敏娜·普尔伏埃夫人，她躺在医院里等待着她那说不清是第几个孩子的出生）两个人混淆的情形就是如此。因此，布罗姆那俄底修斯式的一连串冒险依赖于微妙而偶然的词汇结合：一个词每重新出现一次，都对当时心理的来龙去脉的意义有所增加，而且产

生了改变布罗姆意图、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方向的相互影响。^①

对这种叙述强度的要求如此之高(768页包含仅仅大约十五或十六个小时的内容),因此,时间和空间受到了心理世界的压力。空间价值经常完全中止了,同时性代替了连接性。时间对兴趣有益,它随着当时的要求延长和缩短——直到它夜城那一情节的幻觉中完全中止。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主要关心的是人物的充分发展;他坚持公正而客观,决不在人物发展中插进一般的线索,因为他认为读者有责任在布罗姆和斯蒂芬的思想过程中发现共同的兴趣。这样的人物塑造依靠的是意识的深度和内心状态的一致性,而不是外在行动和意图之间的平衡。意识和无意识两者的思想水平决定任何一个情节片段的文学风格。因此,在开场的几个情节片段中,人物用传统的方式描述出来,作者提供了副词和形容词,对话以小说创作的普通形式出现:“庄重的,肥胖的巴克·穆立根从楼梯顶口走下来,举着一只上面交叉放着一面镜子和一把剃刀的满是肥皂泡沫的碗。一件没有系腰带的晨衣在他身后柔和的空气中轻微地飘荡着。”(《尤利西斯》,第5页)

在“普罗透斯”一章中,斯蒂芬独自一人让自己的头脑在属于他自己心理生活一部分的那些想法中徘徊。事情不再由作者的控制所客观地决定,而是暗示着属于人物阙下世界的精神联想。“所有的带子都连结着所有肉体后部的绳缠绕的索。那就是为什么会有神秘的修道士的原因所在。你会象神灵一样吗?凝视着你的肚脐。你好!肯奇在这儿,请给我接通伊甸园村。A, A, 零, 零一。”一会儿,斯蒂芬的眼睛闭上了,时间和空间都消失了。精神价值制服了客观事物。词汇象事物那样得到处理。“总是试图下

^① 乔伊斯,《尤利西斯》,第156页,第366页。参见汉雷,《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词汇索引》,第391—392页。

结论的可怜的亲爱的阿立叶斯(Arius)在哪里？他一生中有很多时间都在同三位一体的和使化质的壮丽的犹太猛撞 (contrans-magnificandjewbangtanti-ality) 作斗争。这个注定要倒霉的异教的创始人。”(第39页)

在“卡吕普索”一章里，我们在前意识层次上遇到大脑(这次，是布罗姆的大脑)。外在的事物靠近意识，并暗示恰好处于日常生活意识注意之下的一连串想法。由于布罗姆是一个普通的人，还由于他在忙于相当普通的准备早餐的工作，这种强调并不深刻或具有悲剧性；思索是琐细的：“他们说愚蠢。他们懂得我们说的要比我们理解的好一些。她懂得她所需要懂得的一切。还是恶意的。不知道我在她眼里怎么样。一个塔的高度？不，她能跳过我。”(第55页)

这个有关“猫性”本质的独白，由于立即可理解和思想顺序松散而引人注目；代词先行词的转换是布罗姆自己的——从他们(一般指人们，大众的评价)到它们(指的是猫以及它们与人类的关系)。布罗姆独白的大部分是这类性质的。在“哈得斯”一章里，他与斯蒂芬的父亲一起坐在灵车上，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情敌布莱兹·博伊兰，感到慌乱而窘迫。他试图低头看他的指甲并回忆毛利的身体，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慌乱：

布罗姆先生反复看他左手的指甲，然后又细看了他右手的指甲。指甲，是的。他身上有比他所见到的更多的东西吗？魅力。都柏林最坏的男人。那东西使他生活下去。他们有时感到一个人究竟是什么。直觉。但是象那样的一类。我的指甲。我正在看着它们：成双成对搭配得很好。后来；独自思考。身体变得有点柔软。从记忆里，我就会注意到这一点。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以为当肌肉倒下来时皮肤不能收缩得那么

快。但是体型在那里。体型还在那里。肩膀。臀部。胖胖的。舞会礼服之夜。卡在面颊后面的女人衬衣。(第91页)

布罗姆这里对他自己思想的冥思苦想更加强烈，他的目的也是混合的。因此，意念的转换更快了，好象布罗姆是在躲避他不想承认的某种东西。从整个一段来看，人们可以注意到，他自己对女性的放荡的不适应，以及他对充分实现自己位置的追求的具体化。他注意寻找一个远离由于见到博伊兰所引起的情绪纷乱的物体。但是博伊兰总是在那里，从未直接提高过，他仍然决定了布罗姆有关他自己长相的那些话语的性质。独白是布罗姆受到打扰时的心理反映，也是努力回避这个任务——直接面对这一打扰的原因——的反映。面对事实吗？当事实面对着你时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回避与事实的直接冲突；当一个人远离它们时，再冷静地思考它们——最好是干脆不去想它们，或者用对一个人的衣着体型的琐碎思索去掩饰它们。

这些是“意识白日梦”的例子；但是布罗姆也有环境需要更有深度的独白的时刻。在“塞壬”一章中就有一个这种情况，在那里他在寻找马丁·坎宁汉的过程中，在一家酒吧间停下来，给玛莎·克立福德写一封信。他坐下来，看着雪白的信纸：

空白的一张脸〔那张纸〕。处女，应该说〔纸与玛莎·克立福德混淆了〕：或者只被手指碰过。在上面写点什么吧：纸页。她们会怎么样〔转到有关潦倒的妇女的里考〕？谢绝，绝望。保持她们旺盛的〔性欲〕。看到吧。玩弄她。嘴唇在下面。白种女人的身体，一个活生生的长笛〔性的音乐形象〕。软软地吹。大声吹。三个洞，所有女人。我没见到女神。她们想要它：面不是过分礼貌〔抛弃了的形象〕。那就是为什么〔博伊兰〕

弄到她们。你的口袋中有金钱，你的脸上有黄铜。眼对眼看着，没有歌词的歌。毛利那个街头艺人用的手摇风琴手。她知道他是说猴子生病了。或者因为那么象西班牙人。那个地方也可以理解动物。所罗门理解动物。自然所赐的天才。用口技发音。我的嘴唇闭上了。在我肚子里思考。什么？愿意吗？你？我。想要。你。去做。（第281页）

“哈得斯”一章的理性化在这里继承下去，但是这里表达更流畅了，形象流得更自由了，更少注意到外部事物了。最后一行的标点符号对表示停顿，以及对上下文所指意念的完整思索的欲望是必不可少的。减少了对琐碎分散精力事物的注意，增加了把它们付诸内心自我思考意愿的程度。（他在这思描画毛利，她急切地服从博伊兰的意志。）

乔伊斯最接近人们称为无意识的心理学参照系的地方是在“喀耳刻”这一章里。米德尔顿·默思先生把这一章称作《尤利西斯》的“瓦普几司之夜”，吉尔伯特把主题分成黑色魔术和幻觉。^①斯蒂芬离开了产科医院，他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在酒吧间和妓院里过夜。布罗姆跟踪斯蒂芬，最终在贝拉·科恩妓院找到了他。布罗姆的父性直觉通过他在无意识中，把斯蒂芬同他死去的儿子鲁迪相联系，而被唤醒。布罗姆的幻觉状态是由精疲力尽而引起的，斯蒂芬的幻觉状态则是由酒引起的。在这些影响下，布罗姆和斯蒂芬都产生了幻象，在这些幻象中，过去同现在和将来结合成一体，每个人的无意识愿望和焦虑都被赋予了伪装形象的形式。那一天的一切事件都以伪装的形式，同过去的一些事件相结合；斯蒂芬和布罗姆两人受到压抑的负罪感现在都在痛苦的戏剧中得到了表现。斯蒂芬以红衣大主教的面目出现，布罗姆以都柏林市市

^① 吉尔伯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第299页。

长大人的面目出现。肥皂出现在字谜游戏里，正如把它交给布罗姆的那个药商一样。布罗姆在“独眼巨人”一章中胆怯地暗示出来的所有社会理论都在他的无意识中变得惹人注目。在这个异想天开的场景过程中，乔伊斯在一个连祷赞美诗中总结了前面所有的情节片段，“爱尔兰的女儿们”背诵了这个连祷赞美诗。（第488页）那个以前只在一本小册子中和传单木板上的一条通告中出现过的亚历山大·道威，现在在布罗姆—斯蒂芬的无意识中，却成了一个幻觉的伊丽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在这个货摊上不许哇啦哇啦地讲话……弗洛里·克里斯特、斯蒂芬·克里斯特、佐伊·克里斯特、布罗姆·克里斯特、基蒂·克里斯特、林奇·克里斯特，感到那喜剧的力量适合于你自己。我们在宇宙旁边有冰冷的双脚吗？没有。站在天使这一边。做一个棱镜……”（第496—497页）

布罗姆的父亲出现了，他是布罗姆无意识中的羞愧的象征，斯蒂芬的母亲，她想象中对斯蒂芬的不满形成了一整天的那些次要负罪主题中的一个，重新开始了她的抱怨，作为斯蒂芬的良心在行动着。性别角色的倒置出现在妓院老鸨贝拉·科恩（她变成“贝罗”）和色情受虐狂布罗姆之间。（从第517页开始到后面）

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有几点是很清楚的：（一）幻觉必然是由那一天事件的各种变体组成的，这些事件对于斯蒂芬·达德路斯和莱奥波尔德·布罗姆来说，有些是无足轻重的，另一些却是有重大意义的^①；（二）各种情结、惧怕和性格上的不足都在对无意识的作用面前得到了戏剧化；（三）尽管有了戏剧性的形式，但语言得到了调整，以适应无意识环境的强度。虽然乔伊斯为了表

^① 弗洛伊德作的“精神价值的评价转换讲演”，《释梦》，第285—288页，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象一块肥皂和福音传教士这样的琐事得到了荒唐的高度重视，同它们在那一天的事件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失去了正常的比例关系。事实上，肥皂、福音传教士以及其他显然毫不重要的细节在全书中享有一种偶然的重要性。

现这个夜城情节片段，并不需要任何有关精神分析的研究，但他也在这里很明显还是利用了一些精神分析的实例。这一章不仅仅是“黑色魔术”；它对子女—性欲的主题、良心负担和贝罗—布罗姆事件色情虐待狂的采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对无意识的一种理解，以及对存在于其中的压抑材料的文字上的再现。

另外，毛利·布罗姆那长达四十四页的白日梦并不接近无意识的语言。的确，她十分清醒，十分活跃。然而，应该注意到，愿望及其意识满足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对于她来说，是微不足道和不起作用的。她也许被看作是天真幼稚欲望的文学示范，她满足安逸证明了一种摆脱出在社会上罕见的束缚的自由，这是许多人暗地里渴望得到的。没有任何标点符号表明，她摆脱出社会交际礼节平常对她的轻微束缚。与布罗姆拨奏曲式的苦思冥想形成对照，毛利的思想不停顿地从现在和过去中流过。她的思想随时都得到夜晚景色和声音的补充，只是当她最后安顿下来睡一晚上觉时，它才从她肉体兴趣的制约中松弛下来。因此，尽管用一个连续不断的松散句子的手法令人羡慕地适用于这一时刻，但这种风格并没有任何特别不寻常的地方；跟踪她的思想动向并不困难，因为一个主题，“普遍的是”，每时每刻都在控制着它。

四

然而，汉弗莱·奇姆普顿·厄尔维克的梦却是无意识生活的完整概观。弗洛伊德在《释梦》第七章中所解释的一切方法在这里都得到了运用。事实上，它是一整套连续的梦，这些梦的心理强度不同，它们的目的也不断重复变化着，并且包括了人的全部生活。汉弗莱·奇姆普顿·厄尔维克“梦日”的材料仅仅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乔伊斯的丰富学识和他一生中对流亡主题的专注使人们相信，他自己同厄尔维克共同具有这种梦境状态；实际上，乔伊

斯就是杰丽，凯文的孪生“作者”。包容了如此之多的材料，尽管不可能成为即使象厄尔维克这么不同凡响的小酒馆老板生活的一部分，但这一情况由于两个原因而得到解释：（一）这个梦与某种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原始象征残余物有关联，这些远古的象征经过多少个世纪持续下来，是一切民族的共同遗产。这是一个信手拈来的借口。（二）象其他人一样，维柯也把他的历史循环理论贡献给了厄尔维克的梦。

换句话说，厄尔维克是一切人的普遍代表，“人人都来了”（第32页），他那无意识的梦的生活继续着“凭着逝者和来者以及他们的大灾难起誓。一切人。”（第419页）梦走的“维柯之路”——这里指的是靠近厄尔维克工作地点的一条实际存在的路——同历史的三循环模式相吻合，在这个模式中，人类从原始生活经过复杂生活，再到放荡生活，从那以后再回到他的原始起点：

开始时是雷：雷使宗教以它最客观、最无哲学意味的形式获得解放——崇拜偶像的泛灵论；宗教产生了社会，第一批社会的人是史前的穴居人，他们要逃避性情暴躁的大自然：这种原始的家庭生活从受到惊吓的流浪者那里第一次得到了要求发展的刺激：应该承认，他们是最早的奴隶：长得强壮而有力，他们需要耕地的特许权，专制便卷入了原始封建主义：洞穴变成了城市，封建制度变成了民主制度：后来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因独裁的返回得到了校正；最后一个阶段是相互毁灭的倾向：国家被解散了，社会的长生鸟在国家的灰烬中再生。^①

只有当作者把一种异化理论加在一个普通人的头脑中时，他

^① 贝克特等，《我们的审视》，第5页。

才能情有可原地自由处理这个梦——如果他仅仅是要证明这个普通的人当他几乎没有被他平常一天的事情所扰乱时，是所有人的原型。为了找到这种神话和梦的内容的混合心理学基础，乔伊斯便求助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为了找到做梦时的大脑机制，他完全依靠弗洛伊德。象在《尤利西斯》这个例子中一样，乔伊斯有许多分散开来的线索，这些线索使读者能够标出他的进程。其中的一个线索是厄尔维克¹的口吃；另一个是不断玩弄的基尼斯黑啤酒一词的文字游戏；第三个是一系列迭句，尽管这些迭句在梦的工作过程中总是被歪曲，但仍旧保持着它们同整个部分最初的联系。

这就是意识流最彻底的文学应用。我们已经注意到潜梦的内容(梦思想和梦愿望的无意识源泉)，正如它在显梦中寻求表达要产生很大程度的多种变化和伪装。浓缩、替代和戏剧化的方法在这里都出现了，但是，真正强调的重点在于词汇能唤起梦的形象，并能代替在真正的梦中那么强烈、那么必需的视觉内容的力量。在《尤利西斯》的“喀耳刻”一章中，斯蒂芬和布罗姆受到抑制的愿望和恐惧被戏剧化了；舞台说明为潜在内容提供了充分的视觉强调。这里，词汇象事物那样得到处理，在所有视觉形象没有得到梦境本身充分对待的例子中，声音代替了视觉形象。在这儿，乔伊斯广博的外文知识帮了他的忙。这为他提供了赞同梦的一个语言习做的机会，这个习惯是用一个词的词源学意义代替它的现行意义，如果它的现行意义太抽象而不能充分表达出来的话。下面是玛格丽特·施劳奇所举的这种方法在应用中的一个例子：“希望得到恩惠的人”(the “gracehoper”)有一付“‘找到的帆布篷在底下定住他’”(“pair of findlestilts to supplant him”)[在这个例子中]作者提醒我们‘代替’(subplant)的词源意义是‘在下面种植’(to

plant under), 而不是现代的‘取代’(supplant)。”^①

“词汇”作为把厄尔维克的梦生活与人类的种族史结合起来的
的有效性在哪里都不如在“安娜·丽维娅·普鲁拉贝拉——美妙的
重新生活”(Anna Livia Plurabelle)一章中得到最好的展
现。(第196—216页)。在这里,我们通过两个在河岸上洗衣服的妇
女的窃窃私语得到了一条河(利菲河)在源头流向它与大海的结
合处的印象;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变老了的故事,通过语
义的转换,对世界上所有河流名字的浓缩;榆树和石头的象征,
表示生命和死亡,它们一直存留在以后的正文中。

《芬内根的苏醒》的目的很清楚,是要把梦的生活用词汇展现
出来。施劳奇小姐认为作者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

在我看来,为了这一独特任务所选用的语言学媒介特别
合适。它是一个象征的媒介。多语义言语表达的语言获得了一
种可以同一个梦的多种形象相提并论的效果,尽管它采用了
梦所不能采用的言语。^②因此,一位梦的天真叙述者毫无疑
问是无意向倾听他叙述的一位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学家暴露
出一个词的整个涵义的。^③

① 玛格丽特·施劳奇,《詹姆斯·乔伊斯的语言》,刊登在《科学与社会》,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406页。

② 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对话确实在梦中发生,讲话也可以再现出来,尽管它们并不表现梦中的任何实际的理性活动。

③ 施劳奇,《詹姆斯·乔伊斯的语言》,在上述引文中,第487—488页;参见特假斯考特,《具有想象力的头脑》,第304—315页。迈克尔·斯图尔特,《乔伊斯先生的词汇创造物》,刊登在《专题论丛》,一九三一年第二期,第459—467页。卡罗拉·吉狄那—威尔逊,《〈进展中的工作〉》,詹姆斯·乔伊斯的语言学实验,刊登在《过渡》,第十九期到第二十二期,第174—183页;阿奇博尔德·A·希尔,《一位语文学家看〈芬内根的苏醒〉》,刊登在《弗吉尼亚评论季刊》,一九三九年第十五期,第650—656页。参见肖恩·奥弗莫兰在“几乎是音乐”中的抱怨,刊登在《措辞与符号》,一九二九年第二期,第178—180页(对“美妙的重新生活”的评论),以及斯托尔教授的反对意见,《从莎士比亚到乔伊斯》。

在浓缩和替代这些术语下结合起来的梦的生活的语言习惯全都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一个词的模糊意义正如适用于浓缩的目的，显梦因此很可能包括许多为施劳奇小姐称之为“多语义的言语表达”的实例。双关语和混成词正如弗洛伊德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对于梦来说并不生疏；它们组成了乔伊斯的一种主要方法：“当然了，所有谐和的喧闹全都带着最大的快乐参加进来了。”和“空白中间的的一和一种红酒的空间，他住在那儿之前，曾是一个穆克西(Mookse)”(第58页)在后来的段落里可以注意到现代英语、中古英语和德文的结合使用。没有能力接受抽象事物的梦把“进入事物中心”转变成“在迈达斯的芦苇中”(第158页)；在另一个例子中，它使用同样的方法(把一行宗教诗天主教认罪经的第一行)转变成一个掩饰性参照，

是我的过失 是我的过失
让他占有，让他占有她，
是我最大的 过错
让他混和和充分地占有她！(第238页)

爱尔兰语中“威士忌”一词(这是唤醒芬内根们的一个词)用在这一行中有双重意义，“威士忌往昔的奥康纳的啤酒”(第319页)其意义可以翻译成“狂饮威士忌(usqueabaugh)的疯狂的(或从前的，或同性恋的)爱尔兰人奥康纳”。当商恩抵达女修道院发表他的“假布道”时，姑娘们“对他的纷乱表现出姑娘们特有的大惊小怪”(第430页)。从头到尾，莎士比亚的诗行在梦的结构里都受到了歪曲：“在海洋中吃饭，或是命运暴虐的男孩和错误，这两件事，哪一个比另一个更高贵？(Where it is nobler in the main to supper

than the boys and errors of outrager's virtue.) (第434页)① 有时，对音节进行这样的游戏可以随时暗指掩饰的愿望：“我将始终被严格地禁止，并以我自己的方式忠诚，私下里，我将长久长久地同一个对你忠诚的人一样，对你保持忠诚，我从未有过一次对他忠诚，而他从没有一次出卖过他自己”。(第459页)这里，厄尔维克和儿子离恩(凯文)和女儿艾索贝尔的复杂的、掩饰的乱伦关系最终是通过“我”(“ay”)声音战胜“你”(“ue”)，让乱伦概念滑过了潜意识压抑力的控制而得以暴露的。

显梦在防止专有名词的困难和使它们的声音适用于当时意义方面也表现出了可观的独创性。乔伊斯对这种方法的使用具有双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把神话转化成梦的生活。它经常是形成神话和当地事物的结合点的手段。

没有水桶喷嘴和基尼斯黑啤酒小酒店(第24页)

(奈蒲卡特奈扎尔)(基尼斯黑啤酒小酒店):

凭她自己的资格就够得上克里奥巴特拉式的人物……

(第166页)

莎士比亚(Shakespeare)名字的种种歪曲也出现了：“粗毛的镜(shaggspick)，摇动他的胡子(shakhisbeard)，支票对儿(scheekspair)，伟大的模型球(great shapisphere)。”(第117页，第191页，第295页)。歪曲也许暗指对原著的一种态度——如“以色列人的欺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第331页)；或者它可以提供解释一个寓言的关键，例如，“希望得到恩惠的人”，“由于忧郁而悔恨”——这个词组指的是在奥格斯堡(Augsburg)议会达成的妥协”(第416

① 参见对波洛涅斯的滑稽模仿，第三部分，第579页。

页)。

梦实行的下一个服务项目是以歪曲他的名字和他个人面貌的方法来掩饰自我。由于H、C、E这几个字母既代表着那个当地小酒店主人又代表着神话的每个人，因此这个伪装特别适合于乔伊斯的目的。它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通过歪曲名字本身；(二)通过用姓厄尔维克的声音来作游戏。

第一类情况的例子很多：哈路恩·蔡尔德瑞克·艾格波斯；霍克·科区米·艾；霍克斯·克罗克斯（“他的第一千零一个名字”）；霍奇基斯·卡尔瑟·埃弗雷蒂；赫里·克拉斯·埃弗霍蒂；哈夫斯·察尔狄斯·埃弗雷威尔。第二种形式从厄尔维克的本源意义——土蚘派生出下列意义：在作梦者耳中嗡嗡叫的一种恼人的蚊子般的小昆虫；法文钻头耳朵(perce oreille)被用来作为另一串掩饰名字的基础；珀西·奥里雷的民谣；珀塞里雷；珀西奥罗维尔；皮尔斯(pearce)演说，等等。

我们通过做梦者时而发出的“头脑清楚的评论”开始意识到梦强度的转换；当蔡明来到，光线打扰了睡眠者，或钟声穿过睡眠者的意识的时候，这种情况特别清楚。在梦的开头，还没有彻底睡着的厄尔维克害怕打扰安：“艾塞，现在，你这个你画的人，和你的膝盖一起静静地躺着，你息吧，尊贵的大人！”(第27页)后来，他梦中的自我听到报时的钟声，但很快就重新调整了自我：“十二，两个小精灵，凯特尔，十(不会是这样)六。”(第403页)全部描写安的梦生活的最后一部分表现出从梦到意识的过渡。房间里的物体，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的孩子们都抛弃了梦境中的畸形，象在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事物一样出现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整个梦的乱伦主题所暗示的东西以真实的词语出现了：“你在变化，我的脉搏，你在变化着离开我，我能感到。或者我是吗？我开始糊涂了。”(第626页)。这就是说，厄尔维克同他妻子的爱情生活已经过去了，

他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孩子们的生活。但是安(安娜·丽维娅·普鲁拉贝拉)的爱情精力将在她所有孩子们的爱情生活中持续下去：“我可以在他们当中看见我自己，美妙的重新生活(allani-uviapulchrabelled)”(第627页)。

这些词汇和声音的实验对历史的和心理的主题有益。由于无意识既意识不到时间也意识不到空间，^①因此乔伊斯可能采用同时性去代替事件的通常顺序。因此，能够进入厄尔维克和他妻子梦境生活中的合成人物形象都是置于现在之上的历史的或神话中的人物。“读者必须准备时而同时想象几个相连系的形象，并且要意识到，这些形象不一定要由表面明显的连系链条密切连接在一起，但是它们的范围可以包括政治史或宗教史、传奇、寓言、神话、科学、数学、当前的事件等领域中任何所需要的论点。^②

乔伊斯大约十五年的努力导致了种族和个人无意识的复杂描写。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评论家在试图解决这个“从容的内心独白”(第119页)时将遇到的困难。他对这种方法的解释可以在正文中找到：

(……对他的语义学兴趣日益减少，让许多下意识的窃笑慢慢地流过他们面前)，无意识地解释，例如，带着一种濒于神经错乱的过分注意细节，他用错的所有不同外语词的词类的各种意思，钩墨鱼故事中关于其他所有人的无法缩小的谎言，当然是带有前意识的不要那些把他逼入绝境的简单的狼和瘟疫和毒药直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打瞌睡的人。但是在轻快的苏格兰双人跳舞的脚后跟被胡言乱语的朗诵彻底搞醒悟

^① 参见弗洛伊德，《新介绍性讲演》，第三十一讲，第104页；更严格地说，伊底完全是无意识的。

^② 贝克特等，《我们的探索》，第156页。

了。(第173—174页)

换句话说，他允许自己对阔下世界的兴趣打乱对准确语义学的重视，以一种几乎是专横的对细节的注意，搞乱了句法，引进了外文中的词汇和意义——有意地排除那种也许会使他的评论家息怒的简单的叙述风格。结果是，他成功地引进了一堆花样繁多的语言学怪现象，历史的断片残迹，“……葡萄干花卷式的一时流行的双关语，土豆泥式的语录，一份浓汤式的混乱的格言，不可怀疑的卫生纸式的无可非议的争端论文……(once current puns, squashed quotatoes, messes of mottage, unquestionable issne paper…)”。(第183页)如果有人希望花费精力去清理这些“所有室内制造的音乐的倒置”，那么他便可以识别“旋转的伊斯兰教托钵僧……在他自我之上的自愿流亡……在家具上写他自己的秘密”(第184页)。^①因此，这种词汇的炫示，这“在大家忍住的笑声之中闪烁”(第190页)是具有意义的，而对弗洛伊德梦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这个意义——但并不仅是那一点。“他的低贱的身份”(lowquacity)(第424页)^②还需要对词汇声音的音乐的耐心注意：“……如果耳朵常常抓住那些没有任何眼睛毋宁悲痛的事物”(第482页)。词汇的有知觉的力量是理解的桥梁；它模糊的结构对解释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线索，并且在乔伊斯看来是复杂的但却紧缩的人类历史的适当表达工具。这就是向评论家提出的挑战：他要是只满足于词汇意义而没有掌握每一个词和每一个词组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涵义的话，他便是个蠢人。那些把毕生精力都用来“使一头骆驼穿过一个小点儿的眼睛”(第120页)的人在这里是找不到乐趣的。

① 当然，这是厄尔维克梦见他的儿子克丽(“作者歌姆”)。

② 这里凯文(“活泼的杰恩”)在议论他的兄弟杰丽。

五

二十世纪对性调节问题的具体的临床态度不仅仅是巧合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评论家们是多么哀伤地提起“旧日的好时光”，那时性在事情的计划中有它合适而体面的位置。弗洛伊德之所以得出精神病绝大多数起源于性问题的结论，是因为他的临床经验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具有压倒之势的证据。他指出，文明教育中的一个中心阶段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候：自然和社会合作，使儿童的兴趣从性事物上移开，从而转向适应环境的教育。如果这个教育太严厉了，升华很容易会给抑制让位，性表现的正常出口就会被关闭。

乔伊斯处理性主题是他对无意识兴趣的直接结果。受到压抑的直觉欲望除了无意识之处外没有任何其他去处；这也适用于那些并不属于性问题的伦理—社会处理的方面。正如弗洛伊德解释的那样：“由于文明带来的压抑，许多原始快乐现在都因受到检查而丧失了。但是人类精神发现放弃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我们发现童向机智为我们提供了使放弃倒退，并以此作为重新获得所丧失的东西的手段。”^①对海淫的苦恼和乐趣是某些平常作用的标签，还有悉心训练出来的对天性的压抑之结果。当这些受到抑制的材料从无意识中释放出来时，我们便感到羞愧、震惊和有趣。《尤利西斯》和《芬内根的苏醒》中的海淫事物存在于其中是因为它们是无意识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后一本书里因为精神检查官经常比法律检察官更有力而得到了更有效的伪装。

乔伊斯对都柏林的爱情描绘既缺乏好莱坞通常赋予它的浪漫光泽，又缺乏教士们经常用来表示其特性的羞耻。《尤利西斯》中的通奸看起来至少具有一种客观描述所给予它的似乎合理性。乔

^① 《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第 697 页。

伊斯明显超越了对卖淫和婚外生活不检点的现实主义描写范围。他对人物目的的概念承认了精神分析学所确定的人性关系的所有基础。在《尤利西斯》“喀耳刻”一章中，这些受到压抑或仅仅部分表露出来的意向都被赋予了戏剧性的表现。^①在毛利·布罗姆的独白中，这些事情的现实意义通过“永恒的肯定”达到了高潮：“我想那就是妇女假定在那里所要做的，不然的话上帝就不会象他已做的那样把我们创造得对男人有如此的吸引力……”（第765页）

莱昂内尔·特里林曾经谈到家庭主题是乔伊斯对弗洛伊德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应用。斯蒂芬对他父母的模潮态度，可以在他对过世母亲的与惧怕相混淆的轻蔑中清楚地看出来。他拒绝在他母亲临终的时候跪下为她祈祷。那个拒绝引起的负罪感在故事中的那一整天都萦绕着他，并在喀耳刻一章中达到了高潮。

（斯蒂芬憔悴消瘦的母亲戴着凋谢了的桔红色花朵编织的花环，披着撕破了的新娘披纱，穿着麻风病患者般的灰色衣服从地板底下僵硬地爬起来……）

斯蒂芬：（因惊吓、悔恨和恐惧而噎塞）他们说杀了你，母亲。他触怒了你的记忆。是癌症干的，不是我。命运。（第564—565页）

最终导致布罗姆与斯蒂芬相遇的寻找从两个方而得到了激发，斯蒂芬对他自己父亲的厌恶和布罗姆对他儿子鲁迪之死的自责，布罗姆认为鲁迪的丧失对鼓励毛利的性欲历险以及证明其合理性是应负责任的。

在《芬内根的苏醒》中，厄尔维克一家是乔伊斯一般描写人物的焦点。厄尔维克，一位大约五十或六十来岁的人，在都柏林

^① 参见埃德温·B·伯格姆，《尤利西斯》和个人主义的死胡同》，刊登在一九四一年《弗吉尼亚评论季刊》，第十七期，第564页。

开一家小酒店；她的妻子安失去对他的控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有三个孩子：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女儿艾索贝尔和两个年轻的孪生兄弟凯文和杰丽。厄尔维克一心想着他的孩子们。他以往对他妻子的爱慕之情现在很容易转移到他女儿身上。他对一个儿子凯文(商恩、活跃的容恩)的钟爱不免有同性恋之嫌。乱伦主题第一次出现是当厄尔维克伪装成特里斯特拉姆向艾索尔特求爱之时(第一部分)。艾索尔特的名字在那天晚上呈现出多种其他形式的伪装。乱伦禁忌主题和同性恋禁忌主题这两者的高潮出现于凯文和艾索贝尔都出场的第三部分。凯文和厄尔维克都对随后来的“审判场面”很重要，在这个“审判场面”中，厄尔维克被他的儿子控告为犯有乱伦罪。

乱伦主题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得到伪装。梦指出它是“那样的具有分析可能性！”(第299页)——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学揭示出它是家庭联系的自然后果。它的进一步伪装的论据可以在“那些来自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的阻止影响”(第363页)的提及中找到。交给厄尔维克的“审判”宣判他与他的两个孩子犯有乱伦罪：“有鉴于敬畏，他们发现他犯有他们的和他的两条白色大腿的相互关系那些私通交媾之罪……”(第557页)①

《尤利西斯》中，毛利·布罗姆的独白和“安娜·丽维娅·普鲁拉贝拉——美妙的重新生活”中的对话表现了乔伊斯对妇女性欲重要性的称颂。安娜·丽维娅·普鲁拉贝拉既是滋润土地的利菲河(the River Liffey)，又是生儿育女的妇女。正如厄尔维克

① 对同性恋、乱伦以及其他堕落的涉及包括：第二部分，第215页，第238页，第279页，注释1，第297页；第三部分，第318页，第342页，第349页，第352页，第364页，第411页，第414页，第419页(对奥斯卡·王尔德的提及)，第422页，第431页，第433页，第435页(“匿名信”)，第449页，第454页，第461页，第466页，第480页，第499页(“俄狄浦斯王”——既是对厄尔维克的身体面貌的涉及又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涉及)。

既是哈夫斯·察尔狄斯·埃弗雷威尔，又是“任何一个人”，还是安姆弗雷公爵一样，安娜·丽维娅(Anna Livia)象征着永恒的女性：“安娜(Anna)过去是，维娅丽(Livia)现在是，普鲁拉贝拉(Plurabelle)将来是”(第215页)。毛利和安娜·丽维娅都是贪欲好色，“淫猥的”东西——可以加入著名淫荡妇女画廊中的两幅肖像。虽然后一幅肖像可以看作是对感伤主义者的滑稽模仿——就象《尤利西斯》中的“瑙西卡”一章一样——，乔伊斯在这里大概是最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最感兴趣于声音和形象之美的：“她曾经的确是一个年轻、瘦弱、苍白、柔软、腼腆、苗条的姑娘，在银色的月亮湖畔漫步……”(第202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乔伊斯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尽管当然不是他的中心兴趣，在决定他最后两部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上却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他把梦的工作，特别是词汇的暗指性模糊看作是实验性写作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二)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都更多地注意到个人从意识中退出的几个阶段和与每一种情况有关的美学问题。(三)他认为大部分人物动力通过诉诸精神分析学对家庭关系的解释比起诉诸任何其他方法来，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乔伊斯并没有被他那无意识生活的力量所束缚或囚禁。他是一位非常认真、勤奋、“自觉的”作家，他注意到现代心理学并对它感到兴趣，然而，他毕竟还是没有受它支配。无论我们批评乔伊斯对精神分析学应用得不准确还是干脆谴责他应用了精神分析学，我们都会极大地损伤审美意识的完整。对他的艺术的衡量标准不应是任何科学家的判断，而应是对他所采用的那些他认为在审美上吸引人并且适用的材料的分析。在这样的分析中，有关精神分析学的知识对读者和评论家都有帮助。

第六章 劳伦斯与弗洛伊德的争论

一九三九年五月，当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在伦敦达克沃斯出版时，人们就指出，劳伦斯是一位对乱伦恐惧和俄狄浦斯情结这类精神分析问题具有特殊见解的小说家。然而，那本小说毕竟是在劳伦斯真正了解弗洛伊德、并在书信中提到弗洛伊德之前就写成了。这类对《儿子与情人》的弗洛伊德主义评论充其量是被夸大了。《儿子与情人》表明，除了能有助于分析人物的自己的理论之外，劳伦斯并不需要任何理论。最重要的是，劳伦斯的全部作品不管也许包含多少“异化理论”的暗示，最终仍涉及了他自己的经历。

我们考察劳伦斯的阅读习惯时，就会发现，他对同时代人提供了一切东西，或者热心或者抱怨；我们发现，他的阅读兴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在他生活中某一特定时刻，只要能得到什么书，就读那些书；碰上什么样的特殊情绪，就读哪一类书。他从来都反对理智的分析，但是在早期生活中尤其如此，却在《儿子与情人》中和尤尼斯·坦普尔（杰西·钱伯斯的笔名。——译者）为笔名写的《个人记录》中所描写的那种生活。正如尤尼斯·坦普尔所描写的那样，劳伦斯早年的意识经历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从T·H·赫胥黎和海克尔到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在他的全部阅读中，他似乎是在摸索可以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导原则而掌握的东西。在他的探索中，连哪怕最少的一点学究气或学者风度

都没有。”(第112—113页)

劳伦斯的阅读是零星的，其原因有两个：他漫游世界各地的习惯使他只好依靠手头所能搞到的书；他用感情而不是理智去衡量一切影响的习惯。如果说劳伦斯肤浅，那就忽略了他思想中的某些重要的个性决定因素。他对理智及其愤世嫉俗和“无用的牢骚”抱不信任的态度，这就为他提供了攻击“善行的学术职位”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这一否定中，不仅仅是严格怀疑的头脑，而且连严格的逻辑头脑都受到了折磨；那些似乎有话对他讲的人，或那些与他按着同样思路讲话的人也遭到拒绝。比如，柏格森使他感到厌倦：“他使人感到有些浅薄。”^①

他因此应该看起来是他那个时代最彻底的反理智者。但是，人们必须用自相矛盾的话去谈论这位自相矛盾的人物。“劳伦斯拒绝一切”这一说法必须和这一判断联系在一起：“劳伦斯什么也不拒绝”。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东西。他在他对周围理性世界的一切反应中都采取一种既接受又拒绝的不满的矛盾心理。他用这种方式回复任何影响，但绝不是由于头脑的一般变幻无常。因此，说劳伦斯受到弗洛伊德或柏格森或尼采的影响则是错误的，人们只能说“劳伦斯受到劳伦斯的影响”。为了弄清楚影响问题，还应该指出另一点：他经常把阅读用来作为感情状态的测验；同样，他经常依靠写作来“使大脑清醒”。霍拉斯·格雷戈里指出，劳伦斯有关精神分析学的两篇文章正是以这种方式受到触发的，写这样的文章为他提供了检查他对结果的确信手段，并且……通过这个过程，他有了象地图一样展现自己能方因而可以评价(用他知道如何去做的唯一方式)信念的存在价值。”^②

^① 致麦克里奥的信，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收入《劳伦斯书信集》(纽约，一九三二)，第121页。

^② 霍拉斯·格雷戈里，《〈启示录〉的香客》，第58页。

劳伦斯的阅读总是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他象测量人那样去衡量书；对他来说，它们之间若有任何差别，那也将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例如他对约翰·米德尔顿·默里的评价，就既非从默里的思想方面，也非从他的文学或批评才能方面着手，而几乎完全是从默里能同他“合得来”这方面着手——即，要富于同情地进入劳伦斯的情感生活。他们思想上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劳伦斯的敏感性是有生气的：这种差别是气愤的情绪和温怒内省之间的差别。默里固执地坚持那些经受过考验并能满足他趣味的批评范畴；劳伦斯则从一开始就强调一个有生气的个性和主观的法庭，在这个法庭上，各种观点——任何观点——都应受到审判。因此，从一开始起默里就承认，他不能理解劳伦斯，“劳伦斯的观点对我来说相当难以把握，因为他以一种奇怪的象征意义上应用各种词汇，对于这种奇怪的象征意义，我是茫然不知所措。”^①

就我们所确定的东西来说，劳伦斯对弗洛伊德发生兴趣时，正是他旋风般地追求弗丽达的同一时间。弗丽达解释过她自己对弗洛伊德的兴趣，这一兴趣在她和劳伦斯认识前刚开始产生：“我刚刚遇到弗洛伊德的一个卓越信徒，我头脑中装满了没有消化的理论。这个朋友帮了我许多忙。我曾经在传统的老一套生活中象个梦游者似的，他唤醒了我自己真正自我的意识。”^②劳伦斯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弗丽达对“德国事物”的热情；在他不久后（一九一二年）去德国的旅行中，他有时间探索她祖国的语言和文学。人们只能猜测，弗丽达自己的个性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儿子与情人》的修改本；但有足够的理由说，那本小说中的“米丽亚姆”失去了

^①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劳伦斯回忆录》，刊登在《新阿德尔菲》第3辑（一九三〇），第270页。

^② 弗丽达·劳伦斯《不是我而是风》（纽约，一九三四）。

对劳伦斯的控制；结果，小说在细节和角度上都做了改动。^① 在最后定稿本可以交给出版商之前，也许是在修改过程中，劳伦斯听取弗丽达对弗洛伊德的解释，并同她就弗洛伊德对现代思想的贡献进行了争论。弗丽达在她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给我的信中，告诉我说：“真的，劳伦斯在撰写《儿子与情人》的最后一稿之前就了解了弗洛伊德。我不记得在我们1912年相遇前他是否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或者听说过他。但我是一位弗洛伊德的忠实崇拜者；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劳伦斯的结论或多或少是这样的：弗洛伊德从医生的角度过分看重性了，弗洛伊德的‘性’和‘利比多’太局限了，而且太机械了，因此其根源是更深的。”

这些争论和讨论可能至少在一个方面影响了《儿子与情人》的最后结构：劳伦斯可能增加了小说中对母子关系的强调，因而忽略了其他东西，并使之在出版了的书中显得十分清楚。但这种关系在劳伦斯最后修改书稿之前早就存在了；而且他没有允许任何临床或心理学的评论干涉小说整体上卓越的文学价值。《儿子与情人》的修改远不止是受到了劳伦斯接触精神分析学的表面化影响，这一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弗洛伊德主义对劳伦斯成长的后期才发生影响。劳伦斯对精神分析学家的影响，完全是另一码事。批评家们欢呼，《儿子与情人》是到那时为止英国文学中对俄狄浦斯情结最深入的研究。劳伦斯对精神分析学开始感到高兴而有趣，后来变得很感兴趣——仿佛他预示过它，因此指望它值自己头脑清晰似的。大卫·伊德医生开始参加“劳伦斯之夜”，着手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严肃的讨论，特别是因为它影响了对《儿子与情人》的解释。劳伦斯带着他通常的强烈兴趣研究了精神分析学，但是很快就对它的“实验室气味”感到失望。他反对它的分析习惯，因

^① 出处同前，第56页。最后一稿“在弗丽达的帮助下”写于意大利加尔加诺。

为这种分析从来“不干涉一个人的感情”；他抱怨说，精神分析学家“只能帮助你更完全地创造你自己的感情。他们从来就无法让你有真正的感情”。

二

然而，《儿子与情人》在精神分析学界引起的激奋并没有促使劳伦斯全心全意地接受弗洛伊德理论，但它的确给了他一些思考的理由。他开始时急于想指出《儿子与情人》中所描写的经历是“正常的”，但他却仔细地注意精神分析学了——也许在等待着某种可以证明它们是谬误的方式。他在自己的两篇论文《精神分析学和无意识》（一九二一年）和《无意识的幻想作品》（一九二二年）形成了他的“存在理论”，这时似乎机会到来了。他在文章中明显地征服了精神分析学，并给它贴上了贬低性的标签：“科学的”（scientific），但是他并没有让精神分析学安宁；他的书信和书评几乎直到他去世时还不断提及这门新的心理学。写完《无意识的幻想作品》后，他在两个基点上证明，他抛弃精神分析学是正当的：（a）它只是一个不值得认真考虑的“时尚”，（b）它没有说明组合联想（group-association）的问题，但是却在力量悬殊的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把医生的自我牢牢固定在病人的自我之上。

他写给梅波·多吉·卢汉的信作为他最早反对的证据，这是最有启发意义的。他写信给经历过多次分析的卢汉夫人说：“我相当仇视整个疗法——医生、治疗物和其他一切，我相信，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几乎是个魔鬼，但一个治愈了的精神病患者则是一个十足的魔鬼……我宁愿那些精神病患者死掉才好。”^①当劳伦斯听说她对荣格感兴趣时，他显然十分不满；她在下面这段话里记

^①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信，收在卢汉的《道家眼中的劳伦斯》（纽约，一九三二），第13—14页。

录了他的愤怒：“更多的努力去了解和理解！更多的系统和更多的意识！他所想知道的一切是流(flow)而不是去了解它的情况！”^①他十分敏锐地认识到卢汉夫人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原因——她对“新”经验的永不休止的寻求：“在我看来，它完全是虚假的病情检查和对歇斯底里的疯癫的引诱。我知道隐藏在它后面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同样要在意志和头脑中占有一切的不体面的欲望。生命本身来自另一个地方。”^②

劳伦斯的确似乎只对精神分析学的一个变体感兴趣——一位纽约精神分析学家特利根特·巴娄的反弗洛伊德式分析。他带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巴娄的“群体意象”(group images)理论，认为它是唯一有些价值的理论。劳伦斯相信自己同巴娄一样，都厌恶科学和科学的方法：“你对精神分析学采取的批评击中了要害……但是你知道吗？我认为，你与其说是个科学家，还不如说你是个哲学家或艺术家——你对科学的专门术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然抵抗。”^③劳伦斯所指的那本书是巴娄的《意识的社会基础》。在一篇介绍这本书的书评中，他又一次称赞了巴娄对正在行医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批评。治疗只不过是分析家和病人之间的一场人为的冲突；巴娄发现了他作为分析家的不自然的地位；他“发现，在他的临床经验中，他总是在应用一种理论……由于患者的精神失常，头脑不能敞开，病人所有的经历都不得不与弗洛伊德必然的乱伦动机理论相符合。”分析家的意图是好的，他想使病人得到解脱，但是他只不过是用一个形象替代了另一个形象，“乱伦情结的固定动机……虽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乱伦动机理论作为我们心理学状况的一种描述是有价值的，但你一旦应用它，使它成为现实情

① 出处同前，第138页。

② 出处同前，第151页。

③ 《书信集》，第695页。参看第643页，第693页。

况下的主宰时，你实际上就已开始用一种机械的或无意识的幻想去代替另一个幻想了。”^①

这些对特利根特·巴娄说的话和对他的评论向我们展示出劳伦斯在接近自己创作生涯尾声时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这一点是颇有价值的。他仍旧对心理学感兴趣，但是早已因为其科学性质和不适合作为生活中的心理指导而宣判它有罪了。呆滞僵死的一大堆临床资料一点也不能使劳伦斯感兴趣，但是他一直认为，精神分析学有描述性科学的价值。同样，他不相信分析情景；它过分强调了病人的彻底屈从作用。劳伦斯不愿意使任何人完全服从于另一个人，这样的情况会毁坏有机的个性，因为有机的个性赋予劳伦斯笔下如此众多的虚构男主人公们以生命力。使得一个人本来的自我具有生命的火花本身只有通过个性撞击才使之闪耀不灭，而不通过服从来达到这一点。

劳伦斯至少在某一点上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正常的性生活遭到了灾难性的抑制和忽视。即使在这里，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弗洛伊德认为，大多数神经病的根源在于正常的性欲发展受到抑制，而劳伦斯却争辩说，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其个性的充分表达都包括一个真正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远远超出了现代主义者提供的作为性幸福线索的纯粹“理解”。这些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的态度是否定的方法，他被迫强调性是为了解除疾病。而劳伦斯则认为，性经历（及其对家庭生活的一切暗指）是健康和幸福的起点之基础。性经历是劳伦斯的“教义”的一部分——是自我在寻找生命奥秘时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他的许多人物都是在这类经历之中或之后才

^① 劳伦斯，《精神病新论》，刊登在《文人》杂志，一九二七年第六十六期，第314页；重印于爱德华·D·麦克唐纳主编的《不死鸟：劳伦斯死后发表的论文》，（纽约，一九三六），第377页，378页。

找到了他们必不可少的幸福，或者得到了他们最痛苦的幻灭。

劳伦斯认为，性是一个人个性的最终表现。“群体、头脑”就象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见到它在起作用那样，或正如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工业中心仔细观察它的那样，为集体行动的原则做了许多牺牲。在这样的条件下，性的经历堕落成乱伦欲望（《书信集》第231页）。现代人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去看待性而贬低了性：（a）把性当作一个有趣的东西，一件可以被“了解”和“实验”的东西；（b）把性看作淫欲，这种淫欲对自我和对象都一概不予考虑。劳伦斯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位清教徒；他憎恶纯粹的淫欲，他感到纯粹的淫欲缺乏快乐的情感伴随物，只不过是生命本能的堕落，“性的适当存在只有短暂的一刻，而性的不恰当则有一段长长的时间。但是当它作为一个行动显得不恰当的时候，它在意识中仍然应该有宽敞而安静的空间，在那里它可以休眠般地生存。”（《书信集》，第781页）。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旋律与对位》感到恐惧，尽管他不得不承认，赫胥黎“带着真正巨大的勇气”“显现了真理，也许是”有关他那一代人的“最后的真实”（《书信集》，第765页）。他象反对性放荡一样反对性抑制；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性压抑反常者”最痛恨的就是真正有生气、有意义的生活。他的过分拘谨威胁着“我们正在成长和扩展着的意识”（《书信集》，第769页）。但是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者同样彻底地使他厌恶；尤其是那些使性“理性化”的美国妇女，“从未奉献过自己的妇女就是我们的自由妇女，但她总是在奉献自己。美国就象那样在影响我。”（《书信集》，第559页）。

《恰特里夫人的情人》包含劳伦斯有关性的最完整的宣言。小说为完全的自由而辩论，并非从限制中摆脱出来，而是从假正经的过分拘谨中摆脱出来的完全自由。恰特显夫人处在一个无法忍

受的局面：受到对一个被战争创伤致残了的绅士的同情和记忆的束缚，而这个男人仍然坚持要控制她。“没有什么。”在她逃避自己婚姻的第一次尝试中，她遇到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者，他把性看作一种有趣和使人愉悦的消遣，对他自我的一种奉承，但是他从来没有以劳伦斯所赞同的方式体验过它：“它在生活的激情的神秘之地，首先，敏感的意识之潮需要涨落，清扫和变得新鲜。”^① 恰特里夫人命定要找到这些生活的激情的神秘之源；为了服从它们，她抛弃了她的一切东西——不只是被她看不起的丈夫，而且还有他的全部财富。拒绝的主题在劳伦斯的生活观中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把工业社会作为生活潦倒的一个主要原因来加以谴责。^② 梅洛斯这个完全的劳伦斯式男人为她最后把性理解为一种有生气的东西提供了一把钥匙；因为他一直超脱现代工业主义的压抑力量和克利福德一伙的低级智力主义。

劳伦斯十分乐意并热情地参加了关于《恰特里夫人的情人》的争论。他试图为色情和海淫这两个词语作界定。第一个词语不仅是指性的表现；它还包括“侮辱性欲、中伤性欲的企图。”

在堕落的人中，深层本能已经死去……当精神退化、深层的控制本能崩溃时，这种事情就发生了。而后性欲就是卑鄙，卑鄙就是性欲，性欲兴奋开始玩弄卑鄙，一个女人身上任何性欲的迹象都成了她的卑鄙的展现。这就是普通庸俗的人的情况，他的名字就是众多，他抬高嗓门儿，它是人民的

① 劳伦斯《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佛罗伦萨，意大利，一九二八)，第118页。

② 克利福德的财富是继承下来的，依靠的是煤矿的工作。恰特里夫人同梅洛斯进行秘密的私通事件时，克利福德正忙于把工人更深地投入自动化的地步，以改进煤矿的设备。参见，杰拉尔德·克里奇的类似计划，《恋爱中的女人》(纽约，无日期，一九二一年首次出版)，第240—265页。劳伦斯认为唯一真正的平等在于人的不间断的精神成长；机器把另一种类型的平等强加于这个之上，结果是导致混乱。

呼声，神的呼声。这就是一切色情的根源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深入思考了这些问题，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基督教在其整个历史中都误解了爱情。接近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时（一九二七年），他出版了一部篇幅短小的小说《死去的人》；要是基督的一生象劳伦斯描写的那样行将结束，而不是象福音中所说的那样，基督教和性欲的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基督的躯体从十字架上取下并放入坟墓；但他并没有真正死去——或者更确切地说，福音讲述的生命在他内心已被扼杀了，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去发现人的生命力和幸福的真正源泉。死神从自身的救助中拯救了他。他在对精神使命的追求中忽略了自己的肉体。在埃及神话中，在司生育与繁殖的女神的庙宇里，他满足了自己一直在追求的愿望，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被处死的原因：“我要求他们所有人都用他们爱情的尸体来为我服务。最后，我献给他们的仅仅是我的爱情的尸体……如果我当时用活着的爱去吻犹太的话，也许他永远也不会用死亡来吻我了。”②

适当的性关系在理想的婚姻中得到了最完善的表现。和任何时候一样，劳伦斯主要从自己的经历中取材用来对婚姻的和谐进行描述。同当前大部分描述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劳伦斯只是在同弗丽达在一起时才是最最幸福。激烈的争吵是他们关系的重要部分。他的朋友经常看到他与弗丽达的关系是稳定持久的。弗丽达自己也从未丧失这样的信念，即他们的婚姻是合适的：“我认为，对于一位妇女来说，和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是最大的快乐和满足，当他向前走，奋斗的时候——我感到确实是

① 劳伦斯，《色情与诲淫》，收于《不死鸟》，第176页。

② 《死去的人》（伦敦，一九三一），第137—138页。

这样的……在他形成一个新想法之前他常常显得脾气烦躁，容易发火，但当新的想象精力形成时，他又能象往常那样，热切而专注。”^①

劳伦斯最幸福的年代，也就是当他享受着弗丽达充分实现了的爱情的时侯，激励他多陈述男人对女人的爱的重要性：“我认为艺术的唯一资源，使艺术恢复生气的资源，就是使它更加成为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作品。我认为对于男人来讲，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有勇气接近妇女，向她们暴露自己，被她们改变；对于妇女来讲，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接受和承认男人。”（《书信集》第198页）他之所以相信婚姻是因为他的婚姻生活很幸福。但是除非婚姻包含相互补充性格的激烈撞击，否则就不是完美的。男人为了认识女人的基本性格，就必须克服对女人的最初反感。善良，或仁慈，或心胸宽大只不过有助于过分强调这种反感。劳伦斯把一切自由放任的失败——建立在慈善事业和改善了了的污物处理基础之上的“二十世纪启蒙运动”的失败——看作是与社会基本物质价值中分庭抗礼的倾向，而这种基本的物质价值在文明人看来总是似乎有些讨厌。在现代文学中，人的可憎性终于受到了考查——特别是在乔伊斯、赫胥黎和纪德的小说中。“很长时间以来，人对人的社会信任和仁慈与人对人的隐秘的肉体排斥并驾齐驱。但是，最终一种情况必然要超过另一种情况。仁慈使自己精疲力尽，排斥一味地在加深。仁慈是外在的，超个人的。但是反感却是内向的和个人的。”^②

劳伦斯对现代性观念的批评，是针对它们没能认识到亲身经历的深刻根源，以及它们防止一种完美的，满足的性经验的倾向而讲的。在这个方面，“性压抑反常者”和现代“自由妇女”犯了同

① 弗丽达·劳伦斯，《不是我而是风》，第194页。

② 达尔伯格的《最低下的家伙》序，收于《不死鸟》，第270页。参见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66—67页。注1。

样的错误：一个认为性欲本身是不健康的；另一个害怕性欲的后果。两人中间，没有一个是完全诚实的；没有一个希望生活充满危险和美的因素。劳伦斯在这一指责中包括了现代科学的一切东西；科学家们不能本能地或直觉地把握他们在外表断言的东西。他们计算、列表、用使人迷惑的数字或者用犹豫的半结论宣布结果。弗洛伊德主义也是这种情况，它用“理智心理”代替了“直觉心理”。

三

这种对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犹豫，在劳伦斯看来，现代解体的根源，在这门新的心理学中特别引人注目。当然，精神分析学家是在探讨影响人的命运的最紧密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劳伦斯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呢？他的评论和哲学著作都不时地参照过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无意识、俄底浦斯情结、抑制、升华等等。但是他阅读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要驳倒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精神分析学提供给他的那些术语作出自己的解释。他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观察和他自己的一些建议，尽管有着许多解释上的错误，但却为劳伦斯自己的生机论见解提供了一个卓越的开端。

他一开始便宣称，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在治疗的掩饰下跳出来，彻底废除人的道德官能”。既然弗洛伊德在寻找我们存在的基本因素，他就不能不暴露放肆和恐惧，但是仅仅是希望我们除掉它们：

这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的道德窘境。分析家打算用根除精神病起因的方法治疗精神病患者。他发现精神病的起因在于尚未被承认的性欲。他在全部论说了对正常性欲的抑制之后，

最后总算意识到，几乎每一个精神神经病的根源都在于某种乱伦欲望，而这种乱伦欲望又不是正常性欲望遭到抑制的结果。现在请看这个窘境——这是一个可怕的窘境。如果乱伦欲望不是任何正常欲望受到抑制的结果，如果它实际上存在，并拒绝在任何批评面前后退，那又会怎么样呢？除了接受它作为正常性表现的一部分外还能怎么办呢？^①

弗洛伊德这种错误概念形成的根源当然是关于《儿子与情人》的争论。那本小说的最后一章表现了保罗同把他母亲拉向死亡的力量相抗争，或同他的自我充分实现相抗争。弗洛伊德曾希望把这个强烈的影响称之为乱伦的努力，这种努力后来随着母亲对孩子的控制变得微妙化或遭到拒绝了。莫瑞尔夫人对保罗的控制如此之严，以至于他不能自由地进入同米丽亚姆的任何一种伴侣关系，在绝望和恼怒中被赶进了克莱拉·道斯的怀抱——一个短暂的风流韵事，它也被母亲的意志中止了。劳伦斯被这部小说搅得不安。它有多真实？如果它是真实的——如果母亲的控制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可能毁了儿子的生活——精神分析学家们给予它广泛、有意识的注意是正确的吗？他们错了，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乱伦努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任何抑制必定是错误的，因为它最终必然会引起神经病和精神病。因此，对乱伦欲望的抑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实际上是一切现代神经病的起因。”^②

弗洛伊德当然没有把道德判断附加在他的临床发现上；他也

① 《精神分析与无意识》(伦敦，一九二三)，第12页，第20—21页。当然，劳伦斯假定“乱伦渴望”是无意识的特点是错误的，因为弗洛伊德一直坚持“乱伦渴望”应该被称为“自然的”。实际上，弗洛伊德在他的《性论三讲》已经说明婴儿的利比多不能识别它的对象，它根本没有被有意识地辨认，儿童的教育中的一部分是把利比多引向柔和外在的对象。

② 出处同前，第22页。

没有提倡乱伦欲望的满足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分析的目的既不是在儿童的性生活中找到乱伦，也不是对它进行某种道德审判。首先应该指出，乱伦的不可行性是病人生活中的一个控制因素。在劳伦斯的批评中，隐含有认为弗洛伊德反对抑制的外行评论家们所犯的**错误**；他不赞成乱伦作为使人从乱伦渴望中解脱出来的手段，而是建议升华、改向，以及再造一个人对早期性生活的有意识的控制。只要“巨大的动情作用和情感”保持无意识并且无意识地得到享受，犯罪的问题就不会使人不安了。“亚当夏娃之所以堕落，并不是由于他们怀有性欲，或者甚至是因为他们发生了性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性欲和性行为的可能前景了。”

劳伦斯用一种想象丰富的神秘肯定代替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严肃定义。他说，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是“大脑存放自己私生物的秘密室。真正的无意识是真正动机的源泉和根源。”他希望我们相信，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仅仅由“我们整个抑制体”组成，好象事情就是这样的，再没有别的情形了。如果真实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它的确就要在同劳伦斯所宣称的无意识相比较中受损。对小说家来说，无意识从生命开始的地方开始。“我们在努力追溯无意识的根源。我们发现这个存在于更高的有机体中的根源，是第一个小卵细胞，从那里产生了一个个体的有机体。”^①这是心理学术语和生机论生物学的术语混合——轮廓很鲜明，但并不十分准确。它同弗洛伊德看法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它坚持在个人有机生活和一种“非大脑意识”之间划等号。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独立于它自身之外的任何生活，虽然性欲本能确保任何有机种类的永存。

这就把我们带到也许是处于劳伦斯的批评中心的**东西**面前

① 出处同前 第23页，第26页，第28页，第35页，第37页。

了。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无意识并不为我们所知而存在；但是，他坚持承认，了解它有着明显的益处，如果我们要进行治疗的话，就必须意识到它的独特性，使它们服从病人和分析家的思想。对无意识“大脑”的这种进攻只不过是现代科学谬误中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我们现在遭受的是无意识在某些理想的限制之内的束缚。”他拒绝承认两点：（一）无意识除了对胆小和无能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二）除了描述目的之外，认识无意识也是有价值的。他坚持认为，我们服从使无意识理智化过程的时间越长，就越不能“无意识地生活”——不受任何头脑胆小的局限的束缚。因而，他希望用他自己的见解去代替对无意识的冷静的科学见解：“它是在起源核心的熔接那一时刻，在每一个个体有机体唤起那种活跃的自发性，它在同外界宇宙的两极分化的联系中，逐渐形成详细解释它自己的个性心理和主体，使头脑和躯体都从它们自身中产生出来。”

考虑到有关人类行为根源的不同意见，我们可以期望，劳伦斯还会提供幼儿和儿童心理学的不同的画面。弗洛伊德的《性论三讲》一书中对性病因学的讨论是一个试图摧毁婴儿无性欲概念的相当坚定的努力，劳伦斯却希望把儿童描绘成一个不信教的、充满活力和好动的幸福的人。的确，儿意的生活从胎儿时就开始了，那时的胎儿是“有着强烈个性和意识的”。新生儿的一切行动都是“本能的、盲目的和无知觉的”：“它从腹部巨大的第一记忆中直接移动出来，带着几乎象磁性推进力那样的前知识，就好象小嘴被生气勃勃的磁力所吸引或推动到母亲胸前，它的指示控制中心就隐于太阳神经丛中。”^①

由于科学家总是从理性的角度提及人的行动，因此他总是认

① 出处同前，第45页，第108页，第51页，第55—56页。

为身体的行动是相当不舒服的。即使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某些身体倾向的自然性，他也把这些行动、这些身体健康的首要的健康表达和推动着它们的伊底的动力(drive ofid)，看作“为自我所进行的开拓规划”。对诗人和小说家来说，这个过程被用来扼杀儿童早期生活的自发性行为。劳伦斯小说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这种早期心理畸形的牺牲品。他们要么住在阴郁的教区牧师住宅或庄园里，要么就是受到现代工业主义限制和挤压的牺牲品。由于外界压力或家庭愚蠢的原因，儿童经常被迫变得斯文而笨拙，而这时，他那粗鲁而优美的自然习惯恰恰应该受到鼓励。

在《无意识幻想曲》中，劳伦斯把他与弗洛伊德的争论又推进了一步。虽然“在每一个个人中可以找到男性和女性的基本构成物”，这在生物学上是真实的，但是实际上这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分离性相比较，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男人和女人都有他们独立的世界；他们可以相互补充，却不可以相互交换。男人具有一种使命，一种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服务；但是他必须回来“放松一下，把他自己献给他的女人及其世界”。^①

对青春期之前儿童的教育大部分是通过刺激和加强身体活动的生命区(vitalzone)来完成的。肉体的刺激，时而粗暴的处理，有利于健康的打屁股，都是值得推荐的。因为劳伦斯如此强调成熟的性交行为，婴儿期的性欲对他来说几乎是无关紧要的。“的确，儿童具有某种性意识，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甚至可能一起做猥亵的举动……〔但是〕这只是一种影子似的行动，一种梦的行动。这不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大部分生活实际上依靠的是作为男人的男性与作为女人的女性之间的关系。这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劳伦斯

^① 《无意识幻想曲》，(纽约，一九三〇)，第139页。

认为，精神分析学应当对给我们的错误指导负责。他坚持认为，性行为只是生活的一个更新，其本身是通向其他重大的群体活动的道路。这种活动一点也不只是性方面的，尽管每个人需要性交所能给予的更新。“男人们最终、最大的欲望是对伟大的、有着一定目的的活动的欲望。当一个人失去对有目的创造性活动的深切感觉时，他感到迷惘，并且确实是被打败了。当他进行性交的完成……甚至是在他秘密的心灵里完成时，他便陷入了绝望的开始。”^①因此，性结合是有机整体和个人灵魂尊严的“无意识”的再肯定；劳伦斯喜欢用“无意识”，因为“灵魂”一词已经被亵渎了。

在论述“睡眠与梦”一章里，劳伦斯对弗洛伊德的矛盾心理的接受——拒绝态度甚至更引人注意了。他认为大多数梦的根源都是前一天身体的障碍和失调——“用烧饼当了晚饭”；梦的许多特点是“身体的循环和消化现象的直接抄本”。然而，他并不否认抑制的重要性，他承认梦中母亲固恋的存在：“然而，在较低中心的活动，在白天受到了克制。存在着一种抑制。然后，夜流的摩擦力爆炸性地使被抑制的心理活动获得了自由。而后，母亲的形象就在热烈的、扰乱人心的、令人断肠的梦中扮演主要角色了。”^②

但是，人是带着对他的梦的仇恨而醒来的；因此，乱伦的形象没有任何重要意义。劳伦斯在梦中找到了自动的活动中心，自发的敌人；被醒来的生活拒之门外的活动在梦中得到了自动的生活；“任何有意义的梦形象通常是活着的自发心理中的某种阻止或障碍物的一个形象或象征。”但是梦中的象征不代表任何解脱；相反地，它们是人类的愿望和动力，“放弃人的完善而落入纯机械的

① 出处同前，第140页，第151—152页。

② 出处同前，第243页，第245—246页。

方式。”^①因此，很明显，对劳伦斯来说，梦活动的中心根本就不是无意识，而是无意识的反面——减弱自发性生活的那个大脑自动装置的表述。

劳伦斯与弗洛伊德争论的主要方面可以归纳如下：

(一)劳伦斯之所以不赞成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因为劳伦斯认为，他把最好是留在无意识中的东西带进了意识之中。真正生机勃勃的生活的基础是非大脑自我的自发性作用。理解事物并不是一种认识行为；它是我们自己作为有机的和个体的存在的无意的作用。

(二)无意识不是邪恶的源泉；邪恶是由于把无意识过程精神化并使之无效来减弱这些过程而造成的。

(三)母亲—儿童关系只要是保持在无意识程度上，就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儿童欢乐和生命的源泉，不应该受到理智的干扰。

(四)因此，儿童训练应该全部致力于发展身体的各个中心。决不存在什么婴儿性欲这一事实便使之成为可能，对性兴趣的不正当发展的恐惧也是没有根据的了。

(五)劳伦斯把青春期和青年的性目标同儿童的纯身体的活动区分开来，拒不承认弗洛伊德把性这个术语用于这些早期的活动。他进一步指出男人和女人是分离和脱离的类型，雌雄同体是一个“科学神话”。

(六)性交行为的重要性因而对劳伦斯来说是主要的。它是性关系中的一点，这一点使男人和女人有能力进入他们本性的最深的渊源中去，从而了解他们自己，并且清楚地懂得他们虽然不同，但却互相补充的作用。

① 出处同前，第250，253页。

(七)但是男人应该超越自我的重要结合，就是性交的行动。对他来说，这是更新的渊源，它应该帮助推动他向前进入创造性的群体生活。妇女提供了进一步更新的核心，通过使她的丈夫不时地回到他力量的泉源来补充他的生活。

在所有这一切中，弗洛伊德似乎是个孤独的外人。然而，我们应该把这作为许多例子中的一个——的确，最有趣的例子之一——精神分析学家与创造性艺术家的结合。劳伦斯用来代替灵魂概念的无意识的暗喻，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感谢精神分析学家。乱伦动机及其相关物俄狄浦斯情结使劳伦斯感到迷惑，迫使他用非常独到的生物学见解去进行再解释。接受弗洛伊德的最大障碍——劳伦斯不公正地夸大的一个障碍——是弗洛伊德体系中的决定论。他把这一点溶入到大量的科学理论中，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不赞同其中的许多理论。超现实主义把无意识当作新奇的一个来源加以运用；乔伊斯在它那里找到了进入语言学变化的钥匙；劳伦斯希望生活在无意识里面：“要是我们能闭上眼睛的话，要是我们全都瞎了，事物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曾为肤浅的、幻觉的、外表的虚无而奋斗和生活感到惊异。我们应该在黑暗中找到现实。”（《书信集》，第282页）

四

劳伦斯为否定理智，再一次宣称用“血”作为宗教经验的源泉辩护：“我的伟大教义是对血性和肉体信仰，它们比理智要明智。我们在头脑里可能搞错。但是，我们的血所感到、所相信、所说的事情总是真的。”（《书信集》，第96页）他相信，一个人只有通过他个人经历——他完全“不加思考”地进入其中的那些经验——才能达到同他的存在的主要来源的结合；通向这种经验的一个途径就是女人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讲，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切经验

都是返回母亲；在这方面，劳伦斯坚持乱伦的观念，尽管他给这个观念以完全非弗洛伊德主义的和非科学的意义：

请注意它——这个母亲—乱伦概念可能成为一种摆脱不了的思想感情。但是在我看来其中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在某些时期，男人具有返回到女人那里去的一种欲望和倾向，把她定为他的目的和目标，并在她那里找到他自己存在的正当理由。这样，他就好象把自己投进了她的子宫中去似的，而她这个伟大的母亲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受了他。这就是一种乱伦……一旦性关系走到这条路上，恢复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我们不恢复过来的话，我们必死无疑。（《书信集》，第462页）

劳伦斯的“血的教义”假设意识和感情状态的相等；西此，意识与认识几乎没什么关系。精神的那一部分意识决不应该控制身体的意识。他从这个细胞意识的发现出发，进而达到了一种泛神论与生机论相结合的教义。他还暗示意识中存在着种族差别。然而，这种差别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遗传的。“白人意识”已经变得非常显著的精神性和神经性了，远离活生生的存在的源泉。而更为天真、不太开化的印第安人也许正在“把他们自己又一次献给产生脉动的数不清的血液下降，它总是寻找着落在地球上的中心，而心脏则象一颗行星在轨道中脉动一样，维持着分离的人类存在的孤独的循环。”^①

劳伦斯对基督教的谴责和他对生机论的泛神论的提倡在后期的两部作品中，《启示录》和小说《羽蛇》中，得到了体现。在第一

① 劳伦斯，《墨西哥的早晨》（纽约，一九三四），第110页。

部作品中，他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启示的许多光辉和意义感到遗憾；我们再也不会以一种无意识的节奏统一了，而是已经崩溃成自私自利的、破坏性很强的个体。但是《启示录》这本书恢复了许多异教精神，这种精神后来被天主教和基督教改革运动压垮了。现代人偶然才会获得接近欲望激烈爆发的机会——也就是现代哲学家们当作利比多或生命冲动而如此受到有效抑制和如此表而化地贴上了标签的意识状态。

《羽蛇》是劳伦斯对呼唤旧的神灵复活的答案。由于这些以往的神灵早就在白人意识中逝去了，他们的复活应该留给黑皮肤的种族——例如墨西哥印第安人。在古代印第安人的舞蹈节奏中，女主人公被引导着放弃了她所有白种人的自制。“她感到她的性欲和女性卷入了初生的生命的缓慢旋转的海洋之中，并与其相一致，而男人们的黑暗天空在海洋上面降低、旋转着。”女主人公感到，这是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观察到的白种人意识的不同之处。那仅仅是淫欲，这个处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生动的血缘关系”中的力量的新的意识，是伟大的权力和幸福的源泉。^①

劳伦斯想要用一种新的信仰去代替西方文明的人道主义（通过什么手段他自己也不知道，尽管他曾几经试图提出），他曾经在《无意识幻想曲》中提出了这种新信仰的主要原则。它的基础是，在一切自然力量中都看到一种血的结合的泛神论。祈祷者外在情感的替代物就是爱——一种鲁道夫·伯金信仰的爱。这不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一般的关系，而是对一切人的“孤立的奇异”的清醒认识：

〔伯金告诉厄休拉〕有一个赤裸裸的、不具人格的、超越

^① 劳伦斯，《羽蛇》（纽约，一九三三），第128，398页。

责任的最后的我。也同样有一个最后的你。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同你相遇——不是在情感、爱恋的平面上——而是超越它们，达到没有语言、没有赞同条件的境地……。一个人只能伴随着冲动行事，获取摆在面前的东西，……不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也不须贡献任何东西，每个人只是按照最主要的欲望去获得。①

为了要把现代理性意识搁置一边，我们需要再一次保证无意识中身体范围的归向。一个人决不能因为头脑而拒绝身体，首要的任务是保持身体的生命力健全。因此，他在两篇论述精神分析学的文章中所关心的是对这些身体中心的详细描写。隔膜把无意识分成两个层次——下而的层次是黑暗和有力的；上而的层次是客观和理智的，虽然也有力。这些中心的稳定，通过回避对智力范围的过分强调和通过对下而的范围不断刺激和锻炼（对于儿童是打屁股；对于成人是性交），而得到最好的保持。从他论述无意识的两篇文章开始，他在好几个领域里都进行了广泛的阅读，旨在寻找最充分地过着他那种生活的社会群体。

他整个一生都专心于对他的教义作一种再陈述；他在阅读中，尤其是在个人经历中，总是能找到可以加在它上而的新东西。他对宗教相当混乱的陈述首先产生于对当时宗教实践的厌恶。一个新的经历——象认识托尼·卢汉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的霍特维尔观看霍皮（Hopi）印第安人的舞蹈——很可能会启示一个新鲜和具有独创性的观点，这一观点最终引导他去贪婪地到书中寻找对他的感觉的某种肯定。这就是他首先遇到精神分析学，然后又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反对它时所采用的方法。

① 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第165—166页。

在劳伦斯式的无意识中存在着某些活动中心，其中保持着一种活跃的摆动关系，或者“归向”。教育的主要作用应该是保持较低的身体意识中心的活力；但是西方社会过分强调了理性活动的中心，并通过打断纯粹的血的活动或者使它服从于稀少的、卑鄙的和偏狭的理智主义而打乱了人的平衡。因此，他寻找基本的和健康的归向曾经得到保持的社会形式。虽然他曾经说过柏格森使他厌烦，但是，很清楚，劳伦斯的个人教义，就其从阅读中的全部所得来说，可以追溯到希腊的万物有生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精神分析学家提供了无意识的概念，劳伦斯用这个概念作为灵魂、生命冲动和旺盛精力的一切解释的替代物。

五

劳伦斯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精神发展的证据。正如他的评论著作一样，他的小说反映出一个宣讲真理的争论者和预言家，这个真理间接地影响了他的言论的方式。虽然劳伦斯不是一个乔伊斯意义上的实验主义者，但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独创性观念和方法。从他作为小说家和评论家的生涯开始，他就对有关似乎是现代文学标记的风格和结构感到不安。他还十分不满于他称之为现代人的屈从或者他们在自然和人面前的阴郁的退缩；关于康拉德，他说：“为什么在你开始写作之前就屈服呢？这渗透于康拉德和类似其他人的所有作品——废墟文学派作家。我不能饶恕康拉德如此忧郁和他的屈服。”（《书信集》，第68页）衰败的气味似乎弥漫于现代小说——踟躅在社会本身之中的一种死亡感。“我痛恨贝内特的屈服。悲剧应该真正是对痛苦的一个巨大反冲。但是，《五个城镇中的安娜》好似一种接受——自从福楼拜以来的所有现代货色都似乎如此。我痛恨这种情形。我想再一次很快地冲洗这一切，冲洗掉英格兰的老气、污秽和绝望。”（《书信集》，第66—67

页)

劳伦斯认为，富有人性的个人是值得保持的；他花了毕生精力去完善使之成为可能的计划。在他极端具有活力，经常组织混乱的评论文章中，劳伦斯通过拒绝他的作家同行们的伦理道德标准，展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例如，霍桑的《红字》是“不健康的”，因为“罪恶”令人作呕地受到了赞扬，得到了象征化：“海斯特和阿瑟·迪米斯戴尔事件中的罪恶的确是罪恶，因为他们做了他们**认为错误的事情**。要是他们真想成为情人，要是他们具有他们自己激情的诚实勇气，就不含有任何罪了；即使这种欲望仅仅是瞬息间的。”^①

劳伦斯的小说——任何不负于这个名字的小说——提出了创造性的生活观；它具有一种哲理性。劳伦斯把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的相同倾向带进了他对其他人著作的阅读中。没有哪一本有价值的小说不具有为他自己的观点所存在的意义。比如说，他认为是一部“伟大小说”的麦尔维尔的《白鲸》就带有“说教的力量”，因此，它才是伟大的：

艺术的首要作用是道德作用……但是是一种热情的含蓄的道德，而不是说教。一种改变血液而不改变头脑的道德……。^②

小说将减弱感觉、将表现坚持存在于一个消逝的世界中消逝的东西的危险性还存在着。但是如果把小说当成一幅活的肖像画来处理，它便立即成为艺术家传达生活的真实意义——“我们现存关系的变化的彩虹”——的最好媒介和最好机会。创造性艺术怎

^① 《经典美国文学研究》(纽约，一九二三)，第148页。

^② 出处同前，第254页。

样才能实际上完成这个要求呢？生活是如此具有流动性，一个仅仅能希望捕捉到现在的时刻，捕捉到活生生的和新鲜的时刻，不是普通一天的普通时刻，而是人类关系中的关键时刻。这一时刻可能在印成的书页里显得很微妙，因为人类的各种关系本身就是复杂的，外表现象和内在原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怎样才能在这冷漠的印刷监牢(the prison of cold point)中捕捉这个表达感情的运动而又不破坏那个运动呢？“如果你想在小说中钉住任何事情的话，要么它把小说扼杀了，要么小说爬起来带着钉子走掉了。”^①

这个情感生活从男人和女人那里要求最多活生生的人类经验的时刻，便是劳伦斯小说的焦点中心。劳伦斯把精力集中在它上面，并且向它灌注了他整个精神的强度。这样一种等待时机，等待怀特黑德称之为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的东西，迫使我们抛弃普通的判断标准。形式对于劳伦斯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虽然他有能力写出精雕细琢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他的篇幅较长的小小说则是通过一连串关键性经历的时刻连结在一起的，它的连续性是不规则的，生活方式是一系列的具有新鲜活力的人类关系的危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性交行为是使能量的源泉得以深入吸取的极少行为之一，因而劳伦斯便经常生动地表现这种经历。

人物似乎总是处于与外部世界不稳定的平衡条件之中。我们更多注意到的是感情的各种状态，而不是人物的名字——虽然我们在经过的时候可能注意到弥漫于“周围的空气”中的色彩和声音。他告诉艾德华·加纳特说：“你千万不要在我的小说中寻找传统的性格稳定的人物的自我。存在着另一个自我，按照这个自我

^① 《道德与小说》，收于《不死鸟》，第532，528页。

的行动，个人是无法辩认的，并且走过去了，好似同素异形的状态，它需要一种比我们已经习惯于采用、习惯于发现的感觉更深的感觉，同素异形的状态是同一个单一的剧烈的不变要素的状态。”（《书信集》，第202页）

对劳伦斯来说，一部悲剧为了具有感染力或具有悲剧性，无须用一种暴力的解决方法。在他看来，悲剧存在于“在相爱的人们中间爆发的内心之战。”（《书信集》，第46页）他的人物是强烈地充满感情状态的叙述工具。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一个人物在危机的关头采取的一种感情状态的微妙复杂性。在这些复杂情感中，最明显的便是缓和人际关系，无论这种关系看起来有多么幸福的恨—爱矛盾心理。例如，安娜·布朗文同她的新婚丈夫之间的理解就是模糊的，这种理解在她似乎最恨他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他的血液在欲望的浪潮中流得更快了。他想接近她，见到她。要是他能同她取得联系，她就在那儿。她刚好超越他这一现实状况吸引了他。他由于茫然不知所措和受到了破坏，因此急忙向前走，走得更近，去接受他自己的完或……他不用理解他就了解她，他懂得她的意思。”

把无意识能量投入关系很近的三个人之中，这三个人正是由他们厌恶的东西联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是相当普遍的。莉迪亚·布朗文夫人、汤姆及其女儿安娜就是这样的三人一组。然而，最经常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困难的、常常是强烈的适应标志着具有创造性的时刻。年轻的安娜嫁给她的表兄弟威尔时，无意识意志之间的战斗就打响了，他们相互补充的性格使这一战斗更具生气：“他们无意识地进行着一场无法名状的战斗。他们仍然相互热爱，激情依然存在。但是激情在战斗中消耗掉了。而深入、激烈、没有名称的战斗却仍在继续。他们周围一切都在猛烈地燃烧着，世界脱下了它的衣服，它那新的原始

的赤身裸体令人畏惧。”^①

霍拉斯·格雷戈里指出了在他看来在劳伦斯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象征：《虹》中的大教堂拱门和《恋爱中的女人》里的非洲雕像。这些和其他象征^②使劳伦斯的小说具有一种有意义的和奇怪的适当的连续性。对于劳伦斯来说，象征只不过是保持感情状态具有生命活力的手段而已——或者是蓄积潜在能量、等待着新的发泄机会的基点。关于《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他说：

是的，克里福德爵士的瘫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切艺术在本质上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当然，当我开始写作《恰特里夫人的情人》时，我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不是有意识地用象征来创作的。但是当这本书写完时，我才意识到什么是无意识的象征主义。……树林当然是无意识的象征——也许甚至煤矿也是——甚至博尔顿夫人也是。（《书信集》，第832页）

这些是作为小说家的劳伦斯的两个主要特点：经常性地不满足于正统人物塑造的需要，使一种感情状态聚焦化，以及大部分是无意形成的象征——尽管大教堂似乎是个例外——这种象征作为一切感情释放的泉源而行动着。前面一种象征在早期小说中拥有压倒势力——《虹》、《恋爱中的女人》、《亚伦的藜杖》和象

^① 劳伦斯，《虹》（纽约，无日期），第86—87，157页。第一次发表于伦敦。一九一五年。

^② 经常地，特别是在他的晚期小说中，一只鸟或一个动物象征着在阻止运动那一时刻所捕获的动力，《圣·毛尔》中的马（纽约，一九二五），《墨西哥的早晨》和《羽蛇》中的鸟。还可参看一卷集的《驯鸟与狐狸》（伦敦，一九二三）。只有一次，一件乐器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亚伦的藜杖》（纽约，一九二二）。

“波斯官员”这类短一些的故事，后一种象征统治着、经常扰乱着晚期小说的情节结构——《羽蛇》、《处女与吉普赛人》、《圣·毛尔》、《死去的人》。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这种情节的象征连续性才在一个梦或幻象中得到预见或概括；当人们意识到他在《无意识幻想曲》中有关梦的陈述时，劳伦斯小说中对梦的极少应用就不足为怪了。^①

作为小说家的劳伦斯的成长故事同他作为思想家而出现的故事是平行的。小说是劳伦斯最好的文献；他经常承认不能在诗歌中找到他常常可以在小说中成功地找到的满意的退路。在早期的小说中，这种实例在具有高雅戏剧性的时刻得到了富有激情的展示；在晚期作品中，布道插了进来，特别是《羽蛇》缺乏本文与情景的精细而微妙的混合。前一种象征是他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后一种象征是他的原则和态度的最有力的宣言。

劳伦斯虽然面对着弗洛伊德主义，但他始终保持自己的个性，即他对于影响的独立性。从一个重要意义上来说，劳伦斯的小说一点也不精神分析学的。这些小说既无德劣也无讽刺地采用出现在路德维希·路易森和梅·辛克莱的小说中的那些术语或概念。然而，康拉德·艾肯对“糊涂的精神分析神秘主义”的参照只包含部分的真实性。劳伦斯总是为认识或者理智意识的失败而担心。因此，艺术家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所评述的那样，从过去看到了同样的失败；我们人类意识的直觉是不完整的。但是，两个人走的都

^① 参见马奇的有关狐狸的梦——在那个梦中，她把狐狸不仅当作它自己的狡猾的象征，而且还当作亨利固执本性的象征。《狐狸》，第124页。还可参看厄休拉·布朗文所经历的践踏着的群马的幻象，《虹》，第459—463页。詹姆斯·休顿的梦仅得到幽默的提及。对《失去了的姑娘》的情节没有任何意义（纽约，一九二一），第13页。“他死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之前，的确可悲。他享有过最美好的、象童话一样的梦，他能用具有魅力的典雅语言完美无缺地指述这些梦”。它们是儿童一般的简单的愿望满足之梦。

是他们自己的路，用一个人的标准去衡量另一个人也许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有关意识概念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劳伦斯的调查引导他把信仰建立在作为一种身体和情感表达综合的宗教形式上。对弗洛伊德来说，宗教本身是一个幻想，它象艺术一样为自我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这一观点上的不同是艺术家和科学家之间自然和正常区别的一部分。劳伦斯对无意识的描述很少或者干脆不考虑自我的干扰。弗洛伊德把自我看作这种东西：全部的自我防护恶意的无意识自我对它的侵袭的保护人（必须承认，它是一个被弄得很糊涂的保护人），对劳伦斯来说，这样的一条纪律导致了对感情表达基本源泉的干涉。在作为艺术家和预言家的劳伦斯的成长过程中，弗洛伊德起着刺激物的作用；劳伦斯承认，他的对手对有关那个艺术家们最感兴趣的世界作出了深刻的发现。劳伦斯和弗洛伊德都考察了这一领域，我们已经从这一领域中了解到许多有关非理性在人类事件中的作用。劳伦斯一直注意到弗洛伊德也在巡查相同的领域这一事实。

第七章 卡夫卡和曼

“我的作品是关于您的。在其中我倾吐了那些我不能在您的怀抱中所倾吐的伤心事，除非受到您的强制，在我能够自主的时候总是故意久久地远离您。”^①卡夫卡就是以这种方式强调他毕生同父亲所作的斗争的重要意义的。那是一场为争取承认而充满曲解、焦虑、诅咒和痛苦的斗争。它的意义又是这样的重大，以致我们十分倾向于把它看作卡夫卡作品一切特色的来源。现成的公式已经在手。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没有任何文学著作可以为弗洛伊德学派提供一个比比更好的案例。即使是认真研究卡夫卡的传记，也不能象这封信那样给出这么清晰的答案。他的心灵在看起来简单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几乎是恐怖和自相矛盾的复杂物。

卡夫卡所处的环境并非很不寻常。他的父亲是布拉格的一位生意兴隆的批发商。他出生于1883年，是三个男孩中的唯一幸存者。他有三个妹妹，最小的比他小六岁。他是一个深感孤单寂寞的孩子，他的各种兴趣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以父亲的意志为转移的兴趣和信心的控制之下。几乎从最初起，卡夫卡的愿望和目标就难以同父亲的模式相吻合。这些模式在他父亲看来，所有在他直接控制下的人都必须遵循。因此，卡夫卡的义务似乎包括使自

^① 马克斯·布洛德，《卡夫卡“给父亲的信”摘登》，哈里·斯格肖尔等编，《卡夫卡资料汇编》，（纽约，一九四〇），第43页。

己独特的个性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和愿望。卡夫卡认为，这种屈从使教养子女的责任过于简单化了：

据我的亲身体验，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在竭力消灭个性。这使得教养儿童的工作简单化，同时也就使儿童的生活贫乏——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儿童从一开始就饱尝受压抑的苦恼。……〔我的父母〕不承认我的个性，但我一旦感受到了它，就对它非常敏感，而且总是保持着警惕。我不得不在他们这种态度中察觉到他们对我的不赞同。但是，如果我坦白地承认了某种个性，如果他们立即谴责的话，那么我就会想，他们对我那些隐蔽起来的个性，难道不会更加反感吗？即使是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对头呀！①

卡夫卡的父亲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成功的典型。由于他生活方式的价值，已经从取得的物质报偿方面得到了证明，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倾向于承认任何别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就认为这是每一个明智的人都应当渴望去追求的。有了这样一个父亲作为典范，就很可能使一个不大倾向于怀疑一切行为模式的儿子皈依他的父亲，但对于卡夫卡来说，这样做则是自己无能的一个明证。一旦认清了这两种个性之间的基本分歧，卡夫卡就意识到这是两种不同观点的严重对立。他感到父亲的世界是可怕的、难以接近的。他在他已经经历或希望经历的一切中都体验到那个世界对他个性的支配地位。马克斯·布洛德说过：卡夫卡一度想把自己的选集题名为《逃避父亲的企图》。②在卡夫卡看来，他的父亲是权威的

① 弗朗兹·卡夫卡，《自传速写》收于斯洛肖尔等人编，《卡夫卡资料汇编》，第51—52页。

② 布洛德《“卡夫卡给父亲的信”摘要》，收于斯洛肖尔等人编写的《卡夫卡资料汇编》，第43页。

典型，是不应该怀疑的，也是不容怀疑的，否则怀疑者将难逃严厉的惩罚。这不是一个合理行动的问题，不管有没有正当的理由，所有自主的决定都会受到无形的或有形的惩罚。权威常常否定人的尊严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怀疑者不受到某种创伤而逃脱惩罚，作为这种不平等冲突的纪念。

在卡夫卡的传记中，马克斯·布洛德经常提到这种对父亲的意志的绝对屈从，这一父母专制的典型的永久参照物。布洛德说，卡夫卡过高地估计了父亲对他的权力。这个错误的判断使他不能为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要求正当的独立性。他在气质和才能两个方面，都同父亲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在他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任何自主行动的时候，结果总是被卷入内疚之情而不能自拔。于是，卡夫卡的一生就象是一种永远在变换着的法庭情景。在那里，儿子永远是被告，而父亲则既是原告又是法官。在他一生经历中，他都处于这种被告地位去进行争辩，这在分寸上是可以理解的和明智的，总是那样的通情达理，而且是建立在论据充分、具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的。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他的指控和判决却又是那样的神秘莫测和令人茫然。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些指控究竟是不是来自原告，有时，它们看起来是来自被告本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自我指控形式出现的一种变态心理。在这个法庭诉讼中有两点特别突出：一点是法官的声明是那样的确凿无疑和颇有权威性，是必须接受的——尽管它并没有被充分理解。而被告抱怨一般的辩护却是那样地游移不定，似乎连他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它的合理性。

在“给父亲的信”^①中，卡夫卡给了父亲一个“反驳”的机会。经过一百来页的小心谨慎的辩解和对原告兼法官入骨三分的剖

^① 这封信是由卡夫卡的母亲保存着的，她很明智，没有让他的父亲看到它。

析，被告终止了争论，在一个简要申明中一笔勾销了。他的辩护具有明显的尊严和合理性：

我的确是当真的，当我把每一件事都公开归罪于您的时候。您凭着自己的机敏和慈爱之情尽了最大努力来解释，为什么我也不应该受到谴责。当然，在这里您只是表面上取得了成功（不管怎样，这正是您所需要的）。尽管存在着那一切有关个性、本能、矛盾和孤立无援的谈话，但在字里行间却透露出：我都是真正的挑战者，而您的行为则仅仅是出于自卫。迄今为止，您的缺乏诚意对于您本人来说，应该是足够的了。因为您已经证明了三件事：第一就是您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就是应当受到谴责；第三就是完全出于宽宏大量，您不仅准备饶恕我，而且还将或多或少地证明并且相信，我也是无辜的——尽管这与事实相反。我承认我们是在相互斗争，但是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卷入争斗的双方是平等的。每一方无论胜负都只是为了自己。还有一种则是与害虫的斗争，它不只是叮咬，而且还通过吸对方的血来保存自己。职业士兵就是这样的，您也是这样的。您未能使自己适应生活，但是为了过得舒适，无忧无虑，而且还无须自责，您力图证明是我带走了您对生活的适应性，把它装进了我的腰包。^①

在短篇小说《判决》中，作者又一次描述解释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内疚所构成的父子关系。一个名叫乔治·班德曼的青年商人接管了父亲的商行并且经营得很成功。他还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但却难以把有关他的计划的消息公布出来。乔治的父亲已

① 出处同上，第49—50页。

经年迈体衰，但是还并不很心甘情愿地完全依靠儿子管理自己的商行。他躺在床上申斥儿子公然欺骗了他。他怒吼道：“我还没死呢！你这个不成器的孽种。理在你自己明白在你外面都有些什么事情了。以前，你只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原来装得象个天真的孩子，而实际上却是个恶棍！你听着，你这个不得好死的东西，你去淹死吧！”乔治被这可怕的判决搅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从父亲的房间里冲出来跑到街上，从桥上跳了下去，哭喊着：“亲爱的爹妈，我始终是爱着你们的呀！”^①

卡夫卡受其父强有力的控制而不能自助的可怜境遇，较之他在他的小说中描写的结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自卑感和自责感是如此强烈，以致由于他自己的成功而偶然流露出来的自信心也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崩溃。他意识到，父亲的世界控制着他取得成功的一切物质保证。他断然放弃了以写作为职业的志愿，而在一九〇六年成了一名法学博士。他在布拉格的一个半官方性质的事务所里任职，取得一些明显的成就。一九一二年他结识了原籍柏林的年轻的“B小姐”，在一九一四年同她订了婚。同年七月解除婚约，一九一六年又重新订婚。最后又在一九一七年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借口是由于有病。有些评论家认为这病似乎是他自己故意造成的。一九一六年八月，卡夫卡在给马克斯·布洛德的一封信中分析了结婚的好处和坏处。他认为独身可以使自己自由，并可集中精力去工作。免除了任何日常琐事对心神的烦扰，他的精力就可以完全归自己所用了。如果结了婚，就不得不浪费许多精力，甚至全部消耗在“人类生活的血液循环中。”^②卡夫卡说，他

^① 弗朗兹·卡夫卡，《判决》，收于尤金·乔拉斯和罗伯特·塞奇主编的《过激故事集》，（纽约，一九二九），第208页，第210—211页。

^② 马克斯·布洛德，《弗朗兹·卡夫卡传》，（布拉格，一九三七），第186页。由吉·汉弗莱斯·罗伯茨翻译的英文译本于一九四七年在纽约出版。

的一切成就都是由于“保持独身”排除俗务而取得的。卡夫卡还曾向布洛德暗示过，他的病是由于精神上的原因引起的，这使他从婚姻义务中解脱了出来。^①在那封重要的“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描述了这种真实存在或想象出来的居于“订婚危机”和父亲的控制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那倒无关紧要。他的每一项决定都因为必须得到父亲的准许而受到限制。

婚姻最主要的障碍已经被无可置疑地证实了。为了供养，特别是为了指导一个家庭，在您身上看到的一切品质我都必须具备。我指的是您的所有品质，不管是好是坏，就象它们都有机地统一在您身上那样：强有力，伴随着嘲弄别人的恶习；健康，伴随着某种漫不经心；颇有口才但却令人敬而远之；有自信心却又对谁都瞧不起；老于世故却又专横跋扈；交游广阔而又不相信其中的大多数……所有这些品质相对地说我都缺乏，实际上，甚至是根本没有。正由于这样，我有什么权利去结婚？而且我还深知，正象过去我已经深知的那样，您自己为了您的婚后生活也进行了艰苦的奋斗，您甚至在对待孩子方面都是一个失败者……

我虽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虽然它从小时候起就贯串在我的生活之中。然而，婚姻并不是我自我反省的出发点。对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总是对自己提出疑问。在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您都以您的榜样，以您对我的教养来证明我的无能为力，因为我想要描述这种情况，证明您在一切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是正确而真实的，然对于那至高无上的权力，

^① “他把病归结为由心理原因所致，仿佛是对婚姻的解脱。”出处同上，第199页。

即婚姻，也是无可否认的真理了。^①

维系卡夫卡同双亲的关系还有一个实在的纽带，那就是他们共同信奉的犹太教。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关系也不是稳固而令人放心的。在他看来，他的父亲似乎只是由于要适应“某种犹太社会的一个阶层”，而接受这种宗教的。因此，在履行对宗教的义务方面，尽管有严格规定的限度，但他却总是马马虎虎地应付一下。弗朗兹非常厌烦这一切。在他一生的后期，他却对犹太思想和犹太教十分感兴趣了，他所感恩的是他母亲的那个家族，那非凡的知识和令人难忘的稳健作风对他颇有影响。而他对父亲的记忆则妨碍他完全皈依宗教……“我的新信仰使我厌烦了您的诅咒。”虽然，卡夫卡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学习和虔诚，复活了他的家庭对犹太教的信仰，但并没有使他同家庭更亲近。他的父亲明显地背离了犹太教的教义。这只能意味着“您下意识地认识到了您自己的犹太主义及对我的犹太教养的弱点，您绝不希望我提醒您这一点，反而用公开的怨恨接受我的全部提示。”^②

要想精确地估计这种父子间的暧昧关系对卡夫卡的创作究竟有多大影响是不可能的。没有比简单地作心理学上的解释更容易的了，因为它可以解释卡夫卡生活中和作品中的每一件事，所以就更加简单了。克劳斯·曼告诫说：“任何精神分析学家都可以把卡夫卡的那种哀怨的宗教感情——他的谦卑恭顺，对于上帝的不相信而产生的恐惧——解释成由一种明显的‘父亲情结’而产生的‘升华’”。^③ 就卡夫卡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审美良知和意识受到个

① 布洛德，《弗朗兹·卡夫卡“给父亲的信”摘录》，载于斯洛肖尔等人编，《卡夫卡资料汇编》，第44页。

② 出处同上，第49页。

③ 克劳斯·曼，为弗朗兹·卡夫卡的《美国》而作的序《原罪与格·诺诺》，无出版日期，第11页。

人的经历很大的影响而言，必须承认，这样的父子关系相应地产生了卡夫卡的特殊风格和观点，这正是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诚然，这种关系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反映。在种种情形下，当男性和女性的意志在道德观念上互相冲突的时候，男性总要压制女性。而作品中男女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也不允许他提出疑问和有效地抗拒这种意志。女性的意志及其存在在卡夫卡作品的人物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却大大缺乏理解、同情或最终的救助的入口。卡夫卡不愿接受妇女这种不费力气的同情，因为这种方式的同情会不断地受到男性父权的影响。妇女的作用是次要的，女人只能减轻烦恼和痛苦而不能消除它。卡夫卡作品中的许多痛苦状况是由于误解和缺乏善意的同情而引起的。不幸的主人公知道自己为什么是清白无辜的，并且拥有证据（然而通常都没有见证人）。但对他的指控却有着一种压倒一切的、无可摆脱重压的环境作为证据。于是，主人公尽管是无辜的（或正确的，或公正的），但还是不得不私下里服罪——莫须有的罪！对于这种怪现象，妇女的同情并没有什么用处，它只能提供无关紧要的遁词。总的说来，卡夫卡作品中出现的妇女的同情一般都是浅薄的，不重要的。

卡夫卡感到，要理解父亲是完全不可能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内疚感妨碍了这种理解。对于他来说，以其父亲为象征的权力是不可理解的。他的迷惑感和幻灭感两者都是惊人的和痛苦的。他父亲的行为是不合情理的。而这种不合情理并不能使卡夫卡同他一刀两断，或者毫无保留地接受。卡夫卡说，权威是很难理解的。人们既不能把它归结为合理的关系而同它妥协，也不能予以蔑视和置之不理。没有什么合乎理性的办法来评价一个父亲对待儿子的方式。卡尔·罗斯曼在同奥克赛登塔尔旅社的接待主任谈话以后陷入了绝境，他偶然的内疚就变得那样确凿无疑；似

乎他真的有罪似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在缺乏善意的地方要保卫自己，简直是不可能的。”^① 面对着不合理的或难以理解的环境，这种关于理性总崩溃的观念有时会以恐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短篇小说《变形记》中，一个要养家糊口的成功的推销员格里哥尔·赛姆沙，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脚朝天躺在自己的硬壳背上，稍稍抬起头，就看到自己弧形的肚皮被弯曲的皱纹分割成好几块。在顶部，一条毯子快要滑落下去，因为它自己无法停留在原处。他的许多与原来相比瘦得可怜的腿，在他的眼前绝望地摇晃着。”^②

这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梦。他从昏睡中醒来而进入了一个可怕的世界，并为发生的变化而狂怒。他原来简单而有秩序的世界已经崩溃。他已经成了被厌恶的对象。格里哥尔感到的屈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自己曾有过的愿望所造成的——他曾希望周围的日常秩序能突然崩溃。对格里哥尔的父亲来说，这种变形表现了他儿子的恶意。有一次偶然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引起父亲的狂怒，他扔苹果打他。一个苹果打进了他的背部使他疼了一个多月。这件事“甚至似乎在提醒他父亲，格里哥尔也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尽管他面目可憎而且总是愁眉苦脸，但也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家庭的责任要求他们吞下他们的反感而忍受他——忍受他，只此而已。”^③

正如格里哥尔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期望这种变形——这是他的罪责——，因此他必须心甘情愿地去死，以洗刷他给家庭带来的

① 卡夫卡，《美国》，第188页。

② 弗朗兹·卡夫卡，《变形记》，收于《过渡》杂志，第25期，（一九三六），第27页。

③ 出处同上，第二十七期（一九三八），第83页。参见哈里·斯洛育尔的启发性评论：“我们在这里有的是，亚伯拉罕·林肯艾萨卡的颠倒。”见《弗朗兹·卡夫卡——法西斯之前的流亡》一文，收于斯洛育尔等编，《弗朗兹·卡夫卡资料汇编》，第9页。

耻辱。换句话说，他必须把自己从他的家庭意识中消除，以赎回曾经想要独立于它的罪孽。为此，格里哥尔绝食了，结果，家庭就不要对其丑陋的存在负责了。变形是人对权威的有意抵抗的象征：这种权威是荒谬的或不合理的，这种情况也不能改变环境或减少罪恶。

卡夫卡在处理父子关系上的失败同他在上帝和人的关系方面的最后决定，有着重要的关联：要求一个习惯于“合情合理”的事物的人去接受再明显不过的荒谬的、不可理解的关于责任和服从的要求。只有一次，他提出了一个可能容纳不调合的道德和心理观念的计划或秩序。他进行艺术创作的初次尝试，即写作《美国》一书，以描写“俄克拉荷马大自然剧院”的广阔场景结尾。卡尔是看到这家剧院的招聘广告而首次想到这个规划的。广告上说：“如果你考虑将来，那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欢迎每一个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快参加我们公司！我们剧院能给每个人找到工作，各得其所！”卡尔感到惊奇和难以置信，“每个人，那就意味着我卡尔也是一个……这使他有资格申请一个他可以感到无所羞愧的工作。正相反，这是一个可以上公众广告的工作。”^① 卡尔发现广告上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被接纳为一名实习工程师，并不是由于他曾受过这种职业训练，而只是由于他曾偶尔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他没有任何学历证件这一事实似乎也毫无关系。他的愿望和要求就足以使他获准。卡夫卡从来没有到过美国。这种庞大的社会改革方案是大胆的梦想和追求愿望满足心理的产物，通过它，他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高兴地向他提供了他所在的世界拒绝给他的一切。他想逃避父亲，逃避自己错综复杂进退两难的个人世界，到一个异想天开设计出来的、和谐幸福的、

^① 卡夫卡，《美国》，第272—273页。写于一九一三年。

赞美上帝的理想世界，去寻求庇护。^①这是卡夫卡平日关于人为宗教以及保障伦理道德而奋斗的观念的一个例外。它非常肤浅，说明了这一事实，它只是在他从日常忧患和追求不确定性的重压下解脱出来的短暂一刻。

卡夫卡的作品是根据父子关系的困难和恐惧而写成的。简言之，有以下几种情况：卡夫卡感到自己同父亲有根本的不同——气质和天赋方面的不同。但是他并不由于这种不同而置家庭于不顾。父亲在家中的势力和与其相关的权威使他不能为自己采取任何直截了当的措施，诸如反抗或离家出走等等。他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能自己作主，而要让父亲象一个法官那样来裁决。如果他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作出决策，就会因内疚而产生变化和受到限定。这使它们变得半心半意和模糊不清。此外，还会有一种混着愤怒和仇恨的绝望情绪笼罩着他。似乎他必须接受对他来说是毫无道理并且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寻求平静的努力的特点是反抗和屈服的矛盾心情：对不合情理，经常是荒谬绝伦的权威的反抗，对权威的必然性和权势的屈服。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特点：如果按照逻辑思维进行评价，那它们就可以互相抵销——荒谬绝伦，不合情理，吸引力量，爱和恨，恐惧和猜疑。这些互相矛盾的特性的效果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令人战栗的喜剧，如《变形记》；有的是使人厌烦的绝望，如《审判》；有的则是恼怒，如《城堡》。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卡夫卡的艺术总是用来描写被疑虑和怀疑主义围绕而寻求精神庇护的曲折的人生历程，而这种庇护则始终未能获得。他的追求总是以失去理性的混乱而告终，任何合理的法则都宣告无效，其最终几乎总是主人公的死

^① 参见《世界作为赞美上帝的一出戏剧》，赫伯特·陶伯，《弗朗兹·卡夫卡，对其作品的解释》，汉弗莱斯·罗伯茨和罗杰·豪斯翻译，一九四八年出版于伦敦。

亡。^①

二

关于卡夫卡一生中这个重要而又持久的事实——他和父亲含混不清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内疚心理，马克斯·布洛德说：

……不可否认，卡夫卡的情况可以作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解释似乎太容易了。事实上，卡夫卡本人对这些理论是非常熟悉的，但并不很重视，只是把它看作事物非常粗略的和近似的图象。他认为这些理论在细节上并不是很恰当的，特别是关于冲突的本质。^②

布洛德给精神分析学提供了一个机会，但他坚持认为，它对基本原因不可能探讨得更深。他估计这些基本原因这比任何心理学所能做出的任何解释要重要得多。卡夫卡完全可能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因为他们两家离得不远，而且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就是邻居。斯洛肖尔认为，二十世纪奥地利的经济状况和道德状况已经给精神分析和神秘学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③卡夫卡具有精神分析学方面的知识，或者说这种知识与他的情况有著特别的相关，这已经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如果这只是对一篇传记的精神分析，那对任何人来说，要证明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可以列出许多卡夫卡本人也承认的证据——如

^① 卡夫卡称他自己的死亡为回到父亲那儿去，伟大的宽恕日子。“我的生命是出生之前的迟疑”。陶伯引用《弗朗兹·卡夫卡》，第218—219页。

^② 马克斯·布洛德，《卡夫卡：父与子》，《党派评论》，第4期，一九三八，第21—22页。参见布洛德，《弗朗兹·卡夫卡》，第31页。

^③ 斯洛肖尔，《弗朗兹·卡夫卡—法西斯前的流亡》，收于斯洛肖尔等人编，《弗朗兹·卡夫卡资料汇编》，第9页。

他的笔记、信件等等。^①但是对一个作家曲折的一生及其文学作品如此简单的处理，那就很可能出现解释上的严重忽略，甚至肯定有一半以上都不符合卡夫卡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而且还会否认卡夫卡本人关于精神分析学的论述的相关性和重要性。^②

弗洛伊德对于卡夫卡的一生，能作出一些什么样的分析呢？对父亲的敌意来自一个男孩对母亲的爱，来自“返回母亲怀抱”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经常受到父亲的干涉。他拦在中间，自己享受着孩子认为应当属于他的爱。有很多原因使对父亲的恨受到压抑。首先当然是父亲的努力和权威。其次，事实上这种恨并不是纯粹的，它还夹杂着作为儿子的责任感，有时甚至还夹杂着对父亲的脉脉温情。于是父亲便成为孩子自由地争取本能满足的首要障碍。^③

一九〇九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一个五岁男孩的恐怖症分析》^④。在这篇论文以及后来关于焦虑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展示了

^① 参见布洛德，《卡夫卡：父与子》，在上述引文中，第22页：“……必须承认，卡夫卡本人曾经论述过，他对父亲的优越地位的态度既不是在‘日常的思考’中形成的，而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亲身经历的，’这一事实似乎肯定了精神分析的观点。他关于他父亲的‘教育方法’的言论——这些言论在他许多有关他父亲的‘失败的教育’的日记条目中，都得到了详细的论述；他论及教学法的书籍，其基础是斯威夫特论点，”儿童应在家庭之外而不是由他们的父母抚养成人。这一切都肯定着精神分析的观点。还可参看“卡夫卡关于儿童教育的两封信”，布洛德《弗洛伊德·卡夫卡》，第261—268页。

^② 有关全面完整的对卡夫卡的精神分析解释，可参看查理·耐达的《卡夫卡：他的思想和艺术》（纽约，一九四九）。保罗·吉德曼的《卡夫卡的祈祷》（纽约，一九四七）把精神分析学作为几种批评战役之一而加以运用。

^③ 母亲自己也设置了一些障碍——例如对幼儿的教育是必需的，使他渐渐不再依赖于她的那些障碍。但是父亲的存在以及他有意地事先占有儿童，并盲目地认为是他自己的特权这一事实，是一切障碍中最强大的障碍，最有可能导致仇恨，最终导致焦虑。

^④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三卷，第149—289页。

一个孩子对其父亲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对于父亲，他感到自己有一种嫉妒敌意的俄狄浦斯态度，而在母亲尚未作为引起纠纷的根源而受到注意之前，他一直是忠诚地热爱着父亲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来自某种矛盾心情的冲突——一种牢固的爱和一种并非毫无理由的恨，两者都指向同一个人。”^① 母亲撤消注意力这种行动的影响是双重的：首先是孩子同母亲建立起的联盟。最初，孩子的个性感的唯一源泉，长期受到粗暴的破坏；其次是孩子关于重要性的观念（幼儿时代的重要性观念是很单纯的、生物性的），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的本能的反应是对这种使他困窘的根源进行盲目的斗争。当他的行动不成功时，孩子就被迫进行毫无策略的退却。这时，“敌人”在他心中激发了一系列还不成熟的感情：敬畏、仇恨、恼怒、失望——夹杂着孩子对父亲（作为一个方便的“性对象”）天然的爱，引起他简单的生活的相当严重的分裂。这也是在今后的生活中，等待着他的痛苦而复杂经历的最初一课。

对这种失望及其对孩子性格的影响的衡量，就是控制的力量，用这种力量，父亲调整并规定了儿子与母亲新近建立起来的关系。由于父亲的严厉以及对“家庭的热忱”只能解释为孩子满足个人欲望的严重障碍，后者还会相当强烈地、有时持续地对其根源产生恐惧，因为当他越长越大时，就会发现这个障碍还会以其他方式妨碍他。在某些情况下，也许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服从的教义和痛苦愚昧的戒律明显地控制着孩子那日益增长的对外部世界的意识，这时，连母亲也成了这种父亲的意志的囚徒。这并不是说，母亲一定是苦于父亲的统治（她很可能出于敬和爱，愿意服从它）；更确切地说，是孩子在设想甚至相信，母亲是在分担着他所受的约束，因为她与他同样地急于要使他的愿望得到

^① 《焦虑的问题》，亨利·阿·邦克译（纽约，一九三六），第38页。

满足。因此，父亲就成了暴君。父亲的权威是不可怀疑的，他热切地盼望着放松这种控制。如果偶然稍稍放松一点，他就感激不尽了。以公正或有理为根据去抗议这种控制，只会加重创伤。因为对暴君据理力争是没有用的。

进一步说，随着孩子的成年，就会有能力从表面上区别父亲意志的合理和不合理，就会认识到其中有些是荒谬的。如果父亲的意志类似暴君的意志，他的命令荒谬和孩子认识到这种荒谬，也很少有可能改变这种权威的效力。结束这种无可忍受的状态的办法是很多的：例如与家庭一刀两断、自杀、谋杀。但是这些想法中的任何一个都往往会在儿子方面激起一种强烈的意愿，一种决心即：“必须粉碎这种错误的想法。”如果这种想法是微弱的——完全没有摆脱父亲意志的轨道——，其解决办法就会如此令人失望，以致于很难把它称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孩子可能会终生都在无休止地追求独立自主的决策权，而每一次这样的努力都很可能要归于失败。他不能同父亲决裂，但又对他忍无可忍；而每次决裂的企图都会被对他委屈求全的愿望所阻挠（为了和解的目的），而每一次对他委屈求全的决心又会重新激发起决裂的愿望（由于暴君式的绝对荒唐或蛮不讲理）。

“恋母反应”（oedipus reaction）——早期父子关系发展中的这个现象对孩子接受社会和道德束缚的内容和激烈程度都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良心和超我会取代“恋母关系”（oedipus relationship）：“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抚养他的，一直被视为理想典范的那些人对孩子的影响也会逐渐被超我所取而代之。通常，超我会不断地发展，变得越来越远离它的原型——即双亲，最后变得更加“非人格化”了。①这样，超我的

① 《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新介绍性演讲》，第92页。

发展必然会要超出它的渊源而从孩子所处的学校、教堂和社团这些传统或环境中采用随处可得的事物或形象。当然，超我会发展成伊底和自我的内在威慑力量。

于是，精神分析学家就可以如此解释有关卡夫卡的各种情形了，而且可以不费力地用这种解释对他的每一作品进行评价。卡夫卡对父亲的矛盾态度，父亲对他的控制权力，影响了其个性中良心或超我的发展。卡夫卡心目中的上帝形象，尽管令人感到奇怪，但却是很明显的酷似其父。他的上帝是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谁要是想同这个上帝亲近或相互理解，那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个上帝的专横，使他每走一步都犹豫不决。无论何时一旦他有了一点自信心，只要一回想起这个上帝的惊人的专横，就会感到，相互信任和谅解的前景是不可思议的。卡夫卡创作的《苦役营》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它的令人奇怪的结论不祥地暗示，苦役营这种精心组成的苦刑机构毕竟是公正的；任何能使“罪行”得到宽恕或“罪人”不难得教的改良主义主张，最终都会被否决。几乎卡夫卡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描写父亲的奇怪形象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审判》、《城堡》和《苦役营》等作品都把父亲的地位描绘为难以接近的和不可理解的上帝，如同《约伯书》中怪诞的上帝。或者是基尔凯郭尔的《恐惧和战栗》中严厉而难以对付的上帝。

卡夫卡作品的自传性质使人们很容易对它们进行精神分析性的评注。这一点卡夫卡本人也是承认的，虽然他把这些评论谴责为“简单”了。他艺术上的全部成就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围。它是对一种非理性的伦理道德的审美描述——一种超越理性的伦理和宗教，或者说需要理性的中止才能理解它们。它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不能用一种简单的办法。任何哲学和心理学的流派都不能充分束缚或限制它。卡夫卡同其他许多欧洲和美国作家一样，不相信简单的理性主义。这些人不赞成十九世纪晚期那些科学家的乐观

和自信，否认那种科学及其十八世纪伙伴的理性宗教已经相当令人满意地回答和解决了有关人神关系的矛盾问题。

如果卡夫卡活得更长久一些，他就能看见弗洛伊德在《摩西和一神论》中关于犹太主义所作的论述，弗洛伊德可能会对他有更多的论述。因为卡夫卡在精神分析实验室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反对这种做法。精神分析学家对治疗步骤的信心使卡夫卡不以为然。他认为精神分析学家企图在精神病和神经病的范围内寻找心灵和感情消沉的根源，是在逃避最基本的责任。他实际上认为，简单地把精神病的根源从表面上再现出来，对非理性进行有意识的观察研究，并不能改变和改善病况。

想一想把它叫做一种病是什么意思吧。这是精神分析学家宣布已经搞清楚的许多症状之一。但我宁可不要把疾病看作疾病。我认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治疗方法是一种不可救药的错误。所有那些所谓的疾病，尽管看起来很可怜，但我认为实际上是信仰，是处在忧伤之中的某个人试图在某个故土上的停留。因此，所有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查出是宗教信仰的根源，恰恰就是他们所谓的个人“疾病”的来源。众所周知，时至今日，毫无疑问不再有宗教的一致性，而是分成了无数的派别。大多数派别都是限定在个人范围之内，或者也许对任何一只卷入事件中的眼睛来说，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旨在寻求真正母土所作的停留……是在其生命过程中完成的，日后也将继续在同一方向上构成他的生命（也包括他的肉体）。在这里，谁能希望得到治疗呢？^①

关于宗教和宗教冲动，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说。

^① 弗朗兹·卡夫卡，《沉思默想》，收于斯洛博尔等编，《弗朗兹·卡夫卡资料汇编》，第70页。

但卡夫卡认为，把宗教信仰仅仅概括为皈依“非个人的父亲偶像”或者某个成功的宗教人物，实际上就是看成只不过是利用宗教作为个人精神病的庇护所，那简直是一派胡言。弗洛伊德把宗教解释为一种具有宏大规模的幻觉，可能会从卡夫卡那里得到如下述这样的回答：把宗教看成一种幻觉是对的，如果你的“幻觉”一词指的是在事实上不能立即得到证明甚至最后也不能得到证明的信仰，而不是什么可以用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超越自然，使之适应于调节人为的因果关系的奇迹。此外，卡夫卡还反对他把信仰当作疾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就好象一个实验室或官方的声明就可以驱除对上帝信仰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似的。他认为这和理性是相违背的，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或者说赞成这一学说的趣味起码不是很高雅的。弗洛伊德还把宗教描绘成文化的一个方面，如同一个规模宏大的升华，人们把恐惧和困难投了进去，它就象一个可以容纳邪恶的打击的水库一样。因此，尽管诸神都是人造的，被用来抚慰对大自然感到恐惧的人类，并用来作为灵魂的（或幻想的）避难所，到那里可以逃避严酷的社会文化所造成的痛苦。弗洛伊德总想除掉这些幻觉，因为它们总是在虚幻地满足愿望，而妨碍对人的弱点进行诚实的评价。精神分析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上帝的控制变为人类社会的控制，“诚实地”承认“一切文化法则和习惯的纯粹人性的本源”。他说，结果应导致一种按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的健康的、大胆的观点，对享受的节制，对痛苦的谨慎克制。于是，现实的打击不会导致错觉或宗教的先验模式，而是通过知识或自觉的意识导致对情形的明智控制。从根本上说，弗洛伊德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坚信对生理和心理机制的自觉意识将导致对它们教感的估计和调整。这种重新调整可以消除不幸和神经病这种心灵上的迷途，人的头脑不得不把它纳入精神的领域。弗洛伊德说，“忠实的信徒对遭

受某种精神病痛苦的危险是有很高的免疫能力的，因为通过接受宗教这种普遍的精神病，他已经免除了产生个人精神病的危险。”^①

三

卡夫卡对弗洛伊德关于宗教的观点的反应应该是很清楚的。在弗洛伊德那里，在人的升华过程中教视为越轨、误解和变形的，在卡夫卡那里却坚持称之为一种存在。想象上帝的形象或在人的意识中建立上帝的形象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有理性的上帝。由于偶然的幸运他把自己降生到人间，其行为举止如同一个有教养的绅士。他对所有到他那里寻求保护的人都给予了形式上的庇护。可是在遇到意外灾祸时，这位上帝可能就恕不负责了。于是，每一个这样的推卸责任都会大大降低他的恭顺信徒对他的敬意。^②

第二种人造上帝是一个神话式的虚构的形象。他的温情、宽厚、仁慈、怜悯等品质正是人们为抗拒人生现实苦难所不可缺少的保护手段。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幻觉的一部分。他还信心十足地预言，这种幻觉将来一定会消失。这样的上帝不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存在，而他的缺乏合理性正是他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先决条件。对他的祈祷赞颂和顶礼膜拜是神学原则付诸实行的两种标

^① 《一种幻想的未来》，第76页，第77页。这部书写于一九二七年，因此卡夫卡不可能读过此书。然而，此书与精神分析疗法的总意图和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卡夫卡在一九二四年他去世很久之前就从未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中推断出此书的结论。

^② 讽刺唯一能以任何方式取悦于启蒙时期绅士们同这种上帝的对立。比如，我们可以在伏尔泰的《老实人》中找到这种例证。卡夫卡把讽刺，特别是针对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讽刺，看作幽默的一种低级形式，当然，基尔凯郭尔用它作为一种对付同时代人的武器。但是，无论是在基尔凯郭尔还是在卡夫卡看来，对上帝的方式的讽刺都是不可思议的。

志。这个上帝忍受着人类罪恶的沉重负担，以及肉体上的痛苦和地质上的扰乱。弗洛伊德和卡夫卡两人都希望看到这样的上帝形象的破坏和消失——弗洛伊德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它干扰了二百多年来大规模的科学重建工作；卡夫卡如此则是由于它对真实的上帝的现实所作的蓄意的、愚蠢的否定。而这个上帝的行为方式既不温和也不会体贴人。

于是，第三个人造上帝形象就是基尔凯郭尔和卡夫卡的上帝。这个上帝并不否认对世间罪恶的责任，也不否认对要不然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的坏事的责任。但他对这些罪恶和坏事的抱怨漠不关心。他既不是主持正义的宽容的护民官，也不是安抚入心的庇护所。他保持其严酷无情，表现出异乎常情的残酷，丝毫也不能用理性的尺度去衡量。他在罪恶——善良——罪恶之间波动，反复无常，使人无法理解。这并不是由于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两分法，而是由于他不受任何伦理道德评价标准的约束。人类对第一个上帝的顶礼膜拜是消遣；而对第二个上帝的顶礼膜拜则是对非理性和不加考虑的屈服。用巴斯噶的话来说（卡夫卡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过他的著作），人的体力和智力有限，这就限制了他对无限的认识和控制。

我们在一个广阔的天空中航行，从起点到尽头，永远在无常之中漂流。当我们想把自己系在某一点固定住的时候，它立即就摇晃起来并且离开我们。如果我们跟着它，它就巧妙地躲避我们，从我们身边溜过，但我们抓不着它，它永远地消失了。无论什么都不肯为我们而停留。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自然状态，这与我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我们热切地希望找到坚实的土地作为极为可靠的基础，以建立一座达到无限的高塔。我们的整个基础崩溃了，地而裂开变成了深

溯。^①

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描写的就是人和这种人格化上帝的关系。这上帝是一个拟人的法官，在他那里，人们的理性要求是毫无结果的，因为他没有注意到甚至根本不关心人们想要获得拯救的合理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的约伯书以及亚伯拉罕和以萨克的故事，还有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说引起卡夫卡浓厚的兴趣的缘故。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对亚伯拉罕的故事是那样地入迷，通过阅读基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②把它当作了他自己的哲学入门钥匙。为了正确评价卡夫卡的文学作品，避免作简单化解释的危险，我们应当把这一点记在心上。

卡夫卡的风格首先是现实主义。这一点如果从细节上看更是非常明显的。卡夫卡对背景的描写是很清晰的，一看马上就能理解。斯洛肖尔说：“如果表现主义者把自然事件变为神秘，那么卡夫卡则力图用事物最简单过程来表现神秘。”^③卡夫卡把福楼拜看作风格的仲裁人，他也在不断地探求描写事物的最接近现实的方法。尽管他煞费苦心才实现了这种清晰，但却是虚幻的。在读者注意力的范围内，事实的描写是清楚明白的，也能被正确理解，并言之有理。但是超出读者注意力范围以外的部分，就出现了朦胧，读者就得被迫调整自己的角度，否则就会把整个著作视为荒谬（读者的注意力一般适应于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思维顺序内的

① 《沉思录》（纽约，一九四一），第26页。卡夫卡拒绝接受一种基督教媒介的概念，也就是巴斯噶论点的颇具说服力的结论。参见，卡夫卡，《审判》（纽约，一九三七），第198—199页，以及陶伦，《弗朗兹·卡夫卡》，第216—217页。

② 普林斯頓，一九四一年版。写于一八四三年。

③ 斯洛肖尔，《弗朗兹·卡夫卡—法西斯之前的流亡》，收于斯洛肖尔等编，《弗朗兹·卡夫卡资料汇编》，第27页。

一连串事件)。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表现而是寓言或象征。^①只是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于是才注意到细节的现实主义是经过精心构思的，用来表现作为人类行为整体的、特别是当人类从事于精神探索时的整体行为，是不可理解的，马上就会被读者视为荒谬。

更为适合卡夫卡思想的是反讽或反讽喜剧的运用。在卡夫卡的上帝眼里，人的各种斗争都是可怜而荒谬的。更有甚者，他对它们是漠不关心的。它们之所以荒唐是由于人类自己对它们的绝望的观察。人类最迫切的斗争是建立同上帝的良好关系。尽管这种努力使他们气喘吁吁，而从可见到的将来来看，这种努力是愚蠢的、可笑的。人们在受到嘲笑之后，马上就会引起深思的沉默。似乎热切的努力或斗争注定会突然显得荒唐，就如同这些上帝的崇拜者脚下的基地会突然消失。衡量这种讽刺的尺度并不是任何特定情况的自然滑稽闹剧，而是事件本身所表现的主题的严肃性。马克斯·布洛德描述了卡夫卡读给朋友们的许多作品中的一部。（在读到卡夫卡喜剧式的章节时）“我们全都大笑起来，但是我们很快就沉默起来。这不是我们平时习惯的那种笑。只有天使才敢这样笑……”这是卡夫卡的幽默所激发的一种新的笑，近似于对最后真理顿悟的那种严肃的笑，“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笑。^②卡夫卡作品中有些可笑的情节之粗鲁使人想起轻歌剧中的丑角。这是经过构思的，用以表现一个人毫无希望地追求成功，追求上帝，甚至只是追求一顿晚餐的一颗绝望的良心。埃德

^① 更严格地说是作为象征。因为，正如布洛德指出的那样，寓言指的是抽象与具体真理的一种认真的对应性，而象征则允许有一个无穷尽的解释过程，并且为意义的变换提供了与卡夫卡的探索相一致的性质，“涉及到这么一种力量，它使个别的情形扩散到无边无际的境地。”布洛德，《弗朗兹·卡夫卡》，第236—237页。

^② 出处同前，第163页。

温·缪尔说：“他的幽默使我们回忆起巡回喜剧演员和马戏团。这种幽默的基础是极为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推理。这种讽刺和幽默的独创性是和他的最深刻的严肃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卡夫卡的困难是可笑的（在《城堡》中），但它们同时也是令人绝望的。”^①

卡夫卡用宗教的惯用语表达文学上的讽刺和幽默是很认真的，这便引起了荒谬的概念。基尔凯郭尔首先指出了这个概念在神学上的重要意义。我们习惯于当一事物违反常情或没有道理的时候认为它是荒谬的。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把它视为愚蠢，就是把它看作不可思议的或危险的。基尔凯郭尔用荒谬这个概念作为上帝对待人的方式的一个质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信奉上帝，我们就必定通过它的理性背景而曲解荒谬的概念。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某种行为、幻想和希望觉得荒谬，我们就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认识，把它视作超出人的理解能力之外的别的东西。这种对某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在认识上的屈从，相当于信奉上帝的一个具体行动。这就是亚伯拉罕关于信仰的启示。人和上帝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按照人的理性来衡量的话。但如果用人对于上帝的信仰来加以限制的话，就任何矛盾都不存在了。于是，矛盾就成了人们追求信仰的一个特征。正如大卫·斯文森所指出的：“他是什么样的人和他根据信仰想要修行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他的理性的具体表述。因此，如果信仰是完美无缺的话，那就确实不存在矛盾了。但是对于在修行过程中个别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对心灵变化过程专横的限制，这种矛盾就是

^① 埃德温·缪尔，《弗朗兹·卡夫卡》，收于斯洛肖尔等编，《弗朗兹·卡夫卡资料汇编》，第59页。

不可避免的。”^①

这种关于荒谬的见解与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工作中的“辅助性阐释”在表面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做梦者在醒来的时候，考虑他的梦中荒谬和难以置信的部分，以便限定自己对它们的接受，他说：“算了吧！那只是一个梦。”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则要求他的病人不要把这些梦中的事情视为荒谬。与此相反，他要求病人把它看作取得精神分析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对于弗洛伊德或是对于基尔凯郭尔来说，人们都需要接受与充分安全原理相反的东西。但这种相似性在这一点上却被破坏了：要求病人认真对待荒谬的事件，因为这种态度有助于发现它的原因。于是，他就能因为它的荒谬性而否定它。基尔凯郭尔要求他的读者认清荒谬，最后他便可以采纳它作为通向较高真理的线索。

接受这样一种建议会使人产生一种极大的焦虑，几乎难以忍受的焦虑。因为这意味着撤走了他原有的理性支撑。他原有的生活秩序变得毫无意义——而这种秩序则是他所在的社会给他规定的，甚至是带强制性的。他的理性就会告诉他，怎样做或什么样的事是荒谬的。他对信仰的追求（盲目的寻求）、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搜寻，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无法诉说的焦虑。弗洛伊德把这种痛苦、不安、烦恼的焦虑感解释为追求本能满足突然受阻的结果。他认为焦虑型精神病是一种保护机制，是自我在抵挡可能作为压抑的结果面出现的危险。“焦虑是对危险情况的反应。它是自我为避免危险而进行退却的一种迂回办法。”^② 精神分析学家把这

^① 大卫·弗·斯文森，《简论基尔凯郭尔》，利连·马文·斯文森编（明尼阿波利斯，一九四一）。关于同存在主义推论相关的对于“荒谬”的现代解释，参见艾尔伯特·加缪《西西弗斯神话及其他论文》，贾斯廷·奥右赖恩译（纽约，一九五五年版），于一九四二年在巴黎首次出版。特别参见《弗朗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一文，第124—138页。

^② 《焦虑问题》，第35—66页。

种情况当作“疾病问题”来处理，认为治疗不仅可以把病医好，而且还可以把伴随它的焦虑消除。基尔凯郭尔把恐惧和焦虑看作寻求信仰的过程中所必须有的感情因素。这也是卡夫卡写作的一个样板。对待上帝的方式是要受到无常和不安的折磨。他不顾耻笑和恐吓坚持下去正是证明其信仰的一个具体行动。我们注意到，格里哥尔·赛姆萨为他的变形感到屈辱和羞耻。这种屈辱和羞耻是从他所熟悉和理解的社会中解脱出来所必然要经受的。他在这个社会曾取得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而要解脱则要接受一个可怕的外表。《变形记》的头一部分就是描绘这种外表给他带来的恐怖。在《审判》中，约瑟夫·K一直坚持不向难以理解的判决的荒谬和恐怖屈服。然而，最后他还是不表示抗议就走了。他对自己的死亡的可悲性和矛盾性就掌握在两个法警手中，并没有表示异议。

逻辑是不可怀疑和不可动摇的，但是它不能忍受一个求生的人。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哪里？他从来没进去过的高级法庭又在哪里？他举起了双手伸开了所有的手指。

但是一个法警的手已经卡住了K的喉咙；另一个则把尖刀插入了他的心脏，并且把刀尖转了两圈。K那逐渐失去视觉的眼睛还可以看见他俩。他俩也脸挨脸地对着K，注视着他的最后的动作。他说：“象条狗似的！”似乎是在说他希望死亡后这羞辱还在。^①

面对奇怪的和令人讨厌的环境所产生的焦虑，在《审判》的另一章里可能描写得最好。有一天，约瑟夫·K在没有审讯的时候

^① 卡夫卡，《审判》，第288页。

来到审判厅。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他感到压抑和发昏。女仆告诉他不必担心，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是异常的。空气“由于差不多每天都有众多的诉讼人来到这儿，因而使人呼吸都很困难。”她还说，K一定得牢记，“‘各种洗过的衣物都在这里晾干’”。她还使他相信，“‘每一个人最后都会习惯于它的’。”K的一阵眩晕以及因为在这些人面前表现出软弱而感到的羞愧难当，以至于他不知如何回答她是好。（《审判》第84页）在这里，描述了两种不同的焦虑症候：一种是对生疏的没有吸引力的环境的发自内心的厌恶。第二种是因为他竟然在这些环境中表现出虚弱而产生的羞愧的极度痛苦。这种感受在K和肖像画家廷托拉里会见的时候曾重复出现。K是去向他征求对所处的环境的意见的。这两个事件使人想起在一种不可克服的恶劣环境中的恐怖感和由于失去自尊和表面的尊严而感到的羞愧。眩晕是一种常见的对不能忍受的环境的肉体反映。

参考亚伯拉罕的事迹最能说明卡夫卡同精神分析学家们在宗教和伦理学方面的重大分歧。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出发，那就会认清亚伯拉罕的意向是充满杀机的。基尔凯郭尔肯定会同意这个看法。一个人如果不信仰上帝的法令（这种法令可能是荒谬的），因为要杀自己的儿子，实际上就是犯有谋杀罪。由于没有宗教裁判所，因而必须把亚伯拉罕交付世俗法庭来审理。于是精神分析学家就可能会对这种意向的荒谬性进行仔细的研究，就会认为亚伯拉罕对他的灵魂赦免是一种巨大的和危险的幻觉。他可能会把亚伯拉罕看作危险的和不可救药的杀人犯而关进精神病院，并且用他关于目的和行为的科学术语来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①卡夫卡

^① 我们可以在舍伍德·安德森收于《小城故事集》中的故事《虔诚》（第55—37页）找到美国作家对这个主题的处理。杰西·本特雷试图把他的儿子大卫作为献给上帝的祭品，但大卫逃跑了。本特雷没有如愿以偿，是因为他的信仰是固定在获得物质利益的愿望之上的，他期望着他的祭献会得到奖赏。

在这个主题上表现得反复无常。^①在他写《城堡》的时候，曾仔细研究过基尔凯郭尔的著作。在这篇小说中，卡夫卡通过巴尔纳巴斯一家的故事充分发挥了基尔凯郭尔的论点。阿玛利亚愤怒地拒绝接受奈尔丁尼的命令。她认为这个命令是荒谬可厌的。其结果是，在奈尔丁尼这方面却并没有采取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他甚至可能完全忘记了这件事。阿玛利亚及其一家失去了在村里的地位，家境衰落，阿玛利亚不得不挑起赡养过早衰老的双亲的重担。就象K对她说的，阿玛利亚的拒绝是正确的合理的。那是符合理性标准的。然而阿玛利亚最后还是认识到这一事实，即她的行为是对信仰的要求的挑战——而这些要求是可厌的和不合情理的。卡夫卡无论是在这里或是在别处，都想要说的是任何人都不能用合理的事物的语言来评价他的上帝的要求。只有接受非理性，一个人才能超脱理性伦理观念而开始同上帝建立另一种神秘的关系。

四

不知为什么，人类总是悬于虚无和无限之间，人类不能用任何合理的方法对虚无和无限进行度量。他无限的经历留给他叹息和怀疑。他所表现出的可怜的滑稽味正是这些经历所带来的结果。按照基尔凯郭尔的看法，人类是建立在既是无限永恒又是有限的基础之上的。假若他希望抓住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就必须接受他的存在的奇异本性和摒弃有限的理解的欢乐。上帝以奇特的方式显现其本身。平凡的可能重要，重要的可能平凡。对于

^① 参见卡夫卡致罗伯特·克洛普斯多克的信，收于斯洛肖尔等编，《弗朗兹·卡夫卡资料汇编》，第73—74页。还可参见弗朗兹·卡夫卡，《未完成部分：讲述普罗米修斯的四种英雄传奇》，载《过渡》杂志，第22期，（一九三五），第25页。在这篇文章中，卡夫卡讨论了普罗米修斯故事的四种可能变体。

基尔凯郭尔和卡夫卡来说，存在既是滑稽可笑的也是可悲的，所谓可悲是由于永无休止的抗争，而滑稽可笑则是对自己有意曲解和贬低。从人类的有限论观点来看，无限是无可比拟的。只有在见识的时刻(Innerlichkeit)，人类才能看到和永恒的这种关系，正当痛苦的理解的时刻，他得到了一种对外在现实之无能和虚弱的意识，此时，通过这些方法，永恒变成可以理解的了。他那坚持不懈的探求这种理解和无数的疑虑，以及顺便的略微一瞥，都使得卡夫卡作品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各式各样幽默的，自相矛盾的，意义含糊不定的和奇特的种种情况。

就某种意义来说，卡夫卡的上帝是他的“父亲形象”的扩展和放大，他父亲的每个怪僻和暴虐专横，都在较大的范围内对他的行为作了夸张。在那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可以这样解释，他和父亲的关系在外部和压力的影响下并没有消失，但这种关系还时时出现在卡夫卡后期与宗教的斗争之中。另一方面，从极表面的意义看来，卡夫卡表现出的矛盾暧昧只不过是时代的普遍传统崩溃的写照而已。按照埃德温·贝利·伯格姆的说法，这至少是卡夫卡的目的之一。伯格姆说：“现代个性的矛盾‘被隐藏在[卡夫卡]本人的永久性的矛盾之中。”^①这种解释可以说明一个乡村医生的奋不顾身的绝望呼喊，这个医生却成了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的残酷的忘恩负义者的牺牲品。

乘坐着一辆由神奇的马拉着的人间马车，赤身露体地暴露在这个不幸年代的凛冽寒风中，我，一个老头儿，往前继续漂泊、流浪。我的外衣拖在马车的后面。我抓不着它，这些有病的恶棍们没有一个肯伸出一小手指头帮我一把。背

^① 埃德温·贝利·伯格姆，《弗洛伊德·卡夫卡和信仰的破产》，载《音韵》杂志，第三期（一九四三），第163页。

叛、背叛！一次就足够了，我错误地听从了夜钟的指挥。……但做过的事再也挽回不过来了。①

但是，卡夫卡作品的伟大意义不是那个时代已崩溃成为被破坏的传统的一片瓦砾和导致精神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和上帝的关系——和相应地解决一切困境——是而且一直都是很有限的人和无限的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凡的和私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任何外部组织或系统只能表而地给予帮助罢了。因此那个村长在城堡中回答 K 有关统治权威的问题时说：“只有象你这么个百分之百的陌生人才能提出你所提出的那种问题。是有一个统治权威吗？只有一批统治权威们。坦率地说，从庸俗意义上来说，追查我们的错误不是但们的事，正如你这个案件中，错误根本就不曾发生。最后谁能说那是一个错误呢？”②

该城堡的性质只有通过那些乡村村民们才能了解到一些零碎的情况。证件和公文在桌子上和角落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官员们以某种奇特的不规则方式长时间地努力 working。由城堡通向乡村也无现成一定的路可走，官员们艰难地无规律地通过这些道路。“时而，其中有一条路上走的人已越来越多了，大多数的马车在这条路上通行，时而又是另一条路，每种车辆都混乱繁忙地在那里行使。然而，这种状况的变化是由什么操纵的？始终未能找出其原因。”（《城堡》第278页）官员们也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例如，K 急于想见到的那个官员克拉姆，来到这个村子时是一种样子，而当他离开时，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在他喝了啤酒后和他喝啤酒前看上去的样子显然不同，他醒时和睡着了也不一样，

① 弗朗兹·卡夫卡，《乡村医生》，载《新方向》，一九四〇年，第442页。

② 弗朗兹·卡夫卡，《城堡》，（纽约，一九四三年），第85页。

他独自一人时也和同人们谈话时不同””。(《城堡》，第228页)这些表面上的变化和古怪行为简略地勾划出，企图通过理性掌握上帝的属性是愚蠢的。K在他那不间断地步入歧途探求这种满意结果的过程中，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因为在当时受到自己洞察力的限制，他疏忽了诸如回答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倾听官长布尔格尔唠叨之类的重要事情，布尔格尔对“城堡事务”的那些单调乏味的叨咕象催眠曲似的使他入睡。一次，布洛德问卡夫卡，他若处在那个地位会不会抱有任何希望，卡夫卡回答说：“对上帝抱有很大希望——无限希望——但对我们自己则不抱任何希望。”^①此外，正象对上帝本性的了解茫然一样，人类也未能全面觉察到他，上帝的行为会时常在人们眼中显得十分邪恶、污秽和荒淫。这就是约瑟夫·K的反应，例如他在看到女仆被拐走以便满足一位法庭官员的享乐时，便作出了这种反应。只要人类缺乏信仰，上帝那奇特的方法就会引起厌恶，因此，在人类的评判中，就毫无道理。一旦有了永恒的肯定的信仰，上帝的方法就不再是古怪或者是令人不快的了。

上帝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信仰所产生的行动而得到的，这种信仰超越了理性并接受那些只可能激起有理性的人们嘲讽的事物。由于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乐于放弃理性的判断和嘲弄，人类得以认识神灵的权威。在《审判》和《城堡》中，各方面都完全相象的主人公们在朝向那种知识的漫长道路上前进，仅是不完全地获得知识，但匆匆瞥上几眼，就至少能感觉到它的高贵和无所不能。基尔凯郭尔和卡夫卡的模特儿亚伯拉罕通过战略方面的谦逊恭谨的极大努力已经获得了这种洞察力。

通往上帝的旅程是艰难和痛苦的。卡夫卡的主人公们使用了

① 《弗朗兹·卡夫卡》，第95页。

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每个人都缺少信仰所需要的行动。例如，企图靠猛烈的冲撞往前走是不聪明的，因为那种方法包含着自信和对永恒的蔑视。《城堡》中的主人公K多次都表现出这种态度，因为他过于自信，并且过于频繁地认为这种斗争象斗智游戏一样，聪明和精明的人才可能在这种游戏中获胜。使用人间的标准或资产阶级的伦理学，把它作为达到精神上目的的一种方法是尤为不适当的。由于训斥他的审讯者对他的逮捕太不公正，于是约瑟夫·K彻底弄糟了他的诉讼。审讯者们以极大的兴趣倾听K的指控，但是以这种方法来处理他的诉讼，最后反使他失去了信心，从而以一个女仆的大声尖叫结束了这个过程。改革家们得到的只是厌烦和冷落的待遇。致力于为法官们绘画肖像多年的廷多雷利(Tintorelli)暗示，法庭对那些希望改革法庭状况的被告们是不会感兴趣的。他说：“差不多每一个被指控的人，甚至是他们中间相当普遍的人都会在最初阶段产生建议改革的热情，这只是浪费精力和时间；假若这些精力和时间用在其他方面倒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唯一能有意义的东西是应使自己适应所处的环境。”（《审判》第153页）

关于宗教改革的想法，即为从上帝手中夺出负责惩罚犯有罪行的人的权利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宗教，在卡夫卡的小说《苦役营》中受到了批判。老司令官——在他所兼任的审判官、士兵、建筑者、店员和制图员这些角色中，应该被看成是上帝的化身——显然已失去了对苦役营的控制，国外来的探险家已成功地引诱这位司令官仅剩下的一个随从放弃早先的政府所干的那种不人道的刑讯。老司令官过去设计的刑具是精巧而残酷的。按照原来的法典，判了罪的人是不算一回事的；他没有权利上诉，他也不知道对自己的判决的准确性质。这种法典由于引入了仁慈的道德而被废除了。但是在司令官死后的墓碑上还用“相当小的字母”写着：“这儿

埋葬着老司令官。他的维护者们可能不再有自己的名字了。他们为他挖掘了这个坟墓，并树起了这块石碑。有这样一种大意如此的预言：在若干年后，司令官将由死复生，并领导他们离开这个住处重新占领苦役营。相信吧，等待着吧！”^①

于是，这个故事提出了人类的道德法规，这种法规的特点是进步的科态度对于道德进行的改革。从表面上看，这种胜利是属于这种新法规的，而实际上，这个故事指的是，卡夫卡最终所全神贯注的人类回避或甚至理解神的正义和愤怒的企图是毫无用处的。

无论(如在《审判》中)反对判决的斗争或(如在《城堡》里)为超理性权力而作的祈祷，不管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计谋都没有用。通往与上帝关系的道路是非确定的也不安全的，因此，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听其采用的普通方法——利用律师们、辩护士们、审判官的朋友们、娇柔的女性意识——离他们所想达到的目的都是望尘莫及的，并且必定要惨遭失败。在他的一系列包罗万象的和十分精彩的表现世俗职业的讽刺画中——这些讽刺画那样令人惊讶地明确并常常具有如此强烈的喜剧性，以致于评论家们反复多次地认为，《审判》是对法庭诉讼程序的讽刺——在这里，卡夫卡只不过描画了通过科学的和法律的方法通向崩溃了的救助途径。我们不能仅仅靠建立法庭或信仰誓约来从我们的感觉中消除这个世界的一切邪恶。从本质上说，邪恶是不能被人类理解力所把握的，“被误解”的法律，或不能用人道主义利益的观点作重新解释的法律。邪恶不能从人类灵魂之外立法，也不能由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学家来“治愈”。美德不能通过富有同情心的中间人的调解

^① 弗朗兹·卡夫卡《苦役营》，《党派评论》，第八期(一九一四)，第156页。参见基尔凯戈尔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教士的评论，《恐惧与战栗》，第34—37页。

来实现。^①

剩下的唯一的方法是亚伯拉罕采用过的方法——盲目的接受那种判决，几乎从所有的道德观念来看，除了用那些归于愤怒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的观念，都是令人迷惑的和荒谬的。这种方法需要个人在心理和精神上付出可怕的牺牲，并且对某些批评家来说，至少是暗示了受虐狂似的屈服于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情况确实是这样，卡夫卡承认，当信念用现代医学和治疗标准来判断时，信念通常是一种病态。卡夫卡觉得，信仰的行动远比身体健康和社会的调节深奥得多，这就使信仰的行动看起来好象是普通健康的身驱和精神的严重分裂。因此，这正是他所做的：他常常描绘他的人物们，在不健康的、有时甚至是在恐怖的环境中从事精神方面的发现和探求。就好象厌恶或者轻蔑肉体是获得这种发现的先决条件似的。健康肉体的相爱，即使不令人厌恶，也只是外表上肤浅和令人失望的。仅仅有一次，卡夫卡的一个人物，在并不快乐或适意的环境下，发生过风流韵事，其目的远远超过其本身的意义。^② 在卡夫卡的笔记中，他曾这样写道：“性交对两个彼此想要

^① 正如贝尔根所推出的那样（《弗朗兹·卡夫卡和信仰的毁灭》第161页），卡夫卡的哲学不意味着一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张，或消极地为它铺平道路。他认为法西斯分子的方法和其他方法一样全不适宜。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残酷的极端主义者，并不能使人们向最终的得救迈进一步。在伟大的牺牲——又定义为心理上的——问题面前，在每一个体和他私人的上帝的个人关系面前，所有那样的方法都是重负的和毫无作用的。这种关系的原型是家庭关系，更确切地说，正如卡夫卡的“给父亲的信”所描绘的那样。作为一种设想，指望无产阶级消灭邪恶是无益的，参看故事《往事》，收于斯洛肯尔等编，《弗朗兹·卡夫卡资料汇编》，第67—69页。卡夫卡对法西斯主义体的看法，参见《走狗与阿拉伯人》，《新方向》杂志，一九四二年，第408—412页。

^② K和弗里达在主人庭院的地板上一起渡过了那个夜晚。发生两性关系只是K为了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计划中的另一环而已。这事失败了，因为K为了更接近城堡，错误地以为他紧挨着和克拉姆纳好的一个女人睡在一起，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克拉姆纳是城堡里的一名官员。但是生理上相爱和精神上相爱截然不同（当然，不是与幻想的柏拉图式的爱相混淆，正如人世间的其他东西与其神圣的变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样）。

从中寻求过多欢乐的人来说，是一种需要承担的惩罚”。厌恶肉体是和渴望死亡联系在一起。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说，死亡，是最接近于无限的。这种思想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猎人格拉古》中得到极为充分的反映。格拉古从悬崖上掉下来，并摔死在岩下。在送葬途中，司机转向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我这个愿意生活在自己山区的人，在我死后，漫游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这种死亡愿望的受阻导致一种不舒适的荒谬可笑的不正常状况。“……我很快地穿上了寿衣，好象姑娘很快穿上结婚礼服一样。后来，灾祸降临了……我在这里。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很多我不能做的事。我的小帆船没有舵，随着吹向地狱最底层的风漂泊”。^①上帝意识清醒的第一个象征是希望死亡。有时这种死亡的愿望以出于内疚感而自杀的形式出现——如在《判决》中所描述那样。但是，通常这是通向得救旅途的结束，如在《审判》、《城堡》和《变形记》中所述。^②

毫无疑问，弗朗兹·卡夫卡的作品是对现代社会解体的反映，正如斯洛肖尔和布尔格姆两人都曾指出的那样。面临着愈益混乱和官僚主义的浑沌世界，这些作品是用美学的方式来描述厌恶的表达和无望的手势。从另外一些衡量标准来看，即从传记体和精神分析方面来看，这些都反复证明了忧虑型神经病对于预感到的感情危险的不断的逃避。这类评论暗指了卡夫卡和他父亲的关系——据说这种关系是永远妨碍着他从父亲的形象到社会的公正良心的正常和成功的转变。有大量支持这种解释的证据。但是，在卡夫卡拒绝接受把信念看作只是一种病态或错觉时，他把自己

^① 弗朗兹·卡夫卡，《猎人格拉古》，收于《第一都犹太人选集》，约瑟夫·莱夫特威治编，（伦敦，一九三三），第457页，第458—459页。

^② 卡夫卡和基尔凯郭尔在这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基尔凯郭尔坚持认为“信仰的骑士”存在于世界之中并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享受着普通人享受不到的这个世界的欢乐。

和他的精神分析学解释者们分开了。最后，他奉献给我们时代的思想是，他坚信，信念是从感情上的扰乱开始，后来由于身体和精神遭受痛苦和恐吓产生的作用而开始了信仰的行为。这种信仰行为达到的顶点是，承认上帝的方法是不可理解的、荒谬的、任性的，但却是公正的。这种态度出现于这一承认之前，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卡夫卡作品中的神秘之处，这种态度可以用马克斯·布洛精的话概括为：“他不同上帝争吵，只同他自己争吵。”^①

五

按照托马斯·曼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评价，弗洛伊德的著作是那样地出色，好象科学向十九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发起的风暴信号。曼虽然不是经常这样想起弗洛伊精，但他最后还是接受精神分析学作为反对非理性力量的保障。然而弗洛伊德仍然还是属于十九世纪那一类的思想家，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些思想家和我们的反理智论和非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曼已经给我们解释了这种明显的前后矛盾。非理性主义者认为“帮助理性战胜本能——甚至是坏的本能——的每种企图都是对生命的一种犯罪，因为根本就没有坏的本能，即使本能本身是阴间地府的东西，也是神圣的。”曼说：热衷于非理性主义的人在它之前扫荡了一切，把一切事物分成理性和非理性的，而不是分为善与恶的，这是不负责任的狂热。因此，本能的消极和邪恶便受到鼓励和赞扬。非理性主义者们的标语口号是：“愚蠢的本性，世人的灵魂，憎恨，战争。”

精神分析学常常坚持它的治疗目的：“……它在更大的知识范

① 《弗洛伊德·卡夫卡》，第165页。

圈内保持其医生的个性，保持其人性和伦理道德对恢复和重建在生活中受到歪曲和困惑的人类要素的渴望。”它并不是为一种敌视理性的利益而工作，利用“在探求黑暗的地狱中”所获得的专门知识，而是为了与敌对的非理性力量进行斗争之目的所使用的一种方式。当然，这是弗洛伊德的许多辩护方式中的另一种，这种方式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被认为是必要的。弗洛伊德是个科学家，鉴于这一事实，他的功绩就是基于他全力以赴致力于“自然中的魔力”。就他参与“夜生活的那一面”这一点，也应受到谴责。但是他真正应该受到赞许的是，因为他没有假设无意识的黑暗武力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激发动机。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弗洛伊德，在感情方面他没有堕落到了为了歌颂感情的目标而牺牲知识的地步。他的反理性主义在于，他认为感情冲动实际上优越于头脑，这是就这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而言的。他的反理性主义丝毫不表现在对那种优势面前卑躬屈膝和拜倒脚下，也不在于对头脑的轻蔑。^①

曼把弗洛伊德与德国的“空想的反理性”传统结合起来，与德国人的某些思想联系起来，这些思想没有避开审查人类的反理性本性所负的责任和影响。弗洛伊德的兴趣在于性，他所谓的“冷性主义”已使他成为无意识的探求者，这“使他通过病态来理解生活”，其目的不是承认病态，而是为了治愈病人。^②

曼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找到了对人类未来抱有的一线希望。曼对任何学说的主要部分的接受取决于该学说是否有助于增长精神和知识的力量；非理性的思想只有在它能给人类思想增添力量

① 托马斯·曼《弗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往的大师们及其他论文》，罗威一波特译，（纽约，一九三三），第188页，第190—191页。这篇文章原写于一九二八年。

② 出处同前，第196页。

时才是重要的。曼在什么时候接触到一般性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这一问题尚无法肯定。然而，我们可以设想，在他第一次公开称赞弗洛伊德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很清楚地了解了精神分析学家各式各样的讨论和论著，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在一封信中说过：“在精神分析学派的思想 and 所产生的结果的浓烈气氛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熏陶，一个人可能对同他的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一个领域产生影响。”^①因此，精神分析的理论很自然地在他的《魔山》里广泛渗透在他的现代思想的研究的那一部分之中。事实上，在伯尔格霍夫国际疗养院里，用极其谨慎和十分幽默的方式描述了精神分析学家的作用。他就是克卢克福斯基博士，这位博士关于爱和疾病的很多演讲在疗养院的娱乐中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当汉斯·卡斯托普第一次到达达沃斯时，人们向他指出了克卢克福斯基博士的那篇：“‘……聪明绝顶的文章。他们在内容介绍中特别提到了他的活动。他用精神分析法去分析病人’。‘他，什么？精神分析——多么令人厌恶！’汉斯·卡斯托普叫了起来，他乐得更起劲了，甚至无法忍住。精神分析已经是完成阶段了。他笑得很厉害，以致泪流满面；他用双手捂住脸，笑得越发是前俯后仰。”^②

很显然，克卢克福斯基博士被一种简单的想法所困扰，并且他唯一关心的是探求这种想法的含意：即病态与爱的有机关系。克卢克福斯基博士竭力以认真的态度做演讲，“采用混合的术语，部分诗歌的语言，部分学术的用语；无情地科学的，并带有一种

^① 托马斯·曼致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② 《魔山》，第11页。写于一九一二——一九二四年之间。曼第一次读弗洛伊德的作品是在一九二五年。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克卢克福斯基博士的演讲，是叔本华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特殊用语的有趣的混合体。

具有回响的唱歌似的演说态度和声调；这种演讲姿态和声音，给年青的汉斯留下个不适宜的印象，但是它却可能是女士们兴奋得脸红、先生们想方设法要听得清楚些的原因所在。”（《魔山》，第162页）

那位善良的博士说，爱情和贞操永远相抵触。通常贞操赢得了斗争的胜利。由于恐惧、习俗、嫌恶或畏缩的渴求纯洁，爱受到压抑而被抑制于黑暗和桎梏之中。然而，事实证明，这个胜利是付出巨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被禁止的爱情“常常会冲破贞节的禁令而显露出来，即使这种抑制是以一种改变得使人认不出来的方式所进行的。”其表现的新方式是疾病。“疾病的症状只不过是爱情力量的一种伪装的表现，一切疾病都只不过是爱情转变过来的而已。”（第164—165页）

这是一幅富有反讽意味的讽刺画，它与其说设计得这样出色用来玷污精神分析学，还不如说是评论不可思议的解释者和开业医生的。

在克卢克福斯基博士讲演的结尾，他好象是在为精神分析学作宣传；他伸开双臂欢迎所有来到这里的各式各样的人到他那里去。他谈到遭受痛苦的秘密，谈到羞辱和悲伤，谈到精神分析的赎回权力。他提倡将光明带进无意识的思想之中，并且解释异反常态是怎样变成有意识的感情的……。（第167页）

在创作《魔山》的前几年，托马斯·曼曾经对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感到兴趣，对天才和疾病的关系感到兴趣。在资产阶级社会，艺术家似乎是不适应社会的人，其创作源泉好象差不多都是直接反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题材。这是曼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叔本华

的，正是在叔本华的著作中，他才认识到艺术家主要依赖于所经受的痛苦。艺术家大多数的灵感都来自疾病，这种灵感是健康人所没有的。事实上，正如克卢克福斯基博士对汉斯·卡斯托普所说，“‘人类和完美的健康这两种概念’是否从根本上说就是互相一致的”，这一问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第245页）

曼早期的每个故事都涉及到以下两个题目中的一个：一是艺术家痛苦地孤立于资产阶级社会；一是在天才的作品中，疾病的持久作用（同健康的资产阶级相分离的另一标志）。在他对自己主题的探求中，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两位浪漫主义传统的代言人——叔本华和尼采的意见。尼采对他的影响使他开始了自己称之为的“战争年代，我结束了一段时期的保守思想；但它使我最终能抵御有害的浪漫主义的引诱，这种引诱能——当今仍经常如此——从生命和思想间的关系的非人性评价中产生。”^①曼很多东西都源出于尼采，这些东西对他早期的事业很有意义。艺术家感知的不寻常性使之与社会的通常进程相分离，他蔑视理性生活这一主题，这一主题已经在这样或那样微妙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并与叔本华提出的艺术家是一个特别的人物的思想相结合，艺术家重要使命的标志就是能忍受痛苦的能力。为生的愿望而盲目奋斗支配着所有人的生活，艺术家就是这样，用一个痛苦而客观的观点去观察这种痛苦；从愿望中获得知识，使他对理想状态的审美理解永久地存在。于是，对生活最敏锐的观察力和征服意志的最美好的审美观念，已经不幸地迫使他们的创造者们遭受到与他们同时代人的社会相隔离的痛苦。

曼显然对疾病和衰老把握着生命颇感兴趣——“死亡的蛊惑，

^① 托马斯·曼，《我的一生概略》（巴黎，一九三〇），第23页。那时（一九三〇年），曼当然对于尼采不如从前那么兴致勃勃了。

极端的无目的性战胜了愿为一定的目的而献身的 生活……”^①局部说来，这是他有兴趣将科学广泛应用于人的身体和心理的一切东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毕竟，《魔山》是关于解剖学和医学问题的信息概要。然而，除此之外，曼还想了解一些研究疾病的实在价值。因为正是疾病使人的注意力——倘若疾病本身不是愚蠢的或存心的目的的话，象克里斯廷·巴顿布鲁克的情况那样——从“繁忙”和肤浅水平的社会观察转到存在的内在本质。疾病还促进了更大的敏感性，这是一种天才的充分表现所需要的性质。因此，我们发现，汉斯·卡斯托普，一位在“沙洲”的制图工程师，在他呆在这沃斯的特别长的时间内，变成了一名学者，一名知识分子，几乎也是一名艺术家。他能出现这样的转变，部分原因是，在疗养院里，他暂时中止了他的资产阶级时期，部分原因则是疾病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内心，唤起了在他其他方面的生活中仍沉睡着的敏感性。“我十分清楚地懂得，我自己所有的知识是从很久以前得来的，甚至还在我少年的时候，我就很熟悉病魔和死神……”（《魔山》，第752页）

艺术家需要深入到理性生活的表面以下——理性生活大多是由限制心灵知识的机会的社会风俗所控制。通过阅读叔本华和尼采的作品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瓦格纳的音乐的强烈影响，曼参加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非理性背叛神圣意识的斗争。十分有可能，非理性主义使曼感到极大兴趣，并且他相信，艺术的责任是揭示了可以从艺术中得到的最为悲观主义的结论。进而，曼接受了艺术家的特殊品质，他所描绘的艺术家痛苦的畸形，不管是社会畸形还是心理畸形，都给艺术家（象在《死于威尼斯》中的那个作为精神病患者的艺术家那样）以清晰的描绘——《死于威尼斯》这个故事马上被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是相信在艺术的冲动和性爱

^① 出处同前，第43页。

冲动之间有联系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①

曼作为作家的生活——虽然这种情况是富于变化的——就与精神分析学的联系来看，似乎能得到很好的解释。由于他一开始就对生活的审美方法的特征感兴趣，并提出了疾病和天才之间的重要联系，因此，发现叔本华和尼采给曼以很深的印象这一事实，就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了。一九一二年曼访问了达沃斯，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这最终向他启示了全面探求疾病和天才，爱和抑制，以及或许是本世纪一切理智兴趣的横切面之间联系的前景。他已经了解到，在神经病行为的精神分析描述和他写过的故事的一般要旨之间，有某些十分令人兴奋的相似之处。然而，人们对克卢克福斯基博士的观点和他向汉斯·卡斯托普解释的理论则抱着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保留态度。这位博士的潜在目的的理论绝不是在《魔山》中得到描述的唯一理论。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学最后还是以引人注目的同情和理解得到了描述。克卢克福斯基博士对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是修辞性表达与雷梅·德·古尔蒙特式的富有诗意的讽刺画混合物。似乎这既是对作为文学家的曼的最终地位的决定性考验，同时也是对他将来对精神分析学所抱态度的决定性考验。这是可以做有趣的推测的事情。那么曼的精神分析经验是否向他展现出了在纯粹的反理性立场上的某些不足之处和隐蔽着的危险呢？对于这一点，约瑟夫·布伦南有如下看法。

《魔山》表明，曼最后完全把对疾病和死亡的痛苦根源全力提高到了能意识到的水平，并把这些暴露在辩证运动和蕴

^① 参看约瑟夫·G·布伦南，《托马斯·曼的世界》（纽约，一九四二），第64页。布伦南没有声明，这个故事直接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含反讽的面前。这个史诗般的小说本身不是无缘无故就与西格蒙·弗洛伊德学说有关的。有时，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曼有精神分析学处理的经验。小说本身可以认为是自我管理分析，在这其中，作者产生了病根和死亡的根念的初浅意识，并在艺术作品中使多年来对他的思想重压得到了具体化。^①

《魔山》是一部复杂的艺术作品。不能说它对作者有什么特别的“治疗效果”。这部作品的真正意义可总结如下，从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以来，曼这是第一次在宏大的规模上写作小说。他十分详尽地论述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潜力，也正是通过《魔山》背景的特殊属性，他起初的信念将得到检验并与其他观念和信仰相比较。在这部作品从开始到完成的十二年中（一九一二——一九二四年），曼经常停止——特别是有一次，他停下来陈述他对艺术家和社会关系的意见。一九一八年，《一个不闻政治者的看法》在柏林出版了。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托马斯·曼已准备重新考虑他的美学原则。然而他却怀疑，依据艺术家的生理和心理本性所作的简单解释，是不足以证明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他仍然首先对艺术家感兴趣，因为艺术家可以洞察到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渊源。人类无意识的“黑暗领域”的知识，再加上对存在于人类意志和企图控制这种意志的力量之间的紧张状态的理解——这些正如曼看到的那样，仍然是美学原则的重要区别标志。但是，他想到了精神分析学远不止是对非理性敞开着的大门；它是控制的科学，通过它，非理性可能为满足二十世纪人类不可缺少的需要而得到改革和调整。一方面，精神分析学解释疾病及其与天才之间

^① 布伦南，《托马斯·曼的世界》，第68页。

的关系。韦甘德指出：虽然克卢克福斯基博士是一个比贝伦斯更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曼最后还是更喜爱克卢克福斯基博士的见解和理论，“……他可能比一个好的生理学家和一个极为出色的外科医生更接近于理解在头脑和身体之间得到的关系。”^① 正象曼会在与他的艺术有关连的更大社会范围内增长兴趣一样，他越来越增加了对精神分析疗法的社会重要性的信心。塞特姆布里尼在《魔山》中提出了更狭隘的社会观点：

精神分析学作为启蒙和文明的工具是有益的，就其粉碎荒谬的信念，就其起着缓解天生的偏见之作用和削弱权威而言，它是有益的。换言之，在好的方面，它致力于自由，使之文雅精美，使之具有人性，使奴隶们为自由解放而成熟起来。但就其阻碍行动的道路，不能形成不可缺少的威力而从根本上摧残生活而言，它是坏的……”（《魔山》，第283页）^②

按照曼的看法，精神分析学的优点和价值在于它既具有，又不具有“他所处时代的非理性主义的冲动”。它理解人类的无意识，但没有过高地估价它，或者允许人类随它而消失，或变成非理性的激情的奴隶。曼的希望是，精神分析学不仅将向艺术家奉献新的洞察力，并且还将在未来用一种控制我们时代的非理性威力的强有力工具来服务于理性。这是他反复广泛地阐述的要点，“弗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1936年，他在弗洛伊德八十

① 赫尔曼·J·韦甘德，《托马斯的小说〈魔山〉》（纽约，一九三三），第55页。

② 曼对塞特姆布里尼的处理常常是随意的讽刺。他与纳夫塔处在相互对比之中，但又反对明赫尔·培披克恩，虽然他忌妒地认为，卡斯托普是他的“学生”，但很明显，曼相信，他是一个狭隘的人。他的美丽阿藻，很可悲地根本不能在重要时刻穿透人的精神外表。

寿辰时所作的演说中无限制发挥的正是这种观点。^①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弗洛伊德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体系传统中的一部分。弗洛伊德对曼的极大重要性是来自他的“对疾病的理解，与疾病的某种密切关系，根本的健康比它更重要，以及对疾病创造性意义的理解。”弗洛伊德对探索真理的兴趣也感动了曼——主要是因为弗洛伊德给了曼一种藉以研究“从心理愿望到真理”的方法。

通过研究人类的无意识生活，弗洛伊德最后看到了扩大他的研究、使之超越实验室进入“科学的每个领域和知识的每个范围”的可能前景。科学的公正和精神分析学的彻底性，其实验的坦白直率和无畏，差不多从一开始就缓和了曼对精神分析学的怀疑。把疾病的重要性认作是有关人类知识的源泉很符合他自己长期以来建立在同样思想基础上的兴趣。关于伦理道德，人类学、宗教和艺术的精神分析学含意使曼对弗洛伊德的著作有一个根本意义的真实感觉。

弗洛伊德持续不断地服务于理性，这对曼有着极强烈的吸引力，并得到了他的真诚支持。在他的《新介绍性演讲》中，弗洛伊德仔细地界定和限制了心理范围，即他称之为的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说，未来精神分析的真正任务是：

加强自我，使其更独立于超我，开阔其视野，并且尽量扩大其组织，以便能从伊底中接受新的部分。过去是伊底的领域，将来则是自我的地盘。

这是一种收复的工作，就好象楚格爾湖排水一样。^②

^① 托马斯·曼，《弗洛伊德与未来》，收于《弗洛伊德，歌德，瓦格纳》（纽约，一九三七），第3—45页。

^② 《新介绍性演讲》，第111—112页。

事实证明，这种重要的而且合理的作用，对托马斯·曼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未来的弗洛伊德主义：它为“新人类学的大厦”奠定了基石“……这幢大厦将是更聪慧、更自由的人类的未来住所。”曼说：“弗洛伊德将获得通向未来人道主义道路的探路人的光荣称号”——并不是对非理性持更自由更大胆的态度的观点感到惧怕，而是意识到为实现一种更完善的、很少受到愚蠢限制的生活的可能性。我们一旦排除了对非理性的不合理的憎恨和惧怕，我们就能享受“与无意识有不同关系”的乐趣，“这种无意识将更属于艺术家，更具幽默性，而并不一定具有不恭敬无礼的东西。”^①由于曼具有这种非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观点，而终身致力于非理性主义的研究，这种有效的和扩展的非理性的科学希望与曼对保守的民主精神的信仰紧密相关。他将民主政治和纳粹主义严格地加以区别，这种区别就是他在知识和任性之间所作的区别。由于陷入溺爱伊底的非理性部分而导致了在不切实际的现实的服从，这种服从从个人的手中夺去了对“快乐原则”和基本情感或情感冲动这两者的控制。非理性从曼的早些年仅仅是出于美学兴趣的题目中，终于向民主政治提出了挑战，向整个世界的统治集团提出了挑战。并不是精神分析学在某个神秘时期完全改变了曼的观点，或甚至限定了曼对它们的热情；曼对精神上的全面清查的兴趣与他对精神分析学的深入了解是相一致的。

弗洛伊德的研究给曼提供了重温德国哲学传统的一个机会，他从中可能最终会很高兴地看到勇敢的悲观主义和基本的人道主义的颇有希望的联合，他至少在他的自述中表达了这样的目的：

^① 《弗洛伊德与未来》，第42—43页。

我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思想上的准备，主要是通过叔本华的哲学，因为它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我主要称赞它是悲观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混合体，我非常赞成这种观点；人们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会发现它又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出现。我的关于弗洛伊德的第一部作品论述了在现代科学历史中弗洛伊德的地位，我想尽力解释，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的这种混合体是何等重要和意义深远。他同时是一个科学家和信徒。他很懂得无意识和本能的奥妙，无意识和本能远远超过理性和知识的影响及力量。但是，他同时也为称之为进步的东西而斗争，例如对理性和自由愿望的表达。^①

六

托马斯·曼是当代少数几个对弗洛伊德对人类学的贡献怀有热切的美学兴趣的作家之一。的确，可以这样说，约瑟夫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不一定只是一回事——但都是弗洛伊德的种族无意识理论在美学方面的发展。我们在曼关于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中得到了支持这种见解的证据。我们必须把一个不同凡响的发现归功于弗洛伊德，因为这一发现与艺术家们对种族和历史传奇的解释有关。这是主观控制外在事件的观点，因此包含在人类灵魂中的世界要比“降临到”那个灵魂上的世界更为重要。因此，上帝这个概念包含在灵魂之中。上帝居住在人的灵魂中的这个观念则为历史和神话提供了一个主观的猜测，这种猜测只有分析心理学才能给予充分的解释。在观点方面如此惊人的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即从外部的解释历史文献记录改变为用种族无意识

^① 托马斯·曼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致弗洛伊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

解释历史。因此，曼说，“……当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时，在主题方面我从资产阶级和个人起步迈向虚构的神话和原型，我个人与分析领域的连系已进入了重要阶段。”弗洛伊德学派对孩子们感情生活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人类童年时代和原始神话的深入研究”。当神话以各种各样的乔装和伪装出现和重复出现时，神话的重复价值便构成了其真实历史的重要性。这种神话的连续出现导致了一个暂时停滞的历史时期，这有利于种族和无意识节奏统治的时代。艺术家从这些思想中获得了，

一种理解得到真实描述的更高真理的洞察力；一种永恒的、永远不变的并且可感的有用知识；在知识纲要之中，假设的个体按照这种知识纲要，无意识地生活在地天真地相信自己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独一无二这一信念之中，认识到个体的生活只不过是公式化和重复的程度，认识到在他以前的人们所走过的道路为他标出了他自己的道路。

这是弗洛伊德在总体心理学方面思考的一个重要发展，曼对它的兴趣基于他自己对婴儿期复归的解释。他把这与基本的原始主义相提并论，这种原始主义起着保证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性的作用。当然，这种复归的临床使用显然是不同的；它的目的是揭示出，抑制或神经病是由婴儿时期引起的这一看法是荒谬的；藉助于这一做法，使病人相信进一步维持那种情况也是无益的。为了取得临床情况的较大暗示，需要有巨大的幻想的胆量。曼更愿意愉快地向我们解释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在所有严肃的东西中，我们称作教育(Bildung)的最快乐、最令人愉悦的因素，即造就人类，正是这种钦慕和热爱的巨大影响，这种孩子式地将自己与父亲形象的等同，才是通过深刻的血缘关系而作出

的。”^①

普遍的神话和态度的连贯统一性在于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保证了人类记忆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连续性。后来的传奇故事和历史只具有细微变化的复制或重复，过去的观点，禁忌，甚至历史事件，其中的变化是极其细微的，假若这些东西具有相当的心理学重要性的话。因此，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合法的残留物，在这个基础上，隔了很多代的禁忌，还可能支配着新一代的行为。因而，一个种族便可能在很多方面象“个人”一样有其“复归”现象。^②曼怀着令人钦慕的微妙感和同情感在约瑟夫四部曲故事中发挥了这个主题。对于弗洛伊德主义、人类学的审美运用则是基于下面三个重要事实上的。

(一) 主观灵魂要尽力促成的，不是客观世界的本性，而是客观世界对主观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灵魂是“被赐与的赐与者。”

(二) 重要的精神事件和形式的重复，由于它们存在于人类无意识之中，而得到了保证。

(三) 禁忌和对极端暴力的保护常常是由早期的鲁莽后果所形成的无意识记忆提供的，假如这样的情景相当严峻，并且感情也过分失调到了极点的话。

就这样托马斯·曼玩弄了神秘的伊底概念，在那里，自我通过各种试验、引诱和失败而形成。在旧约故事的永恒的基本模式(schema)中，这种形式能通过对心理的细节予以极大的注意而构成。曼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了解到关于主客观分开的观点。这是他那个时代作家们所具有的特征。把外部世界和人类灵魂联系

① 《弗洛伊德与未来》，第21—24页，第29页，第31页，第40页。

② 参见《图腾与禁忌》，第276页。

起来，使这两者无法区分的作法与西方的思想是无关系的。在约瑟夫故事中，他把亚伯拉罕描绘成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上帝之父”。他认识到并促成了他的产生。……上帝的强有力的本性——也就是上帝本身——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的确是外在的事物，但同时，这些也存在于他的内部并属他所有；他自己灵魂的威力有时简直不能和这些区别开来，这种威力有意识地与它们相互渗透和融合。^①

曼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分析中还发现，时间本身限制的中止和人的生命的延续是神话的再现。这就是说，仅就现在来说，人类的行为仅仅受目前影响的情况是极少的——假使目前的确在决定其行为中起着某种作用的话。人类行为受到过去或过去模式的神话的影响。人类本身以一种能使自己“包住裸身”的畏惧心理看待无意识的混沌状态；但是每次他都抛弃生命的模式（每次都战胜危机或被它所征服）因而每次他都死去了。“死：这意味着确实丧失了时间，意味着超越了时间的旅行，意味着用它来换取来世和今生，另外也第一次用它换取生命。”^②约瑟夫死了，但又再生了两次，还有雅各也是如此。神话保证了这种复生，“这是永恒的基本模式，当生命从无意识中重新产生出自己的特点时，就流入了这种虔诚的公式之中。”^③

约瑟夫的故事一开始就以一种思想作为它的主题。时间具有不均匀的测量性，记忆是建立在口头上一代传一代而沿续下来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很直接的，并可信无疑的；它非常自由地流传，时间是一个更加统一的、因而更简单的回想。（《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第12页）历史事件的重复可以用心理学进行解释，这种重

① 出处同上，第25—26页。

② 《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纽约，一九三四），第54页。

③ 《弗洛伊德与未来》，第30页。

复之所以能继续下去，是因为它们对于神话的留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个人所经历过的：

(一) 无意识不一定非需要具有个性不可。在原始时期，它是综合性的。在个体生活中，原始生活在孩童的生活中得到回响。

(二) 通过传统和戒律，抑制被留传下来。克制是戒律的核心；^①在后来的时代中，无意识还是主张反对同样的抑制。无意识在某些仪式中得到某种仪式的承认，例如，图腾节，繁殖力节等。在繁殖力节日中，对裸体的禁忌暂时取消了。

(三) 禁忌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命令。“违背了这种命令就会造成严重的负罪感，这种情况正象人类的起源不得而知一样不证自明。”^②

由于曼相信“生活如神话”，他开始写作雅各的故事，雅各支配着第一部，他作为强有力的影响出现在书中，只是在第三个系列故事中才没有再出现。雅各喜爱约瑟夫胜过莱阿和比拉的儿子们，这是上帝和人的关系这个主题的重复；它是较早时期的亚伯拉罕和以萨克所表示的喜爱。这种上帝本性的前后矛盾，曼反复多次地解释成是由于灵魂和上帝的亲密关系造成的。上帝喜爱的儿子本质上就是父亲们最喜爱的儿子。存在着对精神偏爱的某种连续性，这是与对物质的偏爱相对应的。雅各“藉其种族中传统留存下来的，也由于上帝自己在同情和喜爱方面狂妄的和巨大的幻想”而得到鼓舞。（《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第84页）因此，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之间总有斗争，正如在雅各和艾索间和在以萨克和以实玛尔之间一直有斗争一样。约瑟夫的弟兄们在不同程度

^① “通过克制对违犯戒律而赎罪，证明克制是以遵守戒律为基础的”。《图腾与禁忌》，第61页。

^② 出处同前，第120—121页。

上被认为是粗率而强有力的，笨头笨脑的和坦率的物质主义象征。卢本作为中间人在他们中尤为突出，虽然他犯了反对父亲之罪，但他在很多情况下保护了他的弟兄免遭莱阿的儿子们的攻击。

雅各在拉班所属的土地上度过的二十五年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心理学知识。雅各作为丰饶的象征，他的丰饶是对多产事物的一种类似无意识的掌握。因此，拉班的农场繁荣昌盛：“在〔雅各〕统治之下，五畜兴旺得超过了人们所能作的估计。”（《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第303页）^① 雅各对拉切尔的偏爱超过了对莱阿的偏爱则暗示出两种解释。正是通过拉切尔，那“宠爱者”才出现的；因此，偏爱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如此，雅各由于忽略了物质的东西和尘世的东西而一定要受到惩罚；而莱阿则在结婚之夜被拉班所代替了。

当雅各准备要离开拉班的土地时，在受宠者和被抛弃的人之间经常产生的那种斗争就形成了。莱阿的儿子们受到轻视，他们的考虑是现实的，他们不能在美貌和智慧方面和“宠爱者”竞争。在《年青的约瑟夫》系列故事的第二部一开头，我们就发现了约瑟夫和他的父亲在一起，正如我们在第一卷的序幕中所见到的一样。这书一开始是关于美的演讲，美也许“根本就只是性的魔力，因而性本身变得可见了。”^② 约瑟夫的美具有双重性。在十七岁时，男性的吸引力和女性的吸引力在他身上结为一体。难得解释清楚的吸引力也随他思想的发展而产生了。“他发觉上帝给了人类理解力，以便于人类能处理那些神圣的事物并使其更协调。……”

① 曼的解释如下：“……正象世界历史上常有的情况一样，克制欲望和权力在精神契约上找到了浅出口：在这儿就是藉助感情转移的类似过程，他们找到了以同情和关心，把生活寄托在受苦人身上的表达方式。”（第304页）

② 托马斯·曼，《年青的约瑟夫》（纽约，一九三五），第3页。

《年青的约瑟夫》，第15页）和兄弟们的争吵仍继续着，并由于雅各对约瑟夫表现出的明显偏爱而加深。最后，兄弟们的憎恨程度发展得更加深化严重，这就导致了在达山井边的起义。

但最终，莱阿的儿子们仅仅成了工具或者说是约瑟夫命运的工具之一。雅各给他最受宠爱的儿子的五彩缤纷的礼服是生和死的象征。拉切尔正是穿着这身礼服死去的，这就是约瑟夫第一次精神死亡的直接原因。在回答卢本询问关于礼服的问题时，约瑟夫说：“你难道不知道？死亡有改变性别的力量，拉切尔虽然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但仍然是为雅各而活着的。”（《年青的约瑟夫》，第127页）约瑟夫在德山山谷第一次死去的故事使得小说发展到这一地步的一切趋势集中到一起来了：精神上的爱好超过了物质的嗜好，物质上的背叛、悔恨接踵而来。第二本书以雅各听到他儿子死亡的消息的痛苦画面结尾。他奚落上帝；他想方设法耍了点诡计去阻挠上帝达到目的。这种行为并未给兄弟们带来好处；它具有通过暴力而达到愿望满足的最后结果的全部特征，但在这里，他们并没得到满足。在弗洛伊德的《图腾》中，他描述了这种模式在家族和种族历史中的许多方面。

这个故事没有停留在雅各及其兄弟们破灭的希望上。约瑟夫此时在去埃及的途中。“这是一条把他的现在和过去分开很深的鸿沟和深渊。这是一座坟墓。”他明显地抛弃了他过去的全部生活；他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Usarsiph”——“迷失了的约瑟夫”；他的主人是海克威特，“伟大的接生婆”，因为他帮助了约瑟夫的重生。（《约瑟夫在埃及》第一章，第6页，第31页）^①他被卖给法老宠爱的波蒂法尔为奴隶，从此，开始了他的“拉班时期”。他在波蒂法尔的庄园家庭中呆了十年之久。曼所塑造的生活在庄园里的

^①（纽约，一九三八年）。

两个矮子形象可谓是具有讽刺特征的杰作。他们极端相反的本性很好地衬托出约瑟夫灵魂内里的矛盾。杜都是常惹麻烦的人，是拉班的缩影，但更加恶毒。他主要希望的是干掉约瑟夫或将他赶出家门。斯洛肖尔称他为“原始的快乐原则的表现，即伊底，带有基于性欲的欲望。”另一方面，贝斯是约瑟夫的保护人和朋友；斯洛肖尔宣称，他“近似于超我范畴，‘提醒人们注意的善良的良知。’”^①

对于约瑟夫在波蒂法尔家中的升迁这一点基本上不需要再讲什么了，因为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中已经讲述过的了。受宠者“好象由一眼喷泉”所激起那样兴旺，这就引起了失宠者们的妒恨，最后将其坠进陷阱。但是对穆特门特的形象，曼则怀着极大的同情给予注意。她那未获成功的引诱企图超过了邪恶和纯洁之间的斗争。曼对穆特性格的描写是非常小心谨慎和带有保留的。最后通过仔细的解释、说明，她的行动被赋予了一种尊严，这种尊严使她成了一位悲剧人物。她并不是天生的勾引男人或放纵淫荡的女人。曼说，“一个象她那样屈服于情欲的女人，当然有着引诱力了，引诱力是她所受到的痛苦形成的外表和肉体形式，……”（《约瑟夫在埃及》，第二章，第372页）她的故事堪称是一部对极度性欲抑制的研究。“性的要求……穆特的父母双双死亡，”（第二章，第375页）而她自己，直到她迷上约瑟夫之前都几乎从未注意到这些。当她意识到危险时，她才设法躲避。她请求波蒂法尔把约瑟夫打发走，而当波蒂法尔拒绝这样做时，她便同意了波蒂法尔的决定，并以此作为她后来辩护的部分理由。她的意志正好与波蒂法尔的拒绝不谋而合，因此她很乐意为这种不可避免的事做好准

^① 斯洛肖尔，《托马斯·曼的约瑟夫故事》，第44—45页。这种有趣的解释已得到曼本人的赞同，参见出处同前，第45页注释1。

备。她现在着手做的事和她的计谋在身上产生的情感影响，只能被认为是极度痛苦的后果：

〔穆特在约瑟夫面前的屈服〕从本质上来说，仅仅是一种剧烈的、恐惧的情感暴发，这是与在最后或近乎最后的时刻保全她的肉体尊严和人类的女性贞节有关的——即保全，或确切地说，确保她的存在，尽管这意味着放弃和牺牲她的精神和宗教的荣誉，放弃和牺牲建立在她生活基础之上的观念王国中的一切。（第二章，第459—460页）

约瑟夫再一次犯了罪，这一次他那傲慢的无知导致了悲剧和死亡。穆特的性冲动是颇为自然的；它所暴露出的强烈程度是与它以前的抑制力量相一致的。悔恨在这种情况下便油然而生；她那本能的能量最后对着约瑟夫以激怒和尖刻指控形式发泄了出来。约瑟夫不屈从穆特的急切愿望，并不是由于他这方面对性欲的无动于衷而造成的。他的拒绝与雅各的宗教信念和约瑟夫在埃及的使命联系在一起。对约瑟夫来说，这是雅各的上帝与阿特姆一端之间的斗争。他又一次“被抛进了地狱，”也就是说，他又一次死去，这就是对他的傲慢和盲目的自我主义的惩罚。

这个希伯来故事的精心构思的表达方式和宇宙间的神话，是随着曼在弗洛伊德关于种族无意识的思考中发现的艺术自由的暗示而产生的。这些东西的总体对给予人类历史以新颖独到的解释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历史被描述为神话的再现——一个性的原型，习惯，抑制，这些东西组成人类的要素。因此，并不是习俗性，而是非理性，并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才有重要意义。

（二）生活被描写为自我和伊底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一

般结果是在这两者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三) 个人生活反映着禁忌与欲望之间的更大斗争。

(四) 在经历中，过分强调精神和依赖物质，都将受到同样的惩罚。于是雅各在新婚之夜便受到了拉班欺骗的惩罚，而约瑟夫则受到了两次惩罚。穆特公正地判了约瑟夫的罪，这并不是因为强奸，而是因为拒绝满足已经被他激起的欲望。

(五) 最后，曼的愿望是要指出人类意志的不断增长着的社会化倾向，这种意志通过多次反复的经验改变了其目的。于是，在系列小说的第四部《约瑟夫，供给者》中，约瑟夫便被当作了日益增强的社会团结和合作的象征。^①

在《新介绍性讲演》中所表达的“弗洛伊德派的希望”是，自我将由精神分析学的未来工作而扩大，伊底的能量则将受到社会利益的控制——这就是曼头脑中所想的，也是他在系列小说第四部中所表明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联想，曼的原意是把约瑟夫作为自我的种族象征，同时也充当文明的原型。

我们可以在圣经故事和梦的解释的结合中，看到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另一个有趣的应用。弗洛伊德所坚持认为的愿望满足是大多数个人的梦的来源，在曼对约瑟夫的梦的分析中，似乎被忽视了。虽然曼首先关心的是使圣经故事具有心理学价值的问题，但他却带有某些独立性地自由使用了精神分析学家的材料。在约瑟夫早期的梦中，以及在他向法老解释的那些东西中，上帝的希望实现得比数梦者所希望的还要多些。这是使这些梦具有预言意

^① “……在约瑟夫身上，自我从绝对傲慢回落到了集体和共同之中，在艺术的和市民的倾向之间，孤立和群体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的明显差别，令人惊讶地被折衷了。正如按照我们的希望和意愿，这些差别将在未来的民主精神下，在自由合作和在使正义平等化的王权统治下的不同民族中解体。”托马斯·曼，《约瑟夫系列小说的主题》（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42），第18页。

义的特殊性质。既然正如曼在《弗洛伊德与未来》中所提出的那样，主观意愿在控制那些偶然事件的本质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愿望的满足就既是上帝的，也是约瑟夫的了，这一点也许并不完全是不规则的。曼了解人的梦的本质和结构，梦的愿望满足显然具有性的性质，这一点通过描写穆特——艾姆——艾妮与约瑟夫的关系开始时的梦想，得到了绝妙的说明。《约瑟夫在埃及》，第二章，第390—393页）在单一的梦的限度内，讲述了穆特勾引约瑟夫的故事，而梦的象征意义则暗示了她的无意识愿望的彻底满足。这是一种有独特见解的释梦模式，它极其适应叙述的需要，而且丝毫没违反它的目的。

七

托马斯·曼和弗朗兹·卡夫卡的形象放在同一章介绍似乎颇为奇怪。卡夫卡拒绝弗洛伊德的观点，形成了与强有力的但却不可思议的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这个上帝的非理性的反复无常性要求超越理性和高于集体道德规范的信仰行为。而曼则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这导致了颇有希望的伦理道德和宗教规划的发展，在这一规划中，伊底的非理性能量逐渐受到自我和一切社会和政治附属物的有益控制。卡夫卡的神学和伦理学观念是非常强烈个人化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中，他的神学和伦理观念似乎从中获得了很多东西，至少是外部的特征。同时，卡夫卡比曼更深刻地了解——也许可以说，更痛苦地了解——现代人的毫无希望和当代的精神崩溃。在象现在的时代里，无论是传统或是革命似乎都不能带来稳定；人类又被抛回到了自己的出处，他们惋惜地不能胜任精神恢复的任务。此外，曼对纳粹主义的直接了解，迫使他敢于认真地进行艺术和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探索。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教授艺术的特殊性，并深入去洞察人

类行为和能力的无意识资源。他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不问政治的人”转变成为一个政治讲演者和一名特别的辩护士。他转向他的非理性主义形式，因为他认为这种形式对人类未来具有最大的希望。在他看来，这种非理性主义就是精神分析的**科学**，特别是当它应用于神话学、原始宗教思想和习惯的研究方面时，就更是如此了。

这两个人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可以在他们对幽默的不同使用方面找到。卡夫卡的幽默主要是描述性喜剧，这样构思是用来针对那些在人类奋斗中的可悲的人们；而曼的反讽则是调和的，在他那方面，尽量不去对他的人物的外貌和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卡夫卡总是作为他自己反讽的牺牲者而深深地专注进去。而曼的反讽则是嬉戏的和超然的，摆脱了任何同情的沉重负担。卡夫卡的论点的可信性取决于社会控制的永久性衰败和社会道德的崩溃。他的立场是那些不相信人类改进的太富有人性（all-too-human）的力量的人所采取的立场。当然，曼的立场由于其可接受性而取决于这一点：立即实现他在自己的政治演讲和四部曲第四部中所许下的诺言。

这两位作家都紧密地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研究对象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没有某种审美保留的情况下，都不会接受精神分析学的。然而，卡夫卡则在纯个人的基础上，继续了他对非理性的探索——他坚持认为，唯一的救助方法是个人与那个至高无上但对一切都冷漠超然的上帝保持一致。在曼的政治哲学中，他从个人的孤立感发展到了暂时接受民主人士的结合，这些民主人士可以产生对非理性力量的一套有益的控制。当然，这种解释是以约瑟夫的故事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些年月里的演说为基础的。在曼的最后几本书中，他又回到了早期的一些主题上，他的反讽是用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在范围上大为局限，但或许比四部曲

中的世界更有深刻的穿透力。然而，毫无疑问，在约瑟夫系列小说中，曼的社会意识得到了最成功的审美表达。在圣经故事中的弗洛伊德主义启示中——弗洛伊德认为家庭的复杂性的社会历史是一代一代的重现，根据这一观点——曼对“人类的部落”所作的深刻评论，似乎已从他作为现代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的解释者的生涯中逐渐呈现出来了。

第八章 精神分析学的 三种美国变体

当舍伍德·安德森的创作生涯在二十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时候，评论家们欢呼他是“美国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一位懂得弗洛伊德心理学并掌握了可以得到这方面最完美运用的极丰富知识的美国作家。安德森曾经谈论过受到抑制的村民，潦倒的美国商人，他好象具备描绘这两种人的令人羡慕的条件，因为他自己对这两类人有过亲身的了解。在二十年代的评论家看来，忍受着那个时代和地方的性习俗障碍的村民或镇民，和有意把生活置于门外以便对成功的女神大献殷勤的商人，都是精神分析学家的理想病人；能娴熟地应付他们的作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在文学中应用这一新兴心理学的大好时机。

至少，这就是安德森在评论界声誉的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那些下定决心要找出影响的评论家们，几乎不愿意承认他本来的天赋，这种天赋是建立在亲身经验之上，并得到他对题材的天然同情心的滋养。安德森是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学家吗？他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影响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确定那些影响了安德森的文风和态度的早先的当地影响。有许多自传材料——因为除了作者承认的两个自传故事《讲故事者的故事》（一九二四）和《舍伍德·安德森回忆录》（一九四二）之外，还有两部自传小说，《爱吹牛皮的麦克菲逊的儿子》（一九一六）和《沥青》（一九二六）。在这些故事和小说中以及在其他来源中，

存在着一大堆自相矛盾的材料，这些材料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使传记家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我们至多只能希望确定某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主题，如果这些主题不是从生活中提取的话，至少也可以看成是安德森的脑子里十分关心的问题。

这些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安德森同他父母的关系。他称他父亲为一个“来自南方的堕落的花花公子”，他“生来就是专事传奇虚构的。对他来说，不存在事实这样的东西。”^① 他把自己最初进入文学界描绘成一种新生：“如果你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件事有附加的兴趣，在我幻想的新生中，我保持了人世间母亲的真正形式和本质，但却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父亲，我把父亲的形象树立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全不象英雄的人，只是为了诽谤他……”^②

在安德森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中，这个父亲被描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说谎家和吹牛者。”^③ 他描绘了一个悲哀可怜的局面，在这个场面中，爱吹牛皮的麦克菲逊自告奋勇，为庆祝七月四日国庆节吹军号，然后却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他对这种乐器一窍不通。在这里和其他许多提及他父亲的地方都是如此。^④ 在安德森的形象中，父亲拥有舍伍德准备在他自己那里发掘的生动想象力的相同特性。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的联系要比人们从以上引证中所推测的要更紧密。在《回忆录》中，安德森集中了一章的篇幅用来解释这种模糊的关系。他的父亲“总是在炫题卖弄；但是安德

① 《讲故事者的故事》(纽约，一九二四)，第3页，第4页。

② 出处同上，第114页。他对他母亲的描绘似乎同样是富于想象力的，因为他的兄弟们在这一形象上认不出与他们真正的母亲有任何相似之处。

③ 舍伍德·安德森，《爱吹牛皮的麦克菲逊的儿子》(纽约，一九二二)，第22页。首次出版于一九一六年，纽约。

④ 安德森采用的方法使自传著作中的父亲同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一样，经过一番大肆渲染。

森则承认，他们之间有着一一种暗藏的同情和共同兴趣的纽带。在那些向他展现出这种联系纽带的事件中，有一件是在附近湖泊的一次普通的历险：“我第一次懂得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他是一位讲故事者，就象我将会成为讲故事者一样。也许我在黑暗中甚至还轻轻地笑了一阵。要是我真的笑了，那是因为我再也不想另一个父亲了，因而发出笑声。”^①这是一个最终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这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对这一事实的承认，即安德森自己将要展现他父亲讲故事的技巧。

安德森对他的母亲表现出很大的同情与爱。他想使她浪漫化，想把她描绘成一位同贫穷勇敢而坚韧地作斗争，并且默默地但却真诚地有着爱的女英雄，这一愿望产生了他早期作品中的几个理想化肖像。

一个人要是想到自己的母亲是一位皮肤浅黑、美丽动人而神秘莫测的女人，那真是太令人欣慰了……。

当她说话时，她的话充满了奇妙的智慧……但是她经常用她那沉默的力量指挥着我们所有的人。^②

在他的想象中，他总是支持他母亲的事业，反对一个不负责任的恶棍，这个恶棍通常是他父亲的某个想象出来的复制品。对他母亲的这种忠诚，尽管在事实上具有充足的正当理由，但仍然是安德森对他自己生活的理性化的一部分——“母亲形象”在他的晚年一直跟随着他，他担心自己也许会象他父亲那样对待妇女，这种担心渲染了他的许多自我批评。

① 《舍伍德·安德森回忆录》(纽约，一九四二)，第49页。

② 安德森，《讲故事者的故事》，第7、8页。

这些显然是当地的影响，他不需要任何教科书上的心理学去欣赏它们的份量或价值。除了这个之外，安德森生活在他自己的想象理论中，同事实的世界完全分离。从他在《沥青》中所描写的童年开始，安德森永远是从事实的世界转向“幻想的更大世界”，诚实和理性正直的标准在这后一个世界中大概是严格的，尽管它们不能通过真实世界的直接参照来得到估价。艺术家有意识的进入幻想生活帮助他“从‘市侩作风’(Philistia)的约束下解放了出来，并确保他的作品可以顶住他可能具有的任何滥用自己天赋的倾向。

在那种生活中，没有清教徒。庸俗而枯燥乏味的姐妹们从来不到这门口来。她们在幻想的世界中不能呼吸。清教徒、那些大声叱责清教徒的改革者、枯燥乏味的知识分子们、所有那些在人类大脑中产生的某种明确计划的基础上想要提高和再造生活的人，都死于肺部的疾病。他们最好还是呆在事实的世界中……。《讲故事者的故事》第77页)

幻想的世界经常是真实的世界——安德森抱着这样的观点，即他梦境中和幻想中的人们也许比他自己物质上的自我和生活在表面世界中的男人和女人们具有更多的真实性。他经常读书明显为他的梦幻头脑提供了材料，或者绘了他“我可以在其之上构造新梦境的背景。”(第156页)这个幻想的世界是白日梦半意识的状态，得到了梦境和幻象的补充，其中的大部分又得到了做梦者的详细阐述。对于安德森来说，梦是他的另一个世界的最连贯紧凑的表达。梦的继片是幻想世界中的事实。它们是安德森用作逃离现实的手段；最经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它们是愿望的实现。在这里，艺术家扮演了一个英雄的角色，在幻想中获得了他在真实生活中

没有得到的东西。^①然而，它们并不总是如此；他有时能报告一个人们也许会有些担心地认为是实实在在经历过的梦：

思想在飞逝，努力想要从梦中醒来，听到有人在讲话，在远处某一个地方讲话的声音；我认识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在黑暗中闪现又消失。

又一次在巨大的空地方。我感到窒息。有一个没有声音的巨大的黑铃在黑暗中摆动着。它摆动着、摆动着、摆动着，摆出一个很大的半圆形，我静静地等待着，感到十分恐惧。现在铃停止了摆动，慢慢地下降着，我吓得魂不附体。难道什么都不能阻止这个正在下降的巨大铁铃吗？它停下了，在那儿挂了一会，可现在它突然又掉了下来，我在那大铃下面当了囚徒。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从梦中醒来……(第189—191页)

这遵循的是忧虑梦的模式，带着忧虑梦模式的一切歪曲和复杂的象征主义。然而，安德森却把梦看作是艺术家生来就有的权利，他可以任意处理的一个幻想形象。他可以退避到幻想形象中，去作为一种间接表达社会批评的手段；在许多方面，他的昏垂状态好象是有人为造出来的，尽管它们最终的效果是足够真实的。

所以，正如他在《讲故事者的故事》和其他地方描绘的那件事一样，在伊利里亚，他从自己做生意的地方和家里出走了，目标

^① 参见《诗人与白日梦的关系》，第173—183页。作家“创造了一个他十分认真对待的幻想世界”。

是那充满冒险气氛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何处的地方。他对惊奇万分的速记员说：“由于长时间地在一条河里蹚水，我的双脚既冷又湿又沉重。现在，我将在干燥的地上行走了。……”（第313页）^① 这个对商业事业具有戏剧性的放弃举动，虽然表达出活跃的想象力，却几乎与事实完全不符。根据当时报纸的新闻电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日有人发现，安德森在克利夫兰市的大街上漫游，他被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他的妻子立即赶到那里。病例被描述成明显是由工作过度而造成的“精神崩溃”。当他还在医院的时候，安德森就考虑要写一本书，“描述他象一个流浪者漫游全国时的感受。他说，‘这是危险的，但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而钱总是受人欢迎的东西’”。^② 从克利夫兰回来后，他在伊里利亚又渡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并在那里制定好了他在芝加哥生活的计划。这一片段的戏剧性意味根据这些事实便会减少很多。这些引文至多表明两种经历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不愿让这些陈述因不精确而受到批评；它们经常是过去想象的重新构成。只有主要主题贯穿它们，它们是从写作那一时刻衍生出来的细节。“当然工作得好的时候，”他在他的《笔记》中说，“就有一种意识的病狂。身体内也许有一些小的神经，如果我们可以容忍它们有足够的敏感度的话，它们便会告诉我们有关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的一切事情。”^③ 隐藏着的思想是危险的，最好是用幻想把它们堵塞过去。至于他总是报告的那些梦，“人们则感到淫荡、惊奇、兴趣并且很自然地感到羞愧，人们并不试图要有逻辑性……。至于我自己，我把我做这样的梦的事实留给精神分析学家。”（《笔记》，第224页）

① 这一事件在《回忆录》中得到了更简练的传达。

② 《伊里利亚（俄亥俄）晚电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威廉·萨顿提供了这一消息。

③ 《舍伍德·安德森笔记》，（纽约，一九二六），第183页。

在他一九一三年首次结识的弗洛德·戴尔的帮助下，安德森很快就同芝加哥的那些住在“格林威治村”的知识界人士联系上了。安德森极少参加有关不同观点和看法的讨论，但总是作好讲故事准备。（《回忆录》，第241—243页）然而，当他的朋友们热切地把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新事物来讨论的时候，他总是在场，他并且还同意一位精神分析家的分析：

那时人们发现了弗洛伊德，所有年轻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忙于相互进行精神分析，或用精神分析法去分析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弗洛德·戴尔对此十分狂热。我们晚上聚在某人的房间里。我从未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谈过他的著作），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十分羞愧……

现在〔戴尔〕开始分析我们了。不仅仅是弗洛德，还有这一组的其他人都这么做了。他们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我。他们用精神分析法分析在大街上走过的人。这就是那么一段时间，那时，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小心谨慎地注意自己讲的话和手势是有点好处的。（《回忆录》，第243页）^①

安德森到芝加哥来时，只是在头脑中模模糊糊地下决心作为一个艺术家而生活。对于承认他对写作感兴趣这一点，他是十分缺乏自信心的。不管他是否在精神分析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找到过一种类似的事，他总是否认曾经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或曾

^① 这种采用精神分析法的业余分析一般遵循以下两个模式中的一个：（一）词语联系实验，这是弗洛伊德和莱格作为分析步骤的一部分而推荐的技巧。（二）关于一个人的“情结”和“抑制”的闪烁其词的概括，以及对“症状行为”的流行分析。这些大致是遵循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中提出的建议，如果这一组人的阅读较广泛的话，他们会参考《性论三讲》的部分章节。

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利用过他的著作。他有着博览群书的习惯，与其说有什么专门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使自己的梦想增加些内容；他的阅读没有什么系统性，而且是漫无边际，他也许唯恐失掉自己的独创性。他有这样的习惯，一旦有人对他提及某个人的话，或者一旦他着到某人同他自己的思想方式有某些相同之处，他就会设法去找到那个人的著作。当评论家们指出一种俄国影响时，“我便开始阅读俄国人的作品，为的是发现这一经常用来引证我和我的作品的话是否是真的。”（《讲故事者的故事》，第48页）有时，他和他的兄弟找到一本书便大声朗读起来；关于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作品，他说：“我兄弟前一天晚上去参加了文艺界人士的一个聚会，那儿有人大声朗读斯坦因小姐的一部新著……他买了一本《温柔的小东西》并把它带给了我，我们坐下谈了一阵那些奇怪的句子。”^①

无论安德森对精神分析学有什么反应，几乎都不是职业上的反应。安德森同特立根特·巴罗医生对此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这位纽约医生还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的著作都曾受到劳伦斯和弗兰克的赞赏。争论是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地进入其他生活。巴罗以这样的话语结束了这场讨论，“你以为你懂，但你并不懂。你所说的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是可以办得到的。”^②下面的谈话显示出两种对立思想在一个中心问题上的冲突：

① 舍伍德·安德森，为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地理与戏剧》作的序。（波斯顿，一九二二），第5页。

② 特立根特·巴罗，《精神分析学即兴作品与个人因素》，载《精神分析学评论》，第十三期（一九二六年），第174页。巴罗采用了安德森在《鸡蛋的胜利》（纽约，一九二一，第23页）中，“种子”里斯引用的话。巴罗说，这一事件出现于“十年前”的一九一六年。

象置身于混乱之外的精神病医生和卷入混乱之中的精神分析学家一样，我们不同的探求结果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把我们抛入相互冲突的窘境两边。我们两方都是私下即席创作的无意识工具。在我们这两方，我们所用的主题可以归结于个人在观测上的误差，这种误差秘密地驱使着我们的不同立场，虽然我们没有承认这一点。^①

安德森对精神分析学的反对在这里好象是以一种个人的确信为基础的。他确信他在“种子”中讲到的“普遍疾病”是不能通过科学方法来医治的，尽管艺术家可以把它描述出来。这是他独立于心理学家的另一个主张，这一次它掌握了该心理学家对此的一个准确引证，以此作为证据。在一封信中，特立根特·巴罗重申了他认为安德森具有理性独立性的观点：

我感觉到舍伍德·安德森同弗洛伊德一样，凭他本身的资格就是一个天才。安德森是一位有着令人震惊的直觉闪光的人，但他又一次同弗洛伊德一样，他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他那离奇的洞察力。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安德森没有读过弗洛伊德的作品，他也没有从别人那里得知的有关弗洛伊德的知识中吸取任何材料。一切流派都喜欢宣称一个聪明的学者是属于自己的，你不认为也如此吗？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精神分析学对安德森的采纳是相当无根据的。对于安德森，我可以说他从社会方面来讲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健康的一个。他在“种子”中的反攻足以证明这一点。的确，为了这一点理由，

^① 巴罗，出处同上。

许多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家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①

内在证据，无论它多么微乎其微，总是引起我们对这一点的怀疑，即安德森了解知识界对弗洛伊德的看法，他并没有把它从自己的头脑中完全驱除出去。在安德森作品中，布鲁斯·达德利的一句话是对弗洛伊德最典型的引证：“要是你对人类生活有任何不解之处的话，去查阅弗洛伊德医生的著作吧。”^②安德森对这一引证似乎并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阐述，它看起来是漫不经心的，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在别的地方处理象梦这类事情时，安德森总是把它们呈交给精神分析学家去做进一步的考察，但他拒绝把他的经验贴上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术语标签。精神分析学的语言时而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穷白人》中，他这样涉及了克莱拉·巴特华兹在火车上的幻想：“它如此强烈以至于影响到他深深埋藏着的无意识自我，并使他感到恐惧万分。”^③他描写本·皮勒，即比德威尔木匠的梦的时候，他采用了精神分析学家并不陌生的语言——尽管这一描述中，没有任何是假如没有精神分析学的帮助，安德森就写不出来的东西。本的那个夜晚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中，他杀了一个人，或者以为杀死了那个人。然后，“随着对梦的物质方面来说相当普通的非一致性，黑暗消失了，天亮了。”（第206页）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表明，对梦境中歪曲现象的了解就象第二个梦本身所表现的那样，它或许意味着对梦的一种浓厚的个人兴趣，或许意味着对弗洛伊德释梦的研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① 特立根特·巴罗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致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

② 《邪恶的笑声》，（纽约，一九二五），第230页。

③ 舍伍德·安德森，《穷白人》，（纽约，无日期），第181页；一九二〇年首次出版于纽约。

这对于批评家们的夸张宣称来说，的确是不充分的证据。例如，吕倍卡·威斯特说，安德森“对这门新心理学的过分专注摧毁了他的天才。”威斯特小姐通过把安德森的《鸡蛋的胜利》同他的另一部作品相比，宣称安德森的作品恰恰是由于其作者完全沉浸在这门新心理学之中，而“达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程度。”因此，他的作品才更有无限的价值。“它〔新心理学——译者注〕表明了他的主题。他的故事里单调乏味地充满了那些带着衣箱返回故乡的患有精神病的年轻姑娘，和情感遭到抑制的中年男人。”^①在评论《小城故事集》时，波因顿将精神分析与俄国现实主义连系起来，作为对安德森的主要影响：“他在这部小说中似乎是最糟的，就象一个过分自由地吸收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人，此后的工作进展只是微微地‘着眼’于通向小说的道路而已。”^②

一九三一年，雷吉斯·米乔德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作者的首要任务是用精神分析学的假想去反对美国文学中的清教主义的种种抑制。他在专论安德森的两章中，称安德森为“典型的弗洛伊德派小说家。”^③首先，安德森全部的文学生涯都在证明精神分析学的合理性，并在文学作品中检验了这个理论。《穷白人》的价值在于主要情节之外的弗洛伊德式小品，在于对感受力的病理形式的分析。《小城故事集》也是一部“第一流的心理学文献……它与大多数美国文学近年来对精神分析学所作的贡献是完全一致的。”（第182页）对这一先入之见的热情使米乔德沉迷在极端的评论之

① 吕倍卡·威斯特，《小说注解》，载《新政论家》，第十八期，（一九二二），第564—566页。还可参见《新心理学的一位拥护者》，载《文学文摘》，第七十三期，（一九二二），第33页。

② 亨利·小波因顿，《全靠运气》，载《文人》第四十九期，（一九一九），第729页。

③ 雷吉斯·米乔德，《今日美国小说——社会和心理研究》，（波士顿，一九三〇），第156页。

中；谈到“新英格兰人”时，他在提及那个故事中的一个情节片断时，称其为“文学上美妙动人，技巧上几乎是弗洛伊德式的……”。抑制的折磨极少得到如此戏剧化和科学化的描绘。”（第188—191页）米乔德说安德森与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合作，主张从抑制和压抑中解脱出来。他决定提倡这一学说，生活将会使监狱空无一人。“它将把那口‘井’的盖子打开，弗洛伊德式的群魔在那口‘井’里沉睡，清教徒感到那些群魔在他内心摸索着，他谨慎而明智地用索链拴住它们。”（第195—196页）①

这类评论的另一个例子出自卡米尔·J·麦考利笔下，他用精神分析学证明安德森的作品是罪恶的。如果我们不懂安德森的话，他说，就必须到弗洛伊德那里去寻求解释。“在我们了解一个学生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他的老师。”麦考利的方式是用类推法辩论，是把读者搞糊涂以便使他相信平行的活动实际上意味着直接的影响。安德森犯了两个弗洛伊德式的谬误：他只看到大街的一边，非常黑暗的一边，由白日梦者、堕落者、“受抑制者”、道德上的虚脱者、好色之徒、行为古怪的人所组成的人流在那边鬼鬼祟祟地走着。安德森的书页中到处都是这类人物。第二，象弗洛伊德一样，精神分析学应用的自由联想法是小说家们应该效法的极好模式。他的人物应该“无拘无束地讲话”，不隐瞒任何那些很可能是“不体面的或痛苦的”事情。安德森如此这样地遵循弗洛伊德主义的“讲出一切”的方法，这就使他同时触犯了高雅趣味和道德规范。安德森对性的全神贯注不仅仅是象弗洛伊德的专注，而且它就是由精神分析学衍生出来的。要治愈弗洛伊德的病人和安德森

① 这似乎颇为合适的引文来自《多重婚姻》，（纽约一九二三）第217页中约翰·韦伯斯特对意识流，并且主动介绍了“弗洛伊德式的魔鬼”这一术语。然而，必须承认，这段对无意识“深井”的描写与精神分析学的推广者和倡导者用来描写无意识的暗喻十分相似。

的病人，就必须使病人放弃一切束缚，“使自己屈从于那些扰乱他们生活的特殊冲动或感情……”^①

这些是评论中错误判断的最极端例子。那些与生活在芝加哥和纽约的安德森最接近的人要么干脆不提弗洛伊德，^②要么有节制地提出安德森与弗洛伊德是在相互平行的路线上各自工作着。^③然而，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犹豫的了，很容易把它归结于一个实际存在的影响，这种倾向对人们的诱惑还是极大的。不难找到这种简单归结的原因。当然，承认弗洛伊德把抑制这一术语贡献给美国批评界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一术语几乎立即就在社会学、历史、传记和文学批评这些领域里获得了新的重大意义。在美国反对传统抑制的斗争中，安德森被欢呼为领袖；他的小说恰巧与人们对新心理学的兴趣的勃发同时出现。他描写了受挫，特别是正常性表达的受挫。他把《小城故事集》题献给他的母亲，这件事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即正是他的母亲在他心中唤起了“观察生活表层下面的渴望”。在这里，“新智慧”难道没有清楚地用于小说领域吗？安德森对于梦的象征和梦幻的适

① 《舍伍德·安德森——天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载《天主教世界》，第一百三十三期（一九二九），第131、132、133页。克麦勒引自伊杜阿德·希契曼，《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理学》（纽约，一九一七），第195页，正如他在一则脚注中所承认的那样。但这段引文似乎来自安德森。对于读者来说，代表着安德森的小说理论。

② 参见，例如，罗伯特·摩尔斯·洛威特，《美国人舍伍德·安德森》，载《弗吉尼亚评论季刊》，第十七期（一九四一），第384页；“安德森的许多故事都是关于孤独而造成的人生挫折，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近、相互理解的不可能性。”

③ 在有关安德森的更为中肯的评论资料中，我们可以注意约翰·克罗尔·兰塞姆的《弗洛伊德与文学》，第161页；利奥·A·斯塔洛尔的《新术语——文学中的心理学》，第478页（提到《邪恶的笑声》中布鲁斯的风流韵事）；麦克斯威尔·波顿海姆的《精神分析学与美国小说》，第684页；亨利·赛德尔，《定义——当代批评论文》，第2期（纽约，一九二四），第242—248页，把安德森的《多重婚姻》同新世纪的道德连系起来；约翰·法勒约《现代小说中的性心理学》，第68页；阿利舍·格雷格利，《舍伍德·安德森》，载《日暮》，第七十五期（一九二三），第246页。

用似乎也在他对他的评论家的影响中起了作用。然而，安德森本人在承认任何影响这方面是很犹豫的，这一事实并非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他在回答他的评论家时，也从未表过态。虽然在其他事例中，比如他总是相当乐意地承认，格特鲁特·斯坦因、乔治·巴罗和詹姆斯·乔伊斯对他有着影响。虽说在某些情况下，他热烈地认可他的“良师益友”，但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却十分奇怪地保持缄默。因此，评论家们的夸张说法是可以原谅的。

(一) 安德森在俄亥俄州城镇的早期生活与他对自己创作的根本态度十分有关。他当然并不需要任何精神分析学手册作为他运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或自己的想象力的指南。

(二) 他一九一三年第一次来芝加哥非常急切地要开始作家生涯时，尚没有听说过什么精神分析学。在最早的两本书《爱吹牛皮的麦克菲逊的儿子》(一九一六)和《小城故事集》(一九一九)中的观点，就我们从内在证据来看，或者考虑到安德森早期的“芝加哥时期”的事实情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是他自己的观点。

(三) 在芝加哥，他同弗洛德·戴尔、卢西恩·卡里夫妇和玛格丽特·安德森一起参加文学讨论，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开始了解隐含在“新心理学”这一词语之下的观点和术语。他注意到主题的相似，谈到过流行的“作精神分析学分析”的习惯，但他宣称，他从未超越这些范围。

(四) 从《穷白人》(一九二〇)开始，尽管他并没有急剧地转变他的观点，但他注意到了精神分析学家们也在开发他的那个领域；他们的研究带有许多同他的虚构方法的特点相同的标记。《多重婚姻》(一九二三)与《邪恶的笑声》(一九二五)，还有《鸡蛋的胜利》(一九二一)中的几个故事，以及《马与人》(一九二三)反映出他对影响着家庭或未婚妇女的受挫和抑制的这种兴趣。

(五) 安德森相当独立于弗洛伊德的影响，发展了自己的主题，但是，方法上的相象如此令人吃惊，因而评论家们犯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可以原谅的错误；似乎有这样一种绝对的肯定性，即安德森必定受到过弗洛伊德的直接影响。

在这整个过程中，安德森对新心理学持怀疑态度；有时的反应仅仅是幽默性质的^①；另外一些时候，正象在特立根特·巴罗的例子中，他开始积极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精神分析学鼓励对抑制的社会根源持敌意，在美国尤其是这样；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所涉及的仅仅是神经病的个人问题，并且总是对建议改变社会制度十分犹豫，而社会制度对神经病或者对其不完善的治疗应负责任。然而，二十年代的许多作家则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精神分析学为他们与抑制的根源作斗争提供了一种武器，或者为他们提示了逃避这些根源的借口。再者，安德森经常涉及他笔下人物的性问题，这一点也很可能更容易说服评论家们。他们在区别神经病的临床研究与对受挫的文学研究之不同时表现得十分犹豫。

二

安德森式的村庄是“从内部”来观察的。安德森很少涉及其生活平静而具有欺骗性的外表，而是首先关注生活在村里的狭小社会区域内的那些人的感情。村民们的能量仅仅是偶尔有机会才能

^① 例如，“仅仅在几周之前我同一位谈论‘螺旋式进化’的女士共进晚餐。我的大脑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也许我在试图逃避词语的时代。我十分惧怕精神分析学家用精神分析学来分析我。有几个夜晚，我做梦都梦到那些家伙。有一个家伙在纽约西第八街弄得我走投无路。我无论怎样辗转反侧都逃脱不掉他的纠缠。我把一张床单撕得粉碎，就是为了摆脱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那还是一位女精神分析学家呢……。”舍伍德·安德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吧》，载《视野》，第一百五十一期（一九二九），第247页。

得以表现。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根本得不到表现，除非在情感的勃然爆发或狂欢之中，在那里似乎平静的表面遭到巨大冲击和干扰。^① 那些禁锢着感情表达的力量经常是乡村习俗，以及视纯洁为目的的倾向；然而，这些力量还常常包括村民们自己的胆怯，他们之所以允许自己的感情生活受到剥夺，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力量。对于习俗的憎恨或对某些人的厌恶，会使人的能量偏离本来可以成为其正常出口的方向。逃离厌烦，逃离不祥之运，逃离社区居民眼中的耻辱，这些都表现在一些微小的、带症状性的举止上——比如里非医生的“纸球”^② 或者阿道夫·迈尔斯手的紧张动作^③——或者是实际感官满足的象征性替代物。比如，柯蒂斯·哈特曼的新发现使他感到满足，因为他观察到上帝的手已经抓到了一位妇女“不道德的”裸体形式。对于安德森的村民们来说，肉体是最基本的表达媒介，没有任何力量能有效地使肉体保持沉默而又能不使其变得丑陋。对财富的渴望使汤姆·巴特华斯忽略了肉体的生活，致使他成了工业主人的一个奴仆；其结果是他同妻子和女儿的一切关系都受到了歪曲和扭曲。克拉拉的“成年”一时唤起了他对肉体的兴趣：“就象他在追求她母亲的那些日子里一样，就象他心中的占有欲摧毁了他爱的能力之前一样，他开始模模

① 例如，象在迈克尔·麦克阿瑟的情况中一样，他从监狱里喊出了他的祈祷：“啊！文宝！给人们派来一个新基督吧……让他到教堂里来吧，到法庭上来吧，到城市里来吧，到这样的小镇上来吧，口中喊道‘感到可耻吧！为你们担忧自己那抽泣的灵魂而感到可耻吧！’”安德森，《爱吹牛皮的麦克菲逊的儿子》。

② “在办公室里，他也穿着一件缝有许多特大口袋的避生衣，他总是不停地往这些口袋里塞纸片儿。几星期后，纸片变成了硬的小圆球，他的口袋里装满了这些小纸球时，他便把它们倒在地板上。”舍伍德·安德森，《小城故事集》（纽约，无日期），第19页。

③ “那些充满表现力的纤细手指总是十分活跃，总是努力把自己藏在他的口袋中或躲到他的身背后。这些手指终于显现出来成为他表达机械的活塞杆。”出处同上，第9页。

模糊地感到他周围的生活充满了意义。”(《穷白人》第143—144页)但是这一新的兴趣很快就被他对女儿行为的怀疑所抵销了；他拒不允许她正常地发泄新近唤起的任何激情，一旦有机会就立即把她遣送到州立大学去了。

这些例子难道不是“由抑制引起的神经病”的证据吗？并不都是——从某些方面看根本就不是。因为安德森为许多这类行为找到了另一种解释——中西部人天生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思想。安德森所讲的英勇的灵魂^①将反抗一致性并击败它；但是，普通的、太富有人性的小镇居民则压抑他灵魂中的美或渴望，这一英勇的灵魂在他们的居民区里显得软弱，并且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安德森看来，剥夺人类简朴、美妙生活的力量有时来自社会和经济方面；但是，正是人的先天的胆怯以及不情愿智胜“正义”的法律和约束，或者他们的无能为力，才主要说明了他们因循守旧的原因。人的内心生活因缺乏勇气而保持静止状态；一旦人的内心生活被揭示出来，对它的意识便会出现于极度的痛苦或猛烈的、拼死的反抗之际。比如，玛丽·科奇兰一直到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在恨他——由于他对她母亲干的那些事而恨他。只是到了他死于心脏病突发的那一时刻，她才意识到真情实况；他与她之间的那堵墙只是由于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思想而形成的。^②这种不善于表达经常是由于对性问题的一种强制性沉默而引起的。罗莎琳·韦斯科特向她母亲坦白了她要去芝加哥的情人那里的打算；她母亲打破了自己毕生对这方面问题的沉默；她说，爱情是男人

^① “年轻、勇敢的人深知，在他周围的世界里，都是些努力要把自己的疯狂和一致性强加在他身上的男人和女人。他将在这里发现一种不断耗费精力资源的要求，而这种资源对他来说，是一副补药，用来抵抗与弱者有关联的蕴含毒液。”安德森，《笔记》，第23页。这句话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六年。

^② 舍伍德·安德森，《未点燃的灯》，收于《鸡蛋的胜利》，第32页。

们虚构出来的；性是肮脏而罪恶的^①。

受挫有两个原因：对于积极追求正常幸福的外在压力——即习俗和“普通人的道德”；和个人的胆怯与软弱。梅·艾奇雷的困境由这两种动因造成。她是一位严格而严厉的人，一个乡村恶棍人家的唯一希望所在。她在中学读书，决心为克服村民对自己的不好看法而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人；这一切曾获得过暂时的成功；但当她最终屈从于杰罗姆·哈德利的纠缠时，人们便开始喋喋不休了：

她心中有一种许多人都想扼杀的非常温柔雅致的东西——那是毫无疑问的。扼杀内在纤细的东西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激情。一切男男女女都试图要这么做。首先，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扼杀在他或她自己心中的那种东西，然后便试图扼杀别人心中的这种东西。男人女人们都惧怕这种温柔雅致之感生存下去。^②

罪恶虽然暂时消除了周围人对她的尊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并没有指出通向完美幸福的道路。她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把谴责的手指指向她，迫使她求助于谎言——这是一部采用了所需要的一切精细手法精心设计的梦想之作，直到连她自己都相信它并且生活在其中了。这种把一种罪行投射于习俗的道德规范的做法是沉浸在梦幻世界中的，直到对她来说，只有这种梦幻世界才是存在着的，这一世界规定其自身的法律，并要求自身的一致性。这种

^① 安德森，《来自无处进入虚无》，收于《鸡蛋的胜利》，第260—261页。我们在卡尔·森·维奇顿的《纹身的伯爵夫人：一部有着快乐结尾的浪漫小说》（纽约，一九二四）也可以找到对这些小城镇的态度的实际描绘。

^② 《未用过的》，收于《马与人》，（纽约，一九二三），第76—77页。

一致性最后终于要求她去自杀。精神分析学中有一些适合于这一切经历的术语——抑制、投射、“防护机制”(defense mechanism)、“替代满足”(substitutive gratification)——但是并不需要它们。要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在梅·艾奇雷不需要验尸官的时候遇到她，他就可以听到她的故事了，他会采用与安德森的手法十分相似的方法去解释这个故事。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研究她的问题可能会导向治愈——兴趣方向的更改，或者让她的直觉生活得更健康，并得到更合理的升华；而对于安德森来说，其结果则是悲惨的死亡。

安德森把清教徒的真实世界看作他许多人物的一位强硬而残酷的主人，这里他讲的是抑制现象，正如他同时代的美国人也采用这一术语一样。安德森思考的是自然本身与权力、财富和宗教的世界两者之间的相冲突现象。这一对照在好几种情形下通过人物用以躲避矫揉造作的自然世界而得到了象征化。在玉米地里，“新英格兰人”中的女主人公找到了生命的源泉，而这一源泉竟如此长久地被她的新英格兰世界所遗忘。作为对一种模糊的冲动的反应，她冲进玉米地，脱光了衣服，疯狂地吻着那些玉米秆，这是她在努力为三十五年的抑制寻找补偿。这一疯狂的冲动行为是她对清教徒的窒息世界的回答，就好象大地本身都能用来指出过份抑制的愚昧似的。在他的《回忆录》中，安德森满怀柔情地谈起玉米地这一象征，“我愿意躺在玉米下的温暖土地上，看着昆虫们的生活，倾听夏日的微风吹过田野时，宽大的绿叶相碰的轻轻声音。这是一个适合美好思想的地方……。我甚至幻想，沙沙作响的玉米叶子竟在对我低声细语。”(第33页)

安德森满怀同情地注意到那种哑巴式的湮没无闻的中西部人，他感到人们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找到充足的性欲方向。他的故事中提出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是它能够称得上一种解决办

法的话)在于对性欲的理解,正如在误解和不相配的婚姻中可以找到许多受挫的例子一样。在《另一个女人》中,男人通过同一个陌生女人度过婚前之夜的做法找到了通向幸福的关键。①

《多重婚姻》是安德森有关这一问题的最透彻的研究。这本是一源于他新近对劳伦斯产生的兴趣的最早一部小说,受惠于对诸如《恋爱中的女人》这类小说的不完全理解,这一影响要比其他任何来源的影响要大得多。这是安德森感到内疚的“论题”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得到了最有意识的展开,或者作为一种文欲而记录了下来。在该书的序言中,安德森说:“如果一个寻找爱情的人直接走向它的话,这个人也许是发了疯。”应该做的事情,正如主人公决定要做的那样,就是接受一个人的疯狂。“没有获得爱的任何东西,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不会是美好的。”(第27页)他心中如此强烈的需要几乎完全被他的妻子所无视:“她认为,或者相信她认为,就是在婚姻中,除非为了达到生儿育女的目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不应该成为情人。”(第64页)这就是清教徒对待性的态度——对种族持续的实际关注:“甚至在长时间的准备、谈话、祈祷以及获得一些智慧之后,仍然缺乏无拘无束的感觉,正象一个人要掌握一种新的语言一样,他还获得了某种对鲜花、树木以及对那些被称为低等动物的生命和生命的延续相当陌生的东西。”生命竟能在这种条件下永存,这真令人惊奇;这“证明了冷静的自然决意不要被击败的决心,而这一点正是其他一切都不能证明的。”

约翰·威伯斯特决定离开这个虚伪的世界,但在此之前,他必须向妻子和女儿解释自己反抗的真正秘密。他买来一幅处女的画像,把它摆在自己的卧室里,开始私下对肉体的膜拜仪式。在一间只燃着两根蜡烛的房间里,他脱光衣服走到画像前。这是疯

① 《另一个女人》,收于《鸡蛋的胜利》,第33—45页。

狂，他愿意把它作为疯狂而接受下来：“我承认我目前在发疯，我只希望我能保持这种疯狂。”（第86页）无论如何，这是对他自己内心冲动的一种放纵与屈从。威伯斯特对女儿讲述了自己的生活故事，他曾经有过“缅怀”妻子肉体的理由，但是她却由于自己的恐惧而克制了肉体神圣的生活。

……被人们称为羞辱的东西来到她的面前，使她那欢悦的呼喊声跳过了唇边。

外面的声音叫道：“可耻！可耻！”……一个人应该听从外面的喊声呢，还是应该塞住自己的耳朵，闭上眼睛？
（第157，163页）

他们生活在一个已经死亡了的世界中，新生的唯一希望在于感觉的一种新的觉醒，这是一个不惧怕带有直觉和感觉而生活着的世界。生命的力量（感觉的生活和性合谐的生活）与死亡的力量（对机械的社会模式的严格遵守）之间进行着一场永久的斗争。“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心中都有一口深井，当生活从那扇门进入肉体那座房子时，生命探下身去猛地掀掉井上的沉重铁盖。在井里郁积着的黑暗隐秘的东西一涌而出，为自己找到了表达方式，当这些东西得到表达时，奇迹便出现了——它们经常变得美丽动人。”
（第217页）

对威伯斯特的冲突和他的解决办法的探索有着分析的深刻性，而分析的深刻性这一特征则是安德森的早期作品中所不具备的。这种添加上去的深刻性虽然一点也不有助于他的叙述风格，但仍可以被看作是来自安德森方面的一种暗示，即他在试图努力对受挫问题进行一番更加充分的理解。在《小城故事集》和《鸡蛋的胜利》中，他只是偶尔考虑到受挫问题。与《爱吹牛皮的麦克菲

逊的儿子》不同，经济问题被置于背景之中，内心冲突的性质被看作基本上是心理上的。《多重婚姻》表现出以至少他自认为是劳伦斯的分析方式，力图使他自己的感情“理智化”。

在劳伦斯的影响下，安德森试图宣扬一个“主题”：即原始头脑更容易充分“理解”人类的基本秘密。温德海姆·刘易斯曾指出，安德森的原始主义与劳伦斯的原始主义之间是平行的：《邪恶的笑声》中的女黑人“扮演着同劳伦斯作品中的鸚鵡一样的角色。”刘易斯认为，安德森“……是一个可怜的、怕老婆的、充分弗洛伊德式的、十分迷惑的、带有崭新的‘自卑感’的白人。”^①在《邪恶的笑声》中，有一些被卷入斗争中为了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绝对价值而锒铛入狱的几乎牺牲了一切的白人，安德森对他们和有着无拘无束意识的黑人进行了对比。约翰·斯托克顿离开了他在芝加哥的那位妻子后，改名为布鲁斯·达德利。他与他老板的妻子相识了。她设法安排同他一起从丈夫那儿逃走。在幕后，黑佣人的笑声提醒我们注意到，黑人把这类事情安排得更为优美雅致。在这一研究中，安德森重申了《多重婚姻》中的观点：人类（当然是指白种人了）已经使生命力萎缩，这必将要遭到报复。女黑人们的合唱表明了安德森解决办法的基本原始性和简单性。斯庞吉·马丁这一形象是对劳伦斯笔下的梅洛斯的模仿，代表着对文明的一种理想化的战胜，他不甘于工业上的独出心裁，因为这种独出心裁威胁着他对手工艺的热爱，他成功地迫使死人采取一种好战的妥协。他的回答就是一种强有力而健康的动物性。^②

^① 温德海姆·刘易斯，《苍白的脸》，收于《敌人》：第2期，（一九二七），第61，65页。对劳伦斯的提及是指《墨西哥的早晨》这本书，第3—20页。对安德森和劳伦斯最透彻的研究出现于欧文·豪的《舍伍德·安德森》中，（纽约，一九五一），第179—196页。

^② 安德森未能使这类主题具有说服力，这一点可以从海明威在《春潮》（纽约，一九二六）中对它的滑稽模仿中得到一些证明。

安德森的主题首先同他对人类受挫原因的探讨密切相关。什么东西使人类与其说健康、有感觉，还不如说体面、道德呢？《小城故事集》和《穷白人》中的形象是外在束缚和人物自己的胆怯这两方面的牺牲品——一种堕落的随和。大多数性无能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基本抑制——商业世界、工业世界和中产阶级的体面。安德森急于指出，原始生活并没有受到这类通向幸福之路上的障碍的阻止。他向受束缚的人提出多种多样的建议：《前进中的人们》中的博特·麦克格雷格和《邪恶的笑声》中的阿兰·格雷所采取简单放弃；《超越欲望》中的共产主义。从根本上讲，安德森对他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指出任何真正的解决办法。

安德森本人承认梦和幻想在创造生活中的能量。就好像他有意构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它的特点和关系只有在想象中才是恰当的。他很少满足于简单的现实主义；他憎恶事实的世界——他称之为清教徒的世界。他所参照的东西几乎总是个人经历的心理中心。人们可以说，现实主义小说寻求的是展现事件中的本质的因果关系。为了补充这类现实主义，并在许多方面替换它，战后的作家们便到心理学中寻找塑造和描写人物的一种新形式。因此，在对乡村的叙述描写中，为了替换艾格斯顿的感伤主义和艾德·豪的干巴巴的现实主义悲观主义，二十年代便出现了舍伍德·安德森的心理现实主义。安德森的人物是真实的，但他们只是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只有而且仅仅当我们中止普通的判断而换受他们时——不是接受他们的外表而是接受他们之所想和所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我们看来才是真实的。他的方法是从心理生活这方而研究一个人物，把外在的行为看作是心理生活的症状表现或者象征表现。

一般作者的批评判断，通常表现在对于表达的直接或暗含的判断加以选择。而这种批评判断在安德森那里则被同情所替代了

——同情一词的词源意义是“共遭磨难”。因为在安德森几乎所有的创作中都含有自传片断——他笔下的人物是他自己想象力和气质的产物——这就尤其是真实的了。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种对他自己心灵的全神贯注要求我们承认，安德森是一位独特的心理探索专家。^①

安德森的同情之温柔和含糊，在我们考虑到他的乡村人物作为虚构个人存在的合法性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安德森小说中大量存在的暴力总是由于这一点而缓和的，即行动和进行这种行动的人，都由于对事件预先的详尽解释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谅解。请看乔·温斯华斯这一人物，他是比德威尔的马具匠。最终的连续行动是恶魔般的放肆。然而，在其中的第一个行动之前，则是温斯华斯的哭泣；哭泣正如它所象征着的那样，使温斯华斯生活目的的失败达到了顶点。安德森首先从承认“出了毛病”这一点开始，但人们并不清楚地知道被嫌恶的事物是什么。它指的是一些相当不同的事情，诸如工业主义、商业头脑、文明人的世故、白人对健康冲动的惧怕。

评论家把安德森称为“美国的精神分析学信徒”完全是错误的吗？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安德森在创作时有一本弗洛伊德的作品或者一部精神分析学辞典放在手边。评论家们之所以这样为安德森贴标签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乎他的任何一个人物在他生活中的某一阶段，都可以走进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办公室，而且完全有理由要求治疗。梅·艾奇雷、杰西·本特雷、弗雷德·格雷、

^① 雷切尔·史密斯，《舍伍德·安德森：一些完全武断的反应》，载《西万尼评论》第三十期，一九二九年，第163页。安德森自己也承认，他的创作理论是以作者的自传性投射为基础的。参见：“在每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心中，蕴藏着几十个男人和女人，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可以过着五十个人的生活。”舍伍德·安德森，《再谈“新笔记”》，载《小评论》，一九一四年第一期，第16页。

布鲁斯·达德雷、休·麦克威、威拉德夫人——每个人都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蒙受着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痛苦。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内心心理目的的愿望。在所有这些患者当中，临床报告与安德森的叙述报告会有不同的结果。注意到精神分析与安德森的小说两者间的平行道路是有一定道理的，似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两条道路在任何关键的地方相交过。好象安德森要把澄清艺术家的分析的重担强加于弗洛伊德：“三十岁以上的人和那些聪明的人是理解这类事情的。一位德国科学家可以完美地解释它。如果你对人类生活有什么不解之处的话，去查阅弗洛伊德医生的著作吧。”（《邪恶的笑声》第230页）安德森似乎在说，如果你不能同我一起进入这些人物的生活中，如果在你看来他们仍旧是十分古怪的话——如果他们的行动仅仅是暴力，而这种暴力又是无法解释——那么弗洛伊德医生是冷静而科学地研究过这些事情的，他会帮助你的。但是，要是你真的求助于他，你就将无法理解我想对你说的许多话了。

三

瓦尔多·弗兰克在美国文学批评中占有一个奇怪的位置。他是位急切而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家，他首先试图解释美国文化的严重缺陷，然后便提出了他自己对他称之为“有机整体”的事物的看法。在他三篇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论文中，他的观点在绝望的呼喊与希望的回声之间变换着。《我们的美国》（一九一九）是专为欧洲人写的对美国的理解，它主宰全篇的语调是悲观主义，令人嫌恶的新清教。《美洲的再发现》（一九二九）提供了建立弗兰克的早期文学批评的基础。一部写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间的论文集于一九三七年以《在美国的丛林中》为题出版；在这里，他提出了他对美国的混乱状况的漫评，对“大众思想”的洞察，以及对美

国未来伟大前景之希望的设想。

我们在这些书中既可以找到对美国机构的批评，又可以发现他对复兴根源之信心的反复强调。在弗兰克看来，现代工业主义的发展只是数字上的而不是有机的。美国生活被虚假地和人为地安装在进步的车轮上。弗兰克认为，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产生了感情力量应用的变化。清教徒对生活的自我克制以及开拓者对工业能量的需要，确定了美国特殊的、全国性的抑制模式：创业者“必须对自己施加暴力。他肉体生活的全部活动范围都必须受到抑制。欲望的范畴必须受到禁止。意识所能及的范围必须砍除。古老的、几乎被人遗忘的直觉必须从他思想的隐秘深处呼唤出来，并使他们成为他生活的主宰者。”（《我们的美国》第18—19页）

美国弊病的根源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对感觉生活的自我克制，这种克制不是为了精神上的原因，而是为了物质上的原因。进步与健康的生活水火不相容。对美国的进步“最好的帮助便是压制欲望。”（第28页）美国人已经稳步地用权力代替了现实，或者把两者混淆起来；这是心理上不诚实的一种形式，这种不诚实不断地避开人类有机体的真实状态。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一种象诗人的白日梦那样有效验而又有欺骗性的愿望满足的源泉。^①在我们民族的文学中，我们根据自己的主张而过分简化了生活。开拓者使他的精力转移，把它们引导到他周围环境的不间断的、单向的斗争中去。但开拓者用这些方法并没有战胜欲望。

因为欲望是无法克制的。它害病、枯萎之后便开始变得

^① 参见《关于大脑作用二原则的系统阐述》，第13—21页。弗兰克认为，“权力目的”是使快乐原则改道，造成歪曲现实的结果。他要求承认快乐源泉的重要性——那些被权力为动力歪曲和抑制的源泉。

邪恶。它在神经病艺术中，在显著的感觉宗教中，在对其他人的欲望的性虐待狂般的干涉中寻找表达……。但是它继续存在着。因为它就是生活。它在每个新一代人诞生之际，在每一个个人诞生之际，又一次以强有力的、丰产的和富有灵感的姿态开始了它的旅程——直到环境和“教育”的累积力量使它转变了方向。（第45—46页）

清教徒否认复仇的上帝——或者说清教徒通过与上帝一致，剥夺了上帝的惊人力量，并换上了一位作为商业界沉默的合作者的上帝。清教徒和开拓者在性格和目标上结合为一体。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抑制。然而，在外表上，新清教徒则是在为上帝代劳。现代世界的规矩和检查制度一直面对着一个纯洁的上帝，他们要求上帝的信徒们谨慎而虔敬，最重要的是要在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干脆不沾裸体或它的任何功能的边儿。很明显，他对脱离肉体的上帝和失去精神意义的上帝的外部观察与崇拜，并没有受到任何“感觉反抗”的骚扰。但是人们可以在他更加过分的观察中发现，隐含着一种对未满足的愿望的迎合。清教徒“绝对不可觊觎妇女；因此桑代先生作了颇有启发性的讲演，他的讲演涉及低领长袍，跳舞时身体的接近，‘勾引男子的女人’的戏剧主题，座位靠得很近，没有灯光照明的剧场可能会发生的事这些方面。”（第99页）^①

^① 在一则脚注中，第99—100页，弗兰克从他一九一七年七月发表于《七种艺术》上的论文中引述了几行：“比利·桑代的成功是由于应用了病理学中称之为**转化机制**的东西：——对一种直觉欲望进行改造，使它远离被禁止的表达而转向一个经过伪装的、未被禁止的表达。放纵性欲是不安全的，因此，把激情变为对地狱的恐惧，并通过“开拓精神”使你的焦虑得到满足……人们只要注意到不断重现于桑代先生那画一样的脸上的微笑，就会意识到，在一个否定乐趣的物质第一主义世界中，这种“宗教”该多么有趣。神经病患者满足于一整套扭曲症状，这些扭曲症状代替了不友好的冷酷现实……”我们没有必要指出弗兰克评论观点的未来源，因为它用的语言使这一点不言而喻了。

弗兰克对美国传统的批评为二十年代的那场战役设立了场所，用来反对凡是被贴上“文化抑制”和“新清教主义”标签的东西。在这个暗喻的性格化中，美国工业世界成了一个恶魔般的形象，他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已经变得神经病一般。这一模式经常得到概述，它的细节也经常受到讨论，因此，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做个总结也许很有必要：^①（一）“肉体”是社会有机体，它将原始的、未经开发的资源和精力结合起来；（二）“欲望”是达到快乐与现实之间平衡的直觉的正常倾向；（三）“抑制”是为了达到唯一可衡量的权力之目的而使人的自然精力重辟途径（比如一种导致克制的感觉，通过对金钱收益数字上的测量而使自然精力理性化和抽象化）；（四）结果是宗教原则的枯燥无味，它们常常降低到肤浅的传统和习惯的水平上；“文化神经病”和受禁止愿望的经过伪装的满足。

弗兰克对精神分析学的运用与弗洛伊德在文化史中的冒险有着明显的不同。弗洛伊德强调他一切发现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的普遍性暗示出文化继承的一种形式；弗洛伊德认为，它们是存在于人类无意识中的原始遗产，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古老遗物。^②美国人对清教主义的抨击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这种抨击从对民族的个人英雄的批评转向对整个民族整体的普遍责难。精神分析学技巧的单一术语同大众思想的社会概念相混淆，这些不偏不倚地与反对数字性抽象的工业世界相关联。术语的应用很松散，类

^① 人们将会注意到，这一全部过程是以一种类推为基础的，这种类推为文化状况设想了具有人类属性的解剖学形式。如果一位文化或历史的治疗学家能够想象出他对之能施加影响的一个全国性“团体”，他就会感到更加轻松自在了。因此，将精神分析学的术语转进文化历史领域，是通过把一种地区的存在变为生物的存在而达到的。

^② 参见赫伯特·马库斯，《性爱与文明》，（波士顿，一九五五）。至于对这种文化批评的具体的美国立场的研究，特别请参见弗罗门·菲希曼，《艺术上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伯克利，一九五三）。

推的限制仅仅是得到漫不经心的遵守。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细节服从于一种新兴理论的需要。精神分析学理论被请出来，以证明对清教徒的一种强烈感觉到但却又含糊地得到限定的忿恨，是颇为合理的。清教徒是一只受到抑制和遭到蹂躏的小动物，他的行动使整个民族披上了全民族抑制的黑色墓布。弗兰克同时注意到二十世纪文化方面经济的和心理的这两种因素，在他看来，经济剥削是对文化健康有意窒息的最最终产物。这种抑制导致了二十世纪习俗的可怜的软弱性，以及全民族的神经病。

瓦尔多·弗兰克十分迫切地要利用弗洛伊德主义的术语和概念。《我们的美洲》利用了精神分析学信徒的词汇。全国性的疾病(malaise)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形象而得到象征化，这一偶像把疾病的经济原因与心理原因综合在一起。但弗兰克并不仅仅是一位偶像破坏者。他构思了一个建设性的替换方针，“一种新意识对垂死的文化形式和语言的开战”^①宣言。一切批评必须在哲学上坚决杜绝琐碎和纯粹的否定，“文化的根基是哲学、宗教、伦理和美学。没有一种现代哲学的综合，就不会有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学批评。没有它，最妙趣横生、最庄严认真的讨论也会象最枯燥无味的讨论一样离题万里。”（《礼炮》，第15页）

弗兰克的论题中心是他对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十九世纪理性主义在粉碎“产生文明的子宫和……文明得到哺育和抚养的基础”（第19页）方面助了一臂之力。古老的有机整体感被一系列理性实验所代替。现代知识分子“完全是思想型的”，更糟的是，他对此沾沾自喜，并满足于混乱之中的一小块安全之地。”〔知识分子们〕带着一种宗教般的诚实，专注于任何对他们的思想习惯来说是最甜蜜的东西。他们深入地思考着感伤的人，或

^① 弗兰克，《为了宣战》，收于《礼炮》，第14页。

机械的人，或政治的人。他们否认活动于他们界限之外的那些事物的存在，这样就把他们自己与世隔绝于一个自满的狭小天地里。”（第54页）

弗兰克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称为有机的整体，“我们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人的起源与终结”，^①一种开始于个人但超超个人的宗教状态。艺术把感觉的物理数据与艺术表现的情感中心结合起来。艺术家为这种审美统一性作出自己的贡献，并通过自己的精力使它充满生气；美学形式感是我们肉体统一感的一种无意识的轮廓。”（《再发现》，第23页）如果没有这种统一性，现代文化便是不完全的。现代人的宗教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是一连串的幻想与崇拜，其中有的是商业界的自然派生，其他的则被作为对这类商业界神学化的反抗而含糊地得到承认。这些新的“上帝和权力崇拜”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做作。这种情况指出了恢复文化一致性的真实需要。美国带着受挫灵魂的悲哀的渴望，求助于精神分析学并使它成为崇拜对象。现代知识分子在这一努力中又一次错把部分当成了整体；精神分析学的实验室术语被误认为是心理整体的远见。

弗兰克把弗洛伊德描绘成十九世纪一长串巨人中的最后一位，这些巨人们都曾努力取代“天主教欧洲的破碎的综合”。^②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种结合原则，以用来作为达到新统一的关键。弗兰克敬仰他们，但不无遗憾地发现，他们仅仅提供了不完全的结合。用十九世纪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装备起来的弗洛伊德则深入到“灵魂的非理性深处”。

^① 瓦克多·弗兰克，《美洲的再发现：美国生活哲学入门》，（纽约，一九二九），第19页。

^② 弗兰克，《西格蒙·弗洛伊德》，收于《在美国的丛林中》，第83页。这些“巨人们”是叔本华、黑格尔、斯宾塞、孔德，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多芬、木索尔斯基和瓦格纳，德拉克罗亚、安格尔和尚塞，马克思和达尔文。

但弗洛伊德不愿向这个变幻不定并充满有害气氛的世界屈服，他要通过理性的手段从这一世界的不断变动中抽出适应合理实践的三维世界的精力，他坚持认为，这个有限的世界是唯一的现实。这是旗鼓不相当的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种心理构思，这种心理构思洋溢着作者激昂的英雄意志。（《美国丛林》第86页）

他对弗洛伊德的主要批评是弗洛伊德对理性的过份强调。这是艺术家对科学家的抱怨。弗洛伊德不愿意去考虑无意识中的神秘想象；他否定整体的一部分，而过份强调整体的另一部分，这样，他就重复了十九世纪“绝对论者”的错误：

〔绝对论者〕试图把人类发现真理的一部分资源（它的一方面是团体理性，另一方面是团体有机直觉）排斥在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这方面，他并不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弗洛伊德那里，这种局限意识赋予巨人们一种辛辣的语调，这些巨人们对创造一个能够与作为整体的、不能废除的上帝相对抗的世界感到无能为力。（第88页）

弗兰克要求的不仅仅是对于无意识的一种合理的认识。他说，荣格由于考虑到“神秘的未知数”而“更加富有逻辑性”；但是荣格欠缺弗洛伊德的理智高度。^①

这绝不是弗兰克的最终结论。他对治疗法的社会后果感到不

^① 弗兰克对荣格的理智能力的看法几乎是轻蔑的。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至于荣格，我从来未喜欢过他或者很高兴地谈论过他的著作。虽然他对直觉的创造过程比弗洛伊德更敏感，在我看来，他缺乏弗洛伊德的清晰性和理智上的完善。”瓦尔多·弗兰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

安。那些富裕、浮浅和百无聊赖的人们所采用的精神分析是花销极大的游戏，而进行这些游戏的人都是些“无所事事的女人和寄生虫似的男人，他们不值得精神分析家们去拯救，因为精神分析学家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使他们重新适应这个病态的世界。”（《美国丛林》，第89页）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克认为大众疗法要不得的一个原因。在对布里尔医生的描写中，他对嘲讽中年妇女的古怪行为这一任务感到极大的乐趣；布里尔的工作为流行的妄想狂和昂贵的情结创立了新式样：

他们在俱乐部、在沙龙、在床上相会，用“精神分析学”相互分析。他们讨论着。首先，他们交待、供认。妇女们到处漫游，各种梦从她们那未涂口红的双唇中滔滔不绝地涌出来。年轻的姑娘们象佩戴着头发上的花束或胸前俗艳的宝石那样，佩戴着热烈的供词。在对梦的解释的灵感激励下，强壮的男人们抛弃自己的妻子和职业，去寻找一个情结的伴侣（the Mate of a Complex）。①

虽然弗兰克并不否认弗洛伊德的权威，然而，他认为弗洛伊德对思想所做出的贡献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精神分析学在展示我们无意识生活的深度和丰富性方面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而且是相当有勇气的贡献。但是，仅仅从理性方面去对心理开拓进行探索和实验，这种做法所忽略的因素未免太多了，而这些因素对人类最终创造性的整顿非常重要。弗兰克在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发现，弗洛伊德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帮助。

① 瓦尔多·弗兰克，《欢快的智慧》，收于《曝光：用探照灯……》（纽约，一九二六年），第97—98页。

他是在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一四年首次接触到弗洛伊德的著作的，“它令人惊奇地同我有关人类动力的大部分直觉思索相一致”。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系列在他看来肯定了他自己想法的结论。“除非弗洛伊德适合于我的直觉感觉，不然的话，他对我的帮助是不会如此巨大的。那些先验地同我们相近的人在理智上帮助和养育了我们。在我看来，弗洛伊德是现代思想界的一位英雄，我深深地受惠于他。”^① 他开始对估价美国文化感兴趣时，弗洛伊德主义曾对他有过帮助，到了一九一九年，弗兰克几乎随心所欲地把精神分析学的术语作为批评象征来自由运用。同时，他对弗洛伊德也有些不满之处，他并没有接受弗洛伊德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或引路人，他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具有更大教育和社会价值的疗法。他在一九三四年对弗洛伊德的重新估价中认为，弗洛伊德是现代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是他暗示，未来超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能够企及的范围。他说，从哲学上讲，“我们几乎是处在相互对立的阵营里。”与此同时，他继续抨击大众化的精神分析，这表现了他对这类知识分子、对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和寄生虫似的男人”的厌恶。由于他的小说就是他的批评学说，并且表现出他在文学批评方面同样显著的发展，因此这些小说展现出他对精神分析学同样的态度便不足为怪了。

四

在弗兰克的早期小说中，人们注意到这位艺术家的素材几乎是支离破碎的，正象它们出现在他早期对美国文化的评论估价中那样。人们发现，弗兰克毕竟超越了他的素材，把一种他自己的

^① 瓦尔多·弗兰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

哲学强加于他的理想的主人公身上，这一主人公是弗兰克在对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的研究中都未能找到的虚构原型。^①这个理想人物从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来说，是数字和利润世界的反抗者。弗兰克的虚构理想从安德森的《爱吹牛皮的麦克菲逊的儿子》中获得了一点启发——一位更温柔的山姆·麦克菲逊，他从未完全受到商业利益诱惑的愚弄。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弗兰克对自己的素材的把握；他的人物并不仅仅是观念的贮藏器，人物总是使观念生气勃勃。然而，保罗·罗申费尔德的批评是很中肯的：“他处理素材时，带有一种要使它们证明他的主题之有根据性的愿望，尽管他没有承认过这一愿望。他还把一种便利的先验论保护方法，一种情节或玄学公式强加于他的无意识生活之上。”^②

这些主人公中最重要的人物，大卫·马克安德是弗兰克评价现代世界的工具。他的简朴、天真和深沉的真诚使其他人在他面前感到很不自在；这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内在自我之中，感到很不自在。这些性质是同大卫的无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性质没有受到虚伪的影响，而现实世界要求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要虚伪。大卫目瞪口呆的惊讶似乎从未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沉思默想的对象。大卫对他母亲满怀柔情的依恋对他来说是最根本的。在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他不断地返回到这种依恋中来。没有任何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困难能使这种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就好像他已经逃避了堕落或仇恨的一切暗示似的。弗兰克之所以给予他的主人公如此简朴的衣饰，是为了表现其他人心中仇恨的根源。大卫第一次真正的斗争是同汤姆·伦那德进行的；汤姆是一

^① 接近于“理想人物”的人在历史上有称谓；在弗兰克的同时代人中有阿尔弗雷德·施蒂茨利茨。

^② 保罗·罗申费尔德，《人们所见到的人：二十四位现代作家》（纽约，一九二五），第105页。

位富有反抗精神的清教徒，他为了使自己摆脱新教制度荒唐的野蛮，又回复到它的商业变体上来了，他成了一位繁忙、精明、肆无忌惮的纽约城律师。在汤姆眼中，大卫恰恰是他自己的良心体现，这种良心折磨着他，并使他发疯，而且还指向汤姆曾经有意拒绝的安宁。《阴郁的母亲》写的就是这一斗争的故事，汤姆最终失败了，正如弗兰克会让他失败那样。大卫被保留下来去从事更伟大的工作，痛苦万分的汤姆转向了他那个空洞阴谋的世界。

很清楚，大卫·马克安德要追求的是他那条孤独的道路，他影响着其他人的生活，就象他影响了伦那德的生活一样。下一部小说^①为他在《美洲的再发现》中对美国生活的评价提供了证据。二十世纪敏感的人都在试验一切形式的宗教和信仰，寻找走出混乱的道路，而紧紧靠在美国生活表层下而的就是这一片混乱。没有一条可以走出混乱的道路，因为在混乱之中存在着灵魂所需要的浸礼和新生。海伦·戴安德雷的生活是作为小心谨慎地显示勇敢但却徒劳的美国人的生活商有意描绘出来的，这样的美国人在他的文化表面寻找着真理。她在寻找令人感到安慰的并且是明智的统一性，但似乎科学事实的冷酷使她厌恶，她移入了大卫之爱的温暖而神秘的领域。在这里，又一次仅仅存在着一种部分的解决办法，性生活的幸福和家庭的安定是对真理的逃避。她从精神分析学转向天主教，她相信天主教具有她所寻找的统一性。弗兰克是这样总结这一探求的：“人们总是试图把世界，至少是与他们有关的那部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你可以说那种试图就是文明的一个方面；科学只不过是它最新近的化身而已。”（《死与生》，第50页）

海伦越是真诚地追求，大卫在她看来就显得越遥远。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行进着，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一致性。大卫又一次

^① 瓦尔多·弗兰克，《大卫·马克安德的死与生》，（纽约，一九三四）。

成为隐居者；在下定决心的那一阵剧痛中，他彻底断绝了与旧世界的联系：“尽管我对此并不理解，但这是必要的。”（第85页）他回到母亲那里；母亲的形象回到土地上，回到了大卫作为避难所的家。在他度过早年生活的偏僻的马萨诸塞村庄里，他寻找着可以证明他割断与外部世界一切联系这一行动的合理性。但是，村庄里空虚而庸俗的灰色清教徒精神把他驱赶了出来。他哭着说：“‘让我知道，我为什么招引了他们的仇恨，我怎样才能获得他们的爱吧。因为我们并不是相分离的；我们的间隔是谎言，因为我们生来平等。’”他的道路通向西部和末路——远离财富和商业生活的虚假的安定。无论他参加什么运动，他那单纯的诚实立即就会发现那个运动的缺陷。他从堪萨斯去芝加哥，便卷入了现代知识分子由于受挫而造成的混乱之中。他从混乱中逃了出来，在牲畜围场找到一份工作之后，便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了。但是，理智世界拒不允许他离去，他又被带回来受教育，从书籍中窃取现实。他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同两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结伴漫游全国，去了解战斗中的共产主义——“实际真理”。

所有这一切暗含着对肉体死亡的寻求；但是弗兰克讲得很清楚，肉体的死亡并不是大卫追求的目的。它是一种否定，弗兰克的整体理论要求一种创造力量的积极复兴：“存在着一个尚来诞生的阶级，它为了能生存下去而同世界作斗争。通过它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整个社会也许会又一次获得新生。”（第58页）大卫的新生是凶兆的；他履行了新生的仪式，“一种仍然由他、城市和世界所组成的死亡躯体之内正在觉醒的意志；一种最终战胜自己并获得新生的意志！”的象征。（第541—542页）大卫·马克安德的人生历程是弗兰克理论的一而虚构的镜子。弗兰克回避了一切有关轻而易举战胜混乱之说的暗示；他把精神分析学看作是结合中的又一个课程。正如在他的文学批评中那样，他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作为一种手段来运用，大卫·马克安德的故事表现出同弗洛伊德对生与死的各种直觉推测的密切关系。^①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在于弗兰克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无意识中的一种创造性的积极神秘感；而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神秘感根本就不存在，直觉的战役每时每刻都受到生理和心理事实的制止。

大卫·马克安德的生活用虚构的方法说明了弗兰克在《美洲的再发现》中提出的假设。他的其他著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他有关精神分析学知识的另外一些特点。正如在他的一部评论著作中一样，他第一部小说^②对精神分析学术语的运用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还不如说是惹人注目的；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位年轻的小说家在拙劣地使自己适应于另一种职业的词汇工具。他的形象常常刺人眼目，就好象色彩和光线是抽象的东西，只能在抽象中得到最完美的处理似的。《不受欢迎的人》自由地玩弄着各种术语和概念；下面这个段落表明，作者把他自己没有完全把握的素材表达得十分拙劣：“他的无意识自我象火山喷出熔岩一样喷射出大量激情和反思，它们淹没了昆西的夜晚黑暗的山坡。生动的闹哄哄的梦进入了他的沉睡之中——在这些梦中，被抑制的愿望急风骤雨般地获得了实现。这些愿望既不是善良的，也不是文雅的或镇定自若的。”（《不受欢迎的人》第78页。重点号由我所加）

弗兰克以他那个时代的方式进行了虚构概念和风格方面的实验。《邪恶的笑声》中的原始主义在《假日》中得到了发展；描写某地区内小城生活的潦倒的想法在《城市街区》中也得到了发展。《假日》的原始主义在这本小说中的主题和情节两方面都占有一个中心位置。正如在安德森的小说中一样，白种男人的生活受到习俗标准的限制，而他们只是在触犯这些标准时才想到要遵守它们。

① 参见《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伊底》。

② 弗兰克，《不受欢迎的人》（波士顿，一九一七）。

但是，在《假日》中，两种对立的力量则被引入到更密切、更极端的焦点之中。黑人的宗教是真诚的，而白人传道士则“象一个陷入困境的动物那样，从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中连珠炮似的讲个不停。”^①女主人公重复着白人对“黑鬼城”的恐惧：“当你站在那里喊叫的时候，我怎么能相信你呢？我厌恶白人的一切。去统治，去受文明教育并保持纯洁；你不知道厌烦是什么滋味。我内心中的女人在极大的欲望中期待着我，我精疲力尽了。整个世界在我白种人的正直周围象黑暗的圆圈那样起伏着，我精疲力尽了。”（《假日》，第100页）白人基督教的“不许”对于黑人的“可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代用品。小说的危机出现于强烈地吸引着女主人公的黑人约翰·克劳德遭到诬告的时候。因此，他命中注定要替他的种族受难，为白人提供一个摆脱抑制的假日。小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处于基本冲突中的两种心理组织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原始主义戏剧性。他的主要动力是与几种基本心理概念相关连的一个主题。

在长达六百多页的《新郎》中，弗兰克对流行的精神分析学的明确批评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尖刻地批评道，弗洛伊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不过是自由恋爱和放荡生活的一种模糊辩护而已。美国二十年代愚蠢孤弱的知识分子的这一画像中，有着一一种可悲的东西。每当弗兰克让那些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时，他对那些傻话的尖锐而猛烈的攻击就会继续下去。那位给玛丽·唐纳德在她的“新学校”里提供了一个职位的福贝西夫人，在下面一句随便讲来的话中概括了那种空谈：“我真是太喜欢荣格了，你呢？他精神上的东西要多得多。”（《新郎》，第498页）菲利普·卡里斯医生的形象描绘得十分详细。卡里斯医生这位商人的精神分析学家通过治疗，使他的病人摆脱了对金融灾难的预感，他非常愿意给“无所事事的漂亮妇女”提供他认为她所需要的东

^① 弗兰克，《假日》（纽约，一九二三），第46页。

西。

漂亮的妇女、无所事事的妇女、生理健全但性生活不愉快的妇女，是他的很大一部分开业主顾。她们所有这些人那压抑的需要就是同精神分析学家睡觉。对这一点的戏剧性实现使她们的问题具体化了，并且加快了治疗过程。当她们看到她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同她们的梦（大多数情况下是父亲的意象）睡觉时，她们就作好了正视现实（他最喜欢用的词语）的准备。同时，精神分析学医生便大发其财，并由此而每次得到从二十五到五十美元的收入。（第548—549页）

我们必须把弗兰克对弗洛伊德的尊重与他对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的谴责区分开来。这两方面在他的小说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弗兰克处理他的人物时，显然并没有直接求助于弗洛伊德，但是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任何其愉人相比较，他却更加完整地、更加经常地应用了他的学说。他甚至注意到弗洛伊德有关日常生活方面的不大重要的示意，如他对遗忘的心理学分析。《永久的夏日》^①中功成名就的律师莫提梅尔·克兰在回顾了他个人生活的遭遇之后，便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一旦他的注意力从赚钱这一严肃事务中转移开来时，他便遗忘了那些过去总能使他赢得委托人的社交礼节。他忘记说那些合适的话，其结果便是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委托人。

弗兰克对梦特征的运用在他向弗洛伊德的借鉴方面也是很重要的。由于梦也许是理解无意识的最好途径，弗兰克便把它当作揭示人物行为的无意识动力的合理方法。梦在弗兰克的小说中还

^① 弗兰克，《假日》（纽约，一九四一）。

起着一种结构设计的作用。《永久的夏日》中，戴格尼·彼德逊第一次遇见克兰的那天晚上所做的两个梦就总结了前面的情节，并预示了后面的情节。^①

有一部小说^②几乎全部采用了幻想和梦境。约翰·马克的冒险经历是哲基尔—海德两重性(Jekyll-Hyde duality)的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炼。他在商业生活中无可责难，而且相当成功，但是他却惊恐地发现，那些凡是使他的无意识欲望受挫的人都一一因谋杀或意外事故而丧命身亡，可是警察却找不出任何可以看得出的杀人或罪犯的痕迹。当他的未婚妻坦白地向他说出，她在他和另一个男人之间，尚不能作出抉择时，电话几乎立即就传来了他的情敌之死的消息。他父母反对早婚，他们在一次车祸中双双身亡。最后，马克意识到，这一系列的死亡不是单纯的巧合，而是他无意识愿望的客观化。他做好了勇敢地面对那个欲望的准备。梦境的幻想这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欲望将引导马克走向死亡。约翰试图通过冷静地评价梦的自我来打败它：“梦中有启示：这一点我坚信。让我去开拓它那奇怪地变幻着的领域吧。可是我的思想不能进到那里面去，尽管我的思想已经清除了不必要的杂念而准备投入战斗，但它只能猛烈地敲门却无法进去。”（《白垩脸》，第193页）现在他确信，正是他自己杀掉了他的情敌，清除了他的双亲，因为他们要挫败他的欲望。他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此

^① 参见出处同上，第74—76页。弗兰克在回答有关这个事件的一个具体问题时说：“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断定，一个人物的梦不能象他的有意识行动或象对他身体特征的描述那样，成为艺术家的合理素材。我有意地应用梦，是因为对我来说，梦是我的人物性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我永远也不会明智地这么做的。”

“梦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行为动力的线索，还不如说是共性的线索……我认为，梦能揭示性格——色彩——倾向以及人物的状况……”瓦尔多·弗兰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给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

^② 《白垩脸》（纽约，一九二二）。

甘心情愿地听从自己欲望的摆布，米尔德丽德吓得离他而去。

瓦尔多·弗兰克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方面是很广泛的。我们首先可以在他早期作品中找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尽管他的意图是真诚的，但表现形式却尚未成熟。这些作品中那一堆没有充分同化的事实后来被他以更微妙的形式加以利用。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几条线索都暗示着他从未抛弃过弗洛伊德的影响。他对自己晚期人物的无意识生活的深思熟虑并不仅仅是对动力的深入研究，因为他的中心人物的无意识总是各种事件所涉及到的那一点。弗兰克完成的是创造手段对于死亡的胜利——即弗洛伊德犹豫着是否允许的“神秘的未知数”。梦的形式在每一本小说中都被用来作为加强人物性格塑造的一种手段，它偶尔也被用作一种结构设计。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有关梦的知识决不是来自通俗的论述梦的书籍，而是来源于对弗洛伊德的研究。最后，他对通俗精神分析学的批评和讽刺从未把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作为讥讽的对象。弗兰克批评过弗洛伊德这一点，我们已作过说明；但弗兰克尊重他，一直受惠于他，这一点应该十分清楚了。

五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一九三四)十分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所包含的东西，而且还在于它的写作历史。这部小说问世于已被证明为他文学生涯后半生的开端。通过一九二五年发表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自《人间天堂》(一九二〇)的“早年成功”以来大受欢迎的小说，菲茨杰拉德已经牢固确立了他作为一位重要作家的地位。菲茨杰拉德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构思他最雄心勃勃的一部作品。他花了九年时间为此书应该具有的形式而大伤脑筋，撰写初稿，改变人物，变换场景。在不同的阶段，这本小说(或它的雏形)曾用过下面这些题目中的任

何一个：《杀母的男孩子》，《麦卡雷案件》，《戴弗医生的假日》，《医生的假日》，《我们这类人》，《世界博览会》以及最终的《夜色温柔》。

这些变化并不都是由于菲茨杰拉德无法确定一个有用的形式而造成的结果。这些年是菲茨杰拉德夫妇极度痛苦的岁月。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已下定决心要不负他们的盛名；他们夫妇二人为了获得公认和赏识而相互竞争；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开始就表现出，由于她为自己和丈夫所规定的追求目标太高而造成了严重后果。精神病学在菲茨杰拉德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十分需要的学说世界。菲茨杰拉德夫妇的命运随着泽尔达健康状况的好转或恶化而不断变化着。菲茨杰拉德被迫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判断他的虚构世界。他已经从一位敏感艺术家的角度表现出那个世界的迷惑，它的道德混乱以及它的迫在眉睫的种种暴力暗示。菲茨杰拉德不时地证明，他可以成为这样一位敏感的艺术家。然而，尽管他的小说经常使人联想起精神分析情景，易于作出精神分析的解释，但他很少把精神分析学本身作为一种参照系或一种习惯技巧。随着泽尔达的病占去他越来越多的时间，随着他出于需要而求助于精神分析学著作，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便开始重新考虑这部新小说的计划，并戏剧般地强调精神病学这门科学和精神病医生的生活和工作。^①

^① 泽尔达第一次发病是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菲茨杰拉德带她去瑞士蒙特罗去接受检查，检查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一九三一年一月末，菲茨杰拉德夫妇在美国治疗时，泽尔达的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被送往巴尔的摩去进行治疗。在那之后不久，泽尔达给斯克里本纳出版公司的马克斯韦尔·珀金斯寄去了她的小说《救救我吧，圆舞曲》的手稿。她花了六个星期写出了部书，主要是在住院期间写的。小说主要是攻击她的丈夫，为她自己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的勃勃雄心作自我辩护，菲茨杰拉德反对她当芭蕾舞演员的计划，至少是使这一计划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她的身体第三次垮了下来，在送往巴尔的摩的医院时，好象病得不可救药了。这些经历的整个过程使菲茨杰拉德缠绕着一种负罪感；尽管医生们向他担保，发病的根源可追溯到他与泽尔达相识的很久以前，他仍不无道理的怀疑，他们几年来，在纽约、巴黎、好莱坞、里维埃拉游荡地度过的狂乱生活，与引起她身体崩溃的几个阶段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参见亚瑟·麦兹纳，《天堂尽头》（波士顿，一九五一），第216页之后。

马尔科姆·考利对《夜色温柔》最后的版本作了完美精当的编定，^①他认为，这部小说的计划和写作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梅拉克版本”（一九二五年暮夏开始于里维埃拉）。据推测，着重描写一位好莱坞年轻技术员弗朗西斯·梅拉克，他“将同一位象尼科尔·戴弗的女人恋爱，将参加过多的狂欢宴会，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并在一阵暴怒中杀死他的母亲。”这一构思几乎同 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小说毫无相似之处。在第二个阶段或“罗斯玛丽版本”（大约写于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〇年之间）中，梅拉克不见了，或者说分解成三个好莱坞人物：著名电影导演刘威伦·凯利，他正带着妻子尼科尔去欧洲度假；还有罗斯玛丽，她千方百计地引起他的注意，以希望能得到一个试镜头的机会。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小说中，凯利和他的妻子变成了狄克和尼科尔·戴弗，他们同好莱坞没有任何关系了；罗斯玛丽成为一位功成名就的年轻电影明星，定稿后的整部小说开场时，她同母亲一起在欧洲度假。

第三个也就是最后的版本“狄克·戴弗版”，动笔于一九三二年初，成为一九三四年小说的最终形式。主人公在这里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精神病医生。很明显，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新的发展方向。考利在总结各种变更时认为，三种版本中最重要的主题是“一位去欧洲的雄心勃勃的美国青年，由于他同有闲阶级的接触而遭到毁灭。”（第 337 页）有闲阶级在小说开始时便是焦点，正象他始终如一的焦点一样，尽管后来的焦点是经过一些变化的。菲茨杰拉德决定，主人公——牺牲品——法官三位一体的人物不应该是一位好莱坞技术员

^① 纽约，一九五一年版。以下讨论基于马尔科姆·考利对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手稿的研究。

或导演，而应该是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一决定使菲茨杰拉德所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小说是现代人对评价社会和人类喜剧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他认为，这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事实。这一点在他给马克斯韦尔·珀金斯的一封信（一九三八年）中表达得十分明显：“〔小说的〕最大缺陷是真正的开端——在瑞士的一位年轻精神病医生被粗糙地搞到书的中间去了。”（考利引用，第11页）菲茨杰拉德后来提出，把一九三四年版本中涉及狄克早期阶段和他同尼科尔·沃伦相遇的那一部分抽出来，作为小说的开端。以罗斯玛丽的角度为重点，一九三四年版本的开场就这样被移到了后面，使狄克·戴弗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而获得新的突出。^①

一九一七年春天，二十六岁的狄克·戴弗来到苏黎世，等待着的是他前途无量的整个生涯。我们应该看到他不仅仅是一个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他身上还带着菲茨杰拉德人物的标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狄克到达苏黎世时，虽然身上没有装备一只蜈蚣所需要的那么多阿基里斯脚踵，但他却还是有着许多阿基里斯脚踵般的致命弱点——对永恒力量和健康的幻想，对人们根本善意的幻想；对一个民族的幻想，对虚假地低声哼唱小屋门外没有老狼的那些世代代边疆母亲们的谎言的幻想。”（第307—308

^① 考利在准备一九五一年版本的那本书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按照菲茨杰拉德的愿望去做的。细节请参看他为那个版本所写的导言。关于这些变动所产生的效果，考利有如下说法：“通过把故事依照时间顺序重新安排，菲茨杰拉德把它紧紧地结为一体。他牺牲了一个二分精彩的开场以及一切神秘因素，但是他获得了一部组织结构得更完好、效果更强烈的小说，这一判断是毋庸置疑的。”（序言，第14—15页）一九三四年版本的安排也有许多道理可言，很难说精神病问题推到前场，读者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一九三四年版本所提供的罗丝玛丽观察角度给人以小说中心同一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感觉，而小说的精神病学毕竟是一种评价和判断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本旨。

页)①然而,这些幻想虽然是不熟练地放在这里的,但它们对于非茨杰拉德人物的成长和崩溃,是绝对必需的。他是一位前途无量、富有魅力而真诚的人,而与这一方成均势的另一方却是他毁灭性的天真行为。《夜色温柔》与其说是对现代弊病的精神病学的评价,倒不如说,而且更应该说是对愚蠢和悲哀地支撑着的幻想的叙述。尼科尔疾病的根源以其自身的方式同狄克的雄心根源十分相象。一伙移居国外的人被戴弗夫妇的世界所吸引。许多非茨杰拉德的人物所特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希望与神经衰弱的绝望的结合物也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他们。因此,精神病学与其说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判断,还不如说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解释。沃伦一家生活中的这种混乱状况以非常极端的形式获得了实现。他们的基础就是财富——或者更确地说,就是一笔极不寻常的、拥有巨大权力的并且可以挥霍无度的财产,这笔财产提倡和允许那种把不负责任的人驱向灾难的放肆。非茨杰拉德对沃伦钱财的分析把人们带入了小说意义的整体理解范围;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分析的一个方面反映在十八岁的电影明星罗斯玛丽的形象上,以及她前不久在电影《爸爸的姑娘》中所扮演的角色上:

她就在那儿——一年前的女学生,秀发被在身后,硬挺挺地飘拂着,就象一位塔纳格拉美女雕像(a tanagra figure)那浓密的头发一样;她就在那儿——那么年轻,那么天真——她母亲倾注了爱的关怀的产物;她就在那儿——体现着人类的幼年,剪下一个新的硬纸娃娃在它那妓女般空洞的头

① 在此文和后面随之而来的页数,参考出自发表在《珍稀本非茨杰拉德文集》中的版本。(纽约,一九四五)。

《爸爸的姑娘》的主题反映出尼科尔·沃伦最初精神错乱的原因。这里，在对罗斯玛丽“好甜好甜的事物”(tweetest things)的空洞而甜蜜的描绘中，我们肤浅地得到了对通俗趣味一种低水平的批评，但它还具有对混乱道德的暗示以及对事物的基本无知，而不懂得人类心理组织将是灾难性的。菲茨杰拉德对美国场景(或者说沃伦那一面的美国场景)的起诉的另一面与金钱能给人以特权、机动性和超越善与恶道德优势的荒唐观点有关。尼科尔的姐姐“巴比”沃伦深信这一原则：她们的金钱将买到任何东西和一切东西；它将首先为尼科尔购买一个医生丈夫，在这一安排中，爱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给予考虑的。菲茨杰拉德把这种沃伦罪过描绘成对道德趣味的粗暴侵犯，它的高效率使它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

尼科尔是大量独出心裁和辛苦劳累的产物。为了她的缘故，火车在芝加哥开始运行，并穿过大陆圆圆的凸部开到加利福尼亚；糖胶树胶工厂喷着烟，链环传送带在工厂里一环一环地增长着；男人们在大缸里搅拌着牙膏，从铜制大桶中抽出漱口剂；姑娘们飞快地制作着番茄罐头，或者在圣诞前夜出售低价小商品的杂货商店粗野地工作着……这些是向尼科尔交付什一税中的一些人，随着整个制度摇摇摆摆、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时，它为她诸如批发购买的这种过剩带来了一层狂热的兴旺时期，就象在一团扩大蔓延着的火焰前坚守岗位司炉工脸上的色润一样。她说明着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在她自身中包含着她自己的毁灭，但她将它们说明得如此准确，以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雅致，而目前罗斯

玛丽试图想要模仿出这种雅致。(第233页)

这很明显是“适用于精神分析学家的一个病例”，但菲茨杰拉德使它成为社会案例研究的事物。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这些运用是不完善的，当然更不是绝对精确的。这些运用要求超越尼科尔疾病的界限，去包括十年来只想得到娱乐的一个民族的整个社会。小说尤其发掘了移情——恋爱情况的戏剧前景。戴弗受朋友之托，在一位富有美国病人的病例中帮助，他发现她很容易地就爱上了他；尽管他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但还是相当情愿去回报她的爱。戴弗在同两位同行的对话中坦白了他的困惑与恐惧：

弗朗兹又一次要开口——道姆勒又一次以直接针对狄克的问题制止了他。“你是否想到过要离开这儿？”

“我不能离开这儿。”

道姆勒医生转向弗朗兹：“那我们可以将沃伦小姐送走。”

“您看怎么样最好就怎么办吧，道姆勒教授”，狄克让步说。

“这当然是一种情况。”

道姆勒教授象一个无脚人挎上一副拐杖似的欠起身来。

“但是这是一种职业情况。”他低声叫道。

“我真有些陷入她的情网了——我头脑中曾经闪过要她这一念头。”

“啧啧！”弗朗兹咂着嘴。

“等一等”，道姆勒警告他说。弗朗兹拒不等待：“什么！将你生命的一半都专注于当一个医生兼护士、兼一切吗？——”

万万不能！我知道这种病例是怎样一种情况。二十个病例中就有一个在第一次紧要关头彻底完蛋了。最好永远别再见到她！（第335—336页）

但是戴弗最终还是屈服了。他真心诚意地希望这种“职业情况”能以某种方式转变成一种个人情况。从头到尾“巴比”·沃伦都把她的妹夫当作一位受雇用的医生兼伴侣；他们共同生活的几个发展阶段证明，她的看法与事实相去不远。无论如何，戴弗也永远无法在他的头脑中决定在这两个角色当中，他更愿意充当哪一个。她是在“利用他，就象一个病人在利用他的医生的意志一样，这一点的显而易见性太令人痛苦了。”

……他对她看法的两重性——丈夫与精神病医生——使他的各种官能日益麻痹瘫痪。在这六年中，她有好几次带着他一起超越了理智的界限，通过引起他的情感同情或者通过奇异或游离的智慧的闪光解除了他思想上的攻防装备，因此，只是在事件过去之后，他才带着从紧张状态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发觉，她已经成功地战胜了他那较好的判断力。（第394页）

当尼科尔“利用”他（耗干他的精力）去推进她自己的治疗过程时，沃伦金钱（由厉害的“巴比”所支配管理）逐渐击败了他为保持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这不仅仅是一种遭到个人卷入之毁灭的“职业情况”；它还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粗暴、残酷、享有特权的“富家子”不可避免地要扑灭菲茨杰拉德人物的天真指望和慷慨灵魂。

这本小说最好的题目应该是《戴弗医生的衰垮》。戴弗自己完全把尼科尔的病承担起来；随着她的痊愈，他便虚弱下去了。他

曾经是一位前途无量的人，他慢慢地而且是痛苦地变成了沃伦金钱的“受监护的未成年者”，他往日宽厚自我的一个拙劣模仿。“你曾很愿意创造事物”，尼科尔在接近结尾处告诉他说。“但你现在却似乎只想把它们打个粉碎。”（第486页）这种婚姻的结束是不可避免的。尼科尔抛弃了她那依靠医生丈夫的病人角色，开始不动感情地观察他，很快就投入了另一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的怀抱，尼科尔象刚出院似的去求助于他。她完全康复了，因此她“永远割断了绳索。然后，她平静地啜泣着，双腿无力地向那终于属于她自己的家走去。”（第529页）

“治疗结束了。”戴弗医生“获得了自由。”他精疲力尽地转向里维埃拉海岸，那里曾有好长时间教被用来作为治疗的场景。

“我必须走了，”他说。他站起身时稍微摇晃了一下；他不再感觉好了——他的血液循环也变得缓慢了。他举起右手，站在高处的台阶上，用罗马教皇的十字架为海岸祈神赐福……。（第544页）

这里包含着几种讽刺。其中包括戴弗对一种“职业情况”的屈服以及为了爱情的缘故献身于一个与其说是爱人还不如说是患者的人。但其他讽刺本质上即属于此。尼科尔的病毕竟是沃伦情况的结果，这是由它的巨大财富和特权所养成的道德界限模糊而造成的。财富一直在烦扰着他，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财富的牺牲品。最后，他个人意志的精方已无法应付这种财富了。首先，小说描写了世俗治疗艺术从一开始就在各种机会面前所明显表现出的重要性。戴弗的同事们习惯于一种训练有素的背景，一种不那么慷慨地富有同情味但却是更加坚硬的背景，他们相信，应该把人类情况限制在能以科学态度对待它们的条件范围之内。这是戴弗所

做不到的，或者说，他不愿意这样限制自己。他同菲茨杰拉德的其他许多人物一样，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过善意和讨好人的微笑去治愈整个世界。他道德资本的基金（他的“魅力”，正如菲茨杰拉德最经常称它的那样）慢慢地被他周围那些人所耗尽，他们比他软弱，因此要依靠他。他从他父亲，那位伟大而天真的美国人的道德英雄那里继承了这种道德上的善意。因此，戴弗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他同时又是一位不完全的科学家；他天赋甚高，他试图把精神病学作为他自己善意的工具。他不满足于在职业的谨慎范围内工作，而一定要献出他爱的基金。因为他的直觉要求他不仅仅只是“治疗”尼科尔，而是要做更多的事情（他想要爱她），他便同她纠缠在一起，他被作为一个精神病学的“病例”的她以及她疾病后面的根源所击败。

这个悲剧性的故事是菲茨杰拉德当时自我实现的一种暗示。《夜色温柔》本文“狄克·戴弗”版本的巨大变动与他对自己的其他评论以及他对二十年代的其他评论相般配；在短篇小说《重游巴比伦》中以及他关于自己精神崩溃的公开自白中（载《老爷》杂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六年三月和四月）。在《夜色温柔》的创作中，似乎有一种令人激动得发狂的东西，他在描写那些人物的过度行为的过程中，就好象是在记录自己的过度行为似的。因此，这部小说是他自己士气衰落、痛苦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衰落场景的极度恐惧的一种文献记录。精神病学当时是他生活经历的一部分；精神病学成为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解释中的一部分，他当时就是这么看待二十年代的。他这么做时，自由运用了他的精神病学知识，就象一个门外汉所能做的那样；他这位门外汉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需要了解足够的有关精神病学的知识，以便去理解那些发生在他身上以及发生在他所一直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上的那些事情。

第九章 进一步的解释

对于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小说中一般地提及弗洛伊德或精神分析学进行编目分类，至今还未有人尝试过。这样一种工作将表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即许多作家是熟悉弗洛伊德的理论的，但却认为至多只能在作品中略带提及一下。作家们认为，只要是在他们的论述范围里有必要使得精神分析的理论、实践及专门术语无所不在，那么他们就会对任何这样的理由表示漫不经心的认可。詹姆斯·亨尼克的《虚伪的面纱》中偶尔使用一些这样的术语就是典型的一例，它当然承认其理智的和社会的来源，但却怪僻地、并带有某种独立于这些来源的极大的审美感受使用了它们。亨尼克警告说，现代小说(从一九一九年起)被过多的“描写性铺张词藻”弄得贫乏无物了，小说不妨使用一种“不仅从外部、而且还从内部来描绘你的人物的无孔不入的人物塑造手法”。^① 在他对莫娜·弥尔敦的肖像描绘中，以及在该书另一些地方，亨尼克有机会使用那门新兴心理学的专门术语，这种术语有时偶然地来自弗洛伊德那里。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中，这种术语则与尼采的思想有联系，因为亨尼克对尼采本人有着极大的兴趣。现在事实依然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一九年，这种术语就是某种共同的财

^① 詹姆斯·亨尼克：《虚伪的面纱》(纽约，一九三〇)，第146页。写于一九一九年。

富，而对这种术语的使用并不伴随着对弗洛伊德理论本身的任何精确研究或运用。《虚伪的面纱》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它揭示了作者的倾向，显示了作者对纽约和巴黎的知识，以及对易卜生和尼采的知识，而只是偶尔才显露出对弗洛伊德及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了解。例如，当他作为自己的主人公乌里奇·荫文时说，音乐“从我们的阈下自我中发掘出来，被作曲家的艺术带到我们意识的表面”（第123页）时，他就暗示了一种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了解，但这种暗示根本不带有任何重大的结果。

亨尼克小说在许多小说中有着典型的意义，那些小说在一个讨论和争论的时代，取代了真正的创造性作品的位置。它们中的所有那些习俗都在拍卖。新的自由及其主要敌人陈旧的限制成了重要的问题，而出版商拟定的书单子则注意由那些自由权所激发起的极大兴趣。一些作家至少有三个理由值得在这样一种研究中占有一个位置：他们在精神分析学的大部分或全部分歧中对这种理论的明智的掌握；他们的具体陈述，这往往对他们运用这种理论揭供了一种传记上的重要性；最后则是他们在科学地限制对那些材料的审美利用上的明显的、有争议的独立性。

在本章的限度内，人们也许会看到有些重复，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所变更的，即重复了我们上而已经考查过的那些习惯和方法。因为康拉德·艾肯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发时对分析者实验作了研究，所以他写出了一部规模较小的《尤利西斯》，一个精神分析的“神秘的故事”，以及大量批评性和富有想象力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地并明确地与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有联系。路德维希·路易森对理解当代形势的广泛探索是那样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以致于自传和小说之间的分界线简直都微乎其微了；这种探索对托马斯·曼的人类种族史观点提供了支持。亨利·米勒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奇怪的伙伴，他简直无法与我们迄今所考

虑到的任何人相比拟——除非是超现实主义者的，即使和那些人相比，他也只不过有一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最后，迪伦·托马斯也许最全面地探索了现代人的变化多端而又孤僻古怪的梦幻生活，但其结果与乔伊斯的《芬内根的苏醒》或瓦尔多·弗兰克的《白垩脸》中的结果毫无相似之处。

二

在所有美国作家中，康拉德·艾肯对弗洛伊德主义和与其同源的一些心理学有着最严肃的兴趣。他的态度是艺术家的态度，尽管是独立和批判性的，但是却毫无疑问受益于弗洛伊德。艾肯发现弗洛伊德的著作在美学启示方面、在他的批评家和创造性艺术家的作用方面十分丰富。为了回答《新诗》编辑寄给他的一封质询信，他宣布说，他曾“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每一个人都受其影响，不管自己是否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很早就断定，早在一九一二年，我就认为，弗洛伊德及其合作者、竞争者和追随者们对于理解人及其意识正在作出本世纪最重大的贡献，相应地，我把尽可能多地了解弗洛伊德主义当作自己的正经事来做。’”^①

艾肯在他父母的悲剧性死亡迫使他被送往马萨诸塞州新白德佛的亲戚家之前，还在佐治亚州的无树平原度过的童年时代里，就对一般的医疗实践有了颇有结果的了解。那双重悲剧的记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变化的奇异性影响了他，并给他的作品带上了一种内省性质，这正是那些作品的最显著特色。在哈佛的最后一年里，艾肯从他的精神病医生朋友——剑桥的G·P·麦考奇医生那里了解到了“西格蒙·弗洛伊德教授的有破坏作用的教

^① 《新诗》，第十一卷（一九三四），第13页。

义”。因此，艾肯“似乎就成了一位心理学专家，”或至少是起点很高的业余心理学家。^①

他并非没有意识到精神分析学也许会遭到的谩骂，或业余精神分析学家也许常表现出的不完整的把握。精神分析学家在他的小说中扮演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角色。带着对新的心理学研究的严肃性怀有的十分正当的尊重，艾肯表现出对那门心理学的种种企图的抵制，因为它试图以文字的魔力以及分析家对现代心灵的悲惨情形的温和、平稳的主宰，来解决所有现代的窘境。艾肯和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尽管受到了人类灵魂的新幻想强烈感染，但他们不大情愿离开它的恐惧和魅力，而去求得分析家的冷漠、清醒、合乎情理的启发，因为那些分析家往往指出现状，并吩咐病人在其中感到，这是一种针对他的问题的有效的解决方法。

《伟大的循环》，正如作者对那门新心理学的知识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以令人钦慕的明析度描绘了抵制的现象，也就是所有精神分析学家所面临的那个问题，这种抵制随着病人的脾性而在程度上和强度上有所变化。安迪·凯瑟曾考虑到、梦想到并分析了逼好的危险性，他最终来到一位朋友的房间，那人装作懂得一些精神分析学知识，并且每当那个机会来临时，总是转到不太熟练的精神分析上去。艾肯对这次会见的分析应当被看作是半幽默

① 彼德森，《混乱的曲调》，第48页。彼德森的这本书在某些方面说来是一本颇为有用的书，该书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并不包括对艾肯后期作品的述评，尤其不包括对三十年代问世的那些小说的述评。艾肯指出，他对弗洛伊德主义有所了解的日期“约为一九〇九年或一九一〇年”。这是“与一批医生和未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终生友谊的开端。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是伴随着精神分析运动、并且甚至是置身于其中而成长起来的。”见给弗雷德里克·J·索夫曼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于根据精神分析学批评对艾肯作品的有价值的研究，见亨利·A·默里，《康拉德·艾肯，创造性分解的诗人》，载《美国展望》第五期（一九五三年秋季），第27—36页。也可见《守灵》，第十一期（一九五二），第95—106页。

的，他表达的毕竟不是自己对精神分析学的反对，倒不如说，是自由职业知识界在接受被他当作解决方法的那些东西时，所表现出的自然和正常的勉强态度，但那些方法未免过于简单了，简直无法与他对自己心灵的估价相称。安迪实际上说，假定分析家的魔杖和咒文会使得这一切都消失，那这对我的阙下生活的丰富性，对无意识动机和欲望的迷人的复杂性和困惑性来说，就是一个侮辱。正如所进行的那样，分析是精确地按照临床方法进行的——回答毫不费力、毫不犹豫地就说出了，就象出自一个背下来的本文一样。在谈到安迪未能在婚姻生活中发现乐趣时，比尔给了这样的满意回答：“在你的每一桩风流韵事中，你都试图使你的心上人成为你的母亲。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风流韵事总不得成功的原因所在。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这就是问题所在。那是行不通的。因此或迟或早，你总是拒不把她们统统抛弃，或被她们所抛弃——她们不得不抛弃你。”^①

安迪自卫地和他那位分析家朋友作斗争，同时也和他那明显的企图作斗争，因为他试图剥去他的问题的所有理性化了的尊严外表。

我想是抵制吧。喔，你这个该死的业余分析家，还有所有你那些可怜的、肮脏的、抽象的术语。你为什么不能说出你的用意何在呢？你为什么不有啥说啥呢？灵魂和潜意识、无意识和意志之间到底有何区别？或者阉割情结、自卑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之间有何区别？言词、推诿。由各个高雅的分析家所表现出来的虚荣。不是吗？为了肮脏的爱，为我给它们中的任何一样下个定义吧，以便于我绝对地了解这

^① 康德拉·艾肯，《伟大的循环》，（纽约，一九三三），第217页。

些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告诉我它们存在于大脑中的哪个地方。你曾经端详过头脑里的图吗？（第244—245页）

安迪想要而且也应当有以自己的方式受苦的权利。分析家不仅不想允许这样，而且还使得整个事情显得过于简单：“‘你好像认为，仅仅通过把我们从固定词组赶回到另一个词组上去，通过一系列的历史替换，你就解决一切事情了。上帝啊，真幼稚啊’”。（第256页）冗长的分析已经发现了安迪的困境之根源，但是却无力消除这一根源，因为安迪本人已被它迷住了，因而不想放弃它。无意识的力量有自己的力量，而对这种力量，科学并不总是能征服之。这些力量就是悲剧的主题。理性的中止使得精神分析学家无法实现治愈病症。悲剧人物在自我意识的粉碎性打击面前屈服了，但是由于被无意识的隐秘劝导所牢牢地掌握了，并被迷住了，因此这个人物便以对其悲剧的持久的、非理性的服从而听了无意识的劝导。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说来，他无意识地想望悲剧。问题解决并不在科学调查的有着整齐界限的范围内实现；分析学家仅仅指明了内部冲突的根源罢了。那一冲突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接踵而来的进程超越了他的调节或预防力量。^①

艾肯后来承认，精神分析学对现代文学批评作出了重大贡

^① 对梦和分析情形的极大关注，使得《伟大的循环》在精神分析学直接和精确使用的那些书中占有突出地位。实际上，《伟大的循环》的问世，十分近乎使我本人都成了一位分析学家：它给我带来了H·D·和威妮弗雷德·布莱尔的友谊，他们两人都十分接近弗洛伊德：他们把这本书送给了弗洛伊德，据说他称之为杰作……因此，他们然后就算也带我去弗洛伊德那儿……最后我自己决定（好象得到厄里奇·弗路姆医生的帮助），无论如何这纯属一个误解。现在想来十分懊恼，当时怎么没完成的！”给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于H·D·和弗洛伊德，见她的近作《向弗洛伊德致敬》（纽约，一九五六）。

献。他说，只要你观察美学的历史，你就必定会对其令人不满意的和矛盾的现象感到忧伤。实际上，美学总是试图在外部形式中发现美。美并非是永恒地蚀刻在天空中的一个型式；这是一种感觉，一种欲望，因此与人的心理和生物本性相关联，并非只有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感觉留存在与身体的腐化相分离的神圣超然之中。那唯一真正的关键性问题是与那种感觉的来源有关的，“人为什么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渴望我们称之为美、或道德之美、或审美之美的那种感觉呢？他为什么要以那种宗教热情去不断地发展、发展……称之为艺术的活动去满足那种渴望呢？”

弗洛伊德的回答是，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当我们通过幻想的媒介摆脱出强加的限制，进入一种扩大了个性和一个和谐的世界中时，我们就感到了那种深深的满足。”^①贯穿着他一生的大部分岁月，艾肯一直想起弗洛伊德将艺术家解释为神经病患者的观点。他并不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点；他也并没有说过，这就是唯一的解释，因为这一解释的确省略了一个重要的质的判断，而正是根据那个判断，艺术作品才最终在其内在价值基础上受到估价。创作过程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受到艺术家意识的控制。最终，人们必将丢弃对艺术的这一实在太简单的解释，而去承认，艺术家在能将从自己的特殊才能中得益之前，必须同时具备“一种良好的敏感性”和对自己技艺的认识。

但是，这些东而得到承认之后，艺术家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心理学的问题了，并且弗洛伊德已经最卓绝地、最诚实地描绘了艺术家的天性。艾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这个部分的兴趣赋予了《蓝色的航行》里的自传体主人公威廉·戴默莱斯特的内心冲突以实质

^① 康拉德·艾肯，《批评的基础》，载于《新共和》第三十四期（一九二五），第二部分，第4页。

意义。戴默莱斯特试图二次解释他的地位——一次是向一位“经营嚼糖果”的商人西尔伯斯坦解释，那人当然不想对之有多少理解；然后又在给辛西娅的好几封未发出的信中的一封里作了解释。对于戴默莱斯特来说（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来也是对安迪·凯瑟来说），给他的选择是放纵或抵制神经病，因为这种病是创作和自恋的苦恼根源。糖神分析学家在称艺术为神经病的一种形式时，通过言外之意来建议，艺术家应当抛弃它。戴默莱斯特以这种要求不懈地斗争着，与他幻想中的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辩论着。分析学家说，创作过程因为带有所有那些恐惧和复杂性而受到咒骂，因此这些东西可以驱除掉，但是他最后认输了。戴默莱斯特已经走得太远了。“‘回到简单的东西上来对你来说是不可能的！悲惨！你必须把你的神经病探究到底！’”（第241页）

承认这样一种艺术的基础是丢脸的，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戴默莱斯特在给辛西娅的第二封信里，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家职业以他的人格上的弱点为食粮；它们是这样一种弱点，因而也坚定地阻碍着通向一种充满信心的、正常的性生活的道路。难道他不应当向这些弱点屈服吗？难道一切艺术至少不是以屈从于心理弱点的行为而开始的吗？难道它不因此在其根源处就是不健康的和不正常的吗？

——我正在适应这种必然的事物过程中，即我肯定将遭到失败。我尽可能地在对我的失败所进行的严格的心理检查中躲避，并且努力证明这有多少是由于（1）绝对地缺乏文学的力量，或天才，或被我们称之为的神经病，有多少是由于（2）关于这种新的文学方法的必然性的错误假想。例如，在选择这种文学方法、这种对冗长和断片的故意放纵时，如果我受人格虚弱的支配——这种弱点并非普遍的，或很少有可能将

是普遍的，但却是极其特异性的——仅仅抛头露面的话，那会怎样呢？（第290页）

无意识的生活以及他自己的无意识生活曾强烈地吸引了他，并且使他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接触到了这种生活。一部艺术作品，至少就他所知赋予它本质意义的创作过程，是一种激发人兴趣的力量的结果。那就是令人悲伤的真理，并不仅仅是对艺术家而言的，而且有几分是对所有人而言的。艾肯并不完全对所有这些确信无疑，但他很乐意承认人的无意识生活的持久魅力。在这其中包含有现实阻止他满足或实现的所有欲望和愿望。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蓝色的航行》最有助于表明艾肯对无意识的艺术探索。这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模仿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但并不只是对那个爱尔兰的奥德赛的模仿。戴默莱斯特当然就是《蓝色的航行》里的斯蒂芬·达德路斯，而西尔伯斯坦则是利奥波德·布鲁姆；这部小说是对艺术家生活的精心的、深入细致的描绘。它的型式严格地向下发展，进入戴默莱斯特的无意识中，而结果又从中浮现，进入自我估价的清晰光亮之中。艾肯已经在他那对精神分析学的彻底了解的支持下逐渐进入了内心独白。戴默莱斯特心灵的显露从未忍受严重的模糊黯淡，西方开头的那一章就清楚地陈述了时间和地点，并且确定了叙述所遵循的外部限制。戴默莱斯特乘坐着一艘船前往英国。这一情景当然将提供自己的那份视域和声音，并且提供给对戴默莱斯特心灵的研究一些外部环境的可靠依托。他的注意力受到对辛西娅的几乎完全专注的进一步控制，因为他期待着在英国见到她。在惊奇地发现辛西娅也在同一条船上，并且痛苦地意识到她已不再爱他之后，叙述便成了独白——戴默莱斯特在自己的舱里回顾自己的一生，寻求他虽知道却又害怕向自己承认的原因和解释。整个第

四章都是一场白日梦，这场梦从未将处理方法留给意识（因为戴默莱斯特直到最后都一直是醒着的）。返回充分清醒意识的过程在某一点上受到了一种过分幻想的阻碍，在那个幻想里戴默莱斯特与他的潜意识压抑力就生活和艺术问题发生了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位分析学家朋友），出现了他的同船水手冷静、但却鞭劈入里地讨论生活的一个幻象。

没有谁象艾肯那样如此生动透彻地表达了现代人的精神解体之悲剧，他必然而来的无依无靠之感——“整个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一场混乱的动荡，一种反对力量的旋流，他们和我都处于同一个反常的潮流之中，无依无靠地承受着不可预测的命运的压力。我自己也许在这波动激荡的潮流奔腾的表面上，是唯一一个转瞬即逝的浪花吧。”^①这种对个性一致的追求是自拆台脚，因为它需要一种对表面合乎理性和感觉作用的否定，而这种作用通常则是确保一致性的。自我由于有了名称，只对一致性有着暂时性的制约，因为它一旦被无意识生活的流捕捉住，就会分解成上千种变化不定的东西。“迷失的人们”的挣扎是令人怜悯的，通常是悲枪的，而非悲剧性的。常常放弃这种挣扎，因而自我便屈服于梦幻生活的奇异怪诞和巨大幻想。艾肯对人的梦幻生活有着充分的了解，简单和复杂的梦充斥了他的小说书页中，成了他许多诗歌的首要原动力。自我正如从外部世界运动到无意识中那样，又一次“从黑暗的世界向上运动”，它不大情愿服从现实的专横要求。“象这样向上运动……被自己的身体所包围，手重重地放在心上，心脏在耳边不停地跳动，刚才还只是一场梦的韵律的一切均成了脉搏的节奏，被扭曲了的梦幻面孔和细丝成了抵挡来自窗口那

^① 康拉德·艾肯，《杰荷纳》，载于《迷失的人们中间》（纽约，一九三四），第238—239页。

块亮光的眼睫毛的唯一波动不定的防御物”。^①

在梦中，人们往往自信地或屈从地返回到生活的本源，心甘情愿地消除意识的令人厌烦的控制和平衡，因而带着过去和现在的种种简单的愿望留居在无意识中。向梦屈服是一种诱惑；但是它也有着自已伴随着的恐惧。梦的路程就是通向死亡的道路。它提供了对未能面对现实的借口的最后充分的衡量。屈从于寻求快乐的愿望，不管是机能的还是无意识的，也许最终都会导致最后的和绝对的屈从，这种屈从便是死亡的无意识。自我便与一种难以捉摸的现实作斗争，但是却宁愿要无意识的非现实。自我用所有力气来抵抗与现实原则相连系的奴役的束缚。它渴望孩提时代的原始简单性，渴望梦的生活的幻想，渴望无意识愿望满足的舒适享乐。

按屈艾肯的看法，二十世纪的重大问题是意识问题——并不象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他们多半都未能给人以满意的回答。如果人的意识全是无意识愿望的牺牲品，如果自我失去本质的一致性，并且心灵解体的话，那么我们就肯定要修正我们对完整自我的解释：那个自我有多少可以合理地（也就是说始终一致地心里想着文明的目标）增加上或用来替代自我的较为陈旧、较为表面化的概念呢？当有意识的自我最终在这个更大、更丰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它在某种程度上在无意识中的居留得到假想和承认时，弗洛伊德对我们最终理解自我所作的贡献就终将得到认可。“对我来说，”艾肯说，“〔弗洛伊德〕正象我感到必不可少那样，仍然令人羡慕地适应这样一种哲学的等级——对意识、认识的进化的信念，作为我们的首要才能和职责，作为一种试图不惜

^① 艾肯，《伟大的循环》，第299—300页，参见特歌，《奥西里斯·摩西白夭涌现出来》，（纽约，一九三一）。

任何代价与之相处融洽的苏格拉底式的欲望。”^①

三

路德维希·路易森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讨伐的生涯——反对非道德自由的沉闷的道德抑制和愚昧的现代观念，并且寻求一种敏感的宗教的和审美的标准的德康复原。那长长的一连串书，自传体小说和虚构的自传，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战役，根据格言的范德，追求一种健全的理智生活。哪怕对这种生活的最微不足道的道德障碍成了美国人对性关系的态度。一方面，路易森说，美国人受到教导因而认为，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性问题这样的事。女性贞洁的概念认为，女人没有情欲。英美人心目中的中心弱点则是其“道德幻觉说”。

这种欲意拒绝看到人的本来而目的行为深深地、不幸地影响了我们同胞的习惯和观念。例如，这欲是对爵士音乐节奏的德称：“这些欲曲的合唱是不堪入耳的，因为它们不敢是美的，它们是隐秘的，因为它们不敢真城坦白。但是在歌舞中……却需要节奏——成为性欲和诗意自由的世界的节奏”。^②作为对正常和美好生活的这种过分压抑的结果，即体面的人们的禁忌，美国社会便遭受到周期性的爆炸，身体和精神的丑陋纵情狂欢和令人精疲力尽的淫逸欲德，或者残酷的和毫无道理的痛苦战争。路易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简简单单地就这么解释过去。“但是它那特别没有动机的狂暴、它的激动的炽热中，却有着某种清楚明白的宗教、狂欢的因而有着含糊性欲的东西……民族成了私利团体。它的基调通过性的象征主义进行自发的自我表现。”^③

① 给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② 路易森，《逆流而上》，第192页。

③ 同上书，第204页。参见弗洛伊德，《时代对战争和死亡的思考》，在上述引文中，第288—317页。

在美国，朝着过分压抑的危险趋向已经有了歪曲正常家庭关系的附加后果。既然妇女是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因此法律保护便使得男人成了她的囚犯。路易森在他的好几本书里都关注美国的离婚法问题。《克伦坡先生的案例》是现代文学中最丑恶的作品之一，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十分敏感的艺术家——一位作曲家迫不得已和一位比他年龄大一倍的女人结成了凄凉的婚姻，她不愿和他离婚，并且最终逼得他走上了可怕的谋杀道路。受到自己奴役的不相称和绝望所驱使的男人，逃到了秘密私通事件避难所，但却受到通俗小报舆论的惩罚，因此他们的名字便为每一个愤怒的女店员和卖苏打的店员口口相传。“至于我嘛”，安妮·克伦坡对她那痛苦欲绝的丈夫说，“如果你要想知道的话，我就会亲自跟踪他和那个女人。我就会确保他们连一个置放脑袋的地方都没有，保证没有人对他们讲话，或给他们一口面包或一口水，我就会竭尽全力呼吁所有男人和女人的正派行为来剥光那邪恶奸妇的衣服，直打得她差点丧命！”^①

新清教主义酿成的难题并没有为伪现代主义所解决。爱情的原动力，即“创造性的性爱”被一种东西否定和压制下去，然后又被另一种东西降低等级。所有这一争论最终导致了关于路易森的立场的声明。在男人对自己伙伴的明智选择上，寄予着对所有在人的意识的个性范围内有着价值的东西的希望。如果给人一个机会使他能作出这个完全重要的选择，不受来自社会的阻碍，那么对社会的良好影响就会在短时间里显示出来。既然幸福的、创造性的婚姻是创造性努力的最真实的来源，那么社会就应当首先促成这样的婚姻。性与“上千个审美的和伦理的感觉、偏爱和癖好

^① 路德维希·路易森，《克伦坡先生的案例》（纽约，一九三〇），第291页。

有着密切关系；它深入头脑、心脏、灵魂之中；它需要选择、自由以及其自身的选择性练习。”^①这样一种婚姻的共同责任是什么？现代妇女想要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想“实现自我”；同时，她也想要自己的丈夫忠实于自己的稳定感情。这些愿望是水火不相容的。现代妇女如此经常地试图在有关妇女对社会的责任以及有关各种艺术的那些虚弱无力、欺人之谈的辩论中寻求庇护，这是现代社会一个较大范围的不幸征兆。对“传统方式”的反叛和抗议，对她们自己自由的后果的害怕，以及对未来的空虚的灰心沮丧——这些是消极的特征，但是却是对现代思想的可怜的少数几种辩护罢了。

路易森将精神分析学家看作是本世纪的圣人。在缺少教士的情况下，他就是我们的忏悔神父；在没有一种宗教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为了某种类似精神向导的东西而转向理论与实践了。精神科学的科学是一种奇特的犹太人科学，尽管它的运用是为所有人的。犹太人的思想和伦理观念根本上是属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精神的宽厚理解已经导致精神分析学以及类似代替走向毁灭的治疗物的产生——那个精神就是以色列人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中部海峡》，第281页）犹太人的伦理观念经过了种族磨难的上千次考验，但由于一种宗教统一的观念而从疯狂中保存了下来，现在这些伦理观念作为基本的、内在的智慧而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路易森小说中的精神分析学家是充满智慧的人。如果那个精神分析学家不是个庸医、不是个会赚钱的人的话，或者他如果不是一个及时行乐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人的话，那他将通过废除搅乱了现代思想的劣质词语而回到道德基本原则，以令人不可置信的

^① 《唐璜》（纽约，一九二三），第276页。

简单方式来治愈。作为人们也许信仰的某种宗教的替代，世界需要有人来维护简单的真理，赋予这些真理以效力和价值。精神分析学家正是提供了这个需要。

在路易森的许多小说中，精神分析学家是一位精神上的向导，而至少在其中一部小说中，则是一位主人公（《在岛的内部》）。阿瑟·列维早在大学时代就研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他最终承认，诊断医学似乎不适合于处理许多现代问题；未来的医学研究必将在一个新的方向领先。“我是指部分通过教育的方向、部分通过精神分析来进行的预防性治疗学”。（第179—180页）但是他在精神病医院里的同事们却嘲笑这一概念：“福斯特医生的单一科学观察大意是，作为美国人，我们不可能赞成那颓废的、污秽的弗洛伊德的货色……布莱恩特·福斯特医生曾说过，‘它使每个人的正当体面的本能，都感到厌恶。’”（第185页）但是，阿瑟确信，弗洛伊德指出了未来医学伦理实践的方向。他的第一个病例是完全成功的，受到宽慰和高兴的病人宣称，分析学家是创造奇迹的人。列维顺利地开始了自己的生涯。但是那个主人公却成了路易森争论目标的工具。阿瑟发现，他的大部分病人都受着“一种非犹太人的固结的折磨，即与任何固有才能都不相一致的一种补偿机制的崩溃，对一种不相容的法则和道德的恐惧，以及那些不想当犹太人的犹太人的社会隔离问题。”（第290页）他自己虽与一位非犹太教姑娘结了婚，但却是个牺牲品；因此他迫不得已通过返回到犹太信徒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精神分析学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用法与路易森永远关心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有关，即西方文明中的犹太人问题。^①它同时也与必须

^① 《五十年前的号角》（纽约，伦敦，一九三七）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最完全的小说处理。

被认为是他对弗洛伊德主义最终估价的东西有关联。因为路易森相信，既然精神分析学是一门纯粹的行为科学，因此在一个失去了自己宗教和伦理依靠物的社会秩序中就显得无所依靠了。它可以治愈个人；但它不可能治愈整个社会。最终，治疗对于纠正非道德的社会的失衡状态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每一个下一代人都将患上弹震症的话，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要么就给个人要么就给群众提供卫生设备的机会便微乎其微了。”知识和科学就足够了，科学的观点一开始就离开病人了，而不是到最后他走向救助时才离开。经常不断的精神上的不安和混乱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几乎不可治愈的创伤。传统的分析学家很快便认出了这一创伤，但却迟迟才能看出其最终的伦理道德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路易森小说中如此之多的分析学家们同时也是犹太人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加上了科学训练的有效性，以及种族的文化智慧和精神节制。

弗洛伊德早在自己生涯的初期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分析学家能超越自己科学的限制而成为精神上的向导呢？他指责荣格超越信仰而滥用科学家的特权，但他最终却不得不承认，某种形式的忠告“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不错的”。那些全然接受精神分析学的天主教牧师们看出了其中有一个对忏悔术的卓越改进。但是，他们却急于想指出，忏悔的目的并不旨在使灵魂自由，而倒是把它召回到真正信念的安全限度来。实际上许多现代思想家由于弗洛伊德的实践并未走得足够远而非难它，也有同样多的现代思想家则由于它走向任何地方而拒绝接受它。

路易森坚持要超越实验室的限度。这种坚持有两个理由：他深深地相信犹太人信念的伦理道德牢而性和纯洁性，其次就是，他相信爱情是创造性的力量。这两种信念都使得他广泛地涉猎神话，这是所有宗教的源泉，以及人类学。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

忌》大大地帮助了他的这一探索。^① 路易森已经逐步将自己在精神上与约瑟夫小说中的托马斯·曼排在一条线上了。在某种重要意义上，路易森对一种“创造性性爱”的信念就是他的探索的精神恒量，这是他为了争取对性的深层含义有着更好的社会理解而作的斗争的继续。“你们的保守派和你们的激进派都试图贬低的正是这一性爱的伟大神话，前者将其贬为犯罪，后者则将其贬为无甚重要性的东西”。（《斯蒂芬·爱斯考特》，第216页）

四

迪伦·托马斯的诗和小说是对弗洛伊德对现代美学所作的另一个贡献的称颂。在其他任何一部作品的主体中，对梦的生活的审美趣味都没有受到如此详尽无疑的阐述。一位批评家提及了托马斯对“乔伊斯、弗洛伊德和圣经的兼收并蓄”。^② 我们可在他对弗洛伊德的认真研究中找到大量证据，而且这一证据有他对自己受益的坦率承认作为依据。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中，他意味深长地赞许了弗洛伊德的影响。

不管什么隐藏着的东西都应当揭示出来。黑暗的外罩被揭去就显得明净了，而揭去黑暗的外罩就会变得明净起来。诗歌既然记载了把这种个别的黑暗揭去的过程，那就必定要把隐藏了如此之久、并一直是这样的东西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将赤裸裸的暴露清楚地显示出来。弗洛伊德将他已暴露了的一点黑暗显示出来了。既然受益于光明的视域和隐藏着赤裸裸的知识，那么诗歌就必须深入挖掘光明清晰的赤裸

^① 路德维希和埃德纳·路易森，《避难所》（纽约一九四〇），第265页。

^② 弗朗西斯·斯卡夫，《迪伦·托马斯的诗歌》，载《地平线》第二辑（一九四〇），第239页。

状态，甚至要挖掘出比弗洛伊德能意识到的更为隐蔽的原因。^①

迪伦·托马斯的生涯是十分保守地开始的。他对感官细节的娴熟掌握，虽然适合于最卓越的简单诗的描绘，却在一开始就没暴露出对“个别黑暗”的任何认真的专注。他朝着对无意识和梦幻生活极度幻想的意识进展，这一点可以在他一系列自传体随笔中看到。^②通过某种奇怪的点石成金过程，他对无意识自我的洞察与一种对性的神奇和魅力的日益成熟的敏感性和某种对充分实现它的日益衰竭的犹豫相联系。《画像》有着自己对有关小男孩的粗野行为的衡量；实际上，这些不过是小学生对成人社会的浮夸和环境表示轻蔑的一般自我意识行为。在《画像》的最后那些素描中，他的兴趣方向已经表明了。肉体的爱在这个方面与创作有着密切联系，即它打开了探索一个秘密的、神奇莫测的黑暗世界的大门，也就是“隐蔽着的赤裸”世界。艺术家似乎不得不探索这个世界，带来光明，进行创造性的再现。因此对性行为的这种富有诗意的形象化描述与托马斯自己的富有诗意的形象化描述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和洛可能一起倒下，一具冰冷的尸体上重重地压着一块极热的石头，落在那正在落潮的、茫然雪白的、全然空荡的大海上，就再也起不来了”。^③

在他那“内部的黑暗”的多数幻象中，十分明显的就是这一死亡的意象：一个精神上的无名氏，一个正在肉体的和诗意的创作中的单一个性消除。死亡在他的书页里高视阔步；它与生命相

① 《新诗》，第十一辑，第9页。

② 迪伦·托马斯，《艺术家作为一条小狗的画像》（诺顿克，康涅狄格，一九四〇）。

③ 托马斯，《一个温暖的星期天》，载入《艺术家的画像》，第173页。

关联，因为这二者都在子宫中做着肮脏的交易：

肉和骨头里的天气
又潮湿又干燥；又敏捷又僵死
象我们眼前的两个魔鬼在活动。①

“死亡就是所有的隐喻”——一个勇敢的但却令人费解的口号，充满了与无意识生活的无限黑暗作创造性斗争的负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对无意识的富有诗意的观察。弗洛伊德实际上把他自己探索无意识的最初机会给了诗人，他既没有提供细节，又没有提供对探索的结局的任何设想。

迪伦·托马斯的诗歌和散文的三个重要线索也许可以提供有关他的目的和方向的一些启示：死亡和生活的主题，有时还有一个性的主题，死亡简直就是生殖力的排除，涉及作为巨大肉体和精神力量的一样东西——子宫的重新参照，尽管诗人对它的使用是模棱两可的和引人注目的，但最后，爱和欲望的梦的象征物，正如在托马斯的小说中分散和受到歪曲那样，结果还是给了它们一种奇怪的力量和美。

从一开始，也许可以说，死亡真正有着两个含义，一个是表面的，另一个是深层的。死亡和垂死十分明显是消肿的象征，因此正是通过这样的“垂死”生命才得以实现。我们奉献了自己，这样我们反过来就可以接受我们自己了。那第二个含义是生活与颓废的不可避免的物质和精神联系。那种颓废的某些部分可以被简单地称为“受控”——自然的和本能的冲动的强有力的中止，尽管

① 托马斯，《十八首诗》中的“二”，载《我所生存的世界》（诺福克，康涅狄格，一九七九），第12页。

可以保证外部和感觉上的持续，但这种中止使诗人和爱人都重新依靠某些精神上的娱乐，其中大部分是居留在无意识中的。心理衰退是由对人类心理的根本误解和滥用而造成的，它恢复了诗人对深刻根源的需要，从而使他得以对微不足道的和传统表示不满。

托马斯将子宫当作伟大的母亲的象征，这当然与生死之概念相关。在肉体生殖的限度内，子宫是巨大的和唯一的地区，在这个范围内，生命在其胎儿期无可依靠的时期是受到珍惜和支持的。将其看作是一种恢复的根源，这在最初的无可依靠性在后来的社会和心理危难中加倍时，也许是颇为自然的。这样子宫便变得生气勃勃，富有活力了，成了一个创造性媒介，在这里，生命和死亡为了主宰人的心灵而斗争。

托马斯的诗歌和小说的形象化描绘部分是出自这两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但是他同时也专注于梦的生活，对他使用梦的一些考察也许可以通过对他作品的进一步洞察来报答我们。在这些梦的边界内，人们可以看到肉体爱的布局，梦的象征一面再、再而三地在受到性的强调的情况下提及肉体的轮廓。“爱的最初善性”所赖以存在的“爱的地图”就是一块“有着海洋和岛屿以及奇怪陆地的地方，在每一处尽头都有着一大片黑暗”。在这里，大海——一个持久的意象暗示着出生或返回到生活的源头——被奇异地、永久不断地提及。我们还发现了森林和草地，十分繁茂和丰饶，“沼泽地的令人厌恶的东西，满意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雨雪阴影中，存在于它们自己叹息的噪声中，以及在它们自己的新近痛苦的快感中。”^①

《老鼠和女人》的故事最维妙维肖地揭示了艺术家一创造者与

^① 托马斯，《爱的地图》，载《我所生存的世界》，第95，96页。

无意识的这种地理和地文学关系。诗人创造出自己梦幻中的女人，梦的象征物失去了，它们没完没了地转换并自我消失。“梦的这些细节变化和神圣的变化，这些树木和齿状树枝的作用，这些均是她那胡言乱语的结构”。他让梦来控制自己，并且完全将自己奉献给梦。当他醒来时，便竭力不去想那个梦的造物，那个女人。“她溺水了，死了，死了。”但是她却高叫着请求放松，“再也不能在梦中高视阔步了。”他最后将她从他的梦的意识中释放了出来，“给了她生的机会”。这样，她就成了艺术家自己心甘情愿的一个造物，“一个魔鬼般的女人”。“在她身上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创造的退潮和涨潮外，只有生存和生活的超常冲激还存在于肉体从肩骨到肘部的随意折迭中。在艺术家的想象世界中，真实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调换了位置，那个女人变成了十个不同的形状，最后竟消失不见了。他为了她的返回而向他父亲的形象呼吁。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一个女人出生了，并不是出自子宫，而是出自灵魂和旋转的头脑。曾经把她从黑暗中带出来的他热爱自己的造物，她也热爱他。但就是这么回事：降临在一个男人头上的奇观。他爱上了它，但却留不住它，然后这个奇观消失了。伴随着他在那里的是一条小狗，一只老鼠和一个黑肤女人。那女人走开了，狗也死了。①

艺术家“创造”出了一个美的东西，但是不能承受它的美，却掩饰了它的裸露部分。这种勇气的缺乏导致美消失了，返回到了无意识的“隐匿着的黑暗”中去了。而托马斯所试图显示的正是这

① 托马斯，《老鼠和女人》，载《我所生存的世界》，第120—138页。

个黑暗的部分，因为没有它的话，我们就是半个人了。此外，我们还是无知的人，因为我们不了解人的经验的幽深处；我们只有对此简单而表面化的解释。托马斯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中辨认出了一个大胆勇敢的尝试，即试图揭示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东西。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一位心理学家对无意识的描绘；他必须要在那里开始，通过创造性的手段，“进一步拉拽到光明的清晰裸露部分去，甚至比弗洛伊德可能认识到的那一隐藏着的原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

在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过程中，难得有几个人想到干脆接受混乱和混淆这一事实，他们也想到对此无论如何都无能为力。“感到幻灭”，把许多精力花费在乔治·奥威尔称之为“温柔的绝望”的东西上，以及发明解释事件过程的新途径，并且抱着这样的希望：可以被导向一种个人设想出的解决方法，这些都是另外一码事了。达达主义的否定态度一方面试图毁灭圣殿：凡·威克·布鲁克斯、戈汉姆·蒙森和詹姆斯·奥本海姆的实证主义试图简单地将圣殿重新装饰一番，也许试图加强它的支柱。

亨利·米勒这两者都没做到；他并不希望破坏文明；文明自己在破坏自己。他当然不打算给文明指出方向，因为他自己与任何主义都无瓜葛，不管是理智的或是心灵的主义。巴黎的《促进者》第一篇社论就表达了米勒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是许多编辑之一。《促进者》“没有任何固定的政策。它将是有所选择的，灵活的和生气勃勃的——严肃认真但却又轻松欢快的。有必要时我们将使用机智和微妙。但仅仅是在必不可少的情况下才用。大体上《促进者》将是一个与时代的自我毁灭精神相对立的避孕物……但是我们是易变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和不讲原则的。我们没有任何

用来保留或保卫的美学标准”。①

亨利·米勒并没有开始探讨现代思想的多元领域和混乱。他的任务是毫无羞耻或气愤地接受他在那里所发现的东西，并在他的作品中再现这些东西。他的作品中那些很长的流畅句子，那不停顿的句法以及阴晦和污秽的形象堆积，这些交替地带有铺张浮夸（不带任何批评或讽刺目的粗犷文风）和使人消除怀疑地简单现象。

就象一根树枝落入密西西比河那样相当寂静和自然，我落出了美国生活的潮流。我记得发生到我身上的每一桩事，但是我不抱任何愿望去掩饰过去，我也没有任何渴望或懊恼。我就象一个从漫长的睡眠中一醒来就发现自己在做梦的人那样。一种出生前的情形——生下来的人未出生就是活着的，生不下来的人生出来就是死的。②

这种消极性就是现代思想家们所奋发努力进行的批评的含蓄性，他们试图为自己的文明找到某种理性的支撑物。米勒这样就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反理性者了；他钦佩劳伦斯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智化立场。当代巨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通过探查其痛处而仅仅加剧了现代的疾病。“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提供给我们的这幅疾病世界的可怕图画确实倒不是一幅图画，而是一个微观研究，因为我们能看见它放大，使我们认不出这就是我们在里面旋转摇晃的日

① 《促进者》第二期（一九三七）社论，第5页。《促进者》曾经是一家商业性杂志，专供在法国的英国旅游者消遣娱乐。当米勒一伙人接管时，它便令人震惊地改变了性质。最后，连名字也改成了《三角洲》。

② 亨利·米勒，《黑色的春天》节选，载《新方向》一九三七年号（请福克，康涅狄格，一九三七）。

常的那个世界。正如精神分析学艺术直到社会痛得足以要求这种奇特的治疗形式时才能够异军突起那样，我们也只是到了那个时候——直到在我们当中出现了病态的、如此横行的庞然大物以至于他们的作品就象疾病本身——我们才能有一个我们时代的忠实形象。”①

抛弃和接受——它们通常只有一种宗教味儿。但是米勒的既不是圣者的放弃，也不是罪犯的放弃，而是一种“意志的乐意的抛弃”，一种试图在不干扰其过程的情况下生活在时代的子宫中的愿望。当一个人抛弃意志时，他就更接近于真理了，并屈从于经验的不断变化。理解并不是通过合乎逻辑地重新安排那种经验来获得，而是通过“和它欢乐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其中、通过和依靠这种经验来获得”。② 采取这立场的艺术家最能扮演自己的适当角色。他既不当成为社会的行政控制的一部分，也不应当是对那种控制的激烈对抗的部分。他的作品价值在于，它只不过是“生活的自动作用的反映，在生活中，他被迫蛰伏着，作为一个在睡眠之外的睡眠者，静候着将宣布出生时刻的信号”。③

和迈克尔·福兰克尔就《哈姆雷特》的主题而进行的奇怪的信件交往，除了其他东西外，还讨论了创作过程，艺术家在他那个时代的地位。照福兰克尔的看法，艺术是救助的个手段；艺术家产生于“生物的毫无目标的运动”。④ 福兰克尔就他所称之为的一

① 亨利·米勒，《死亡的世界》，这是一本未出版的书《劳伦斯的世界》的其中一章，载《不死鸟》第11期（一九三八），第49页。

② 亨利·米勒，《对写作的沉思》，载《心的智慧》（诺福克·康涅狄格，一九四一），第23页。

③ 亨利·米勒，《〈离回归线〉节选》，载《新方向》，一九三九年（诺福克·康涅狄格，一九三九），第219页。

④ 亨利·米勒和迈克尔·福兰克尔，《哈姆雷特》（桑土司，波多黎各，一九三九）[1]第11页。

种知识分子式的恐惧而不断地批评米勒，不情愿地利用自己的头脑作为重新构造的源泉；他称米勒的写作是“心理学的写作”。福兰克尔说，米勒害怕面临“你身上那个同我一样站在与你的关系中的我，即作为亨利·米勒。”（第157页）对这样的指责，米勒回答说，确实理智是交流的一个手段，是为了澄清和传达思想观点。但是他并不对这种清晰本身感到兴趣。有时他也曾乐意去与“头脑中那些冰冷的部位”取得联系，但是理智只是一个幸运的意外之事，是人的经验和表现的无意识之流的中断。此外，理智化使一切事物都进入了可疑之列。使怀疑者成了一个悲剧形象——这样现代文学的场景便展现了一连串崇拜自己优柔寡断的无价值的哈姆雷特们——这是当代最令人悲伤的一大错误。怀疑并不是思想和表达的终结；它甚至也不是一个适当的开端。它只不过是人类心理的一个方面。“我承认哈姆雷特是一个现象，正如我承认耶稣基督或乞里什纳默提一样。正在消逝的现象……似乎比别的现象更为有益。”（第180页）

哈姆雷特是现代人的一个原型，他那日益丧失活动能力的疾病正是“思想的疾病”。承担法律的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的决定性道德中心的努力，对人的集体原罪所负责任的重担是那样地固定在自我身上，以致于单一的自我都无法承受得起。烦扰现代思想的“哈姆雷特一罪过”就是出自这个根源，当它的反映超越了每一个单一自我的时候，便导致了良知、道德训诫和社会万应药的空想计划。这是“活着的死亡”，拒绝在真实面前低头的表现。“活着的死亡意味着生活潮流的中断，一个自然死亡过程的阻碍。它是承认世界真的只是一个巨大子宫的否定方式，也就是一个一切东西都变得有生命力的地方”。^① 活着的死亡混合着恐惧和愚蠢的

① 亨利·米勒，《巨大的子宫》，载《促进者》第五期（一九三八），第21页。

乐观主义，现代活着的死亡就是手淫和麻痹症。“它是伊底斯的某种天堂，没有融化危险的冰山环境。这种与现实之联系的失去，就是同等卓越的精神分裂症主题，如果暗指一个新的现实、一个富有诗意的创造的话，就将是无比卓越的……但是颇为盛行的精神病是在手淫逻辑的伪装之下的唯一恶狼。”^①

这样一种情形导致了紧迫地需要当代伟大的精神治愈者，按照米勒的看法，精神分析学家解除了病人对世界的以及自己的疾病所负的道德和心理责任。这就是另一个愚蠢的幻觉，根据这个幻觉，现代人避免了个人的责任和真理这二者：“设想我们将得到外部干涉的拯救，不管是以一位分析学家、一个独裁者的形式……或甚至是以上帝的形式出现的外部干涉，都是全然愚蠢的。”^②作为测试精神分析学价值的一个手段，米勒自己也于一九三六年成了一位分析学家。他反对弗洛伊德，因为他赋予了现代恐惧一种科学的认可；他站在病人对现实的看法这方面，阻止自己接受这一看法。弗洛伊德对“创造一种带有科学色彩的欢乐的现实主义”是有罪的。面不是“创造一种带有但丁色彩的黑白现实主义”。^③分析学家并没有向病人揭示世界的混乱，而是试图治愈他的疾病。这种不幸的情形阻止精神分析学成为它本来也许可以成为的那个

① 亨利·米勒，《精神分裂症的兴起》，载《新英语周刊》第十期（一九三六），第70页。

② 亨利·米勒，《心的智慧》，第35页。

③ 亨利·米勒，《绝对的集体》，载《心的智慧》，第80页。米勒给人的印象是，他尽管十分通晓精神分析学，并有着精神分析学家的亲身经验，但他却意识到了其局限性以及分析学家试图崛起于平凡人物之上的总的失败，“他们全是微不足道的‘艺术家’，我应当这样说”，他写道（我假设，他所指的“艺术家”并不是诗人或画家，而是说到或写到那些也许与艺术素材有连系的人），“在永久价值方面，是无法与诗人或杰出人物相比较的”。在这封信的另一部分，他说道：“我认为，有些最惊人的胡言乱语都是所有这些分析学家写的，他们最恶劣的特性就是完全缺乏幽默感。他们中没有任何人，不管他们写了多少东西，都将不会对一个老子的世界产生影响。”

真正重要的向导。真正的分析学家将“通过接受疾病本身，而不是接受医药或调解者来驱除医生以及病人”。（《心的智慧》，第36页）

精神分析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对无意识的系统探讨，其使无意识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东西的贡献，这些对于希望深入到心灵表面以下的他是有效的。米勒认为这对于我们的得救手段是一个极大的增补，一个决定性的增补。但是他不赞成弗洛伊德的研究所专注的目的，他将在无意识中发现实际生有和死亡的真正领域，即一个他可以在子宫世界里悬在那里消极被动的地方。梦的生活是探索的一个重要途径。通常在梦和现实之间，有着“唯一的这条最细的线”。他因此必须从分析学家那光明和活泼的现实中退却出来，从世界的表面退却出来，进入到无意识中去。“因为通过居于梦的逻辑之外，当他在毁灭自己自我的情况下完成自我实现时，他便等于在为全人类体现个人生活的戏剧，这种生活将受到品尝和体验，因而必将受到解体。”（《心的智慧》，第8页）

最后的接受举动按照作为子宫的世界得到了象征性表现，在这个世界里，人可以处于一种出生前的安定状态。这样居于阴间便为其充分的描绘而需要一种完全是自己的风格和形象化表现，部分地从排泄、消化和性的作用，成为最谨慎地被排除在传统出版物之外的参照物。它就是福兰克尔称之为“心理学写作”的东西。米勒的观点为理智快速而轻而易举地胜过无意识的混乱根源而稳步地排除了任何可能性。一个新世界不可能成熟地从任何现代宙斯的头脑里跳出来。它必须受到被动地等待，因为隐含在混乱中的是杂乱的和野蛮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而发生了宇宙的妊娠期。这样，身体的那些黑暗的和被禁止的变化过程便由于与作为“巨大的子宫”的世界有着相似面获得了精神的意义。性行为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给予这个世界以生命的力量就得到释放了。“夜晚生活的音乐”“不是高度和深度，而是混乱的狂喜，

彻头彻尾的狂喜，底子都达到了顶点。放纵并不只是在土地上而要穿过土地，穿过草丛，草皮和地下水流……并不是良知的冷冰冰的刺激，也不是心灵的痛苦的鞭挞，而是明亮的残酷闪光的刀刃。”（《心的智慧》，第195页）

就这样，通过消极被动地居留在世界的无意识存在的奇异、污秽的混乱之中，获得了平静。在评论画家汉斯·里奇尔的作品时，米勒总结了自己对这种下面的现实的态度。无意识的无与伦比的夜晚生活就是这种稳定的源泉——并不是出身，而是带有痛苦和粗野。

在绝对的夜晚，远远隐藏在主要成分中的阴郁的痛苦之中，事物的本质分解了，直到其精华闪闪发光为止。〔里奇尔的〕爱的对象，在游荡到光的跟前，将自己分布在油画布上时，以不可分解的奇特神秘的结合方式相互结合为一体。但是真正的仪式却在下面的黑暗中进行，根据不可理解的原子婚法来进行。没有证人，也没有庄严的起誓。现象和现象以这样的方式结为一体：原子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生存物的巨大实体。虽有着—夫多妻婚姻和一妻多夫婚姻。但却没有上层社会男子和下层社会女子的婚姻。还有着畸形怪异的结合，正如在大自然中那样，它们也和其他东西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和不可分解的。虽是反复无常的规则，但却是自然的严酷的反反复无常性，并且是那样地神圣^①。

米勒乐意接受精神分析学提供的这一机会，即通过体和和过分拘谨来看待事先与意识隔绝了的世界的新的机会。但是他的接

^① 亨利·米勒，《宇宙论的眼睛》，载《转折》第二十七期（一九三八），第323—324页。

受含蓄地谴责了精神分析学试图把世界从神经病中营救出来的希望。总而言之，他与任何思想流派都无甚联系，甚至与那些超现实主义者也无关，而那些则似乎是在同一个煤矿里探查。因为米勒不愿承认超现实主义这一假想，即个性革命本身是一个指引力量。因此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消极状态的一种奇特形式，根据这种途径，艺术家便成了一个有机体，他们写作就是那个有机体的分泌和排泄。他的艺术的材料正是出自无意识存在的混乱。如果没有对人类悲剧的把握或一种针对世界疾病的抗议感，他就得根据生物屈从的抗菌法而不受它们的危害。这种屈从态度也许最终成为宇宙的宗教—审美观的一个部分，这就是米勒的作品中许多地方都提出的一个建议。因为精神分析学家通过把科学用作“一根拐杖”来回避更大的生活问题；这个问题正是诗人和“宗教人物”更为直接和更为普遍地遇到的。

第十章 弗洛伊德的先驱

历史上，对待非理性刺激和行动的态度，至少一直是谴责的，尽管至多不过以恩赐的态度表示关心罢了。从我们的传统开始起我们所经历的激情、情感和感情特征，就一直被认为是用来刺激或加强这些公开行动的，这些行动被认为是美的、深邃动人的、有时是悲剧性的。但是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政治结构之内，艺术家的作品和人格则一直是令人怀疑的；它们始终被认为有一种深入人类行为之起源和资源的无系统的洞察力。艺术在我们历史的主要一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采取守势的。甚至我们一些最卓越的艺术家，也不得不以一個理性的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那些方式来保卫或解释自己。虽然这些情形几乎没什么改变，但理性——非理性的简单划分已不再受到原先给予的尊重了。这既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同时也是一个可怕的变化。

也许没有谁曾充分地將便利的价值估计为我们法则的决定因素。当然这是一个衡量的极好标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便利是调整的忠实仆从；使个人适应于社会的机制，使个别的知情人适应于不知情者。因此，人的行为和人的知识便一直受约于个人和社会便利的限制。从便利这一概念发展了一个理性控制的牢固概念，这一概念似乎一直在保证我们得以反抗人的脾性中的地震和洪水。控制以理解开始；越是简单便利地达到这种理解，控制的任务就越少危险。所以，交流既然是在语言史上并随着简单句法

形式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那就对这样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了。这样一种有效交流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是合乎情理的，也就是说，人们既可以预示其效果，又可以测量其效果，同时也可以预示和测量其参照和关联结构。理性的交流可以变得极为复杂化，比方说，就象哲学家试图以日益扩大的未知物范围来同一个极其微妙化的理性解释体系相对抗。

说非理性是所有不服从的动机和行为的容器，倒有着强烈的诱惑力，因为那些动机和行为并不赞同理性交流和习惯的结构，或者说，它们直接威胁着这个结构。为了消除危险，使得社会现状对人有吸引力，理性的思想便努力去回避或忽视对它的任何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干扰了它对人类和社会现实的简单便利的制约。科学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科学承认变化，但是那种变化的组成部分得到了检验，它们本身就受制于理性的检验，然后才能获准以任何方式去改变强有力的结构。

非理性在极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勉强的认可。在某种否定的意义上，它一贯受到限定——这对于理性的模式是不合理的，或不可知的，或不相适应的。仅仅是在最近的一百年左右，对非理性的日益增多的注意、对其性质、特征及意义的新颖和深远的推测，才对人的思维及人们对自己那确立已久的控制方式的确信，产生深刻动荡的影响。这种信念虽然颇为不定和间歇地表明自己，但是对它的摒弃却可能会导致深刻的悲观主义。如果在大多数人的头脑和心灵里，这些控制已失去其显赫价值的话，那么悲观主义则成了社会的理智成分的一个主要特征了。

但是悲观主义只不过是理性的自信心失却的三大反应之一。第二个反应也许可以被看作一种享乐主义的变体——平衡的张力及均衡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被肯尼斯·伯克称为“喜剧性的自我意识”。而隐于这一态度之中的，则是对任何真理的绝对有效

性的普遍的怀疑主义，对任何一种极端的态度超然冷漠，以及一种仅仅考虑对经验的直接和个人成分的关注和看法的标准。这一看法在其对一种人格的稳定和平衡的发展之影响中，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这些反应中的第三个也许有着某种情绪的特征，或一系列情绪的特征，这种情绪的主要特征就是热情奔放和言行失检。这种反应对于我们本世纪的大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不同的时期，当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曾为这种反应而幸福、痛苦，或遭殃。理性结构的解体使许多知识分子得以有相对或完全的自由，来着手对许多可能解释的问题加以重新解释：人类、人类世界、人的上帝及人的命运。他们对这一机会的响应已经达到了超越常情和不合逻辑的地步；他们既已接弃了传统的理性主义，便同时有可能进而非难逻辑，因为正是根据逻辑，理性主义才得以显得有理和有效。因此，他们显然是近乎随意地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和另一些人那里择取了一些启示。他们却忽略了上述每个人与其整体的可能的统一和具有个性的发展。

弗洛伊德以我们二十世纪的这一方式，占据了一个奇怪的阵地。尽管他公然自称并自诩为一位科学家，但是他的科学实际上探讨了非理性的渊源。他在重新开始有关各种类型的实际动机和行为的争论后，已经反复声明，他的发现和假设既非要证明毫无根据的悲观主义，也不想证明无所限制的非理性。他对我们说，我们应当重新振奋起信心，回到理性的科学手段上来；自我所从事的建设性工作必须继续下去。放纵和轻率的行为会阻碍自我的工作，并为社会和人的心灵带来危险的后果。弗洛伊德说，科学驱散了许多幻觉；但其中最糟糕的幻觉就是，对科学和理性的摒弃要么是有益的，要么就是安全可靠的。我们对二十世纪的弗洛伊德主义发展史的概括或研究到现在为止，应当向我们展示出，弗洛伊德的告诫鲜为人注意，而他自己却被指责为首创并赞许了

他所谴责过的观念。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常常忽视或拒绝用弗洛伊德自己的主张来评判弗洛伊德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便把我们带到本章的主要目的上来了：简略地考察一下对本世纪的观念的另一一些影响。

二

托马斯·曼坚持认为，尼采和精神分析学的性格的源泉都出自叔本华将世界颇为精当地解释为意志和表象：

叔本华作为一位意志心理学家，是所有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从他开始，这条线就发展着，通过尼采的心理激进主义，然后直接发展到弗洛伊德，以及那些逐步建立起他的无意识心理学、并将其运用到精神病学上去的心理学家。尼采的反苏格拉底主义以及对心灵的仇视，不过是对叔本华发现意志的第一性给予哲学上的肯定和赞美罢了，同时也是对他那对心灵与意志的附属和辅助性关系的悲观主义洞察给予肯定和赞美。^①

叔本华根据需要将世界描绘成意志的，这就强调了直觉的力量，及其为使自身永存的不停的动力。这是生的意志，一种盲目的、无所顾忌的奋斗，虽然在高级的机制中也许其本身的性质得到缓和，但实质上仍是一种仅仅把理性用作一种手段的非理性力量。这种意志是人的存在的关键，尽管它本身并不依赖于人，但却相当无情地摈弃了人们试图独立于意志所作的努力。意志的表现形式受制于人的感觉和概念上的活动，但是意志本身却是毫无

^① 《叔本华的活的思想》导言（纽约，一九三九），第28页。

根基的、毫无形式的，并且是无情的。人体的部位和行为是可见的表情，“意志的具体化”^①，这就是意志呈现出暂时的和不明确的形式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假定这些形式是生活中的控制因素，或甚至假定它们具有康德赋予它们的那种有限的重要性，那则是徒劳无益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所有这种特别重要的知识，本身都是外在于意志世界的东西。叔本华反对康德并不是因为他限定了理性的限度，而是因为他低估了超越于理性之外的现实的重要性，人被禁锢在有机反抗的世界里，因此他那试图使自己的生存理性化的微不足道的努力就受到生的意志的强有力的束缚和影响，因而理性控制的明显成功既不令人信服，也并非是最最终行之有效。“既然每一个人必定被看作一种意志的表现形式，既然意志必然要自我表现为一种抗争，因此组成一个星球的每一个世界的本来环境就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在硕大无垠的空同永不静止、永不终结地奋争着。”（第69页）

不加思考地服从于这个永不静止的有机奋争的环境，这确实是一般凡人的命运，这些凡人是大自然“每天都成千上万地创造出来的表现形式”。“他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事物，仅仅是就这些事物与他的意志有某种关系而言，而不管这种关系有多么间接。”（第77页）我们的无意识的性质的真实情况是一种“不断的奋争，永无终结，永不静止。”（第80页）但是有一种摆脱出意志的方法——禁欲的途径，结果导致一种对生活意志的否定。艺术家能够强迫自己摆脱出意志及其所有对自我的要求。“人们现在达到了自愿抛弃、屈从、真正的冷漠超然以及完全的无意志状态。”（第124—125页）他对物体和观念的沉思冥想与意志的存在方位相分离，同时也与他自己为争取生物学上的保存而进行的斗争相分离。这样，

① 《意志和表象世界》，见《叔本华的活的思想》，第50页。

他就能客观地注视着美好的东西，而且这样，他就能发现专注于生的意志的痛苦终止。至于其余的，则一切都是没完没了的，盲目奋争的。快感只是缺乏痛苦，如果持久的话，它还可以引起另一种痛苦、厌倦或无趣。说这话是颇为自然的：叔本华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把理性的优越性降低到仅成为意志的囚徒的地位；他把摆脱出非理性意志的希望赋予一些人，并且以人们通常为自己谋求的那些优越性为巨大代价。理性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它被一般命定死亡的人用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即在动荡不定中求得幸存的有机体的永不停止的竞争中的有机优势；只有例外的个别人，即天才人物，才以一种对无意志观念的柏拉图式的直觉来取代它。

衡量叔本华与尼采之间的差异可以用这样一些交错的词语来表达：世界的本来面目以及其可能的面目——承认这二者都是意志的世界。这是唯意志论的悲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的乐观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别。因为尼采谴责了叔本华，但并非由于后者对理性不屑一顾，倒是由于他把那块无用的遮盖物强加于人的奋斗。开始，他赞同叔本华对理性的估价，但随后便在提出意志在心理上优越于理性这一见解时，远远超越叔本华了。他说，意识的概念长久以来，一直受制于我们努力的限度。它是对认知和存在问题的虚假的简化。激情和欲望是人性的首要原动力，理性则是这二者的工具。尼采认为人的欲望的复杂结构并不是生的意志的凭证，而是权力意志的凭证。激情是维护个人重要性的力量。当激情在趋向满足的过程中受挫时，便发现了间接的发泄方法，诸如在煞费苦心的愿望满足中或梦幻中。梦往往揭示出我们的无意识生活的丰富证据：

这样，有着审美感受的人便象哲学家与存在的真实一

样，也与梦的真实有着同样的关系；他是一位细心的、心甘情愿的观察者，因为这些图画给他提供了对生活的解释，而且正是通过这些过程，他才使自己受到生活的训练。有了这样一种完全的理解，他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那些令人愉快友善的图画，而且还不乏严肃的，窘困的，悲伤的，阴郁的，突如其来的约束，命运的恶作剧，不安的预感，总之，整个生活的神圣喜剧，以及地狱也都从他面前经过，不只是如同投在墙上的阴影——因为在这些场景中，他生活着并受到煎熬——然而却带有表面感觉的消逝^①。

尼采并不认为对冲动的一切控制都是有害的；他也并不提倡完全摆脱出控制。他反对那种充当平庸之辈的奴仆的控制。心理整合作用的过程必须经常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不仅要走向固执己见，而且走向流行的呆板道德规范。“我们现代人头脑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过程，与一种冲动的过程和抗争相一致，那些冲动各自并且本身都是十分不合逻辑的和不正当的；我们通常经历的只是抗争的结果，这种原始的机制此时在我们身上正如此迅速地发生作用。”^②

理性主义者曾对哲学史上最大的错误作过贡献。“哲学家们认为，那种进程就在于它变得越来越有意识，而无意识的直觉则是尽善尽美的类型，意识倒不如说是某种失调的征兆。”头脑是，或应当成为直觉的奴隶，尽管它可以如此聪明地削弱直觉，以致于颠倒他们各自的作用。基本上说来，意识，或意识的告诫，是胆小和虚弱者的一种工具。既然他们感到满足欲望的直接方式困难

^① 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纽约，第二版），第169—170页，这是尼采早期的一部著作，约作于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

^② 《快乐的智慧》（纽约，一九二四），第157页。

和痛苦，因此他们便求助于狡猾和机敏，求助于一种狭隘的聪明，作为征服他们那不太谨慎的邻居和使他们的谨慎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美德的一个手段。这样，尽管理性本是直觉的奴仆，但也可以逐步摆脱直觉的束缚，并且试图主宰直觉了。^①通过人的权力意志与对达到权力意志的社会障碍所作的不懈斗争，便产生了人的“邪恶的良知”；随着人的意志越来越受到禁锢和挫折，无意识变得日益丰足和充分了。

整个内在世界，尽管开始单薄得象在两层皮之间拉开一般，然后突然裂开，均衡相称地展开，并有了深度、宽度和高度，这时，人的外部出口便受到了阻塞……敌意、残忍、迫害的快乐、惊奇的快乐、变化、毁灭——使所有这些本能与其自身的所有者相对抗：这就是“邪恶的良知”的起源^②。

尼采为赞同这种道德显露而争辩，因为意志恢复了个人的权力意志的无意识源泉。理性的生活已几乎永恒不变地导向颓废、胆怯，并将人的所有奋争降低到了中庸安全的地步。就这样，便出现了人的意志的迟钝。人的希望——确实是人的真正救助——就在于他的有机力量的加强和发达，而并不在于那些力量的使人厌烦的调整和控制。权力意志充其量不过是求得这种丰富人生的意志。但是这种权力意志并不仅仅是粉碎它而前一切的一种野蛮的、无所顾忌的力量。尼采说，恰恰就是那个错误吓坏了叔本华才使他幸免。伟大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它并非要由他对历史的影响的性质来衡量。从人的成就的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他的

① 乔治·艾伦·莫根：《尼采意味着什么》（剑桥，一九四一），第107，111页。

② 《道德的世系》（曼丁堡和伦敦，一九一〇），第100—101页。

欲望及其满足的手段也就以一种张力或平衡的状态存在了——一种积极的、精力充沛的泰然自若，它超越了自身之外，并没有疲惫地依赖过去。尼采一方面试图区分心理上的进展和精神上的进展，另一方面则试图区分心理的进展和意志的迟钝。例如，在谈到瓦格纳的天才时，尼采就说，巨大的能量和激情需要从社会的狭隘压抑中摆脱出来，天才必须承认意志为一种永久的力量。“从它的最深处迸发出一股充满激情的意志，这就象一股迅速奔驰的山洪一般，竭力穿过山间水道、沟壑、裂缝，搜寻光明和力量。只有一种完全自由和纯粹的力量才是十分强大的，才能指引这一意志通往一切善良、有益的地方。”^①

对艺术家及其作用的想法在尼采生活的历程中改变了。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表现出的对艺术家的雄辩支持给人以这种印象：艺术家是人类的真正领袖，是超人的先驱。最终他还是改变了想法，但是他却坚定不移地认为，对艺术的任何正当考虑都必须摆脱出理性的约束。康德和叔本华在将艺术与认识相联系时都犯了错误。反之，真正的艺术家则“象征服者和法典制定者那样，履行着形成的权力意志，对艺术的鉴赏和思考也需要艺术家所拥有的活力和意志的同样特质。在更大的程度上，艺术家要比普通凡人更有可形成真正强有力的人的力量和欲望。“艺术家向这些超然冷静的人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另一种宗教，他试图在他们当中寻找出道德的崇高，甚至找出神圣尊严，找出非人体化的灵性，找出仁爱 and 善行，他很快便会被迫抛弃它们，感到沮丧和失望……我们只听到一个朝气蓬勃的、狂欢胜利的生命的主调，在这主调里，一切东西，不管是好是坏，都被奉若神明。”^②

① 《不合时宜的看法》（爱丁堡和伦敦，一九一〇），第一卷，第109页。

② 《悲剧的诞生》，第179—180页。

艺术家由于其表达了给予生命的力量并且服从于这些力量，而多方面为人所知。他可以赋予人的最高欲望以形式，他也可以通过在有着迟钝的地方将其显示而使一个社会新生。然而更为经常的是，他并不屈从于权力意志，而屈从于流行的制度或习俗，并且成为只不过是社会的仆从而已。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最终导致尼采对艺术家的估价作了更改。二十世纪的知识界不大可能去注意尼采思想的这一转变，倒是倾向于将这一想象的作用与他的《悲剧的诞生》和《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动力相联系。这是错误地解释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部分中有着许多阶段，就和弗洛伊德那里的一样多。

这样尼采便和叔本华一道确认，意志比理性更为强有力。但是他的观点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乐观主义，而不是面对着在社会上中庸奋斗的持续而叹息，他提议，社会上的僵死的成分应当抛置一旁；他呼吁个人放弃限制和管束力气，而通过自己的意志去寻求富有个性的进展。

这是一个人的理想：他天真烂漫地（即不自觉地，出于精力过剩）与迄今为止一直被称为圣洁、善良、不可亵渎和神圣的所有东西开玩笑；在这个人眼里，最为流行的标准不过是危险、颓废、堕落，或至少是自我的放松、盲然和暂时的忘乎所以；一个充满人性的超人的理想就是幸福和友好，这一点常常也许足以显得没有人性——例如，当它面临着作为其手势、言语、腔调、面容、道德修养和义务中最逼真和最无意识的模仿的那些全人类以前的严肃和庄重时——但是有了这些，伟大的严肃性也许最先出现了，于是疑问的第一个符号附加上了，灵魂的命运改变了，时针运行了，悲剧也

就开始了^①。

探讨人类反对理性的渊源形成了对人的意志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人的无意识得到了一种富有诗意的和含有隐喻的外观。因为叔本华和尼采在其反对理性的自负的论辩中，都只不过对人类谋求仔细的、简洁的和可理解的描述的愿望作了简单适当的处理罢了。因此，要说有区别的话，弗洛伊德的这两位最重要的先驱者只在形成看法上颇有影响，而他们对于那些看法的剖析则贡献甚少。对于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理性的破坏者，他们的论点不过进一步证实了对理性态度的虚弱性的潜在怀疑罢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他们的贡献也许可被看作是否定。

这个有影响的团体的另一位成员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也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迫不得已于死后提供了许多有矛盾的观点。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有许多作家在他那对反理性立场的冗长阐述中，发现了一些用以支持他们自己观点的根据。较之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他更多地发掘了他的人物的心理特征；即那些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厄纳斯特·J·西蒙斯^②的看法，陀斯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集中营获释（1854），便立即发现，并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C.G.卡洛斯写的一本书，名叫《心灵：灵魂的发展》。从这本书中，他必定至少获得了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将支持他的观点：精神病是心理与其环境之间的失调而造成的一个后果的理论。卡洛斯确信意识和无意识生活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他那一种人格对与之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人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看法，最后，还有“不正常的心情

^① 《看这个人》（纽约，第二版），第98—99页。

也许是导向与神圣紧密相联的超常经验的入口……”^①

对这位俄国小说家来说，人的个性是十分简单的，因此他的理性必然导致了对重大问题的浮于表面的和危险的简单回答。从一开始起，陀斯妥耶夫斯基就不相信理性，他要么把理性看作是用于讹用目的的一个聪明的手法，要么将其视为社会教条的骗人的简单外表。在所有的人中，都至少有着一种冲动的矛盾；人类既非纯然讲求理性的，也并非天真幼稚般地善良。陀斯妥耶夫斯基有很多时间一直考虑着他那幅“地下室小人物”的肖像，那是一个穷困无告、并被歪曲了的人，他的微不足道往往产生出邪恶来。外表上他的行为显得矛盾；行为的矛盾受到了一种实质上双重的性质的激发和制约，表现为忽儿善，忽儿野蛮，忽儿柔顺，忽儿跋扈。在他的梦中，他得到了所有欲望的满足，而这些欲望却被他醒着的生命所拒之门外。人的自我的最邪恶的扩张就是将理性肤浅地应用于世界的改善上，运用于社会福利上。地下室小人物的理性对他来说是讨厌的，因为这种理性不断地暗示他的愿望的徒劳无益。因此他便与理性斗争，宁愿要梦中的忘却和希望的满足，而不要这种理性。然而他的理性却在他醒着的时候一直陪伴着他，不断地起着阻碍意志的作用。因此，便使得他相信意志终将战胜理性的质量上的优势。

陀斯妥耶夫斯基指出，有两种理性的替代物。他宣称，其中之一便是邪恶，因为它野蛮地表达了在一个道德假日里受挫的意志。谋杀是它的实际行动，而自杀则往往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另一种替代物尽管十分稀有，几乎不可能获得，但却是他想求得人类救助的真正希望：简单的忠诚和屈从，一种将上帝和人的愤怒都搁置一旁的精神上的逆来顺受。这些特征在索尼娅·玛尔美拉

^① 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家的灵魂》（伦敦，一九四〇），第77页。

多娃、梅什金王子和阿尔约莎·卡拉玛佐夫的形象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它们理论上的阐述者和精神上的典范是捷克荷恩和左斯玛僧侣。这个温顺、消极的人的一生经历充满了耻辱和痛苦。他是一个可怜的造物，但他却无意识地对自己的同胞施行了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力量，也许实际上影响了其中的一些人，使他们放弃彻头彻尾的邪恶或阴险毒辣的智谋的曲折道路。这样，对他本人身上邪恶的最初承认，如果它导致了认可而非藐视的话，便将无意识的邪恶变成了有意识的善良。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最有力的人物——穷人中的斯塔夫罗金、《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伊凡·卡拉玛佐夫——有时也受到这种道德观念的奇怪影响，但是他们的意志是十分坚强的，他的自豪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最终屈从于索尼娅似乎是他一生的不真实的结局；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也表明了写作那本小说中最后几章之前的犹豫不决。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于二十世纪作家的想象力的强有力控制在于，他们十分乐意去探索和发掘对人类非理性所有暗示的另一个迹象。十九世纪遗产的总和就是以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对非理性的这种强调。人类并非受到理性的激发，而是受到其他某种东西的激发，他的理性是限制和强制性约束的一种手段，这就是许多现代作家喜欢在理解他们所钦慕的人时硬行加进去的结论。

三

当代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强调毕竟只属于十九世纪遗产的一部分的东西呢？首先，他们生活在一个抗议的时代，这种抗议的矛头直指传统的道德伦理。没有一种巨大的代替理性的结构来取代旧的结构。另一方面，盛行的基调，至少直到颇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是高度的个人化，导求个人救助或个人玩世不恭

的理论支持。将所有精当地系统化的解决方法视为值得怀疑的简单倾向，实际上把个人抛回到主体的资源上来了。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过分强调了分割的和无联系自我，而自我的精神和理智上的资源则存在于自身中。

任何奉承自尊心或加强其反叛感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中心主义制约了他们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反叛去不分青红皂白地选择领袖。尼采曾经富有诗意地以极大的感染力宣布了自己的反叛措词；弗洛伊德也曾表明了流行的病症和失调的心理原因。如果有人可能忘记尼采曾限定过自己早先的言论，或拒绝从整体上来看他的话，那么他也许可以绝妙地充当一位杰出的领袖了。同样，如果有人要否认弗洛伊德的临床观察目的，那他也很可能是将精神分析的原料用于某种目的的。这一看法鼓励了托马斯·曼的这种相当忧郁的观察。在当代所有的人中，他已经最全面地、最精当地研究了非理性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二十世纪在其第一个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已经占据了一个反对古典理性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反动立场。它已经向对无意识的崇拜投降了，并也向它认为是生活期待已久的对本能的颂扬投降了。邪恶的本能一直在相应地享有一种鼎盛期。我们看到的不是悲观主义的定罪，而是故意的恶意。对痛苦的事实的理智承认转变为对心理本身的仇恨和不屑一顾。人类已贪婪地扑向“生活”的一边了——即扑向较强的一边了——因为这一事实无可非议，即生活不存在任何来自心理的恐惧。并非生活，而是知识，或看说倒是心理才是这个地球上的更为虚弱的一部分，并更需要得到保护。然而当代的反人性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成了一种人性的实验。正如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回答一样，它也是对那个永恒问题的片面回

答①。

把人解释为非理性的，或至多解释为一种有着微弱理性的生物，这已成了二十世纪初诸观念的一个流行的决定因素。为了理解这些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有必要去理解它的渊源以及接受和改变它们的现代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的理论已在理解和区分的不同程度上得到运用了。让我们最后一次概述这些观点吧，因为根据这些观点，非理性的哲学和心理学已在我们的时代得到运用了。

对理性的信念的中止使得有些人如此专注于无意识生活的表现形式，以致于他们的看法被歪曲了。既然正常和不正常之间的界线已消除，既然善良和邪恶之间的区别也已摒弃，因此就有可能把本能的生活看作是最重要的，并有可能不去考虑用来保护这种生活、并使其免遭永恒的现实纠缠的防护设施了。这样一种看法决不是罕见的，它无需去为完全摒弃责任的作法进行辩解。当然，它也可以为一种永恒的道德假日辩解，以这样一点为理由，即任何限制都剥夺了生命的活力。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可以是一种新道德的阴暗的开端，在这里，自我得到了完全的加强，伊底的精力最终得以对心理的生活有所贡献。当然，超现实主义者们通过将无意识认可为证明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一个理由，已经为一种新的意识而开始了他们的所有“战役”。

受到对非理性的这种兴趣激发而产生的另一个看法，则是过去的毁灭了的爱，丝毫不带有为未来道德和社会结构所做的准备。这一看法一般只被暂时采用，它要么富有朝气蓬勃的非理性主义特征（正如《爆炸》的编辑们的那种情形，那是一九一四年出

① 《叔本华的活的思想》导言，第29—30页。

版的英国杂志), 要么就富有理智上的玩世不恭特征。前者的论证可被看作是变化的征兆, 而不是一种模式的确立。但是, 它对生活的颂扬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结构的摒弃, 已成为二十世纪爆炸的特征之一。所以, 例如, 由杰克·林赛和 P. R. 斯蒂文生编辑的《伦敦阿佛洛狄特》创刊号社论上所说: “我们肯定生活, 而且为了求得定义而引用尼采的这句话: 精神就是将自己凿成生活的生命。我们肯定美, 并且根据那一术语来理解一种感觉的和谐, 一种本质相似的狂喜, 它虽然在理智上构筑, 但它痛恨任何事物都没有痛恨已经具体化了的、和正在具体化的理智的轮牙那样深。”^①

现代生活中对非理性那势不可挡的存在的第三个响应, 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屈从听命的主张的延展。由于后者的民族主义受到削弱, 并被基尔凯郭尔的思想加强了, 这便成了弗朗兹·卡夫卡所采取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假定了意识认知的限度, 而且还把无意识头脑的怪僻和痛苦的非理性主义转化为人与上帝之关系的方式。弗洛伊德式的类推法就是父子关系, 它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上帝的态度以及他对人类的要求在得到理性判断时, 是不能解释的。对它们的抵抗就和对那些不能但利地分类、并加以证明的东西的心理抵触相似。精神上的解体是由人们要求达到似非而是的荒谬绝伦的地步的一个结果造成的, 直到理性判断的中止使它失去反论和荒谬感时为止。无意识的怪僻性在为这样一种观念确立精神上的最低限度时, 通过两种方式奏效: 在表面意义上, 它们与上帝的本性的不可测知的怪僻性相似; 因此, 正如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它们可以

^① 《伦敦阿佛洛狄特》第一卷(一九二八), “编者”的话第 2 页。阿佛洛狄特也许是尼采的观点的受现代的解释。参见杰克·林赛, 《现代意识: 走向综合的一篇论文》, 《伦敦阿佛洛狄特》第一卷, 第 3—24 页。

在通向救助的通路上强有力的牵制，指出并促进其虚弱性，并且削弱人们对理性道德的信心。

非理性的感染力还有其他效果。这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它对道德反叛的特性的影响。叔本华、尼采以及弗洛伊德都承认性本能的重要性。对叔本华来说，它是“意志的活动中心”，是一种生的意志的强有力的有机决定因素，尼采则将其视为权力意志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创造性艺术家就象具有其它本能的力量一样，也同样具有大量的性本能。我们已经考察了弗洛伊德在性本能的本质及其与人的心理活动之关系方面所有的研究。在维拉杰和其他人的争论中，性的自由和通奸实验方面的论题的突出证实了这些推测所引起的极大兴趣。这并不是—种非理性的态度，他们争辩说，它首先是在摆脱清教徒偏见和维多利亚式的多愁善感方面对智力的最佳使用。在文学内部和外部，对性的现代观念主要源于精神分析。但是它们内部，还有两种不同的区别，一个就是弗洛德·戴尔倡导的现代性习惯和性观念的理智的文化分析；另一个则是D.H.劳伦斯的活力论的性准则。第一种观念提议性选择方面的更大自由，但并不主张放纵；第二种观念则认为性冲动是对最深刻、最丰富的经验的一种宗教仪式的探索，但却指责了现代主义的性混乱。

最后，非理性心理学，按照为数甚少的几位现实主义作家的看法，只是强调了内心或自我所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弗洛伊德本人就坚持认为，这一结论是精神分析所能提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实际上，他对得到加强的理智的最后力量的依靠受到了西奥多·雷克的批评，尽管他是弗洛伊德最忠实的追随者：

虽然我们不得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宗教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已经在自然地发展了，但我们却不得不怀疑这种看

法，即人没有幻觉也能够生活。现实的教育当然是人们最诚恳地希望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实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其令人不快乐……弗洛伊德所预见的理智的至高无上决不会超越表面化；人基本上还是会得到其本能欲望的指导和。我们并不否认人总有一天会受到科学支配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仍将是人，也就是说，是脆弱的、反复无常的、多少有点非理智的生物，他们是自己本能的奴仆，并且在享受了转瞬即逝的快感之后，永远不会停止奋斗。^①

创造无意识始终是精神分析学的快乐，而对无意识的心理的估价，则终将提供给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这样一种增加了的知识，以及这样一种控制的强化手段，以使得人类从今以后，既在自己的基本力量的增加了的认识中生活，又在对理性控制的必然性更为严肃的重视中生活，这就是弗洛伊德、他原先的门徒弗朗兹·亚历山大，以及他那最伟大的文学阐述者托马斯·曼所公开承认的信念。

^① 引自《和弗洛伊德在一起的三十年》（纽约，一九四〇），第130—131页。

附录 I

心理学与文学*

为了精确地探讨心理学和文学的关系，或者为了指出心理学对文学批评的作用，人们已作了许许多多的尝试。首先，人们需要心理学，是为了看看能否采用一种新的观点。我相信，我们已很清楚地明白了凭借生平传记研究作家的优点及局限；现在，谁也不能摆脱荣格的“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的黑暗精灵了。也许我们可以再度看看西格蒙·弗洛伊德本世纪初及早先提出的结构和术语，以便找到得以涉猎这个问题的最好捷径。弗洛伊德本人在其后的年月里对这一结构和术语作了详尽的阐述。

当然，我指的是弗洛伊德对心理机制下的定义、描述和分析。这里包含着一系列隐喻，恰象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提出一连串假想那样大胆。开始时，弗洛伊德只是列举了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头脑的一些真实情况。他首先看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以及被他称之为使这种张力具有不变特征的能量的恒定，或平衡，或者说他首先对之产生了怀疑。正是从这些简单的开端，产生出我们现在熟悉的术语：伊底，自我，超我，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快乐原则，现实原则等等。

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来说，“……自我就是伊底的那个部分，

* 原为在英文学院宣读的一篇论文(一九五六年九月)，最初发表于《坎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一九五七年秋季号。

即外部世界通过感觉意识作用的直接影响所调节的那个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它是外表不同的一种扩张。并且自我还担负着这样的任务：使外部世界的影响对伊底及其趋向产生影响，并试图以在伊底中占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代替现实原则。在自我中，感觉起着在伊底中移交给直觉的那种作用。而自我则展现了我们称之为的理性和理智，这和含有激情的伊底形成了对照。”（《自我与伊底》，伦敦霍加斯公司，一九二七版，第29—30页）

这些术语具有附加隐喻的性质，是被人们当作观察心理张力的那种最初直觉加以介绍的，它们需要详尽的阐述，而且其微妙之处也需要加以限定。我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即这些公式出自这个愿望：要肯定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基础是存在的，并试图肯定，我们通过视觉和感觉所知道的某种东西也是存在的。确实，它们也是希望暗自赞颂正统科学的语言的产物。在弗洛伊德描述这些现象的特征时，根本就没有什么非同一般的或令人惊奇的东西，也并非弗洛伊德第一个强调必须审视“无意识的”生活或头脑的。也许正是在他那令人钦佩的耐心注意的一致性中，才体现出他的体系的优点——同时也在于，他的体系可加以几乎无穷尽的和卓有成效的阐述。

我们一旦确认，无意识是一个明确的实体，是心灵的一个具体可行的方面，那我们就可以着手对它进行描述了。然而，我们仍在有意识地分析意识头脑的越轨和暧昧，并通过那种颇为独特的方法继续对无意识进行描述。因此在这样的分析中，语言就成了主要的工具。我们必须假想出一个语言标准，即语言的行为标准，这种标准与一种系统的逻辑或合理的形式有关。如果确有这种标准的话——如果人们不退到那么远以致堕入抽象化的境地，而这些标准仍可维持的话——那么就可以对变异、偏差、规避和心理“抑制”进行审视了，同时也可以把它们解释为伊底的一个战

略部位，解释为出自心理能量的顺流和逆流的张力的一个语言表现结果。

弗洛伊德本人对这些过程的描述既精确又能给人启迪：“凭着与感觉系统的关系，(自我)按照一个暂时次序安排了思想的过程，并且检验了它们与现实的关系。插入思维的过程时，自我就保证了汽车卸货得以延宕，并控制了运动的手段……从外部产生的生活的一切经验都丰富了自我；然而，伊底对它来说，则是另一个外部世界，自我试图使之服从自己。它从伊底中撤回了利比多并把伊底的物体专注改变成物体构成。在超我的帮助下，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仍感到艰深晦涩(一九二七年)，但自我却吸收了贮存在伊底里的过去的经验。”(《自我与伊底》，第81—82页)

这就是成为某种文学的基本要素的心理分析成分。依靠它，我们可以有效地说明我们在文学批评中所讨论的形式、结构、隐喻和象征。我想为一种以弗洛伊德对心理次序的最初描述为基础的批评提出下列计划。让我们假设，我们的心理生活也许可分为首要和次要两个过程；既然它们的位置不同，并对不同类的方向发生反作用，因此这些过程就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或更为精确地说，它们在心灵内部造成冲突；正如弗洛伊德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基本的能量(不管是愿望或欲望的能量，或某种别的刺激物的能量)反过来转向自己，或者只允许表达一部分，或者仅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充分地自我表达；我们对这些能量的理解产生于这一事实，即它们在一种局部表达的状态下受阻碍，受控制，并暂时停滞了；而最终那种理想的心理状态则起源于紧张的平衡和心理能量的维持。我们想起了描述我们心理生活的许多重要机会。当那些能量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东西时，就可以以某种相当令人满意和有效的精确性来描述它们的特征。伊底的逼迫、冲动和能量就是追求快乐、追求具体满足的欲望和愿望；阻碍这种欲望的力

量则暴露在现实的面前，即通过加剧痛苦或逼迫退却来表明其抑制性的那个外部世界。一种寻求满足无意识愿望的自由冲动（或叫性欲能量的消耗）常常会导致死亡。这种愿望在现实的震动中需要得到指示；如果抑制的特征是有节制的，震动就会导致调整；如果现实受到过于突然、过于粗暴的逼迫，就会造成一种损伤性震动的后果，最终导致行为不由自主的现象产生。弗洛伊德在外部世界中假想出安定；而海明威则尤其没有发现这种安定。但这种震动既不受无法抑制的欲望的偶然性限制，也不受一种无法抑制的现实的突变性限制。抑制本身也是一个痛苦的原因；为了保护心灵和延长生命，它也许会引引起心理系统的强烈混乱。

作为弗洛伊德那极为精确的描述的概貌，不管这有多么不适当，我还是要在这一先作一个初步介绍，用来审视它用在文学上的一个观点是否有用。这两者共同具有我们可以称之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语言——作为描述工具的语言在我讨论的过程中成了一种战略体系的语言。一开始，对于贴标签和下定义，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对整理现象，语言也必不可少；再者，使贴标签和排次序的动机的本质具有特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最后，在其使用范围的最明显之处，对达到改变意义之效果，对把情形展现得比也许会、或本来就会、或应当会出现的更为复杂，也是必须的。在一个有着各种语言天资的头脑里，在一次演说中，心理紧张、冲突、冲动和抑制的现象会同时在心理上得到适当的、微妙的表达和体现。因此我想指出，文学也许可以用心理及其行为的文字和隐喻的对应物来考察和分析。文学在隐喻上比心理学有更大的自由，或者说它也许有自己大脑想象的自由。但是它却积极忙于在伊底、自我和超我的能动关系中提供其文字和隐喻的对应物，并对它们那描述简单的行为作详尽的阐述。我从这里几乎难以再朝下深入了，难以再保持精确的对应物了；也许在文学中发现怪僻

和自我中心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意味着要承认文学传记的特征就是对已取得的艺术成果的明确解释。在性格或外形上找出一位作家的伊底、自我、超我等的位置，就等于破坏它们自然安排的细微区别。而与其相反，我的目的旨在把文学作品的复杂性解释为象征作用的结果，因为象征在高水平语言的明白性和微妙性上反映了心理能量的基本紧张、平衡、不平衡、抑制和补偿，而心理能量则包含在诸如弗洛伊德描绘的某个体系里。

在运用这种文学批评时，我们开始可以使用较为简单的定义。创作过程是以自我抑制的放松开始的。此外还有另一些关于这类放松的例子：醉酒、精神分裂症以及做梦。但艺术家的工作和这些状态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抑制是从容和有节制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对抑制是有所意识的；人们几乎可以说，他们是决心要这样抑制自己的（诗人也是这样，他们试图通过人为的方式来强行达到这种抑制）。创造性的头脑往往将自己的工作暂时搁置在灵感和抑制或批评之间。艺术家首先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他从容不迫地允许自我屈服于来自伊底的能量之流。正如恩斯特·克利斯所指出的那样（《艺术的心理分析探索》，纽约，一九五二年版，第253—254页），（和艾布拉罕·卡普兰）

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到一种心理水平的转变，它就存在于功能抑制和控制的波动之中。当抑制得太过分时，象征就隐蔽了，也许甚至对反映的自我都难以理解了；在另一个极端，当控制占优势时，结果就被描述为冷漠的、机械的和缺乏灵感的了。

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在《释梦》中及其他地方），在受到自我的抑制影响的无意识中，存在着试图胜过自我的潜在策略。

诸如压缩、替代以及取得否定或条件方式的附加物的那些策略，也都是伊底—自我张力的一个产物。可以在前意识中运用这种张力的语言表现形式。在对文学批评的基本利益中，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据此看来冲动和节制是混杂的，即多种含义和模棱两可就形成了欲望和节制冲突的结果。据说模棱两可的含义可以用语言来表明一种已达到的平衡的细微差别。人的状态的复杂性既不在寻求自我的饱和的影响，也不在用来阻止这种影响的社会制约的自我的作用（这两者本身是浮于表面的）——倒不如说在于冲突的产物之中。自我在同前意识的关系中提供了论说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虚无和良心的反能量；伊底决定着用来缓和、阻碍或避免的策略。文学用一连串明显的意义和隐喻记载了这些交流和冲突的无限变化。

我们还要考虑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两个主要因素：文学的多重含义和形式的要素。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的产物；社会和道德形式与美学形式有关；或者倒不如说，美学形式是社会和道德形式的逻辑延伸。文学形式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这实际上只不过和形式通过这种丰富性得以持久一样，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文学形式上做些实验也许是出于对传统形式不信任；容器再也不满意自己装的东西了，因此就试图介绍一种“质的”形式，或试图坚持把象征作为与合理发展过程的区别。这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对形式不满，因为形式不允许有丰足的结构，或者因为形式公然抑制了结构发展的机会。结构本身是形式的一个变体，节奏既鼓励含义自由，同时又抑制了它的自由，押韵形式既提高了单词音调的质量，同时又给它们的频率造成了限制。

更具体地说，形式是自我的特殊部分；它们是抑制的工具，是包含创作能量的手段，平衡这种能量的方式，同时也是在特殊范围内确保最大限度的可辨性的方式。总之，在和别人的交际中，

使自己表达明确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一个正式的形式内，储备心理能量。一开始，这种形式在心理学上被介绍为一种阻止不受抑制的能量储备的方法。为了形式而盲目屈从于形式，当然是软弱无力和徒劳无益的。但形式和结构确立的张力却导致了接合，然后又造成了基本能量冲动的遏制，而那种冲动则一开始存在时就是无可言喻和没有形式的。恩斯特·克利斯要我们对他称之为“说服力”(stringencies)的一个问题开展有趣的讨论，这是他为艺术表达的外部抑制下定义时所用的一个术语。

艺术作品中说服力的水平——作品和阐释的程度——显然从一个句号到一个句号都有着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充分利用了模棱两可的含义，因而对读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含义的模棱两可，也决不包含在作品的审美中；对读者的要求是极低的，所需要的解释也是有着严格限制的。我们可以提出，艺术很可能具有低效的说服力(即根大的模棱两可性和可解释性)，因为在这里，行为和理想的体系是悬而未决的，或者说社会价值处于转折的过程中。(同上书)

形式的那些方面在包含一样东西时又要去为自己所包含的东西加以限定，特别是当这些方面不再去适当地为自我服务时，就更是如此了，其原因要么是因为它们通过过分的抽象化而受到了削弱(定义再也不起限定作用了)，或者是因为它们过于绝对固定了(定义与其应当包含的细目相去甚远)。我们可以说，任何形式都只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构。正如平衡可用来使能量得到理解那样，形式在文学中是需要和能量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得依靠限制能量并允许能量凭借特殊的张力起作用。

我们对文学中的形式的最后探讨是通过向形式与语言和意义

的关系转变的方式进行的。自我为了包含能量而拥有的主要工具是时间、空间、常规和逻辑。而伊底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它们是在实体的中心确定心理能量方位的工具。每一个这样的工具既具体又模糊。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每一样东西都通过使能量成形来吸引能量，或者准备吸引能量，以便使其成形。如果我们能够想象伊底具有时间意义的话，那么它就会具有未来的意义——也就是说，达到完全满足的冲动仅仅完全属于未来，而且常常导致死亡，如果不受抑制的话。自我的作用是依靠过去吸引未来，使当前的时刻成为过去和未来的统一体。这一过程的结果旨在使走向死亡的脚步放慢；结果就意识到了时机，同时时间的增加和正式的形式也就形成了。同样，自我也对能量释放提供了空间概念，就时空而论，自我确定了心理能量的位置，并迫使它对背景有所意识。背景本身则是客观的时空情景的产物。弗洛伊德对社会的家庭起源及发展所作的详尽探讨在这里应当对我们产生影响，但是这些探讨不得不假想。（见《图腾和禁忌》，《自我与伊底》，《摩西和一神教》。尤其要参见赫伯特·马库斯著：《性欲与文明》，波士顿倍根出版公司，1955年版）。在这里指明背景的精神分析评价范围也许有着某种兴趣。弗洛伊德的探讨虽然是假想的，但这种假想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通过被证实了的复现历史地概括，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背景在弗洛伊德的病例中是由临床实践得出的，这种解释是以根据个人情形得出的结论为基础的。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称之为“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学”的源头，在这种文学中，形式的控制是以风格来限定的（例如《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魔山》）。荣格的背景尽管也是由某种治疗步骤得出的结论，但是其描述的含义范围却极其广阔。背景的概念并不是由于与当代社交或社会状况的关系而特别著名的，因为那是一个其他分析家十分热衷于断言的事实。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点的文学含

义都同共相有联系，但弗洛伊德的共相却至少在来源上更容易和特殊相联系。要继续对这四个术语探讨，那么习俗则作为抑制因素而成了人类时空历史的一个形式。它是意识到的所有形式中最灵活和最不稳定的，而自我则正是利用它来阻止趋向放纵满足的进程。但是它在文学中却可以获得很重要的意义。社会习俗和道德习俗常常与文学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习俗是文学习惯的社会逻辑。而逻辑本身则是强加在伊底所表达的心理能量上的最终限制。通常有一些与外部世界相通的基本逻辑原则；而自我则正是从这个世界里抽出储备抑制的。这些原则大部分用来要么否定，要么限制；也就是说，它们的作用是排它（如果开始排除这个，随后又不这样了），或否定（并非这个），或规定（这个，而实际上并非这个）。每一个语法上的细节都是预示形式的抑制的一个标志、一个符号；但它本身也许也是表现心理平衡的审美媒介的一个线索。

在如此任意陈述抑制的形式条件时，我已经竭尽全力去为自己讨论的最后一点确立范围了。我应当坚持，模棱两可的意义、文字游戏、以及非力普·威尔赖特所称之为的“多重符号”（*plurisignation*），根本上说来就是经常在心灵中发生的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而心灵则试图获取欲望与保留之间的明确的张力平衡。伊底既非符合逻辑，也非不合逻辑；它直到同自我发生联系或自我与之发生联系之前，都一直处于前逻辑（*prelogical*）状态。而在那以后，它便获得了逻辑手段，但却让这些手段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文学中逻辑和矛盾之间，单层含义和多重含义之间的平衡是非常活跃的张力的要素，这种张力在于能量和形式之间，并在其间得到言语的表达。弗洛伊德描绘的梦的工作现在已十分有名了，无须我在此赘言；《释梦》第七章就是其最初的规定，那里有许多解释，均出自弗洛伊德本人和其他人。我倒想从那些在我看来似乎对文学批评至关重要的解释中推论。每一个有目的地介绍到文

学中来的模棱两可的意义，都以不同方式成了毫无抑制的能量和极端的形式抑制之间的一种妥协。要确定模棱两可含义的理想程度是难以办到的，但我认为，人们可以假设，模棱两可含义的形式既反映了紧张的程度，同时又反映了心理平衡的条件。当然，不同程度的牵强附会还是存在的。在孩子们中间，就进行着一种愿望和抑制的相当自由的游戏，它包蕴在隐喻可能达到的有限数字之内。爱丽斯就是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斯，而不是爱丽斯本人的爱丽斯。詹姆斯笔下的梅西出于需要表现出成年人的复杂性。在绝大多数成年人中，往往只能在相对说来很小一部分相当抽象的、但感情丰富的形象中获得能量的限制。堂恩、马维尔、赫伯特以及其他人所取得的那种反论和反讽表明，一种充满高度模棱两可成分的意义就存在于这样的张力中。确实，在堂恩这方面，他用来表达那些反论和反讽的形象已达到了极高水平的复杂地步，它的目的既要使欲望富于个性，又要赋予它某种程度上的复杂性。出现的模棱两可结果也许可说成是一部分出自对人性腐败（不仅道德上还有肉体上）的真正了解，一部分则出自这种愿望：通过对玩世不恭地放弃欲望的行为表示蔑视来捍卫这种欲望，还有一部分则出自谋求超越当代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手段。这种反论是一种需要的结果，即一方面承认真理，同时又用可以得到的超越卓著的形式企图否定它；承认和否定往往融注在一起。腐败成了死亡，但死亡又包含在一些形式内，那些形式在否定肉体死亡方面是十分成功的，甚至超过了玩世不恭的地步（“只有我们的爱才不会腐败堕落”；《周年纪念》1. 7）。同样，时间和永恒的反论也可以在一首诗中发生作用；时间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必然性又在将暂时变成永恒时被否定了。然而，时间确立的界限（通过这种界限我们勉强将肉体的腐败看作“成熟的”标志）本身就包含在永恒意象中；确实，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就不会有永恒了。许多宗教

诗的复杂性也许正是因为在每个人中，我们的身体不稳定和我们永生不死的欲望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的；至于永生不死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其不同的形式。永生不死是欲望的最终形式化；我们虽然继续有这种愿望，但却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硬是要这样，也还是会死亡的。希望永生不死就是希望排除现实原则，以便在提炼快乐原则时获取可观的成果。在拉福格和科比埃尔的诗中，有时含有一种企图：确立理想地省略的伊底形式，要么讽刺这些形式（《墓志铭》），要么就利用它们（《丑角的语言》）作为讽刺的一种手法，并非讽刺本身自我控制的事实，而是讽刺人们一般所接受的控制形式。讽刺通常反抗自我同时用来抑制的方式。在超现实主义作品中，有时在韩波的作品中，也试图描述伊底是纯洁的——或至少允许那种明显的梦的内容自由表现——结果，文学并没有描述紧张的平衡，却只向自我的表现方式描述了肤浅地暴露愿望的后果。

一切语言交流的最大范围和最微妙处是以能量冲突和守恒这一原则为基础的，这可以在菲力普·威尔赖特绝妙地描绘的那些交际类型中窥见，他在《燃烧的喷泉》（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54）中将其描绘为“富有表情语言”（expressive language）的形式。我想在此运用这些形式的一、二个例子，但很抱歉，我要变换一下上下文，将他的本来意图作一些改变，也许是重要的改变。威尔赖特先生把他所称为的“多重符号原则”限定为这样的意思：“富于表达的象征物，在其实现的任何特定场合，都容易带有不止一个合法的依据，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它本身的意思便成了语义强调的两个方向或更多方向之间的一种张力。”（第61页）也就是说，用我选来解释这种象征物的字眼表达，象征的语言保留其心理根源的负荷和紧张，即能量的机能转变和交换的负荷和紧张，在这种状态得到表现以前就是这样了。压迫、指引、

痛苦的冲击和抑制的多种可能，在此都在一个特定的意象、隐喻或许多意象中得到多重意义的表现。这种象征手法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用法。诗人也许希望对自己在接受—拒绝的状态中看到的反讽加以发掘(即他也许只是表面上接受，或表面上拒绝，但却不无讽刺地用自己的语言来使接受和拒绝并行不悖)。我认为，我们也许可以说，艾略特既接受，同时又拒绝。他也经历了纯粹接受或纯粹拒绝的凄惨后果。因此在这里就出现了他一些诗中那种近乎过分的反讽。也许倾向性过于明显了，普鲁福罗克和斯威尼的缺陷则过多地是由于阻止超越的环境而造成的。在我看来，艾略特对但丁的极度崇拜是因为，他在但丁那里看出了一种从普鲁福罗克和斯威尼的死胡同摆脱出来的方法，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造成了那种可怕的环境。在地狱中形象地预示着天堂；那是一个人间的地狱，诸如艾略特在早期诗歌中描绘的那样，它只能通过大胆的超越行动，即通过当然是艾略特本身试图采取的一种行动，才能向人们启示净化和天堂。否则，诗人也许希望表达那不可避免的接受的悲剧了(也就是说，控制的接受是最不情愿的，但并不是一点也不需要)；或者，诗人也许会把模棱两可的意思扩展到取得超越的功效之地步(为了行为或机械的静态平衡条件努力创造一种可行的神秘交流)。

威尔赖特同时也谈起了他所称之为的“背理空间原则”(principle of paralogical dimensionality)，并试图用这种原则提出，“除了逻辑的普遍和存在的特殊空间或难点外，还有其他空间和难点……”(第64页)逻辑范围大概就是在可感的现实的严格界限之内起限制和限定作用的那个范围吧。但是我认为，这一范围作为一个开始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必须首先明白一样东西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确定它所达不到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它所超越那样东西的范围和程度。首先确立现实和欲望的协同物，以我们

单调地习惯于使用的那种空间角度来确立。诚如威尔赖特指出的那样，富于表情语言的“背理空间”从不满中获取了营养，而那种不满之感则是在努力妥协中积累起来的。由于梦的工作拒不从二者择一，因此诗人的语言便通过一种紧张的状态使人联想起多重含义。从好几种意义上说来，这种状态也许是真实的（平静的有效性、健康性及助长性），从另外几种意义上说来，这种状态或许又是假的。这些变体均包含在某种平衡张力的单一的语言或隐喻的再现之中。

最后，人们必须考虑到把文学表达的最复杂性和荣格的原型相联系的问题。在最近的批评中，对神话的涉猎至少有一部分是研究的成果，或者说是对取代了象征物的神话代替物的探索。荣格为了使个别的现在与集体的过去相连接，提供了精巧的结构，其用途在于：这种结构提出了想象在使当前的必然和经验推广时也许会走的那个极端。但是原型超越了其在分类和排列时所起的作用，因此实际上成了最灵活的形式。其实，它们可以阻止心理紧张的表现过程，也可以使结果简化。不管人们因信任荣格那别出心裁和丰富想象而说出什么话，毕竟原型的生产过程仍会使富于表情的经验扩大并失去个性，并以此威胁要破坏它的个别性和复杂性。文学的吸引力以及荣格的文学批评的陈旧形式和残余的吸引力当然罕见地巨大；这里有必要说明原型究竟对文学创作活动起何种作用。

首先，用语言表达的过程、构成对任何心理动力状态作语言表达的过程，是沿着其自身的逻辑思路开展的。这并非一种超越的逻辑；它如同环境所要求并允许的那样复杂。在弗洛伊德看出并确立的界限之内，心理紧张和平衡所确立的实际条件的超越始终与紧张和平衡紧密相联，并且也具有其特征。用来限定这种状态的隐喻，按照其确定的经验所规定的条件，始终具有个性特征。

由此可见，心理经验的特殊性便为一般的行为所用了。但是一般是从基本经验或基本来源的结合体中得出的，而经验的那些次要特征也是从中得出的。在它们可以形成一个围绕静止的象征物的集合体这个程度上说来，它们也许可称为原型。但危险恰在于人们往往会抛弃特殊而寻求原型。一旦一种经验被限定为“分享的原型”，其特殊性就受到排除的威胁了。依我看，这确实常常是荣格的治疗目的。

荣格的集体心理的原型描绘用于文学批评上的优势最初来自这一点：它可以用于宏观推论的一个近乎无限的范围。如果诗人无意识地分享了原型的利益，如果批评家能够使自己与参与分享的诗人交流，那随即，传统的外形，可见的过去和可感的现在之联系的外形也就变得模糊了。对一个固定的象征和神话形式的巡礼式考察的传统与现代文学中直接地、卓有见地地、精当地公开使用神话有着巨大的差别。参照原型的形式来解释当代文学的现象就等于是对当前的实践和需要的特殊性视而不见。说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原型的方式与过去连接，就等于不真实地描绘了我们狂热追求超越的特殊性质。对可信和可靠的一般欲望毕竟、而且尤其是我们当代行为的一个特征。这并非是说那种希望就是独特的，而是其特殊的性质是独一无二的。在合情合理地削弱过去信念的基础时，我们已经使自己处于一个特别的折衷位置了。我们并非完全屈从于任何原型，倒反确实愿意接受一切原型，把它们作为诗人的工具，作为一半真实、一半只是“好奇的”神话的经验。

荣格尤其极好地提供了我们现代情形的这种特殊性，他是为艺术家服务的，把艺术家从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弗洛伊德式判断中拯救出来，并赋予他们以先知、预言诗人、神殿保护者以及神话的邻人的角色。这种性格描写使我所概述的那些对文学创作过程的任何分析都相形见绌了。灵感对心理解释再也无用了，或至少说，

心理的、或确实是任何其他一种解释对灵感都成了多余之物了。所以，荣格那精心构成的体系试图满足对超越的巨大欲望。但是，超越仍是困难的。荣格试图把它变成一种治疗的必需物，变成精神病放纵的极端。荣格的说教语言距离弗洛伊德的告诫越走越远了，精神分析学家变成了教士，“神一般的魔鬼”，绝对权力的执行者和原型的保管者。

总之，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精细、正确的编导保持了其慎重的优势。在其意义、半意义及超意义的一切范围内的语言也许适合他对心理组织的单越分析。我们语言的模棱两可性其实是我们智力高下的一种回旋，在留在伊底里和不无懊恼地接受自我之间相互交替。当我们也许会发现和过去一致的类型时，我们就不是八十年前的我们了。但是提出原型的自居作用无论怎样诱人，我们的心理特性最终还只是适合于对系统调查的清醒证实。换句话说，就等于是既忽视了困境，也忽视了我们时代的具体智慧。

附录Ⅱ

主要参考书目

- Adams, Grace. "The Rise and Fall of Psychology," 《心理学的崛起与衰落》in *Atlantic Monthly* CLIII(1934), 82—92.
- After the Genteel Tradition: American writers Since 1910, 《高雅的传统之后: 自从一九一〇年以来的美国作家》 ed. Malcolm Cowley, New York, 1937.
- Aiken, Conrad. Answer to Inquiry About the Influence of Freud, 《答有关弗洛伊德影响的询问》in *New Verse*, XI(1934), 13.
- _____. "A Basis for Criticism," 《批评的基础》in *New Republic*, XXXIV(1923), Pt. II, 1—6.
- _____. "Disintegration in Modern Poetry," 《现代诗歌的解体》in *Dial*, LXXVI(1924), 535—40.
- _____. "Forslin and Freud," 《弗斯林与弗洛伊德》in *Reedy's Mirror*, XXVI(1917), 273.
- _____. *Scepticisms: Notes on Contemporary Poetry*, 《怀疑主义: 略论当代诗歌》New York, 1919.
- Alexander, Franz. *Fundamentals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基础知识》New York, 1948.
- Allen, Frederick Lewis. *Only Yesterday: 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 《仅仅是昨天: 二十年代的简史》New York, 1931.
- "Analyzing the Psychoanalysts," 《分析精神分析学家》in *Review of Reviews*, LXXVI(1927), 322—23.
- Anderson, Margaret. *My Thirty-Year's War: an Autobiography*, 《我的三十年战争: 自传》New York, 1930.
- Anderson, Sherwood. "Man and His Imagination," 《人及其想象》in

- The Intent of the Artist, Princeton, 1941.
- _____. Preface to Gertrude Stein's *Geography and Plays*, (为葛特露特·斯坦因的《地理和戏剧》写的序) Boston, 1922.
- _____. *Sherwood Anderson's Memiors*, 《舍伍德·安德森回忆录》 New York, 1942.
- _____. *Sherwood Anderson's Notebook*, 《舍伍德·安德森笔记》 New York, 1926.
- _____. *A Story Teller's Story*, 《讲故事者的故事》 New York, 1924.
- Auden, W. H. "Psychology and Art Today," 《今日心理学与艺术》 in *Arts Today*, London, 1935.
- Bartlett, Francis H. "The Limitations of Freud," 《弗洛伊德的局限性》 in *Science and Society*, III(1939), 64—105.
- Baudouin, C. *Psychoanalyse de l'art*, 《艺术的精神分析》 Paris, 1929.
- Beach, Joseph Warre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二十世纪小说》 New York, 1932.
- Beguín, Albert. "The Night-side of Life," 《生活的阴暗面》 in *Transition*, XXVII(1933), 197—218.
- Bell, Clive. "Doctor Freud on Art," 《弗洛伊德博士论艺术》 in *Nation and Athenaeum*, XXXV(1924), 690—91.
- Bergler, E. *The Writers and Psychoanalysis*, 《作家与精神分析学》 New York, 1950.
- Blum, W. C. "Impossible Purity," 《不可能做到的纯洁》 in *Dial*, LXXVIII(1925), 318—23.
- Bodenheim, Maxwell. "Psychoanalysis and American Fiction," 《精神分析学和美国小说》 in *Nation*, CXIV(1922), 683—84.
- Bottoms, Phyllis. *Alfred Adler: a Biography*, 《阿尔弗雷德·艾德勒传》 New York, 1939.
- Bourne, Randolph. *History of a Literary Radical, and Other Essays*, 《一位文学激进派的历史及其他文章》 New York, 1920.
- Brennan, Joseph G. *Thomas Mann's World*, 《托马斯·曼的世界》 New

York, 1942.

- Brett, Dorothy. *Lawrence and Brett: a Friendship*, 《劳伦斯和薇丽特的友谊》Philadelphia, 1933.
- Brewster, Dorothy and Angus Burrell. *Modern Fiction*, 《现代小说》New York, 1934.
- Brewster, Edwin Tenney. "Dreams and Forgetting: New Discoveries in Dream Psychology," 《梦和忘却, 梦幻心理学中的新发现》in *McCure's Magazine*, XXXIX(1912), 714—19.
- Brill, A. A.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reud's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弗洛伊德的著作在美国的介绍与发展》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LV(1939), 318—25.
- Brod, Max. *Franz Kafka: A Biography*, 《弗朗兹·卡夫卡传》tr. G. Humphrey Roberts, New York, 1947.
- Budge, Frank. *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 《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创造》New York, 1934.
- Burgum, Edwin Berry. "Franz Kafka and the Bankruptcy of Faith," 《弗朗兹·卡夫卡和信念的破产》in *Accent*, III (1943), 153—67.
- _____. "Ulysses and the Impasse of Individualism," 《尤利西斯和个人主义的绝境》in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XVII(1941), 561—73.
- Burke, Kenneth.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对待历史的态度》New York, 1937.
- _____. "Freud and the Analysis of Poetry," 《弗洛伊德及诗歌分析》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LV(1939), 391—417.
- Burrow, Trigaant. "Psychoanalytic Improvisations and the Personal Equation," 《精神分析学的临时拼凑物和个性均衡》in *Psychoanalytic Review*, XIII(1926), 173—86.
- Calas, Nicholas. "The Light of Words," 《词语的启示》in *Arson*, I (1942), 13—20.
- _____. "The Meaning of 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的意义》in *New*

- Directions in Prose and Poetry, 1940, Norfolk, Conn., 1940.
- Cargill, Oscar. Intellectual America: Ideas on the March, 《理智的美国, 前进中的观念》New York, 1941.
- Carswell, Catherine. The Savage Pilgrimage: a Narrative of D. H. Lawrence, 《野蛮的一生: 劳伦斯的叙事手法》New York, 1932.
- Caudwell, Christopher. Illusion and Reality: 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Poetry, 《幻想与现实: 诗歌溯源研究》London, 1937.
- Chesterton, Gilbert K. "The Game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的游戏》in Century, CVI(1923), 34—43.
- Cleaton, Irene and Allen. Books and Battles, 1920—1930,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间的书籍和战斗》Boston, 1937.
- Colum, Mary. From These Roots, 《从这些根源开始》New York, 1937.
- Corke, Helen. Lawrence and Apocalypse, 《劳伦斯和启示录》London, 1933.
- Cowley, Malcolm. Exile's Return: a Narrative of Ideas, 《流亡者归来: 诸观点叙述》New York, 1934.
- Daiches, David. The Novel and the Modern World, 《小说与现代世界》Chicago, 1939.
- Dell, Floyd. The Briary Bush, 《石南树丛》New York, 1921.
- _____. Homecoming: an Autobiography, 《回家: 自传》New York, 1933.
- _____. Love in the Machine Age, 《机器时代的爱情》New York, 1930.
- _____. Moon Calf, 《怪物》New York, 1920.
- De Reul, Paul. L'Oeuvre de D. H. Lawrence, 《劳伦斯的著作》Paris, 1937.
- De Voto, Bernard. "Freud'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in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XX(1939), 10—11.

- _____. "The Well-Informed, 1920—1930,"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间的见闻》in *Forays and Rebuttals*, Boston, 1936.
- Dingle, Reginald J. "Psychology and Original Sin," 《心理学与原罪》in *Dublin Review*, CC(1937), 134—44.
- Dujardin, Eduard. *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 《月桂树断了》tr. Stuart Gilbert, Norfolk, Conn., 1938.
- Eastman, Max. "Exploring the Soul and Healing the Body," 《探索心灵, 治愈身体上的伤痛》in *Everybody's Magazine*, XXXII (1915), 741—50.
- Empson, William. *The 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歧义的七种类型》New York, 1931.
- Farrar, John. "Sex Psychology in Modern Fiction," 《现代小说中的性心理学》in *Independent*, CXVII(1926), 669—70.
- Faulkner, William. *As I Lay Dying*, 《我弥留之际》New York, 1930.
- _____. *The Sound and the Fury*, 《喧哗与骚动》New York, 1929.
- Fite, Warner. "Psycho-analysis and Sex Psychology," 《精神分析和性心理学》in *Nation*, CIII(1916), 127—29.
- Flores, Angel, ed. *The Kafka Problem*, 《卡夫卡的问题》Norfolk, conn., 1946.
- Frank, Waldo. *In the American Jungle*, 《在美国丛林中》New York, 1937.
- _____. *Our America*, 《我们的美国》New York, 1919.
- _____. *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American Life*, 《美国的重新发现: 美国的哲学思想导论》New York, 1929.
- _____. *Salvos: an Informal Book About Books and Plays*, 《齐发: 关于书籍和戏剧的一本非正式的书》New York, 1924.
- _____. *Time Exposures, by Search Light...*, 《时代的朝向: 通过寻找光明》New York, 1926.

Freud, Sigmund.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自传研究》tr. James Strachey, London, 1936.

_____.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超越快乐原则》tr. C. J. M. Hubback, London, 1922.

_____.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文明及其不满》tr. Joan Riviere, New York, 1930.

_____.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Sigmund Freud, 《西格蒙·弗洛伊德论文集》London, 1924.

Vcl. II:

"The Dynamics of the Transference," 《移情的动力》tr. Joan Riviere(1912), 312—22.

"The Employment of Dream-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中释梦的适用》tr. Joan Riviere(1912), 305—11.

"Further Recommendations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 《精神分析法进一步介绍：关于治疗的开始阶段……》tr. Joan Riviere(1913), 342—65.

"Further Recommendations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精神分析法进一步介绍：对移情—爱情的看法》tr. Joan Riviere(1915), 377—91.

"Further Recommendations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Recollection, Repetition...," 《精神分析法进一步介绍：回忆，重复……》tr. Joan Riviere(1914), 366—76.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精神分析疗法的未来前景》tr. Joan Riviere(1910), 285—96.

"Observations on 'Wild' Psychoanalysis," 《对“狂热的”精神分析的看法》tr. Joan Riviere(1910), 297—304.

"Recommendations for Physicians on the Psychoanalytic Method of Treatment," 《向医生推荐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tr. Joan Riviere(1912), 323—33.

"Turnings in the Way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精神分析疗法的

转折》)tr. Joan Riviere(1919), 392—402.

Vol. III:

"The 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在一个五岁男孩身上作的恐惧症分析》)tr. Alix and James Strachey(1909), 149—289.

Vol. IV: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A Special Typt of Choice of Object Made by Men,"《对爱情心理学的贡献: 男人作出的一种特殊对象选择》)tr. Joan Riviere(1910), 192—202.

"Formulations Regarding the Two Principles in Mental Functioning,"《关于精神功能两原则的规定》)tr. M. N. Searl(1911), 14—21.

"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米开朗基罗的摩西》)tr. Strachey(1914), 257—87.

"The Relation of the Poet to Day-Dreaming,"《诗人与白日梦的关系》)tr. I. F. Grant-Duff(1908), 173—83.

"Some Character-types Met with in Psychoanalytic Work,"《精神分析的工作中碰到的几种人物类型》)tr. E. Colburn Mayne(1915), 318—44.

"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关于战争与死亡的时代断想》)tr. E. Colburn Mayne(1915), 288—317.

"The Unconscious,"《无意识》)tr. Cecil M. Baines(1915), 98—136.
_____. The Ego and the Id, 《自我与伊底》)tr. Joan Riviere, London, 1927.

_____.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幻想中的未来》)tr. W. D. Robson-Scott, New York, 1928.

_____.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概论》)tr. G. Stanley Hall, New York, 1920.

_____.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群体心理学及自我的分析》)tr.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 d.

_____.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精神分析运

- 动的历史》)tr. A. A. Brill (1916), in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ed. and tr. A. A. Brill, New York, 1938.
- _____.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释梦》)tr. A. A. Brill, New York, 1913.
- _____. *Leonardo da Vinci: Psychosexual Study of an Infantile Reminiscence*, (《列奥纳多·达·芬奇: 孩提时回忆的性特征研究》) tr. A. A. Brill, New York, 1910.
- _____.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新介绍性讲演》)tr. W. J. H. Sprott, New York, 1933.
- _____.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的起源和发展》) tr. Harry W. Chas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XXI(1910), 181—219.
- _____. *The Problem of Anxiety*, (《忧虑的问题》)tr. Henry A. Bunker, New York, 1936.
- _____.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tr. A. A. Brill(1914), in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tr. and ed. A. A. Brill, New York, 1938.
- _____. *Three Contributions to a Theory of Sex*, (《性论三讲》)tr. A. A. Brill(1910), in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tr. and ed. A. A. Brill, New York, 1938.
- _____. *Totem and Taboo*, (《图腾与禁忌》)tr. A. A. Brill, New York, 1927.
- _____. *Why War?: An International Series of Open Letters*, (《为什么要有战争?: 国际系列公开信》)Paris, 1933.
- _____. *Wi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tr. A. A. Brill, New York, 1916.
- Fry, Roger. "The Artist and Psychoanalysis," (《艺术家与精神分析学》)in *The New Criticism: an Anthology of Modern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d. E. W. Burgum, New York, 1930.
- Gascoyne, David. *A Short Survey of Surrealism*, (《简述超现实主义

- 义》》London, 1935.
- Giedion-Welcher, Carola. "Work in Progress: a Linguistic Experiment by James Joyce," 《进展中的工作: 詹姆斯·乔伊斯的语言实验》》tr. Eugene Jolas, in *Transition*, XIXXX(1930), 174—83.
- Gilbert, Stuart. *James Joyce's Ulysses: a Study*,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New York, 1934.
- Glover, E. *Freud or Jung*, 《弗洛伊德或荣格》》New York; 1950.
- Golding, Louis. *James Joyce*, 《詹姆斯·乔伊斯》》London, 1933.
- Gorman, Herbert. *James Joyce*, 《詹姆斯·乔伊斯》》New York, 1939.
- Gray, Ronald. *Kafka's Castle*, 《卡夫卡的〈城堡〉》》Cambridge, 1956.
- Gregory, Horace. *Pilgrim of the Apocalypse: a Critical Study of D. H. Lawrence*, 《启示录的朝圣: 对劳伦斯的批评性研究》》New York, 1933.
- Hanley, Miles L. *Word Index to James Joyce's Ulysses*,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词汇索引》》Madison, Wis., 1937.
- Hapgood, Hutchins. *A Victorian in the Modern World*, 《现代世界中的维多利亚时代人》》New York, 1939.
- Harding, R. E. M. *An Anatomy of Inspiration and an Essay on the Creative Mood*, 《灵感剖析兼论创作的情绪》》Cambridge, 1940.
- Hatcher, Harlan H. *Creating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创作现代的美国小说》》New York, 1935.
- Hill, Archibald A. "A Philologist Looks at *Finnegans Wake*," 《一位语言学家看芬尼根苏醒》》in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XV (1939), 650—56.
- Holt, Edwin B. *The Freudian Wish and Its Place in Ethics*, 《弗洛伊德的愿望及其在伦理学中的地位》》New York, 1915.
- Hook, Sidney. "Marx and Freud, Oil and Water," 《弗洛伊德与马

- 克思, 油和水》in *Open Court*, XLII(1928), 20—25.
- Huxley, Aldous. *Antic Hay*, (《滑稽的酬报》) London, 1923.
- _____. "The Farical History of Richard Greenow," (《理查德·格里诺的滑稽故事》) in *Limbo*, London, 1920.
- _____. "Our Contemporary Hocus-Pocus," (《我们当代的欺骗手法》) in *Forum*, LXXIII (1925), 313—20.
- Jacobi, Johan. *The Psychology of Jung*, (《荣格的心理学》)tr. K. W. Bash, New Haven, 1943.
- Joad, C. E. M. "Psychology in Retreat," (《退却中的心理学》) in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IX(1935), 956—57.
- Jolas, Eugene. "The Dream," (《梦》)in *Transition*, XIX—XX(1930), 46—47.
- _____. *I Have Seen Monsters and Angels*, (《我看到了魔鬼和天使》) Paris, 1938.
- _____. "Inquiry into the Spirit and Language of Night," (《蒙昧时代的精神和语言探究》) in *Transition*, XXVII(1938), 233—45.
- _____. "The King's English Is Dying: Long Live the Great American Language," (《标准英语正在衰亡: 伟大的美国语言万岁》) in *Transition*, XIX-XX(1930), 141—46.
- _____. "Literature and the New Man," (《文学和新人》)in *Transition*, XIX-XX(1930), 13—22.
- _____. "My Friend James Joyce," (《我的朋友詹姆斯·乔伊斯》) in *Partisan Review*, VIII(1941), 82—93.
- _____. "Necessity for the New World," (《新世界的必然性》) in *Modern Quarterly*, V (1929), 273—75.
- _____. "Surrealism: Ave atque Vale," (《别了, 超现实主义》) in *Fantasy*, VII (1941), 23—30.
- _____. ed. *Vertical: A Yearbook for Romantic-Mystic Ascensions*, (《纵观: 浪漫主义—神秘主义的上升年鉴》) New York, 1941.

- Jones, Ernest.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论集》 Baltimore, 1938.
- _____. *Hamlet and Oedipus*, 《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 New York, 1949.
- _____.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西格蒙·弗洛伊德生平及著作》 Vol. I: *The Formative Year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 New York, 1953. Vol. II: *Years of Maturity*, New York, 1955.
- Jung, Carl G.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寻找灵魂的现代人》 New York, 1934.
- _____. *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二论分析心理学》 London, 1928, New York, 1956.
- Kafka, Franz. *Amerika*, 《美国》 tr. Edwin Muir with a Preface by Klaus Mann, Norfolk, Conn., n. d.
- _____. *The Castle*, 《城堡》 tr. Edwin and Willa Mui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homas Mann, New York, 1943.
- _____. *Diaries*, 《日记》 tr., Joseph Kresh and Martin Greenburg, ed., Max Brod. London, 1948, 1949.
- _____.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中国的长城》 tr. Edwin Muir, London, 1933.
- _____. *The Penal Colony*, 《苦役营》 tr. Willa and Edwin Muir, New York, 1948.
- _____. *The Trial*, 《审判》 tr. Willa and Edwin Muir, New York, 1937.
- Kierkegaard, Soren. *Fear and Trembling*, 《恐惧和颤抖》 tr. Walte: Lowrie, Princeton, 1941.
- Klein, David B. "Psychology and Freud: an Historico-critical Appraisal," 《心理学和弗洛伊德: 历史批评估价》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XL(1933), 440-56.
- Kris, Ernst. *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 in Art*, 《艺术的精神分析探

- 察》New York, 1952.
- Kroeber, A. L. "Totem and Taboo in Retrospect," 《图腾与禁忌追忆》)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LV (1939), 446-51.
- Krutch, Joseph Wood. *The Modern Temper*, 《现代气质》) New York, 1929.
- _____. *Edgar Allan Poe: A Study in Genius*, 《埃德加·艾伦·波天才研究》) New York, 1926.
- Landis, Carney.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精神分析学和科学方法》) abstract in *Science*, n. s., XCIII (1941), 486.
- Lawrence, D. H. *Apocalypse*, 《启示录》) New York, 1932.
- _____. *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 《无意识幻想曲》) New York, 1930.
- _____.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劳伦斯书信集》) ed. Aldous Huxley, New York, 1932.
- _____. *Mornings in Mexico*, 《墨西哥的早晨》) New York, 1934.
- _____. *Phoenix: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 H. Lawrence*, 《不死鸟, 劳伦斯死后论文集》) ed. Edward D. McDonald, New York, 1936.
- _____. *Psychoanalysis and the Unconscious*, 《精神分析学和无意识》) London, 1923.
- _____.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国古典文学研究》) New York, 1930.
- Lawrence, Frieda. *Not I but the Wind...*, 《不是我, 而是风……》) New York, 1934.
- Levin, Harry. *James Joy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詹姆斯·乔伊斯评介》) Norfolk, Conn., 1941.
- Lewis, Wyndham. "Paleface," 《白种人》) in *Enemy*, II (1927), 3-10.

- Lewisohn, Ludwig. *The Island Within*, 《内部的岛》 New York, 1928.
- _____. *Mid-Channel: an American Chronicle*, 《中间的途径: 美国纪事》 New York, 1929.
- _____. *The Permanent Horizon: A New Search for Old Truths*, 《永恒的地平线: 古老的真理新探》 New York, 1934.
- _____. Stephen Escott, 《斯蒂芬·艾斯科特》 New York, 1930.
- _____. *Upstream*, 《逆流而上》 New York, 1922.
- Lewisohn, Ludwig and Edna. *Haven*, 《避难所》 New York, 1940.
- Lhote, Andre. "The Unconscious in Art," 《艺术中的无意识》 in *Transition*, XXVI (1937), 82—96.
- Liadner, Robert, ed. *Explorations i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探索》 New York, 1953.
- Lindsay, Jack.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An Essay Towards an Integration," 《现代意识: 论走向结合》 in *London Aphrodite*, I (1928), 3—24.
- Lindsay, Jack, and P. R. Stephensen. "Editorial Manifesto," 《社论宣言》 in *London Aphrodite*, I (1928), 2.
- Lippmann, Walter. "Freud and the Layman," 《弗洛伊德与外行》 in *New Republic*, II (1915), Sup. 9—10.
- _____. *Preface to Politics*, 《政治学前言》 New York and London, 1913.
- Luhan, Mabel Dodge. *Lorenzo in Taos*, 《道家眼里的劳伦佐》 New York, 1935.
- _____. *Movers and Shakers*, 《转动者和摇动者》 New York, 1936.
- McCole, Camile J. "Sherwood Anderson, Congenital Freudian," 《舍伍德·安德森, 意气相投的弗洛伊德派》 in *Catholic World*, CXXX (1929), 129—33.
- Macauley, Rose. *Dangerous Ages*, 《危险的时代》 New York,

1921.

- Mann, Thomas. "Freud and the Future," 《弗洛伊德与未来》
tr. H. T. Lowe-Porter, in Freud, Goethe, Wagner, New
York, 1937, 3—45.
- _____. "Freud'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hought," 《弗
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in Criterion, XII (1933),
549—70.
- _____. ed., The Living Thoughts of Schopenhauer, 《叔本华的活
的思想》 New York, 1939.
- _____. A Sketch of My Life, 《我的一生略览》 tr. H. T. Lowe-
Porter, Paris, 1930.
- _____. The Theme of the Joseph Novels, 《约瑟夫系列小说的主
题》 Washington, D. C., 1942. An address delivered in the
Coolidge Auditorium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ovember
17, 1942.
- Marcuse, Herbert. Eros and Civilization, 《性欲与文明》 Boston,
1955.
- Menzinger, Karl. "Pseudoanalysis: Perils of Freudian Verbalisms,"
《虚假的分析：弗洛伊德式言词的危險》 in Outlook, CLV (1930),
363—65.
- Merrild, Knud. A Poet and Two Painters: A Memoir of D. H.
Lawrence, 《一位诗人和两位画家：劳伦斯回忆录》 London,
1938.
- Michaud, Regis. The American Novel Today: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y, 《今日美国小说：社会和心理学研究》 Boston,
1931.
- Miller, Henry. "The Rise of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的兴起》
in New English Weekly, X (1936), 69—70.
- _____. "The Universe of Death," 《死神的宇宙》 in Phoenix, I
(1938), 33—64.

- _____. *The Wisdom of the Heart*, 《心灵的智慧》 Norfolk, Conn., 1941.
- Miller, Henry, and Michael Fraenkel. *Hamlet*, 《哈姆雷特》 San-turce, Puerto Rico, 1939.
- Mordell, Albert. *The Erotic Motive in Literature*, 《文学中的性爱动机》 New York, 1919.
- Morgan, George Allen. *What Nietzsche Means*, 《尼采意味着什么》 Cambridge, Mass., 1941.
- Muller, Herbert J. *Science and Criticism*, 《科学与批评》 New Haven, 1943.
- _____. "Surrealism: a Dissenting Opinion," 《超现实主义：一种持异议的观点》 in *New Directions in Prose and Poetry*, 1940, Norfolk, Conn., 1940.
- Munson, Gorham B. *Waldo Frank: a Study*, 《瓦尔多·弗兰克研究》 New York, 1923.
- Murray, Henry. *Introduction, Pierre and the Ambiguities*, 《皮埃尔与歧义》 New York, 1949.
- Murry, John Middleton. *Between Two Worlds: an Autobiography*, 《在两个世界之间：自传》 London, 1935.
- _____. "Reminiscences of D. H. Lawrence," 《回忆劳伦斯的往事》 in *New Adelphi*, III (1930), 264—75; *Adelphi*, n. s., I (1930), 42—52, 142—52, 195—203 (1931), 322—29, 413—20, 455—61.
- _____. *Son of Woman: The Story of D. H. Lawrence*, 《女人的儿子：劳伦斯的故事》 New York, 1931.
-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Birth of Tragedy*, 《悲剧的诞生》 tr. Clifton P. Fadiman, New York, n. d.
- _____. *Ecce Homo*, 《瞧这个人！》 tr. Clifton P. Fadiman, New York, n. d.
- Orwell, George. "Inside the Whale," 《在鲸的体内》 in *New*

- Directions in Prose and Poetry, 1940, Norfolk, Conn., 1940
- Osborn, Reuben. Freud and Marx, 《弗洛伊德与马克思》New York, n. d.
- Parry, Albert. Garrets and Pretenders: a History of Bohemianism in America, 《顶楼和骗子: 美国的放纵主义历史》New York, 1933.
- Penton, Brian. "Note on the Form of the Novel," 《略论小说的形式》 in London Aphrodite, VI(1929), 434—44.
- Peterson, Houston. The Melody of Chaos, 《混乱的旋律》New York, 1931.
- Prescott, Frederick Clarke. The Poetic Mind, 《富有诗意的头脑》New York, 1922.
- Prescott, Joseph. "James Joyce: A Study in Words," 《詹姆斯·乔伊斯: 词语研究》 in PMLA, LIV (1939), 304—315.
- Ramsay, A. W. "Psycholog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心理学和文学批评》 in Criterion, XV (1936), 627—43.
- Rank, Otto. Art and Artist, 《艺术和艺术家》 tr. C. T. Atkinson, New York, 1932.
- Ransom, John Crowe, "Freud and Literature," 《弗洛伊德与文学》 in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I (1924), 161—62.
- Read, Herbert. Collected Essays in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批评论文集》 London, 1938.
- Reed, Raoul. "Psychoanalysis in Literature," 《文学中的精神分析》 in Freeman, V(1922), 490—91.
- Reik, Theodor. From Thirty Years with Freud, 《三十年来和弗洛伊德的相处》 New York, 1940.
- Rosenfeld, Paul. Men Seen: Twenty-four Modern Authors, 《看得见的人: 二十四位现代美国作家》 New York, 1925.
- Sachs, H. The Creative Unconscious, 《创造性的无意识》 Cambridge, 1942.

- Santayana, George. "A Long Way Round to Nirvana: or Much Ado about Dying," 《为死亡而烦恼》 Review of Freud's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in Dial, LXXV(1923), 435—42.
- Scarfe, Francis. "The Poetry of Dylan Thomas," 《迪伦·托马斯的诗歌》 in Horizon, II (1940), 226—39.
- Schlauch, Margaret. "The Language of James Joyce," 《詹姆斯·乔伊斯的语言》 in Science and Society, III(1939), 482—97.
- Schroeder, Theodore. "Deterministic Presupposition of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的决定论前提》 in Open Court, XLI(1927), 90—102.
- Simmons, Ernest J. Dostoevski: The Making of a Novelist, 《陀斯妥耶夫斯基: 小说家的材料》 London, 1940.
- Sinclair, May. The Life and Death of Harriet Frean, 《哈里埃特·弗里恩的生活和死亡》 New York, 1922.
- Slochower, Harry. "Freud and Marx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当代文学中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in Sewanee Review, XLIX (1941), 315—24.
- _____, et al. A Franz Kafka Miscellany, 《弗朗兹·卡夫卡资料汇编》 New York, 1940.
- Soencer, Theodore. "'Stephen Hero': th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f James Joyce's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斯蒂芬英雄”: 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的未发表手稿》 in Southern Review, VII(1941), 174—86.
- Spender, Stephen. The Destructive Element: a Study of Modern Writers and Beliefs, 《毁灭性因素: 现代作家和信念研究》 Boston, 1935.
- Spiegel, Leo A. "The New Jargon: Psychology in Literature," 《新的行话: 文学中的心理学》 in Sewanee Review, XL(1932), 476—91.
- Stuart, Michael, "Mr. Joyce's Word-Creatures," 《乔伊斯先生的词

- 语生造》 in *Symposium*, II(1931), 459—67.
- Sullivan, Mark. *Our Times: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5*, 《我们的时代：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五年的美国》 New York, 1932. 4 vols.
- Swenson, David F. *Something about Kierkegaard*, 《基尔郭凯尔二三事》 ed. Lillian Marvin Swenson, Minneapolis, 1941.
- Tauber, Herbert. *Franz Kafka: An Interpretation of His Works*, 《弗朗兹·卡夫卡：对其作品阐释》 tr. , G. Humphrey Roberts and Rogers Senhouse, London, 1948.
- T. , E. D. H. Lawrence: *A Personal Record*, 《劳伦斯：个人记载》 London, 1935.
- Thomas, Dylan. *Answer to Inquiry about Freud's Influence*, 《答有关弗洛伊德影响的询问》 New Verse, XI(1934), : 9.
- Thurber, James. *Let Your Mind Alone*, 《别管你的头脑》 New York, 1937.
- Thurber, James, and E. B. White. *Is Sex Necessary?* 《性是必不可少的吗?》 New York, 1929.
- Tindall, William York. *D. H. Lawrence and Susan His Cow*, 《劳伦斯和他的母牛苏珊》 New York, 1939.
- Tridon, André. *Easy Lessons i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简明教程》 New York, 1922.
- _____. *Psychoanalysis: Its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精神分析学：历史、理论及实践》 New York, 1923.
- Trilling, Lionel. *Freud and the Crisis of Our Culture*, 《弗洛伊德和我们的文化危机》 Boston, 1955.
- _____. "The Legacy of Sigmund Freud, II: Literary and Aesthetic," 《西格蒙·弗洛伊德的文学美学遗产》 in *Kenyon Review*, II(1940), 162—68.
- Van Vechten, Carl. *Peter Whiffle: His Life and Works*, 《彼德·魏尔弗：生平和作品》 New York, 1922.

- Vivas, Eliseo. "The Legacy of Sigmund Freud: Philosophical,"
 《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哲学遗产》 in *Kenyon Review*, II(1940),
 173—85.
- Ware, Caroline F. *Greenwich Village, 1920—1930: A Comment
 on American Civilization in the Post-War Years*, 《一九二〇年
 到一九三〇年间的格林威治村：论战后美国文明》 Boston, 1935.
- Weigand, Hermann J. *Thomas Mann's Novel, Der Zauberberg*,
 《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 New York, 1933.
- West, Rebecca. *The Strange Necessity*, 《奇怪的必然性》 Garden
 City, New York, 1928.
- Wickham, Harvey. *The Impuritans...*, 《非清教徒……》 New York,
 1929.
- Wilson, Edmund. "The Dream of H. C. Earwicker," 《伊尔韦克的
 梦》 in *The Wound and the Bow: Seven Studies in Literature*,
 Boston, 1941.
- _____.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对文学的
 历史阐释》 in *The Intent of The Critic*, ed. Donald A. Stauffer
 Princeton, 1941.
- _____. "James Joyce," 《詹姆斯·乔伊斯》 in *Axel's Castle: a
 Study in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 New York,
 1931.
- Wittel, Fritz. "Revision of a Biography," 《传记的修正》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XLV(1933), 745—49.
- _____. *Sigmund Freud: His Personality, His Teaching, and His
 School*, 《西格蒙·弗洛伊德：其人，教学及其学派》 tr. Eden and
 Cedar Paul, New York, 1924.